

前言

中国的历史上曾活跃着很多外国人,他们也是推动中华文明进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把中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把中国缺少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中国。他们在推动文化交流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人敬仰的杰出人物。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就有外国人来华的记录。只是由于那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交通极为不便,因此来华的外国人并不多,发挥的作用也不明显。秦汉时期,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地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先进成果,来华的外国人数开始逐渐增多。他们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充满仰慕之情,不远万里前来学习。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秦汉时来华的外国人大多来自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中亚、西亚地区和天竺。其中,佛教的传播者是这些外国人中最受人瞩目的一支力量,代表人物有安世高、迦叶摩腾与竺法兰等。他们把天竺古国的佛教传入中国,并翻译了大量古天竺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中国的外国人仍以佛教传播者为主,他们有的来自天竺,有的来自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佛学大师是达摩祖师。他在中国留下了很多富有神话色彩的传奇。此外,中国摄论师的始祖真谛、中国佛教的三论始祖鸠摩罗什以及涅槃学派的创始人昙无讖也是那时来华的著名僧人。

进入唐朝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入了全面大发展时期,吸引

了周边许多国家的外国人前来拜访、学习,尤其以中亚、西亚国家和日本、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来华人员最多。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也是大批外国人来华的重要原因。唐朝时,日本天皇曾经十几次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华交流、学习,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就是日本来华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做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学习了中国的很多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把中国的围棋、茶叶、兵法等带回国,为本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阿倍仲麻吕与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崔致远还与很多唐朝著名文人、官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现在中日、中韩两国人民传颂的佳话。

宋朝时,来中国的外国人主要从事的是贸易活动。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回回商人。宋朝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唐朝,但在科学方面的发展却很快。指南针以及海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为外国人来华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宋朝的对外政策也比较宽松,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多海外贸易繁盛的港口,如广州、泉州、明州等。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仍有外国人来华学习,其中以日本来华学习禅学的僧人最为突出。日本高僧荣西以及日本第一位国师圆尔辩圆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华学习佛学禅法的,并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带回日本。

元朝时,在元朝政府的号召下,来华的外国人继续增多,主要以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为主,如杰出的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阿拉伯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天文之星札马鲁丁等。此期来华最著名的外国人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中国居住了17年之久,担任过很多重要官职。回国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第一扇窗口,由此引发了西方人到东方寻宝的热潮,进而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元朝的历史中还有一位高丽人很有名,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太监朴不花。他在元顺帝时担任了朝廷中的重要官职,并引发了元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明清时期,来华的外国人主要以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主。明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但他们仍然排除艰难险阻,进行传教。杰出的传教士与科学家利玛窦不仅对中国的宗教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为明朝时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他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联合译著了很多科学书籍。古苏禄国三位国王也举家来明朝朝拜,东王因此而长眠中国。现在山东德州北营村的回民大部分是古苏禄国东王的后裔。

清朝是中国来华外国人最多的封建王朝。他们以传教为主,把基督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开来,同时他们还从事一些行医、科研等方面的活动,为中国人了解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其中,南怀仁、汤若望、徐日升等人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不仅在传教方面获得了很多特权,还在朝廷内担任了重要官职。马礼逊是把基督新教带到中国的第一人。马戛尔尼率团访华使英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策略提供了依据。

综观几千年来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人,他们中最多的是使者、宗教人士、学者、旅行家等。秦汉时期来华的宗教人士主要为佛教徒,他们把佛教带到了中国。唐朝以后的宗教人士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来华学习的外国人有的来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有的来学习中国的佛教。来华旅行的外国人以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为主。他们的行为大多是个人行为,没有受到政府的派遣。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是专门来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如古苏禄国国王和英国大使马戛尔尼。

总之,大部分来华的外国人为增进中外的友好交往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交流史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欺骗、盗取、抢夺中国的财富,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对这些历史上

的小丑,我们要坚决予以唾弃。

本书选取的多是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来华外国人,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所处的时代予以分析,以期对他们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同时也期望对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目 录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外国人	1
第一节 我国最早的外国和尚——天竺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	1
第二节 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安息国太子安世高	7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外国人	17
第一节 涅槃学派的创始人——天竺僧人昙无讫	17
第二节 中国禅宗始祖——香至国王子菩提达摩	28
第三节 摄论师的始祖——优禅尼国圣僧真谛	40
第三章 唐朝时期的外国人	51
第一节 最早的景教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	51
第二节 空怀复国梦——萨珊国王子卑路斯与泥涅师师	57
第三节 中日交流的先驱——日本僧人阿倍仲麻吕	65
第四节 日本围棋的始祖——大和留学生吉备真备	75
第五节 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新罗文学泰斗崔致远	82
第四章 宋朝时期的外国人	92
第一节 茶禅之始——日本来客荣西	92
第二节 日本第一位国师——禅学中兴者圆尔辩圆	104
第五章 元朝时期的外国人	113
第一节 杰出的阿拉伯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	113
第二节 元朝的天文之星——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	124

第三节	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意大利神奇人物马可·波罗	136
第四节	杰出的非洲旅行家——摩洛哥朝觐者伊本·白图泰	152
第五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太监——高丽人朴不花	164
第六章	明朝时期的外国人	171
第一节	长眠在中国的国王——苏禄国王巴都葛叭答喇	171
第二节	杰出的传教士与科学家——泰西儒士利玛窦	181
第三节	欧洲的中国通——佛朗机传教士曾德昭	199
第七章	清朝时期的外国人	210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洋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210
第二节	献身中国的科学奇才——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222
第三节	康熙大帝的音乐教师——葡萄牙神父徐日升	236
第四节	第一位来华通商的英国使臣——英国勋爵马戛尔尼	243
第五节	精通汉学的外国奇才——英国新教传播者马礼逊	252
第六节	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	264
第七节	闽南使徒——英国教士领袖杜嘉德	273
第八节	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	281
附录	古代来华主要外国人一览表	294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外国人

第一节 中国最早的外国和尚

——天竺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来中国弘扬佛法的两位天竺国僧人，他们之所以来到中国，是因为东汉明帝的一个奇异的梦。他们是中国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外国僧人，为中国的佛教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合作翻译的《佛说四十二章经》是中国佛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经典经书。

梦 回

惊梦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汉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正是因为这个梦，他派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并因此带回了两位天竺高僧。

这天汉明帝梦见自己不知为什么忽然来到了大殿的外面。与往日不同的是，那天夜里殿外一名士兵也没有，夜出奇得寂静。他信步来到了殿外的回廊上，凭栏远眺，正当他陶醉在优美的夜色中时，忽然从天边飞来了3个金黄发亮的小圆点。随着距离的拉近，小圆点越来越大，汉明帝最后看出他们是3个金光闪闪的金人。不一会儿，他们就飞到了汉明帝的面前。只见这3个金人身材都十分魁梧，面带微笑，看起来十分慈祥，一个在前面飞，另外两个在后面紧紧跟随。他们在汉明帝面前停留了一小会儿，就直接飞入大殿中去了。

不知为什么,汉明帝没有感到一丝恐惧,他十分好奇,于是也跟进大殿。这3个金人飞得很低,速度也很慢,汉明帝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相貌。他们头上都有一轮金色的光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全都穿着火红色的绸制长衣,长衣的上面镶嵌着一条条光彩夺目的金线。长衣随着他们的飞翔而飘扬,使他们看起来很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神。他们好像并没有看见汉明帝,只是神态安详地在半空中飞舞。

汉明帝更加好奇了,刚要开口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却突然从梦中惊醒。他对自己做这样的梦很不解,这个梦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暗示呢?

于是,第二天一早,汉明帝就把大臣们召集了起来,向他们讲述了这个



个梦。大臣们也都不能解释这个梦产生的原因。群臣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这时,史官傅毅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上前禀奏道:“听祖上说,孔子时,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天竺国,那里诞生了一位大圣人,名字叫佛陀。他一生传道教化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陀的身上好像就披着陛下梦到的红色长衣。陛下梦到的金人莫非就是佛陀的化身?”另一位博士也向汉明帝

讲述了他的意见。他听说周

朝的时候就有佛陀诞生的记录。于是汉明帝就命史官把周朝记载奇异事情的书籍《异记》找了来,查找关于佛陀的记录。

不一会儿,那些负责查找的大臣就找到了这条记录。《异记》对当时事情的记载很全面,令汉明帝惊奇不已。

周昭王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江河泛滥、大地震动,天上的太微星发出五色光芒。大臣与百姓都很恐慌,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苏由为了确定这种征兆是凶兆还是吉兆,就用《易经》来占卦,一占就占到乾卦,卦象显示的是九五。九五是“飞龙在天”的意思。他知道很可能一位大圣人要降临到世间了。根据太微星的位置,他判断圣人应该出生在周朝的西方。卦象上还显示这个圣人会向世间传播一种教法,这种教法1000年之后会来到中国。

周昭王听苏由说发生的那些现象是吉兆,才慢慢放下心来。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个参考的证据,他命令史官把这件事情刻在石头上,并将石头埋在城南。1000年后人们可以根据石头上的文字判断是否有这件事情发生。

周穆王执政时期,有一年,大地又发生了震动。白天天空中出现了12条白虹。古人认为白虹贯日应该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当时有个太史叫扈多,他也用《易经》占算了这个奇异现象,得知西方有一个大圣人离世了。那个大圣人就是周昭王时出生的那位圣人。

从周昭王到汉明帝,中间跨越的时间正好是1000年左右。查阅了《异记》之后,史官告诉汉明帝,现在可能就是那位大圣人宣扬的教法来到中国的时候,并建议汉明帝派人到西方迎接教法。汉明帝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吉兆,就准备派人到西方去。但是,这件事情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耽搁了下来。四年之后,到了永平七年(64),史官对汉明帝说这是一个到西方迎接教法的好年头。于是,汉明帝就派了蔡愔、秦景和王

遵三人带着 18 个随从到西方迎接教法。

三年之后,这支历尽艰辛的队伍来到了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碰到了向东宣扬佛法的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僧人宣扬的佛法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佛法。于是,蔡愔等人就邀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中国传教。他们二人也正有这样的想法,就接受了邀请,与蔡愔等一起来到了中国。除了口传佛经外,他们还用一匹白马驮回了许多天竺文字书写的佛经以及佛像。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的到来受到了汉明帝的热烈欢迎。当汉明帝见到他们带来的佛像后,一下子惊呆了,这些佛像几乎与他几年前在梦中梦到的金人一模一样。听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宣讲的佛经,汉明帝更加确信世界上真的有佛的存在。为了表示对这两位僧人的敬意,他下令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一座寺庙。因为那些经书是用一匹白马驮回来的,这座寺庙就被命名为白马寺,也就是现在洛阳的白马寺。《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马的原型就是迦叶摩腾、竺法兰和运经书的白马。

迦叶摩腾也叫摄摩腾或摩腾,是天竺僧人。他长得十分高大俊美,精通大乘佛经和小乘佛经,来中国之前就经常云游四方宣扬佛法。在宣扬佛法的路程上,他有很多传奇的经历。一次,他前往一个很小的国家——天笔国,去宣讲《金光明经》。到达天笔国的边境时,正赶上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在攻打天笔国。战争中很多军士与百姓丧命,更多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眼看天笔国就要沦陷了。迦叶摩腾对侵略其他国家的残忍行为十分气愤,想:“佛经中说宣讲佛经、佛法的人可以得到神的保护,使当地的人们安居乐业。现在天笔国遭受战争的侵袭,人民痛苦不堪,难道这就是宣讲佛经带来的好处吗?”于是,为了把天笔国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前去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矛盾。他用广博的佛法规劝两国国王,最终使他们受到感化,达成了一



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佛教寺院。

致协议。两国终于和好,战争也平息下来。经过这件事之后,迦叶摩腾的声誉显赫起来。

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一样,也是天竺僧人。他的佛教造诣非常高,能够背诵经论数万章,是天竺学者中佛法比较精深的一位。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后,不顾一路旅途的劳顿,稍作休息之后,就开始宣扬佛法。他们将释迦牟尼佛画像交给汉明帝宫中的画师,由他们描摹复制多幅,供奉在国内新建的寺庙,让人们瞻仰礼拜。由于佛教刚传到中国,他们也刚刚来到中土,不会说流利的汉语,因此佛教最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学习汉语、汉字,力图把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



竺法兰与迦叶摩腾来到洛阳后,便开始大力宣扬佛法

传 奇

“佛说四十二章经”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认为弘扬佛法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人们诵读佛经。但是,他们带来的佛经全部是用天竺文字书写的,汉朝人根本看不懂。于是,他们决定把带来的佛经翻译成汉字佛经。

他们对带来的经书进行了精心的挑选,认为《佛说四十二章经》的教义应该是中国人最先接受的教义,就决定首先把它翻译成汉字经书。《佛说四十二章

经》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第一部重要经典著作。这本经书记述了佛成道以后,有许多佛僧将他们对宇宙人生不明白的地方以及有疑难的问题,纷纷提出来请佛解释。佛学家将佛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答案以及他对人们进行开示的语录集合起来,全书共有42段,每段皆自成一章,称《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说四十二章经》的内容很符合汉朝的社会状况,对当时人们能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于是,便成了翻译的首选。

经书翻译完成后,汉明帝将它视如国宝,特别敕令将经书珍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是汉朝最重要的藏书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佛说四十二章经》因此成为皇室的专利品,民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部经典经书。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经书的目的,绝不是让汉明帝将经书据为己有,但是,他们对汉明帝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却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开始把精力放在其他经书的翻译上,又先后翻译了《法华藏经》、《佛本行

经》、《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二百六十戒合异》等5部佛经。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高僧在中国长期定居,并把后半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中国的佛教发展中,最后卒于中国。他们可能是中国有明确历史记载最早到中国来的外国和尚。佛学界一般认为,他们来到中国,翻译经书之后,中国才正式有了佛教。因此,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始祖。



山西五台山的显通寺也是始建于汉朝时期的佛教寺院

第二节 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

——安息国太子安世高

安世高(约2世纪),本名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太子,后来继承大统。因为他的王族地位,西域来华的人都称他为“安侯”。他译的一部《十二因缘经》,被称为《安侯口解》。安世高来华的时间,《梁高僧传》

记为“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安世高传》）。汉桓帝的第一个年号是“建和”（147—149），安世高即在这一时期来到了中土洛阳。

安世高早年做过安息国（今伊朗）的国王，继任不久就将王位让给叔父，自己潜心修习佛法，是著名的不爱江山爱佛法的国王。在历史与传说中，这位国王的前世今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安世高翻译了大量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

梦 回

1. 前世因缘

在1000多年前的安息国，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太子。他不爱江山，却爱佛法。为了研究佛法，他宁可舍弃锦绣江山和荣华富贵，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译经禅修，影响深远。这位太子就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安息国太子安世高。

安世高是一个修行高深的僧侣，他很相信前世今生、因果循环。据说，他的前世是一个出家人，一生清白，有着很高的品行。当时与他一同出家的还有一位抱怨心理特别强的同伴。每当安世高的前世和这位同学一起外出化缘的时候，若是施主给了布施，那个同伴会感念施主的恩德；若是没有讨到布施，他就会暗地对那位施主进行抱怨，甚至达到了诅咒怨恨的程度。安世高的前世时常规劝他要一心向善，但他一点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20年间，同伴在佛学上一点也没有进步，还是半瓶子水晃荡。而安世高的前世造诣已经是非同一般了。

一天，安世高的前世突然向同伴辞行。他说要到遥远的中国广州

(当时称番禺,公元前214年设郡)去了结一桩宿债。走之前,他还没有忘记规劝同伴,说:“你在明达经藏和精进不懈两方面的成就都远超过我,但是你死后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你时常发一些恶毒的抱怨,死后一定会受到惩罚,会投生为丑恶的形体。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修成正果,一定来超度你。”

就这样,安世高的前世踏上了前往广州的路程。刚到广州,他就赶上了寇贼作乱。可能真的是佛家的因果轮回吧!安世高的前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那天,他在街上走着,遇到了一位少年。那位少年一见到安世高的前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用,就从容地举起了手中的刀子,高兴地说道:“可逮到你了!”安世高的前世对发生的事情早有预料,他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反而微笑着说:“我前生欠你一命,所以千里跋涉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了却这桩宿债。知道你为什么一见到我就像见到仇人一样吗?那是因为前世宿债的缘故。你现在就可以杀死我。”说完,安世高的前世就坦然地把脖子伸了出去,没有一丝恐惧。那位少年果真举起刀向他砍去,没有丝毫迟疑,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就这样,安世高的前世了却了这桩宿债。他的灵魂在一种特殊力量的引导下又回到了安息国,因为修行高深,所以投生为安息国的太子。

2. 尽舍江山,与佛相契

安世高从小在宫廷中长大,享尽长辈的疼爱 and 富贵荣华。他自小就是天下楷模,并以孝道闻名全国。安世高禀性聪敏仁慈,勤奋好学。凭借优越的成长条件,他翻阅了各国的典籍,对于天文、地理、医药、异术等都很精通,甚至飞禽走兽的语言,他都能听懂并可以和它们交谈。安息国的国民都把他当做最接近神的神童。

后世著名的天竺人康僧会(康僧会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在其《安般守意经序》中这样描绘安世高:“其为人

也,博学多识,贯综神摸,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疑为“动”字之误),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可以说,安世高是个神异之人,在西域地区,他的“俊异”之名早已是声名远扬。

每当安世高与动物说话时,周围都会聚集起很多好奇的人。但是,安世高刚开始告诉人们 he 可以和动物对话时,却引来了嘲笑和白眼。有一天,安世高与一群小伙伴走在路上。他仰头看见一群飞翔的燕子,就对身旁的小伙伴说:“燕子刚才告诉我,一会儿会有给我们送食物的人来。”小伙伴们先是瞪圆了眼睛,惊讶地看着他,待听清他说的话之后都哄笑起来。小伙伴们认为安世高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说起疯话来了,燕子怎么能够和他说话呢?即使那些燕子是和他说话,他又怎么能听懂动物的语言呢?

嘲笑过后,伙伴们谁也没有把安世高的话放在心上。安世高面对伙伴们的嘲笑也并没有加以辩解,他对自己的话很有信心。一会儿,令伙伴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果然有人给他们送食物来。原来,安世高的仆人怕他们玩饿了,准备了一些点心送来。这件事之后,有人开始相信安世高真的有与动物对话的能力,但有的小伙伴还是不相信。直到又经历了几件这样的事情后,他们才完全相信了。于是,安世高王子可以和动物交流的事情很快在安息国传播开来。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安息国的国民对这位王子越来越佩服。父亲去世后,安世高理所当然成了安息国的新一任国王。但是,人们渐渐发现,这位国王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王位,却对佛教越来越虔诚。

这或许与安世高的前世有关。安世高的前世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法力,能够知道前生与后世。投胎后,安世高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一些法力,并对佛学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父亲去世后,他对人世间苦空无常的道理考虑得更多了,对女色也很厌恶,并产生了出家的念头。但由于在父

亲的服孝期内,他只好把这种念头压了下去。服孝期满后,他坚定地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叔父,专心致志出家修行。此后,他在佛学上精进不懈,博通经藏,尤其擅长阿毗昙学,能穷尽其中的奥妙。

他认为,要想把佛法发扬光大,就要去四处云游,宣扬佛法。于是,他告别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王国,四处云游,度化有缘人,历经许多国家,最后来到中国。那时,中国正处在东汉末年,准确地说,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148年。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点燃战乱的烟火,所以,人们很需要有智慧的大师指点迷津。

安世高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东都洛阳。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这里信奉佛教的人做的事情并不是像佛教中提倡的那样。洛阳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神仙方术,把佛当成是祭祀的对象纷纷向佛像焚香膜拜,祈求长生。安世高认为这是对佛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那里的人没有汉语经书,经书对于他们来说太过神秘。为了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佛教,安世高决定翻译经书,让普通百姓都能看懂真正意义上的佛法。

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小乘佛经,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小乘佛教的天下,等到了大唐的时候,才由三藏法师历经艰辛取得大乘佛经,从而使佛教的研究更加详尽和完备。安世高一生共译佛经35部,41卷,现在保存下来的有22部,26卷。因此,安世高在中国享有“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师”的美誉。

3. 繁忙的译经岁月

如果仅有传说故事,安世高只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让我们看不清,猜不透。这位来自远方传播佛教的高僧,为中国佛教事业作出的最突出贡献是翻译佛经。这些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安世高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聪慧的人,再加上爱学习,来到中国之后不久,就学会了说汉语并学会了写汉字。基于此,他开始改变佛法在中国的状况。

佛教是从天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传入中国的,正式传入的时间是在东汉明帝时期,但实际上早在周朝的时候,佛教已开始陆陆续续地传播过来了。

佛教传入最初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是在一小部分贵族当中流传,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那是因为天竺国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语言是天语,于是把用天竺语言写的经书原原本本地带到中国来。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当时的人们根本不能明白经书里面的内容。即使有一些译本,也大多是由那些并不十分精通汉语的天竺僧人翻译过来的,有很多错误,根本不能把佛学的精髓表达出来。所以,中国才出现了把佛当做祭祀对象的奇怪现象。

安世高精通汉语,他对佛经的翻译工作做得很顺利。他注意到中国当时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尽管他们的信仰还存在一定的错误倾向),于是,安世高把佛经的翻译与中国佛教信仰者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翻译出了很多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可以说,安世高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单纯的翻译活动,而是一种创作活动。他既要把佛经的精华完整地表现出来,又要使译出的佛经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因此,在翻译上,他比较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因为工作量比较大,主要读者接近平民,所以他的语言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达到了谁都看得懂、谁都爱看的境界。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安世高并不拘泥于某一固定的形式。他有时自己亲自拿笔做记录,有时只是口译,由别人代笔写成书籍。这种由安世高口头解释、别人执笔翻译的佛经被称为“阿含口解”,后来名扬天下的《十二因缘经》就是这样翻译出来的。因为安世高是王族出身,自己本身当过国王,因此中国人民尊称他为“安侯”,“阿含口解”也被称为“安侯口解”,就是由安侯口述的意思。

安世高学习的是小乘佛教,因此他翻译过来的佛经也都是小乘佛经。在这些佛经中,安世高重点翻译了“定”与“慧”的学说,也就是止观的法门,体现了他基本的佛学思想。

“定”学即禅法。安世高的禅法是从禅师僧伽罗刹那里传承来的,提倡用四念住贯穿五门也就是五停心来修行。禅法是安世高佛教学说的核心,“禅”又称“禅定”,是佛教的一种宗教修养活动,要点是运用宗教教诲所得的信仰力量,限制来自内部情绪的干扰和外界欲望的引诱,令修习者的精神乐于集中在被规定的观察对象上,并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思考,以抑制烦恼,达到心绪宁静、身心愉悦的境界。安世高翻译的关于禅法的典籍主要有《安般守意经》以及从僧伽罗刹大本《修行道地经》抄译的三十七章。

安般守意中的“安般”,是“安那般那”的略称,“安名为出息,般名为入息。念息不离,是名为安般”(《安般守意经》卷上)。“安般守意”就是通过数出入息来守住心意,不使散乱。安世高结合中国古代传统的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反省自身,然后达到摄心向善的目的,很有中国特色。他把印度佛教文化同中国文化有效结合起来,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能够让人们简单接受的理念。由此,人们可以更加主动地学习和研究佛法了,这可以说是安世高的最伟大之处。

“慧”即数法,是指《阿毗达摩》的事数。《阿毗达摩》又译《阿毗昙》、《毗昙》,翻译为汉语是对法、无比法、胜法的意思。它对佛教基本理论概念的分类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十八界等,所以也被译为数法。数法包括《阿毗昙》的经和论,讲的是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安世高翻译的有关数法的典籍有相当一部分是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单品,还有一部分是解释《阿含经》教义的论书《阿毗昙》的节本,其中以《阴持入经》最有代表性。关于数法,安世高谨守毗昙家的规模,采用“增

一”、“集异门”等标准,选译了《五法经》、《七法经》、《十二因缘经》、《十四意经》、《阿毗昙五法行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等经论。

对于安世高所译佛经的具体数目,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确切部数已不可考。上面提到的35部、41卷是根据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上列举的佛经条目总结出来的。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主要有《八大人觉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行经》、《大比丘三千威仪》、《坚意经》、《处处经》、《道地经》等。这些汉译佛经成为中国历代佛学家研究佛学的范本,同时也是研究中国佛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传 奇

江南了却前生誓

史书上记载的关于安世高的故事有很多。就说那一年,他来到长安附近宣讲佛法。那时已进入了汉灵帝时期,社会治安比他刚来的时候还乱,长安附近经常有乱军出没,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根本待不下去。为了更好地宣扬佛法,安世高决定乘船到相对安稳的江南地区去。

临行前,他对自己身边的人说:“我此去江南的途中一定会经过庐山。我在前世时答应了同学一件事情,就是在他投生为比较凶恶的人时,去超度他。现在,他就在那里,我正可以完成自己的这个承诺。”周围的人对安世高的话都很惊奇,大部分人都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旅途上,他一面宣扬佛法,一面寻找他要超度的那位同学。

不久他来到了共亭湖。湖旁有一座神庙,庙里香火鼎盛。当地的人们对神庙里供奉的神灵十分信服,在共亭湖上过往的船只都要在这里停留一下,向庙神祈求平安。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佑在烟波浩瀚的湖面遇到危险时,获得神灵的保护。

安世高是坐船来到共亭湖的。与他同行的30余艘船只的船主全部

备礼到神庙祈求福祉。安世高没有前往,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那位庙神的来历。庙神通过庙祝显身说:“船上有一位修行的沙门,你们邀请他到庙里来。”船主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僧人却受到了庙神的邀请。于是,赶紧把安世高请到了庙里。这位庙神竟然就是安世高前世那位喜欢抱怨的同学。

庙神向安世高说:“我与你前生都出家学道,但是我经常抱怨一些不满的事情,所以堕落成为这里的庙神。这里的人们非常信服我,因此积聚起了很多布施。我的寿命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能够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假如我死在共亭湖中,那么必将污染湖水,因此我准备去一个僻静的地方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为了不使我的灵魂堕入地狱,请你帮我把收集的奇珍异宝都用来立坛修法、营造塔寺。”

安世高听了庙神的话,说:“我知道你就在这附近,因此特地前来超度你,你快把原形现出来吧。”

“我的原形非常丑陋,会吓坏附近的百姓,还是不用了。”庙神悲哀地说道。但在安世高的鼓励下,庙神终于从神像后面慢慢地探出头来。人们一看,都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躲到了门外。原来,庙神的身体竟然是一条大蟒蛇。它眼中含泪爬到安世高的身边。安世高没有一丝畏惧的表情,从容地对它念诵着超度的咒语。

不一会儿,这条大蟒蛇不见了。人们知道它已经走远了,才纷纷从



安世高化度共亭湖神全图

门外探进头来,向安世高投去了敬佩的目光。安世高拿出庙神生前积蓄的财物,踏上了南去的航船。安世高乘坐的船一到达豫章(今江西境内),就立即取出庙神的绢布宝物,来建造佛寺。一天黄昏,一名美少年忽然踏上了安世高乘坐的航船,跪在了安世高的面前,但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安世高知道这位美少年就是那条大蛇,也就是庙神,为了感谢他的超度向他作最后道别。他见庙神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丑陋面貌才安下心来。现在,江西境内有一个小村庄叫做蛇村。据说,这里就是那条大蟒蛇死去的地方。

安世高完成自己前世许下的承诺后,乘船继续向南走,来到了广州。他来这里的目的寻找杀害自己前世的那名少年。当他找到那个人时,当年的少年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一见到安世高,就觉得十分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安世高把自己前世与这个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完这一切,老翁热泪盈眶,对年轻时的行为十分后悔。安世高对他说,现在他们之间的所有仇恨都已经消除了,请他不要放在心上,并向他讲述了很多因果循环的道理。随后,安世高告别了老翁,继续云游四方宣讲佛法。那位老翁从此虔诚地信起了佛教,并向周围的人不断传颂安世高的德行。

安世高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到洛阳,到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基本完成了对佛经的译著。安世高晚年四海云游,行踪飘忽不定,具体下落不明,有历史记载他在绍兴去世。安世高在中国生活20多年,是中国佛经汉译的创始人,也是将禅观带入中国的第一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外国人

第一节 涅槃学派的创始人

——天竺僧人昙无讖

昙无讖(385—433),意译法护,中天竺人。家境贫寒,6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10岁时,在生活的重压下,也是出于机缘巧合,昙无讖出家做了和尚。学成佛法后,他四处云游,在北朝时来中国宣扬佛法。他在佛学、医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华期间他翻译了许多著



《大般涅槃经》部分插图

名的佛经,如《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菩萨戒本》等,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佛学思想以《大般涅槃经》中的涅槃思想为主,开创了中国佛学界的涅槃学派。

梦 回

1. 少年得志的天竺第一名辩

昙无讖基本上是与达摩、真谛同一时代出现的大师。但是,略有不同的是,他没有出生在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贵族,他童年里的记忆没有鲜花和美味佳肴,只有一间贫寒的屋子和一位经常叹息但疼爱他的母亲。

6岁时昙无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抛下他的母亲独自抚养几个年幼的孩子。昙无讖很懂事,经常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母亲虽然勤快,也只能夜以继日地帮别人做一些织补的零活。他们的生活日渐艰难。

一天,昙无讖的母亲外出时,看到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好像是在向一个人朝拜,并且这些人都带了很多东西作为礼物。她走近一看,原来人们在朝拜著名的佛教高僧达摩耶舍。看到达摩耶舍能够得到那么多的礼物,她心里十分羡慕,就准备让昙无讖皈依佛门,向达摩耶舍大师学习,以改变生活困境。回家之后,她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儿子。昙无讖听母亲说要把他送到达摩耶舍大师那里,很兴奋。在当时,能成为一名高僧的弟子是件很光彩的事情。就他的家庭条件来说,想要学习文化知识简直就如做梦,如果成为佛教高僧的弟子,读书的愿望就会轻而易举地实现,他怎么能不高兴呢!更何况,昙无讖本来就对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心里已经有了皈依佛门的念头,只是看到母亲整日一个人操劳,没有提出来。没想到母亲竟然主动提出这样的打算,他马上答应了下来。于是,年仅10岁的昙无讖被母亲送到了达摩耶舍那里,向他学习佛法。

昙无讖有很高的佛学天分,虽然在之前没有上过什么学,但很快就

认识了很多字,并且能够独立诵读经书了。他有很强的记忆力,一天就能背诵 300 多颂经文,远远超出了与他一起学佛的师兄、师弟。达摩耶舍本来没有看上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小孩,可是见他实在是聪明伶俐,就渐渐地喜欢上了他,并经常抽出时间向他单独讲授佛经。在师父的特殊照顾下,昙无讖进步很快。昙无讖最初学习的是小乘佛经,但人生中一次偶然的经历使他改学大乘佛经。

昙无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与同学们辩论,这样就能很容易并且进一步加深对佛经的理解。他辩论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寺庙内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渐渐地,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有佛僧专门从别的寺庙或很远的地方赶来与他辩论。昙无讖在这些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僧人面前,并没有丝毫胆怯与紧张,而是能够很流利地把自己的所学准确、精练地表达出来。有一次,一场长达若干天的辩论赛开始了。昙无讖像往常一样,发挥出色,仍然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他。就这样,不到 20 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乘佛教高僧,昙无讖很为自己感到自豪。

可是人生中总是充满了变化,年轻的昙无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转折。

那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位叫白头禅师的佛学高僧。他听说这里有一位年纪轻轻、才华横溢的人,就专门前来拜访。说是拜访,实际上白头禅师是来找昙无讖辩论的。他们的辩论持续了 100 多天,昙无讖也没能占上风。原来,这位白头禅师是著名的大乘佛教高僧,与昙无讖的宗教教义有很大的不同。昙无讖使尽了浑身解数,也不能把白头禅师驳倒,若干天下来,反而被白头禅师难住了。于是,他从心里对白头禅师产生了敬佩之情,对他阐述的大乘佛教理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这样,昙无讖终于把目光从小乘佛教转向大乘佛教,虚心地向白头禅师请教问题。白头禅师认为这个年轻人资质很好,非常有潜力,就把自己珍藏多

年的《大般涅槃经》传给了他。



譬方伎藝日月博極星宿運變音書識記如
是等經初未曾聞秘密之義今於此經而得
知之復有十一部經除此佛略亦无如是深
密之義今日此經而得知之善男子是石不
雕而能得圓圓已判益者若能聽受是大涅槃
經悉能具知一切方善大乘經典甚深義
味解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像了了分明
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觀之悉得明見大
乘經典甚深之義亦如有人在闇室中執大
炬火悉見諸物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菩薩觀
之得見大乘深奧之義亦如日出有平光明
悉能照了諸山嶺圍今一切人遠見諸物是

《大般涅槃经》部分篇章

从此以后，昙无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本《大般涅槃经》和其他大乘佛教经典。20岁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大小乘佛经6万多颂。后来他受到《大般涅槃经》的启发很大，因此在弘扬佛教的过程中，他就以自己心向往之的《大般涅槃经》为主，成了大乘佛教传播者队伍中的一员。

但是，仅有佛经仍旧满足不了昙无讖旺盛的求知欲。除了学习佛经，他还学习了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包括声韵学、语文学、工艺、技术、历算学、医药学、逻辑学、佛学等多种学问，还接触了咒术等密教知识，是位名副其实的天才，全才。

昙无讖智商非常高，连国王都不能拿他怎么样。

昙无讖的一个哥哥是国王的训象师。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是

这样，这位倒霉的哥哥某一天无意间把国王最喜爱的大象弄死了。国王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就把他杀死了。即使这样，国王的气还是没有消，命令任何人包括他的亲属都不能去看他的尸体，更不能收尸。于是，所有的亲属都不敢来收尸。昙无讖得知自己的哥哥被国王杀死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不顾国王的禁令前来寻找，并把尸体埋葬了。国王认为这是昙无讖在向自己挑衅，非常生气，就下令把他也杀死。昙无讖看到国王不讲道理，就对来执行的人说，希望在临死之前，能够见国王一面，国王满足了他的愿望。

面对拥有生杀大权的国王，昙无讖没有丝毫畏惧，沉着冷静地说：“您因他犯法而杀他，我因他是亲属而葬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您因何生气呢？”国王听完这句话后张着嘴半天，没有回答上来这个问题。后来一想人家说得有道理啊，为什么不能让亲属埋葬死者呢，于是只好赦免了违反自己命令的昙无讖。

国王为昙无讖这种在死神面前毫不畏惧的表现震惊，并且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他不但没有杀昙无讖，还把他留在了宫中，给予充分的信任。

2. 大咒师远遁中土

昙无讖最拿手的一项“技术”是咒术，而且十分灵验，在国内，素有“大咒师”之称，因此国王很器重他，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可不幸的是，国王身边的宠臣很多，而国王又不是十分热爱佛学的人，所以没过几天就把昙无讖给忘了。

一次，昙无讖不知因为什么事触犯了国王。按照国王的性格，昙无讖觉得自己此次难逃杀身之祸，于是就带着《大般涅槃经》和《菩萨戒经》逃到了西域的龟兹国（新疆库车一带），准备在那里传播大乘佛教。可是当时龟兹国的人们都信仰小乘佛教，他们对古老的《大般涅槃经》没

有兴趣。无奈之下,县无讖只好继续向东走,来到了鄯善国,后来到达了古老的敦煌。敦煌那时候地处中国通西域的交通要道,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大乘佛教很受人们的欢迎。县无讖在敦煌停留了几年,学会了汉语,开始了他人一生中翻译汉字佛经的生涯。现在流传下来的汉语《菩萨戒本》,就是县无讖在敦煌译出的。



敦煌佛教壁画

公元421年,河西王沮渠蒙逊占领了敦煌,成为北凉国国王。沮渠蒙逊十分推崇佛教,得知天竺高僧县无讖在敦煌,就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居住地姑臧。沮渠蒙逊虽然推崇佛教,但是对佛教本身的教义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天竺僧人掌握的巫术。这也是他将县无讖接来的最重要原因。巫术是县无讖的一项特长,因此他很受沮渠蒙逊的重用。

一次,县无讖对沮渠蒙逊说,现在这里有很多鬼魂聚集在一起,恐怕

要有什么大灾难发生。沮渠蒙逊起初不相信,就让县无谿证明给他看鬼魂究竟在哪里。于是,县无谿就使用自己的巫术,足足念了三天三夜的咒语,然后对沮渠蒙逊说鬼已经被赶跑了。沮渠蒙逊以为县无谿在戏弄他,正想发怒,忽然有士兵向他报告说边境上有很多鬼魂向外逃跑了。此后,沮渠蒙逊更加相信并器重县无谿了,即使是一些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要征求县无谿的意见。

县无谿还曾经救过沮渠蒙逊一命。那一年,沮渠蒙逊忽然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国内所有的名医都不知道这种怪病的来历,也就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样耽搁了不少日子,他的病愈加严重,眼看就要不行了。这时,县无谿主动要求为他治病。他对沮渠蒙逊说,医治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虔诚的心去诵读佛经,这样就可以很快消除疾病。沮渠蒙逊本来对自己的病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自己最信任的高僧既然这样说,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就抱了一线希望用最后的力气诵读佛经。没想到只读了几句,他就感觉身体似乎有了一些力量。于是,他就一直坚持读下去,身体竟慢慢地好了起来。

就这样,县无谿的名气陡然大了起来,北凉国周围的许多国家都听说了这位高僧的事迹,纷纷邀请他到自己国家宣扬佛法。但世事难料,谁能想到县无谿竟然因为自己的盛名而丧命呢。

公元433年,北魏皇帝拓跋焘听说县无谿会巫术,有很神奇的力量,就派人到北凉国向沮渠蒙逊索要县无谿。当时,中国北方诸国中,势力最强的是北魏,北凉的势力远远比不上它。沮渠蒙逊见北魏派人来接县无谿很为难,若让他乖乖地把县无谿交给拓跋焘,他绝对不甘心。可是如果不放人,很有可能挑起北魏与北凉之间的战争。他深知自己的国家肯定打不过北魏强大的部队。不过又一想,如果县无谿到北魏后,拓跋焘命令他使用巫术做出对北凉不利的东西,后果将不堪设想。左右权

衡之下,沮渠蒙逊想出了一个既不得罪北魏,也不会产生后患的办法。对于昙无讖来说,这绝对是个馊主意,那就是沮渠蒙逊命令手下的士兵在护送昙无讖去北魏的路上,偷偷将他除掉。

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的昙无讖随着迎接的队伍踏上了去往北魏的路程。队伍走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时,忽然间蹿出了几名武功高强的刺客。昙无讖大师就这样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死时年仅49岁。

相比于前几位大师的神话传说,昙无讖的形象更符合我们所认识的智者。他有头脑,有智慧,有勇气,有文化,但是也会沮丧,也会激动,也有恐惧,是一个最天真烂漫不过的人。

尽管他最后的结局离我们的想象有很大差距,但只靠翻译佛学著作,为我们留下一批可观的文化典籍这一项,昙无讖就已经足以名垂青史了。

3. 译经岂无执著心

早在昙无讖刚到敦煌时,就已经开始翻译佛经了。他被沮渠蒙逊接到姑臧后,度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这十几年正是他翻译佛经最集中的时期。昙无讖到达北凉的那一年十月,沮渠蒙逊就请他翻译《大般涅槃经》。那时,中国著名的高僧慧嵩和道朗都对昙无讖无比崇拜,主动帮助他翻译佛经。慧嵩更是承担着将他翻译的佛经写下来的重任。有了帮手还是不够,昙无讖翻译《大般涅槃经》的过程一点也不顺利,因为他手中的经书并不全面。《大般涅槃经》的梵本有3.5万颂,译成汉文大约百万言,他们所译的只有1万多颂,很不全面。为了使翻译的经书更加全面、精确,他决定不远万里回到自己的家乡找寻缺失的部分。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昙无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迎接他的却是母亲的去世。他忍受着极大的悲痛,埋葬了母亲。但他并没有找到缺失的部分。无奈之下,昙无讖只得返回,并在归途中不断询问佛经

的下落。当他来到于阗国(古代西域城郭王国,地处今塔里木盆地南沿)时,竟然无意间找到了缺失的部分。就这样,他带着经过千辛万苦找回的佛经回到姑臧继续翻译,把这本经书 36 卷全部都翻译了出来。昙无讖在翻译这本佛经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密教色彩,突出了鬼神信仰和禁术咒语。这种思想既是昙无讖所专精的,也适应了凉州的社会需要。

昙无讖究竟翻译了多少部佛经,历史上没有准确的记载。梁朝僧祐著述的《出三藏记集》记载他翻译了 12 部佛经;唐朝道宣著述的《大唐内典录》记载他翻译了 24 部;唐朝智升著述的《开元释教录》记载他翻译了 19 部。佛学家认为,僧祐为梁代人,离昙无讖译经年代较近,因此他提供的数字应该比较准确。《出三藏记集》记载昙无讖翻译的佛经有:《大般涅槃经》36 卷、《方等大集经》29 卷、《方等王应空藏经》5 卷、《方等大云经》4 卷、《悲华经》10 卷、《金光明经》4 卷、《海龙王经》4 卷、《菩萨地持经》8 卷、《菩萨戒本》1 卷、《优婆塞戒经》7 卷、《菩萨戒经》8 卷、《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1 卷,共计 12 部,117 卷。现在,这些经书除有少数遗失外,绝大多数仍保存在《大藏经》中。

在翻译过程中,昙无讖采取了传统的边译边讲的方式,前来听讲新经的僧俗、信徒达数百人。佛学界对昙无讖译经的质量,有很高的评价。道朗在《大般涅槃经序》中评价说:“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可见其受推崇的程度。

昙无讖翻译的主要强调卫世护法和忏悔思想的《金光明经》对中国后来的佛教发展影响很大,也是最流行的佛经之一。《菩萨戒本》一卷是昙无讖一项重要的翻译成果。他是第一个把大乘戒律介绍进中国的僧人,为中国佛教的戒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印度大乘佛教的戒律,从《菩萨戒本》开始才把散见各经的有关大乘戒律总集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昙无讖首先把它译为中文,这是他最主要

的功绩之一。他初到敦煌时就重视戒律的翻译工作。译本与后来唐玄奘所译大致相同,只缺少“善开性罪”一条。因为条文里有反对统治阶级的说法,后来为了避免引起纠纷而删除了。除此之外,昙无讖翻译的这一系列大乘戒律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前,鸠摩罗什大师也翻译了戒律,但这些戒律都属于小乘佛教系统。大乘菩萨戒律从小乘戒律中独立出来,是从《大般涅槃经》开始的。昙无讖重视《大般涅槃经》,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重视大乘戒律。他翻译的其他几部戒律,也都是大乘戒律中的重要著作,受到中国佛教学者的热烈欢迎。

《法苑珠林》上记载,昙无讖带着《菩萨戒本》刚到敦煌时,就受到一位叫道进的当地僧人的邀请去宣讲《菩萨戒本》。后来,在道进门下习大乘戒律的就有3 000人,这些人学成后又将戒律思想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4. 涅槃是人生最后归宿

涅槃思想是佛教的一种重要思想。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门研究涅槃思想的涅槃学派。竺道生等人代表的是南方涅槃学派,北方涅槃学派的创始人是昙无讖。他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与北方涅槃佛学思想的盛行有直接关系。

昙无讖在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中阐述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阐提(不能成佛之极恶众生)亦可成佛的思想成为后世的一种主流佛学思想。《大般涅槃经》强调佛身常住,有无量寿“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这种常住之身,就是佛法身,佛法身具有无数功德,也是涅槃之身。

涅槃是佛教追求的最后归宿,但佛教各派理解的涅槃并不相同,小乘佛教以出离“无常、苦、无我、不净”的世俗世界,灰身灭智为涅槃。《大般涅槃经》认为,如来不能只修诸法本性空寂之实相,还应追求更高的菩提涅槃,于出世间得大涅槃。这种大涅槃具有“常”、“乐”、“我”、“净”四

德，“常”是法身常住不灭，“乐”是涅槃大乐，“我”是佛身之大我，“净”是佛法清净无染。他认为人人都能得大涅槃，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包括阐提也与佛菩萨一样都有平等无差别的佛性，从本质上讲都能成佛。但一切众生的佛性被烦恼覆蔽，不得成佛，如同贫人有真金宝藏而自不知晓。

《大般涅槃经》阐述的核心佛学思想是佛性说，认为一切众生都具备能自觉成佛的佛性因素，乃至断了善根的“一阐提”（即“阐提”）也不例外。这种观点不但在别的经典中看不到，就连早先传入中国的节译本六卷《泥洹经》中也没有明确提出来。昙无讖刚提出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的主张时，受到了保守僧人的非难。但是昙无讖发挥他雄辩的口才，依靠他对《大般涅槃经》经义深刻的理解，成功地捍卫了佛性学说。佛书上记载，每当他“疑难纵横”时，都能够“临机释滞，未尝留碍”。在他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对《大般涅槃经》的翻译，并使佛性学说在凉州传播开来，继而又传到内地南北两方。从此南北各大家都服膺和提倡《大般涅槃经》，产生了许多研究《大般涅槃经》的著作，涌现了一大批称为涅槃师派的涅槃学家，使中国佛学的主流从般若学过渡到涅槃学。

《大般涅槃经》传到中国南方后，可以说给南方涅槃学派的创始人竺道生解了围。在这本经书传到南方之前，竺道生根据法显所译六卷《泥洹经》，就提出过阐提也可成佛的见解。他认为阐提也是众生，法性平等，无有高下。阐提既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也可成佛。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并将他驱逐出僧团。竺道生当时因找不到经典作根据，虽然遭受了很大的侮辱，但也只能默默承受。《大般涅槃经》传到南方之后，证明他的主张与经书中的思想相符。据说，竺道生看到这本经书后，竟然喜极而泣，后来在庐山讲解这本经书的时候，竟然死在了法座上。

昙无讖的一生，虽然没有让人产生他是佛祖转世的敬畏和仰视，但他绝世的聪明和对佛法的悟性却是值得人们称羨的。无论他的成就或

失意,都在显示着一位博学多才的执著者的努力和成就。为此,我们就不能选择不负责任的遗忘,不是吗?

第二节 中国禅宗始祖

——香至国王子菩提达摩

大家一定听说过达摩洞、达摩亭、达摩影石以及相关的一些传奇故事吧!这些景点与传说都是关于达摩祖师的。达摩祖师是中国佛教界公认的禅宗始祖。他本是南天竺香至国的一位王子,后来在第二十七代禅宗始祖的教化下皈依佛门,从此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达摩祖师经历的传奇很多,如一苇渡江、面壁九年、立雪断臂、只履回国等。他为中国带来了以“二入四行”为主的禅学思想,推动了佛教事业的发展。

达摩(?—536,一说528),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姓,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千载而下,直至今天仍是最兴旺的佛家教派。后人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梦 回

菩提达摩:香至王子的成佛之路

在古代的南印度,有一个国家叫做香至国。香至国有一位国王很推崇佛教,他在国内广筑寺庙,供养佛僧,极大地推动了佛教事业的发展。

这位好功德的国王共有三个儿子，全都长得一表人才，智慧非常，尤其是三儿子菩提多罗更不像凡人，简直是上天赐予的神童，机敏无比，从小便得到了万分宠爱，过着金尊玉贵的生活。

由于国王对佛教的推崇，远近的僧人都慕名而来，到香至国学习、拜访。禅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这年也来到了香至国，向国王和国民宣扬佛法和自己领悟的佛法真谛。

看到二十七祖都肯赏光，香至国国王十分高兴，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便叫出自己的三个聪明儿子随般若多罗出家修行。祖师一看国王心诚至此，也就答应了。

一段时间过去后，般若多罗发现最小的菩提多那很不一般。他的聪明和悟性是别人没有办法与之媲美的，因此般若多罗便竭尽心力地教导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有所成就。国王去世后，菩提多那就正式在般若多罗的剃度下出家，成为一名僧人，并改名为菩提达摩。

出家以后，菩提达摩比以前更加用功地学习佛法。般若多罗也倾尽所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他。一天，达摩问师父：“我学成后，要到哪里去传播佛法呢？”

“你虽然已经学得了佛法，但并不可以远游。只有等我圆寂67年之后，你才可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去传播佛法。”般若多罗回答道。

从此，达摩就安下心来，认真聆听师父的教诲，习法讲经，从不懈怠。多年后的一天，般若多罗大师忽然身放二十七道光芒，化火自焚而逝。安顿了师父的后事，达摩谨遵师父的教诲，一直在香至国弘扬佛法，成为第二十八代禅宗祖师。

时光荏苒，67年过去了，达摩按照师父生前的教诲，辞别了朋友弟子，只身一人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到了中国。他的海上之旅一直持续了3年，历尽艰苦。在公元520年，也就是南朝的梁武帝时到达了南

海(今广州)。

因为梁武帝信奉佛教成痴,南海刺史萧昂一听说有西方高僧渡海而来,自然不敢怠慢。他一边备礼迎接,一边派人飞马赶至建业,上奏梁武帝。梁武帝的笃信佛教是能在历史上挂上名号的。他不仅自己学佛,还命令全国的百姓也学佛。他经常口诵《放光般若经》,举国上下都称他“皇帝菩萨”。当他听说有天竺高僧前来,自然十分高兴,立刻派使者前往南海迎达摩到建业宫中。

简单的寒暄之后,梁武帝就与达摩攀谈了起来。但是,他们的首次对话并不愉快。

“朕自即位以来,起寺、写经、度僧、造像不计其数,不知有什么功德?”梁武帝一脸兴奋地问达摩。

“无功德!”达摩面无表情地简单回答。

“为什么没有功德?”武帝压抑住心中的不悦,一脸疑惑。

“如果做善事而希求果报的话,就不是实在的功德。”

听完达摩的回答,梁武帝的脸立刻沉了下来,这次见面以不欢而散收场。其实,刚一来到中国,看到那大大小小的寺庙,达摩就已看出梁武帝笃信佛教动机不纯。梁武帝推崇佛教不是为了修身养性,也不是为了教导人民,而是为了有所回报,希望佛能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增福添寿,没准心里还在为修得来世仍做皇帝做准备。因此,达摩直言不讳地把他的目的拆穿。

这次会面后,达摩祖师知道自己的回答已经得罪了梁武帝,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就在深夜悄悄地离开了驿馆,继续向北走去。

没走多远,达摩就遇到了一条大江拦路。他随手从岸边摘下了一片芦苇叶扔进了江中。只见这片苇叶在江中稳稳地漂浮着,没有丝毫颤动。随后,达摩就踏上了苇叶,借着风势顺利地到达了江的另一岸。在

同一时间，皇宫里心情郁闷、睡不着觉的梁武帝也在琢磨白天达摩对他说的话。梁武帝起初确实对达摩的话很生气，但他细想之后，觉得达摩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就赶忙让侍从再请达摩一叙，但使者回来报达摩已经离开了。

梁武帝很后悔，说自己空有一个敬佛的名声，却没有宽广顿悟的胸怀，自己的举动真是太鲁莽了。他想到这里，赶忙派人去追，他知道北面有一条大江会把达摩拦下来。但他没想到达摩作为一名得道高僧，滔滔江水怎能阻止他的脚步。

渡江之后，达摩步行向中原进发，来到了洛阳。据说当时他已经150岁了。

达摩见永宁寺宝塔建筑得十分精美，不禁对中原经济的发达赞叹起来，曾经“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但他看到洛阳城内僧人滔滔善辩、竞逐浮华的现状后，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认为这些僧人的行为有悖佛理。之后，他又来到了离洛阳不远的嵩山五乳峰，在那里面壁修行，长达9年。由于他长时间面壁而坐，日光照射着他的影子，竟然在石壁上留下了一道印痕，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当时，道育、慧可二僧十分崇敬达摩，坚持在那里侍奉供养他许多年。达摩觉得他们有一颗真诚的求佛之心，就决定把自己的衣钵传给他们。他把自己珍藏的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并叮嘱他：“我认为中国人最应该修习这本经书上面的佛法，你只要按照上面的去做，将来一定会修成正果。”

达摩晚年的事迹，中国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人说他遇毒而逝，



达摩始祖一苇渡江图

葬于熊耳山；有人说魏使宋云出使西域回国时在葱岭遇到过达摩，当时达摩手里拿着一只鞋子，飘然向西走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传 奇

1. 立雪断臂及达摩影石

“立雪断臂”是一位非常崇拜达摩大师的僧人为了拜达摩为师而发生的事情。

这个僧人名叫神光，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渡过长江，在嵩山少林寺找到了达摩大师。神光一心一意想拜达摩为师，向达摩求教，但大师却总是不答应。其实，达摩大师早在建业传教时就曾见过神光一面。当时，神光不知道眼前就是大名鼎鼎的达摩大师，表现得十分高傲。后来，当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十分后悔，就想方设法要拜达摩大师为师。

达摩大师见以前那个傲慢小子神光前来向自己拜师，不知道他有没有诚心，便婉言谢绝了。遭到拒绝的神光并不灰心，一直追随在达摩的左右。达摩在洞里面壁坐禅，神光就虔诚地双手合十，侍立其后，精心照料，形影不离。就这样，神光一直在达摩大师身边跟随了9年，并越来越佩服达摩大师，拜他为师的念头更加强烈了。9年后，达摩回到了少林寺继续宣扬佛法，神光就跟随着他一同回到了寺院。

一天，达摩在少林寺的后院达摩亭坐禅，神光依旧虔诚地侍立在达摩亭的外面。时值隆冬，夜晚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地面上已积了厚厚的一层。大雪淹没了神光的双膝，他的浑身上下也落满了厚厚的积雪，可他仍然双手合十，兀立不动。第二天一早，达摩走出达摩亭，见神光在雪地里站着，已经成了一个“雪人”，就问神光在这里做什么。神光回答说向佛祖求法。达摩沉思了片刻，对神光说，只有天降红雪，才传给他佛法。神光似乎是明白了达摩的意思，马上把随身携带

的戒刀抽出来,毫不犹豫地向左臂砍去。就这样,神光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积雪。

西天的佛祖看到了神光的惊人举动,决定成全他一心向佛的愿望,于是随手脱下袈裟,抛向东土。霎时,天上降下的大雪片被鲜红的袈裟映得通红。神光弯腰拿起鲜血淋漓的左臂,围绕达摩亭转了一圈,亭周围的积雪也被染红了,然后侍立于红雪之中。达摩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神光的转变,便将自己的衣钵、法器传给了他,并给他改名为“慧可”。从此,慧可成为少林寺禅宗的第二代始祖,被尊称为“二祖”。

除了“立雪断臂”,关于达摩祖师的神话传说还有许多。在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有一块十分神奇的石头,叫做“达摩影石”,又称“达摩面壁石”。这块石头上有隐约可见的人影像,传说这就是当年达摩面壁时留下的影像。这块奇石吸引了古今众多学者、游人的注意。人们不禁提出了质疑,石头上面的影像真的是达摩大师留下来的吗?



达摩影石图

《登封县志》上记载:“达摩在少林寺五乳峰上的石洞里面壁九年,影入于石。所以叫面壁石。石长三尺有余,白质黑纹,如淡墨画。隐隐一僧,背坐石上,露其侧颌,衣褶仿佛全有。”明朝的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认为“下至初祖庵。庵中供达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质黑章,俨然西僧立像”。古代有一名叫魏校的人曾经对这块奇石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这块奇石与达摩洞中的岩石不是一类岩石。现在的地质调查发现,达摩洞位于嵩山五乳峰半山以上,是寒



嵩山少林寺的达摩洞

面壁的故事是否确有此事呢？

嵩山五乳峰中峰的上部，有一个高、宽不过3米的天然石洞，这就是著名的达摩始祖当年面壁的地方。相传达摩大师在这个石洞里，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他不说法、不持律，终日面朝壁，双眼紧闭，五心朝天，力求“明心见性”和“苦心练魔”。达摩始祖入定后，一动不动，洞穴内十分安静，连飞鸟都不知道这里有人，竟然在达摩的肩膀上筑起巢穴来。一次，达摩始祖发现自己刚坐下不久，竟然打起了瞌睡。他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愤怒，认为打瞌睡是不会达到佛教的终极境界的。于是，他用刀割断了自己的眼皮，扔出了山洞。不久以后，在达摩眼皮落地的地方竟长出一棵茶树芽。“开定”后，达摩就活动一下四肢，吃一些东西，然后继续坐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公元527年到536年，达摩始祖整整面壁了9年，成为佛教史上的美谈。

当达摩始祖离开洞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坐禅面对的那块石头上，

武纪石灰岩，倾向北方，类似平砌的砖块。人们在墙壁上打洞，洞中所见的砖块均是侧面，不是直立的砖面。所以，达摩洞中不可能出现直立的岩层作为“面壁石”。可惜的是，面壁石在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被破坏了，现在少林寺内的影石是用河石复制的，这给研究达摩影石的来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 面壁，修行：不历经辛苦如何成佛

既然达摩影石迷云重重，那么，



明朝画家宋旭根据自己对佛学的领悟绘制的《达摩面壁图》

竟留下了一个自己面壁姿态的形象,衣裳褶皱,隐约可见,宛如一幅淡色的水墨画像。后来人们把这块石头称为“达摩面壁影石”,把这个天然石洞,称为“达摩面壁洞”。

那么达摩始祖为什么要在洞穴中面壁9年呢?达摩祖师在《入道四行观》中说:“夫人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人;二是行人。理人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自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此即与真理冥状,无有分别。寂然无名之理人。”他已经给出了面壁这个概念的理解,面壁就是心无分别,守性不移,面对一切境界,心不为所动的内在功夫。

有人认为9年是一个虚数,并不能代表达摩始祖真的在山洞中面对石壁静静地坐了9年。因为从1数到9后,就要重新开始计数,9实是数中之最大的,是数的极限。9年面壁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修行修到极处,

功行圆满,才能修成正果。还有人认为达摩始祖在少林寺面壁修行了整整10年,而不是9年。现在通常说的“十年面壁”,就是从这里演化来的。

还有人认为达摩大师根本就没有在达摩洞面壁。面壁是从达摩禅法中演化而来的。达摩禅法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安心”,而“安心”的主要内容即是“面壁”。于是,有人便从“面壁”的字面意思理解出现了达摩祖师面壁9年的故事。其实,“面壁”不是面对着墙壁,而是一种比喻,是一种精神境界,亦即心如墙壁一样,岿然不动。达摩认为人只要凝心壁观,摒除杂念,由定发慧,便可证悟如来藏佛性,进入佛的境界。

不管达摩祖师有没有面壁,究竟面壁了多长时间,他创造的修行方法对中国禅宗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3. 达摩与少林寺:禅宗圣地兴盛日志

河南嵩山少林寺是中国最早的一座禅宗寺院,位于登封县城西北13千米处。少林寺的前面是少室山,后面是五乳峰,处在山峦环抱、丛林掩映之中。少林寺虽然是由印度僧人跋陀在北魏孝文帝时修建的,但真正把它发扬光大的却是达摩大师。公元527年,达摩大师来到这里,传授禅宗。从此,少林寺威名远播。

与河南嵩山少林寺齐名的是少林武术。《登封县志》上记载,少林寺武术起源于达摩大师。当时,达摩大师不仅创造了独自面壁9年的神话,还经常带领弟子们参禅。坐禅是他传播佛法的主要活动。每天,他们要盘膝静坐、终日不动,从中领悟佛法的奥妙。由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僧人们就容易在精神与肉体上造成萎靡和困倦。于是,坐禅之余,他们就开始在达摩大师的带领下做一些活动来锻炼身体。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心意拳”的雏形。后来经过多年发展,“心意拳”得到了完善,逐渐演化为100多种拳术,在中国武术史上形成了著名的“少林派”拳法。少林武术不仅在国内广



嵩山少林寺

为流传,还传到了国外,尤其是对日本武术的影响很大。

少林寺的武术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种特色。直到现在,少林寺千佛殿的东厢白衣殿内仍保存着关于少林武术的一组壁画。其



少林寺的棍僧壁画

中,有两组壁画描述了“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比较真实可靠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很有研究价值。

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事件发生在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围攻洛阳那一年(公元620年,当时李世民还是秦王)。在战斗中,十三棍僧擒获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救下了当时化装成郎中而被狱卒扣下的李世民。后来,这位秦王为嘉奖少林寺,特遣使致书赐少林寺主教。现少林寺尚存有“唐太宗赐少林寺主教碑”,碑文共240字,“世民”二字是唐太宗亲笔所写。由此,少林寺声名远扬。

4. 禅宗始祖:“大乘壁观”里的面壁哲学

除了在少林寺留下的故事,达摩祖师真正的成就,是被誉为中国禅宗的始祖,为中国禅宗的奠基者。

他对中国佛学发展作出的最重大贡献就是带来了禅学思想。他的禅法和禅学理论在中国禅学史和中国禅宗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达摩的禅法被称为“南天竺一乘宗”,又称“大乘壁观”。“壁观”是一种比喻,意思说修禅时要心如墙壁,中直不移,排除执见。

达摩大师的修行不像其他人,留下了许多阐释佛学经典论义的著作。他教授弟子一般都是口述,文字记载的,只有一篇短短500多字的法语,用来阐述入禅之门的方法,即《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也叫《略辨大乘四行观》、《入道四行观》。

这篇法语中阐述的最主要的修禅方法就是“二入四行”。“二入”就是理入和行入,“四行”就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壁观”是达摩提出的“理入”的入道途径,是指在经教的启发下,借助禅定的方式,对解脱成佛进行理论思考。“四行”是“行入”的入道途径。在这四行中,前三行的目的在于止恶,最后一行的目的在于修善。

“报冤行”的中心是逢苦不忧。“报”不是报复的意思,而是对待的

意思。达摩大师主张对待冤家,要秉持佛教忍辱的精神、忍让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化解的精神,不要针锋相对。佛学界有“三受”,即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果从三受的角度来看,“报冤行”重点指的是如何对待苦的感受。

“随缘行”指的是如何对待乐受。达摩大师主张不要为喜所动。他认为高兴的事是因缘所生法,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何喜之有?面对好事要保持一种非常平静的心态,不要忘乎所以,趾高气昂,目空一切。

“无所求行”的意思是说苦受也好,乐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一切随缘,不要去着意追求什么。因为世间一切事情都是有求皆苦,知足常乐,对于修道的人更是如此。修道的人要了解到一切法随缘,随遇而安,不可执意地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称法行”中的“法”指的是“性净之理”,也就是缘起法。只要一切按照缘起法的规律去做,就是“称法行”。

“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是达摩大师在壁观时亲自传授给慧可、道育两位弟子的口诀。“如是安心”讲的是在修行中要使心成为一道墙,任何尘劳妄想、世间物欲都无法侵蚀进来。“如是发行”中的“行”讲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四行。“如是顺物”是达摩对宣扬佛法的僧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做任何事情,不要让众生有怀疑,不要做有损形象的事情。做事的时候,一定要令众生“未信者令信,已信者令增长”。“如是方便”就是要在自利、利他的同时不要过于执著。

达摩祖师主要以《楞伽经》来宣扬佛法,这本经书与他的禅法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也称《入楞伽经》。《楞伽经》为印度佛教法相唯识系与如来藏系的重要经典,与禅宗相联系的主要内容是:“三界唯心”说和“藏心自性”说。“三界唯心”说认为一切诸法都系“自心所见”、“自心所现”,是“自内证”。“藏心自性”说表明

真妄的因缘,辨明邪正的因果,说明去妄归真的旨意及五法、三性、八识、二无我的道理。

禅法的核心理论是“壁观”,禅法的具体实践是“四行”。四行着重在于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佛教教义苦下工夫。达摩祖师把“理入”与“行人”结合起来,以理入为主,行入为助。

达摩的禅法因为哲理性很强,一般人不易理解,所以在传教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很多,受法的弟子不多。只有那些把握了达摩禅法精神实质的人,才能获得深刻的感悟。达摩大师的著名弟子,有慧可、道育、昙林、僧副等人。同时又因为其佛法的深奥,反而激发了后人更多的钻研兴趣,由此,达摩禅宗反而成为中国最主流的佛学教派,这恐怕是当初来到中土的达摩祖师所没有预测到的吧。

第三节 摄论师的始祖

——优禅尼国圣僧真谛

真谛(499—569),梵名波罗木陀,原名拘那罗陀,是西印度优禅尼国婆罗门族。真谛大师从小就十分聪颖,深受佛学的影响,拜过多名高僧为师,精于大乘佛法,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佛学。为了弘扬佛法,他四处云游,在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邀请下,公元546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宣扬佛法。真谛大师是中国佛学研究学派中摄论师派的始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梦 回

1. 执著于佛学的优禅学者

真谛生于优禅尼国。这是西印度的一个小国,但因与著名的佛教义学中心地伐腊毗(当时佛学分支正量部的主要集中地)相近,所以佛学的发展非常繁荣。真谛就在这种浓厚的佛学氛围中长大,他的佛学思想受正量部的影响比较深,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30多岁的青年真谛,在当地乃至整个印度都有很大名气。

那时的印度和中国,都处于比较混乱的时期。但社会的混乱,阻挡不住人们渴求知识的脚步。真谛在中国的经历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东汉三国之后,随着一大批佛学著作在民间的传播发展,佛教在中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都对佛教十分信服。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繁荣景象。

南朝梁国就是一个十分推崇佛教的国家。梁武帝不仅自己整日念经诵佛,还在国内修建了大大小小许多佛寺。这些佛寺全部由朝廷统一供养,香火很旺。那时的人们如果衣食无着、生活贫困,就会剃掉头发去当和尚。和尚在国家中不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且能学到广博的知识,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职业。

虽然梁武帝推行佛教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却给中国的佛教带来了空前的大好发展时机。实行这些政策后,梁武帝还不满意,他想从佛教的源头——天竺寻求高僧,亲自为他讲法。于是,他便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由张记率领以护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为名到那里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经》等。这支队伍在途中遇到了在扶南国宣扬佛法的真谛。



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它的影响通过其虔诚的信徒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图为阿育王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大菩提寺

其实,张记等人在见到真谛之前,就已经听说了他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位有精深佛学造诣的高僧,尤其是在大乘佛教的研究上更为突出。能够遇到真谛,实在是这支队伍的幸运。当张记向真谛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真谛很快就答应了下来,并随这支队伍在梁武帝大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546年,来到了南海(今广州)。

真谛本来想把著名的佛学典籍《菩萨律藏》带到中原地区。但是,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当他从扶南到达南海后,稍作休整,就准备继续登船向建业(今南京)进发。一切行李都像原来一样装在了船上,但船却

突然走不动了。船在水中摇摇晃晃,好像要沉没一样。船员们都以为是装载的东西太多所致,于是就把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扔入水中。船员们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扔了下去,船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仍然摇摇欲坠。这下船上的人们可都犯了难。因为此时的船上除了被真谛大师视若珍宝的经书,就是必备的生活用品了。

若没有生活用品,他们是不可能安全起航的。于是,船员们把目光投在了真谛大师的身上,希望他能作出决定。真谛似乎从这件事情上察觉到了什么,这可能是佛祖的启示吧!稍稍考虑后,真谛虽然十分舍不得那些经书,但还是命令船员们把它们之中的一部分扔进水里。他们刚刚把《菩萨律藏》扔下去一点,船身马上就从水里浮上来不少。真谛此时对天长叹曰:“菩萨戒律,汉土无缘,深可悲矣!”他认为这是上天注定不让他把《菩萨律藏》带到中原,于是就命令船员们把这部经书全部都扔到了水里。就这样,航船很快恢复了正常。

两年后,即公元548年,真谛终于来到了梁国的首都建业,并随身带来了240多部佛经。此时,真谛大师已经近50岁了。真谛的到来得到了梁武帝的热情款待。梁武帝对这位高僧十分恭敬,把他安排到宝云殿居住。

真谛平时生活严肃,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衣食之奉,节俭知足。弟子们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奋稟学,晨夕不懈,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真谛去世后,弟子们分归各地,弘传其学,形成摄论师学派。真谛来华后翻译了很多佛经,可以说是翻译大家,也是一位义学大师。随着来华时间的增长,他对汉语的掌握也越来越熟练。后来,他翻译的经书都是随翻随讲,弟子将他讲的话记述成为义疏。

真谛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几年,为中国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曾经两次想从拉州乘大船前往梭伽修国(今马来西亚)传法,但



福建延福寺,传说中的翻经石即在此寺

都因遇到风浪而终止了。现在泉州九日山下的延福寺里,还有一块他当年留下来的翻经石,传说是真谛翻译经文的所在地。

2. 佛法无边:战火硝烟怎挡得住译经之路

真谛到达梁国的首都建业后,本想马上就投入到对佛经的翻译工作中。但是,他却在翻译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可以说,真谛翻译佛经的道路充满坎坷。

当他在宝云殿洗去脸上的灰尘,刚刚安顿好之后,梁国就发生了政治动乱。南朝北齐国降将侯景乘梁武帝不备,发动了一场叛乱。叛军在战斗中节节胜利,最后侯景竟然囚禁了梁武帝。没过多久,梁武帝忧愤而死。真谛虽然逃过此劫,但是面对战乱,再想翻译佛经已毫无可能,于是,他只能东行宣扬佛法。公元550年,真谛来到了富春,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富阳县,受到了县令的热情接待。县令陆元哲十分推崇佛教,早

已听说过真谛的大名,将他接到自己的私人住宅居住。真谛接受了陆县令的盛情邀请,并决定在这里完成自己的愿望——翻译佛经。就这样,这项工作终于能够展开了。

陆元哲为了让真谛安心翻译佛经,在当地召集了较有声望的20多个僧人,并布置了庞大的翻译场所。真谛一看盛情难却,就踏实地住在了那里,潜心进行佛经的翻译活动。可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只是暂时的,他对《十七地论》、《中论》等佛经的翻译刚刚开了头,这个富裕的小县就被战火席卷了。翻译工作暂停靠后,年迈的真谛大师非常失望,可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因为战乱而终止。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公元552年,“功成名就”的侯景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也将真谛请回到建业的台城,请他翻译佛经。但是,侯景的“成功”只是暂时得势。没过多久,梁朝皇族势力反扑,侯景战败向东逃去,这场夺权运动如昙花一现失败了。

继承皇位的是萧衍的第七子——梁元帝萧绎。萧绎即位之后,建业的社会经济秩序逐渐恢复,难得的太平日子又来了。真谛一看形势不错,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就只身前往正观寺居住,并与当时著名人物和愿禅师等20余人翻译了《金光明经》。

在接下来的公元554年至557年的几年中,真谛如闲云野鹤般到处云游,先后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宝田寺、新吴(今江西奉新)美业寺、始兴(今广东曲江)建兴寺等寺庙宣扬佛法。公元558年,他又回到了豫章,在栖隐寺住了一段时间,随后前往晋安(今福建晋江)佛力寺居住。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中,真谛的生活极不安定,但他对佛经的翻译却从来没有中断过。此时,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

公元561年,真谛从晋安搭乘小船到了梁安郡(今广东惠阳一带),在建造寺译讲《解节经》等。过了一年,《解节经》已经基本翻译完成了,

他心满意足。

也许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真谛在中国漂泊了这么多年后也准备回归故里。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乘小船出海向西航行,不料风向转变,在海上漂泊数月的他最后没能如愿以偿地回到祖国,却又回到了南海。也许这就是天意,真谛平静了一下自己原本有点难过的心情上岸了。

南海刺史欧阳颙一看真谛又到了自己这里,非常高兴,马上请他为菩萨戒师,迎住制旨寺,译讲《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和《俱舍论》等佛经。这期间,他对《俱舍论》和《摄大乘论》进行了几次修订,力图把它们翻译得更加完美。

公元568年,真谛在南海郡高僧法泰的邀请下译讲了《律二十二明了论》。可是,不知为什么,真谛在这时产生了厌世的念头,竟然悄悄地到南海北面的一处僻静的小山坡上自尽。幸亏他的弟子慧恺察觉了师父的反常举动,一路尾随并多方劝解,真谛才暂时打消了自尽的念头。之后,真谛又回到了王园寺居住。这段时期可能是真谛一生中心绪最为繁杂的时期,也许是对祖国的怀念,也许是佛学的研究进入了瓶颈时期,总之,连真谛大师自己都搞不明白是怎样的情绪在作怪。

这年八月,他的得意弟子慧恺在讲《俱舍论》的时候突然病倒了,没过多久就死去了。真谛对这位弟子的死十分伤心,怕《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从此失传,就邀集了12名学识渊博的僧人,亲自向他们讲述这些佛经的要义。频繁的讲经活动使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毕竟他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了。公元569年年初,这位高僧告别了人世,结束了他漂泊不定的译经讲经生涯。

真谛大师翻译的佛经主要是瑜伽学系的经书,如《决定藏论》即《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一部分,还有《唯识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

论》等。中国佛教的瑜伽学系可以说是由真谛开创的。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论》和《阿毗达摩俱舍》二论。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对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真谛在翻译这两部经书时,已经年近70岁高龄了。但是,他对这两部经书的翻译没有丝毫的懈怠。在第一次翻译完成后,又仔细地研读译文,反复讲解,可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翻译过程中,真谛大都保存了佛经原本的面目。因此,他的翻译文字有些晦涩难懂。但他翻译的佛经大都是比较正统的佛学经书。真谛翻译的主要佛经大都被他亲自讲解过。他的弟子们将他讲述的佛经整理起来,通称疏、释,亦称注记或本记,数量竟多达20多部。因此,真谛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还是一位渊博的义学大师。弟子们记述的疏记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释经论的传统学说及有关文献,是研究佛经教义和佛教发展史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这些疏记大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

真谛大师共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在颠沛流离中翻译出了佛经论著100多卷,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尤其是他最后翻译的《律二十二明了论》,以22个提纲颂文来解释正量部律相要义的论书。还有他翻译的《部执异论》上,也可以看出正量部佛学思想的影子。可见,真谛大师是正量部佛学在中国的首倡者和“代言人”。

传 奇

1. 摄论师的开山祖师

摄论师是中国陈隋之际专门弘扬《摄大乘论》的一派佛教学者。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真谛。他的弟子慧恺等在真谛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摄论师发扬光大。摄论师以后的弟子中又出现了著名的智殷、慧璘、灵觉

等大师。

《摄大乘论》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由印度著名高僧无着著述。在中国有三个译本，分别是元魏佛陀扇多译本、陈真谛译本和唐玄奘译本。摄论师研究这部经典佛学著作依据的就是真谛翻译的汉语《摄大乘论》。虽然佛陀扇多翻译的这本经书在时间上比真谛翻译得早，却并没有在社会上形成较大的影响。真谛不仅翻译了《摄大乘论》的本论，还翻译了释论，使这部经书得以迅速弘扬。

真谛开创的摄论师对佛学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九识说”。真谛之前，佛学家普遍认为佛教中的八识是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眼识就是眼睛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耳识就是耳朵听到的不同声音；鼻识就是鼻子闻到的不同味道；舌识就是舌头品尝到的不同滋味；身识就是身体对外界的感受、接触；意识就是在前五识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概念；末那识是梵语的音译，本质是恒审思量，使生起自我意识，也被称为“我识”；阿赖耶识又称为藏识，是一切善恶种子寄托的所在，是本性与妄心的和合体，是形成烦恼的根本。真谛在这八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九识——阿摩罗识。他认为第八识阿赖耶识并不是真常净识，也不是最高的识。在阿赖耶识之上，还有阿摩罗识，这才是无垢识，也就是真如佛性。

修行的人在阿赖耶识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对治妄识，就可以达到阿摩罗识而成为佛。于是，真谛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没有永不能成佛的众生。不能成佛的人只是修行程度的不同而已，只有不断地进行修行，才能修成正果。

“三性”是真谛佛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论断。他认为“三性”分为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三性”中不但分别性是空，依他性也为空。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胜义无性）不但包括分别性，也包括依他性。摄论师以

三性思想为中心,以体用、真妄来诠释“三性”,提出两种形态的三性思想,并且有两重、三重、四门唯识观的不同观念。

真谛,是唐玄奘之前 200 余年中贡献最大的佛学译师。

2. 一语惊百年:六祖惠能横空出世

说完了真谛大师一生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

真谛大师在研究佛经上有很深的造诣,被后世传为已经修成正果的得道高僧。他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事情。六祖惠能,就是在真谛大师的预言下“横空出世”的。

惠能大师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风动与幡动的故事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真谛早于惠能 100 多年,他们根本没有见过面,又有什么联系呢?下面的这个故事虽然是关于惠能的,但却从中体现了真谛大师极高的佛性。

惠能是中国佛教的第三十三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家境贫寒,只能靠卖柴来维持他与母亲的生活。他得知五祖弘忍禅师在蕲州黄梅冯茂山传法,于是产生了北上求法的念头。怎奈家里一清二白,兼无人侍奉老母,愁得不得了。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惠能得到了别人 100 两银子的资助,让他用来安顿母亲的生活。有了这笔银子,惠能很快安排好一切,朝黄梅山出发了。

经过与五祖大师的一番交谈,大师认为惠能是一个十分有佛性的人,就把他留在了寺里。有一日法师正在讲经,忽然间刮起了大风。法师见门外的幡迎风招展,就有心考一考弟子们对佛经的领悟能力。他问:“风动也,幡动也?”有的僧人说风动,有的僧人说幡动,两拨人相争不下。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惠能说道:“仁者自心动。”他的回答让五祖大师很满意,就决定收他为衣钵弟子。

后世人认为惠能是菩萨转世。其实,关于他的身份,早在 120 多年



唐代佛教禅宗六祖惠能肉身

前,著名的真谛大师就已经作出了准确的预测。那年,真谛大师在寺庙里宣扬佛法。一天,他在戒坛边栽种菩提树,他一边给菩提树浇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当时人们无法判断这句话是否能够应验,就把这句话记载了下来,希望百年之后的人们能够鉴证。事实证明,真谛大师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从他作出预测的那年算起,到惠能在戒坛上剃度出家,刚好是120年。

真谛大师在中国传播佛学的几十年间,中国的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愈加辉煌起来。尤其是真谛开创的摄论师派和翻译过来的瑜伽学系经书,丰富了中国的佛学世界,为文化的传播和融合提供了条件,铺平了道路。

为了这些,我们也要学会怀念和感谢。

第三章 唐朝时期的外国人

第一节 最早的景教传教士

——叙利亚人阿罗本

阿罗本,生卒年不详。他是第一个来华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出生于叙利亚,少年时在波斯接受了良好的宗教教育,后来又受波斯景教总主教的派遣来华。他的这次传教活动受到了隆重的皇家礼遇,无论是唐太宗还是唐玄宗都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帮助。在阿罗本的影响下,景教在中国传播开来。

梦 回

1. 奉命传教的西亚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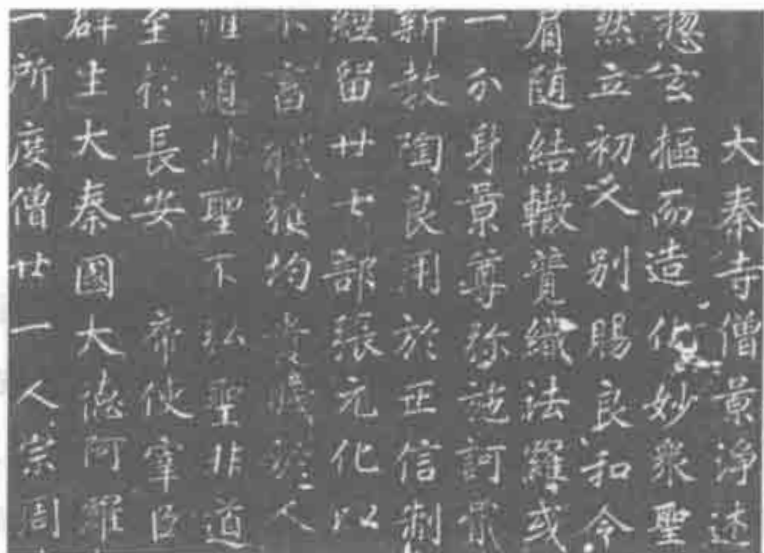
早在唐朝,中国就已经有基督教传入了。那是基督教下的一个分支教派景教,也叫聂斯托利派。

聂斯托利为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

景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唐朝建立后形成的第一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采取的各项政策不仅使天下局势安定,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国君自然是

要主张发展文化,就这样,景教传入了盛世中的中国。

明朝天启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个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据石碑所载,“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相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也就是说,唐贞观九年(635),大秦国有大德僧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双方经过短暂交流后,皇帝觉得景教教义不错,就命令阿罗本在国内传授。

以上大致就是景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证据。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时,唐朝国内局势虽然比较稳定,但边疆地区的各个小国却常年混战。回教徒不断与亚洲西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及波斯等地的基督教国家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战争经常殃及唐朝边民。唐太宗认为这些国家很有可能进犯唐朝领土,就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

为防止突厥入侵,他经常与突厥贵族保持通婚,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同时,唐太宗深知丝绸之路是连通这些国家的重要商路,就极力确保这条通往欧亚各国的交通要道的畅通。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唐太宗时期的唐朝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经贸活跃、声威远震,名扬四海。于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很多国家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朝拜,并进行经贸活动和宗教传播活动。唐太宗积极推行文化包容政策,引进并吸收了各种外来文化。他笃信宗教,不独极力倡扬固有的道佛两教,即使西来的各种宗教,也皆兼收并蓄。在那时,唐朝欢迎各种外国人前来,如阿拉伯的穆斯林、叙利亚基督徒、突厥人以及萨珊王国的波斯人等。

阿罗本就是在这种对外环境下来到唐朝的。他原是叙利亚人,成年以后来到波斯国。波斯国是一个以景教为国教的国家。阿罗本到达波斯后,很快就在大环境影响下开始信仰景教。后来,他投身于景教的传播,领受圣秩,成为司铎。来华之前,他已经成为大德主教了。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政治、文学、宗教都很精通,是一位端庄肃穆、谦诚有礼、饱读诗书、满腹



出土的大秦景教石刻

经纶、颇有儒家风范的中年学者。公元635年,阿罗本在波斯首都宿利城的景教总主教易朔亚伯二世的派遣下来华传教。他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带来了530部景教

经书,其中有些后来被翻译成汉语。

2. 超乎想象的皇家礼遇

来到长安后,阿罗本受到了唐朝皇家的隆重礼遇。唐太宗听说有波斯使者前来拜谒,就命令宰相房玄龄出城迎接。房玄龄率领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来到了长安西郊,摆开了隆重的迎接阵势。这是当时唐朝迎接外来使者的最高级别。

随着侍卫的禀报,房玄龄远远地看到了一位气宇轩昂的外国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温文尔雅,很有大师风范,房玄龄一看不禁产生了崇敬之情。为了表示唐朝对阿罗本的重视,房玄龄在与阿罗本进行了简单的寒暄之后,直接把他接到了唐玄宗的内宫。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只有与皇帝最亲近的人或是地位特别高的人才有权利进入内宫,直接与皇帝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阿罗本第一次来中国就受到了这样的礼遇,足可以看出唐朝对他的重视。

唐太宗见到阿罗本后,心里很高兴。只见这位传教士高大英俊,学者风度十足,是一位充满无限魅力的男子。阿罗本施过朝拜之礼后,就与唐太宗热情地交谈起来。他向唐太宗详细地讲述了景教的教义,并把自己带来的经书送给他。但是,这些经书全是用波斯文字书写的,唐太宗看不懂,于是唐太宗就请阿罗本把这些经书翻译成汉字后再给他看。阿罗本非常愿意,很快,景教的汉译本便问世了。

听完阿罗本宣传的教义后,唐太宗很受启发,认为他讲的教义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并不是空泛的宣扬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景教虽与唐朝盛行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其他外来宗教有很多不同,但初衷都是好的,都劝人们改恶行善,做好事。唐太宗认为,景教倘若在唐朝传播开来,对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会有很大好处,因为当时留在中国的波斯、阿拉伯人很多,所以就给了阿罗本和他的随行人员留华传教的权利。

年复一年,阿罗本兢兢业业地做着本职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为了表彰阿罗本在唐朝的传教活动,唐太宗册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阿罗本没想到他一个小小的传教士竟然能受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皇帝如此隆重的礼遇,十分感动。

阿罗本之所以能受到唐太宗这样的礼遇,除了他的个人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唐朝要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增加边境贸易,就要维护边防的安全。要想维护那些地区的安全,就要得到边地居民的支持与认可。当时那些边地居民中有很多景教教徒。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唐朝使者基本上无法与那些边地居民顺利地进行沟通。唐太宗正在为这件事情烦恼的时候,景教大主教阿罗本前来朝拜的消息令他惊喜万分。他想阿罗本在边地有很大的影响,不仅可以利用他增加与边地人民的感情,还可以把他当成翻译,为对抗回族的战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公元638年,唐太宗在长安城的义宁坊划出了一块地,用于建立景教寺庙。义宁坊在长安城的西北方向,与气势雄伟的开远门相邻。唐太宗之所以选这块地方建立景教寺院,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当年,阿罗本就是从开远门进入长安城的。唐太宗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不久之后,唐太宗又命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用以表示对景教的特殊恩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

唐高宗对阿罗本也很器重,不仅授予他“镇国大法主”的称号,而且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景教寺庙,帮他传播教义。景教教徒在寺庙中集会、讨论,加速了景教在唐朝的传播。当时,长安城的景教十分繁荣,出现了“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景象。

传 奇

1. 传播景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工作就比较顺利

为了使更多的人接受景教,阿罗本接受唐太宗的邀请对带来的几百部经书进行了认真的挑选,选出了一部分适合唐朝国情的经书并翻译成了汉语。

经书翻译完成后,唐太宗亲自对经书进行了审阅。由此,他对景教的理解更为深入了,也更加认识到景教对于维护唐朝社会稳定的益处。于是,他命令朝廷上下对阿罗本的传教活动予以全力支持。传教期间,阿罗本得到了唐朝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徵等人的协助,进行得很顺利。当阿罗本的传教活动遇到困难时,他们都会全力相助。

当时,景教对于唐朝人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宗教,因此最初的传教活动比较困难。人们已经对佛教和道教十分信服了,很难再接受一个外来宗教。但是,阿罗本依靠自身的努力以及唐朝政府的支持,坚持不懈地进行传教活动。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亲自下诏准许阿罗本及其随从可以在唐朝的任何地方公开传教。为了给景教教徒提供一个理想的集会场所,他还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一座景教寺院。

在阿罗本的带动下,短短3年内从波斯来华传教的景教传教士就达到21位。这些传教士在唐朝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与波斯、叙利亚的景教基本相同,都奉巴格达宗主教为领袖。他们把唐朝广大的国土分成了几个教区,由副主教负责对各个教区的管理。副主教之下设司铎,负责礼节、布施、教育等职事。一些较大的教区或较大的寺院还设有寺主和理院。

阿罗本的传教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更多唐朝人加入景教。他除了讲授景教教义外,还很重视宗教生活。讲授教义时,他以基督被钉在十

字架上作为出发点,来说明救赎的真理,并用圣洗来说明洗出皈依基督的原罪。阿罗本认为适当的宗教生活可以把景教徒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因此,他很重视诵念日课,每天有七个固定时辰的礼仪朝拜。教徒们在朝拜中配合着磬声表达虔诚的心意。他们在礼仪中穿着僧人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保存了东方隐修士的礼规。

景教寺院起初被称为波斯寺或波斯胡寺,景教徒被称为波斯僧。波斯灭亡后,唐玄宗把“波斯寺”改称为大秦寺。景教是聂斯托利派教徒在8世纪中叶以后的自称。当时,唐朝流行的对景教的称呼是波斯经教、大秦教、大秦法和弥尸诃教。

阿罗本为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有准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景教来华传教士。因为景教是天主教的一支,而天主教又是基督教的一支,因此说阿罗本是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也不为过。通过阿罗本来华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国家,“兼容并包”四个字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更是促进文化更快发展,更加有特色的前提。只有心胸狭窄的小国,才会拒绝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当清王朝的统治者决定故步自封时,难道忘记了前贤的作为了吗?

第二节 空怀复国梦

——萨珊国王子卑路斯与泥涅师师

卑路斯,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王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泥涅师师的父亲。父子俩虽然经历不同,但最终命运却殊途同归,成为空有满腔抱负的伤心王子。他们为光复自己的祖国萨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最后都

没有完成复国的夙愿。历经坎坷之后,他们都客死在唐朝的长安城。他们虽然没有完成复国的愿望,但是却在唐朝的宗教事业、医学、经济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梦 回

1. 复国梦: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却很脆弱

萨珊国是亚洲中西部的一个古老国家,是古波斯王国的一个分支,也是萨珊王朝(226—650)的最后一个王朝。

萨珊家族崛起于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王朝的开创者萨珊,原系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公元3世纪初,其子帕佩克据法尔斯自立为王。公元224年,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一世(224—241在位)推翻帕提亚王朝(安息帝国),公元226年在泰西封加冕,自称诸王之王。进而占领原帕提亚帝国的广大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萨珊波斯封建帝国,并以祆教为国教。

萨珊王国自从建立起就是一个好战的国家,那里的人们从出生起就注定要在弥漫着硝烟的空气中,在四分五裂的土地上,寻找生机。公元632年,萨珊的伊嗣俟统一了周围的一些地区,建立了统一的萨珊王朝。伊嗣俟与唐朝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经常得到唐王的赏赐与援助。

萨珊王朝刚建立不久就遭到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阿拉伯)人的大举进攻。伊嗣俟一见形势不好,马上向唐朝求助。公元639年、647年、648年,他曾三次派使者到唐朝。但唐朝统治者觉得萨珊国太远了,若要出兵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何况大食人对萨珊国的进攻并不会影响到唐朝的统治。为了维持与大食国的微妙政治关系,唐皇拒绝出兵。

公元651年,伊嗣俟在一次重要的战争中失败,逃到了吐火罗的木禄城,被一个磨坊主设计杀害。至此,萨珊国基本灭亡了。

可怜的伊嗣俟国王有个儿子,名叫卑路斯。他在仆人的掩护下逃了出来,保住了性命。从此,他就一直在吐火罗避难,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虽然已经不再是王子了,但身边依然有一些效忠的士兵。他们的势力虽然很弱,但时刻等待着复国的机会,一直与唐朝的使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654年,卑路斯认为复国的机会已经成熟了,就派遣了使者到唐朝,向唐王请兵支援复国。不幸的是,他选择的这个时候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很不合时宜。当时,唐朝正处在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交战中,唐朝统治者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支援已经名存实亡的萨珊国复国呢?而且吐火罗在葱岭以西,即使唐朝统治者当时答应出兵相助,也不可能很快把军队派到那么远的地方。于是,卑路斯王子的第一次求助就这样化为了泡影。

但是,卑路斯一直没有失去信心,耐心等待着时机。就这样又过了7年,到了公元661年,卑路斯再次派出使者前往唐朝请求支援。他认为此时唐王不会再像上次一样按兵不动了。他的理由很充分:此时唐朝已经取得了对西突厥战争的胜利,击破了西突厥汗国。葱岭附近原来属于西突厥管辖下的各个小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为了加强对这些小国的统治,在那里设置了专门负责管辖的羁縻都督府州。羁縻都督府州就设置在吐火罗地区。但是,卑路斯这回再一次地失望,唐王并没有发兵相助,只是在他居住的疾陵城设置了波斯都督府,用来保护卑路斯的安全。

公元663年,唐王为了安抚卑路斯,并加强对疾陵城的控制,任命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

卑路斯明白,如果不接受唐王的任命,就太不识时务了,况且如果还有机会,必定需要唐朝的大力帮助,于是,他就走马上任,成为唐朝的一名正式官员。但即使在唐朝做官,他管辖的地区也经常受到大食人的威

胁,太平日子总是与他无缘。公元667年和公元671年,他曾经两次派出使者向唐王纳贡,以示自己的忠诚之心,这几年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安定的几年。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674年,大食军队向吐火罗地区开进,接二连三



印有卑路斯一世头像的波斯银币

地攻打卑路斯统治的波斯都督府。

卑路斯既没有强大的军队来抵抗

大食军队的进攻,也得不到唐朝军

队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波斯都

督府很快就被大食人攻破了。无

奈之下,卑路斯只得向东撤退,最

后来到了长安。与他一同逃来的

还有众多波斯贵族。

唐高宗看到这种情况,也觉得

过意不去,就册封卑路斯为右武卫

将军,留守中央。但是时日不久,卑路斯就在不能复国的思想影响下忧

郁而死。

2. 命运多舛的王子

卑路斯去世后,他的儿子泥涅师师继承了他留下来的名存实亡的萨

珊王位。

泥涅师师作为一名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绝对不是贵族中的纨绔

子弟。他看到父亲因为不能复国而忧郁致死,伤心悲痛之后,发誓一

定要帮助父亲实现这个梦想。他极力与唐王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不时地

表达自己复国的愿望。在他一连串的恳求下,唐王终于下定了决心。

泥涅师师的命运要比他父亲卑路斯幸运得多。卑路斯空有一腔复

国的热情,却没有赶上好时机。当泥涅师师向唐王提出复国的愿望时,

唐王出于自身利益，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时，西域的局势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挑起问题的，仍旧是那个强悍血性的西突厥。自从西突厥建国，它对唐朝边境的骚扰就没有停止过。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突厥族的阿史德温傅起兵反唐，再次发动叛乱，对西域诸多小国的大举进攻影响到了唐朝在西域的统一。这一年，唐高宗任命大将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护送泥涅师师为名出兵西域。其实，这是一次有周密安排的军事行动，目的是为了在护送泥涅师师的途中，乘敌军不备袭击西突厥余部与吐蕃联合的军事力量。这次军事行动很顺利，裴行俭率军在碎叶擒获西突厥余部首领，平定了叛乱，随即立碑纪功而还。

裴行俭是回到长安论功行赏去了，可泥涅师师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曾经说要护送泥涅师师回国的裴行俭，因为嫌到萨珊国的路途遥远，就派另一支军队护送泥涅师师到了吐火罗地区。其实不仅裴行俭这样的中原人不愿意去那么远又那么危险的地方，就连早年与卑路斯一同来长安避难的波斯贵族有很多都没有一同回去。他们选择留在长安居住，过更稳定的生活。泥涅师师回到吐火罗后，召集以前的残余部队，组织了一支军事力量与那里的大食军队展开了长期斗争。他在吐火罗地区坚持与大食抗战20余年，对大食军队的打击很大。但是，他的这支军队力量非常弱小，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大食的统治。公元708年，泥涅师师的军队在对战中遭遇了一次惨败。为了保存实力，他只得率领部队回到长安。唐王授予泥涅师师“左威卫将军”称号。不久之后，泥涅师师也在复国梦想落空的失望中悲愤而死。

尽管唐朝的统治者对卑路斯和泥涅师师的待遇都很不错，但是唐王因为政治的原因始终没有对他们的复国活动予以太多的支持。不过，能

稍作补偿的是,唐朝一直把卑路斯和泥涅师师看作是萨珊波斯的正统代表,直到泥涅师师去世后,唐朝才在史书中记载“其国遂灭”。

传 奇

1. 波斯胡寺与祆祠

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中都有属于波斯人的祆祠和寺院。这些独具特色的波斯寺院有的是由波斯王子卑路斯修建的。

公元677年,卑路斯来到长安后,奏请唐王在长安建立一座“波斯胡寺”。这处寺院位于长安城的义宁坊附近,是一座景教教徒祭祀的地方,也是信仰景教的波斯人集会的场所。卑路斯信仰的宗教是祆教,他为什么会建立一座景教的寺院呢?这还要从“波斯胡寺”与祆祠名称上的差异来说起。

在唐朝天宝四年(745)之前,中国历史对景教寺院的记载都是“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当时,很多波斯人信仰的宗教是景教。由于卑路斯的王后十分推崇景教,卑路斯就奏请唐王建立一座专门给景教教徒用来朝拜的寺庙。

有人认为卑路斯建造的寺院可能是祆教寺院,这是不正确的。卑路斯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要依靠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安城中的波斯人大部分信仰的都是景教,因此,为了政治的需要,他完全有可能在长安新建一所景教寺院。这样,他就可以把长安的波斯人团结起来,复国也就有了希望。

此外,在长安城醴泉坊还有一座在卑路斯的倡议下修建的祆祠。这里很有可能是他本人宗教信仰的祭祀重心。《长安志》记载,唐朝时,因为宠臣宗楚客建造的私人住宅侵占了义宁坊的波斯胡寺,所以这处寺院

被迫移到了布政坊袄寺的西面。这时,出现了波斯寺与袄祠处于同一坊中的现象。这座袄祠很有可能是泥涅师祭祀袄神的地方。

卑路斯与泥涅师推动了景教和袄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在他们倡议下修建的波斯胡寺和袄祠成为后世景教教徒和袄教教徒集会的重要场所。

2. 倾国而来的文化使者

早在萨珊国建立之初,其统治者就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卑路斯来到长安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交流。

与卑路斯一同逃到长安避难的除了护送他的士兵外,还有很多波斯贵族。这些贵族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带来的金银财宝,而是文化,丰富多彩的古波斯文化。

这一时期,萨珊国的医药技术在这些使者的引领下来到中国。除此之外,大批萨珊国商人来华经商,足迹遍及长安、扬州、广州等地,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日益兴盛,也把中国特产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大量输入波斯,通过云游四海的商人远销西方。

当时中国先进的造纸术等,也随着西域地区的往来交通,在8世纪时,传入了阿拉伯及广大中亚地区,促进了古老文明的共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面也有波斯人的一部分功劳。

唐代诗文和《太平广记》等文献中对波斯胡商有很多生动的记述。在近代,这一情况也为考古文物所证实。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新中国成立后,共出土了萨珊银币1 171枚,绝大多数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和京都附近。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袄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随着波斯客商和侨民的增多,长安等地建立了袄祠,唐朝为之设置萨宝、袄正等视流内品官典守。景教与摩尼教也都在

唐代由萨珊朝国民传入中国。



出土于新疆的萨珊银币

萨珊国人中也有人仕唐廷者，如阿罗憾。阿罗憾本来是一位波斯大酋长。来到唐朝后，被唐王授予“屯卫大将军”，并被作为唐朝的使臣出使拂菻国（大秦）。萨珊王朝灭亡后，有些流寓长安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曾被编入神策军中。

1955年，西安出土了祆教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墓志为汉文、婆罗钵文双体合璧，苏谅就是神策军中的波斯后裔。

萨珊朝的艺术也对唐代有很大影响。唐代织锦图案如联珠纹、对鸟对兽纹等，金银器的形制如八棱带柄杯、高脚杯、带柄壶、多瓣椭圆形盘等，纹饰如翼兽、宝相花、狩猎纹、忍冬花纹等就是萨珊国艺术最突出的反映。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在当时乃至现在的世界上声名远扬的波斯地毯。波斯地毯编织的历史与其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在4000年前，古波斯人就迷恋上了这种工艺。在劳作过程中，他们对原料的选择、色泽的搭配、图案的设计和编织技艺都要求极严，时至今日，波斯地毯仍堪称是世界上最精细、最富装饰性、最有价值和质地最优的地毯之一。当唐朝古波斯人拥入中原寻求安定生活的时候，这些精致的工艺也随之流传到了唐朝，促进了唐朝编织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波斯人亲手制作的地毯，则成为上流社会竞相购买的奢侈品。

虽然萨珊王子的复国梦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难道，上天赐予他们忧伤的生命，是为了

文化而来？卑斯路和泥涅师师，在中国与波斯之间行走得好辛苦，历史不会将他们遗忘。

第三节 中日交流的先驱 ——日本僧人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698—770)，日本人，出身奈良时代一个中等贵族之家，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阿倍仲麻吕从小就显露出了非凡的资质，他聪明机敏，勤奋好学，尤其酷爱研究汉文学，很快就在日本学术界崭露头角。19岁时，阿倍仲麻吕作为后起之秀的代表，随第九批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一次科举考试中，阿倍仲麻吕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并且连他也没有想到，他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50多年。阿倍仲麻吕先后担任了唐朝多个大大小小的官职，为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皇帝效力。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梦 回

1. 幸运的“留学生”

阿倍仲麻吕来华时中国正处在大唐“开元盛世”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中心。日本原名倭国，武则天时赐其国号为日本。

唐朝时，日本刚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经济、文化、政治都十分落后。日本国王为了向唐朝学习先进文化，不断派遣使团出访大唐。通晓经史或精通唐朝情况的官吏被选为大使、副使，并且往往有十

几名或 20 名留学生、学问僧同行。

遣唐使的职责是向天朝称臣进贡,表示日本作为番属国归顺天朝的决心。遣唐留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学习范围涉及经教、政治、律令、制度、礼乐、兵法、天文、历数、医学、技艺以及其他天朝文明,以便回国后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只有少数最有发展前途的优秀青年,才有可能被选为留学生。

公元 645 年孝德天皇进行大化革新后,日本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热情更高了。他们不顾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一批又一批地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学生。有的留学生在唐居留达二三十年之久。这些留学生中,最著名的当数年轻的阿倍仲麻吕。那还是公元 716 年,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一批以多治比县守为首,由 557 人组成的第九次遣唐船到唐朝出访、学习。18 岁的阿倍仲麻吕因博学多才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之一。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终于可以到日思夜想的中国去了。

第二年的三月,浩浩荡荡的遣唐船满载着热情高涨的人们离开了难波(今大阪),向中国大陆驶去。那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还很落后,旅程十分艰险,不幸丧命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所幸这次行程还算顺利,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了中国。遣唐使团在扬州登陆后,开始向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万国之都长安进发。九月底,他们安全到达长安。

阿倍仲麻吕既然是留学生,学习自然成为他到达长安后的第一要务。因为成绩优秀,他来到中国不久就被送进了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学习更深的文化知识。他攻读的重点是《礼记》、《周礼》、《诗经》、《左传》等经典名著。在太学学习期间,他非常刻苦,经常在油灯下学习到半夜,甚至天亮了都不知道。在聪明才智与努力刻苦的共同作用下,没过多久他就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很快掌握了汉语与汉字。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经常得到太学老师们的夸奖。

经过五六年的苦学,阿倍仲麻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以便查漏补缺,他参加了那一年唐政府举办的科举考试。没想到,仅此一次,他就考中了进士,这真是太幸运了。但是,幸运的背后却是一条淌满汗水的河流。是啊,没有辛苦,哪里来的收获呢?阿倍仲麻吕的学识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阿倍仲麻吕考中进士,也是一种必然。

2. 东瀛明月

唐朝时期,中国最高学府设有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等。太学的学习科目主要是经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书经》、《易经》、《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合称九经。学生在太学结业后,要经过科举,取得秀才、进士、明经的资格方能出任官吏。其中,进士和明经是朝廷选拔高等文官的考试。进士要求具有长于论述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家才能,明经要求具有长于经义教学的学者才能。

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勤奋好学的阿倍仲麻吕。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上。即使在太学毕业后,他也想尽办法学习,仿佛永不满足似的。考中进士后不久,他就得到了唐玄宗的正式任命,破格录用在朝廷内做官。从此,阿倍仲麻吕开始了在唐朝长达几十年的为官生涯。



阿倍仲麻吕

最开始,他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负责校订经史子集四库书籍,并辅佐皇太子李瑛研习学问。这个官职虽然小,却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位。原因很简单,居于这个职位的人与太子有直接接触,是太子的近臣之一。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子将来登基,首先得到重用的,肯定是以前的心腹。所以,这个官职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位。唐玄宗把他安排到这里任职,足可以看出他对阿倍仲麻吕的喜爱和信赖。唐代诗人储光羲曾用“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的诗句称赞阿倍仲麻吕的这次任命。有多少人一辈子费尽心机都没能得到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这个年轻的外国“朝生”,运气真是好得令人嫉妒,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这句诗,仍然觉得里面充满了酸汁子,稍微一拧就会滴答下来。

公元731年,幸运又刻苦的阿倍仲麻吕升官了。这回他担任了唐朝的左拾遗,也就是谏官。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朝廷的破格提拔,晋升为门下省左补阙,掌供奉、讽谏、扈从、来舆等事务。左补阙是从七品以上的官职,是皇帝的侍从官,虽然品秩不高,但必须由才识高超的人担任。担任这项官职的人可以经常得到在宫中和天子直接接触的机会。阿倍仲麻吕担任左补阙期间,进一步得到了唐玄宗的青睐。唐玄宗亲自为他取了一个汉名——晁衡,也叫朝衡。不过更多时候称他为“晁卿”、“晁巨卿”、“晁监”、“晁校书”、“日本聘贺使”。能够得到天子赐予的名字对于一位外国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

事实证明阿倍仲麻吕的确没有浪费这个官位,他的才华在官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终荣升高位。在担任左补阙后不久,他就晋升为从五品下的官职,职掌侍游和规讽之事。天宝末年,他又被晋升为从四品上的卫尉少卿,旋又晋升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兼卫尉卿。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卫尉卿是卫尉寺的长官,职掌国家器械文物,总管武库、武器、守宫三署,这足

以看出唐皇对他的信任。

阿倍仲麻吕在中国的几十年中,并没有因为皇帝的宠幸和仕途的顺利而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他原本就是为促进中日交流而来,得以做高官,只是为他更好地为祖国作贡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而已。

公元752年,以藤原清河大使为首的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到达长安。在阿倍仲麻吕的斡旋下,藤原清河大使等受到了唐玄宗的特殊礼遇。唐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召见了藤原清河大使等人,并对岛夷使臣的礼仪给予高度赞许。同时,经过阿倍仲麻吕的不懈努力,日本遣唐大使被破格提高到番属使臣的首席座次。此外,唐玄宗还特别指定阿倍仲麻吕带领日本大使参观了大明宫库府以及收藏佛、道、儒经典的三教殿,又请画家为藤原大使等人画像纪念。当藤原大使等事毕告归时,唐玄宗还亲笔为他们题诗相赐。同时派遣鸿胪卿蒋挑挽陪送使团至扬州,然后由淮南处致使魏方进送回日本。

遣唐使团的成员对唐玄宗的种种礼遇感到受宠若惊,非常感动,表示日本会永远归顺唐朝王化。这次遣唐使是所有日本来华使团在唐朝受到接待最为隆重的一次,这一切都是因为阿倍仲麻吕的努力。

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生活了54年,“安史之乱”后,他又得到了唐肃宗、唐代宗的重用,官至客卿,荣达公爵。他的一生十分辉煌,成为众多日本留学生学习的典范。

传 奇

1. 是诗人更是座上宾

早在阿倍仲麻吕来华之前,出于对唐朝、汉学的崇拜,他就自学了一些汉语与汉文,并能够写一些较为浅显的诗句、文章。来华后,在太学的几年学习中,经过盛唐文化的熏陶,他的诗歌技巧更加成熟。

阿倍仲麻吕担任的官职大多是文化方面的。因为职务的关系,他经常与唐朝的著名文人交往,并与许多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阿倍仲麻吕性格洒脱豪爽,与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包佶等都有密切交往,并多次互相赠答诗文。其中,他与李白、王维的交往最为频繁。和这些著名诗人相交是阿倍仲麻吕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他们经常荡舟于曲江芙蓉园,寻觅汉鸿门故址,谈古论今,商讨诗文。他曾把自己的一件日本布裘赠给李白,为此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这样写道:“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足以看出二者之间友情的深厚。

史书上的阿倍仲麻吕还是一位天才诗人,他的诗连大诗人李白也赞叹不已。后来有人把他的诗集结为《古今集》,随着一大批优秀的唐代作品一起流传了下来。《古今集》里有一首著名的诗作于公元734年第十次遣唐船将回国的时候,这首诗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诗作水平,还体现了他对唐朝的赤诚忠心和对年迈双亲的无限怀念。这两种感情穿插在字里行间,让人读了不得不为之动容:

慕义名空在,愉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这首诗不但感动了当时大部分文人墨客,更感动了唐玄宗,使得他更加信任这位为了忠义而舍弃了故土的外国人。公元753年,即阿倍仲麻吕来中国后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他终于得到了唐玄宗的默许,随此次来往的使团一同起程回国。在第二年的六月,唐玄宗和阿倍仲麻吕的朋友们为他在长安城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那时,李白由于在外地而没能参加。唐玄宗为送别阿倍仲麻吕,专门作了一首五言诗: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阿倍仲麻吕对此很感激，赋诗曰：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骅骝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右丞相王维赠给他的送行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螯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王维不仅写了送别诗，还冠以长序：“……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名成太学，官至客卿。……黄雀之风动地，黑蜃之气成云；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子其行乎，余赠言者。”

告别宴会过后，阿倍仲麻吕一行辞别长安，南下扬州，他很幸运地在扬州城内见到了鉴真大师，惺惺相惜之余，阿倍仲麻吕邀其东渡。11月15日，阿倍仲麻吕和鉴真大师等人在黄泗浦起航回国。开航之际，阿倍仲麻吕心潮澎湃，他把满腔思归的怀乡深情写成了著名的《望乡》诗：

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本想顺利地回归故土，然后在自己的家乡了此一生。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归帆很不幸地遇到了海暴，全船 170 多人仅有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幸存。后来船只漂流到南越（今越南）境内，归国无路，阿倍仲麻吕只好决定重返长安。可是，那个年代，由于消息闭塞，长安城误传他已遇难，朝野叹惜。

李白听了阿倍仲麻吕途中遇难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含着眼泪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首诗的意思是日本的晁卿辞别了都城长安，乘船驶向大海中的故乡。我那像明月一样皎洁的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沉到了碧海深处，带着愁色的白云遮满了苍梧山，悼念我这位友人去世。这首诗感情真挚，情意深厚，真切地表明了他们两人刻骨铭心的友谊，成为中日友谊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

2. 天意留人：一帆风雨路三千

以下是阿倍仲麻吕公元 753 年回国的整个经历以及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在唐朝住了几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倍仲麻吕越来越思念家乡和年迈的双亲。日本第十一批遣唐使的到来加重了阿倍仲麻吕的思乡情结。这批遣唐使的副使是吉备真备，是 36 年前和阿倍仲麻吕一同来唐朝学习的留学生。故人相见，他们聊了很多。这更加重了阿倍仲麻吕的思乡之情。于是，公元 753 年，他便趁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国的机会，以双亲年迈为由向唐玄宗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回国的意思。

这时的阿倍仲麻吕已经 56 岁了,已经由满怀壮志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唐朝。唐玄宗尽管对阿倍仲麻吕十分不舍,但不忍让这位离家多年的老人失望,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唐玄宗感谢他仕唐几十年立下的功勋,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任命一个外国人为天朝皇帝的钦差大使,说明了唐玄宗对他是何等的信任和器重。

同年 6 月,阿倍仲麻吕随藤原清河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辞别长安,向东驶去。他们在扬州作了短暂的停留,邀请了中国著名佛学大师鉴真一同前往日本。10 月 15 日,他们分乘四船从苏州起航回国。

但是,命运似乎偏偏与这位离家几十年的老人作对。他们的船在海上遭遇了大风暴。藤原清河大使与阿倍仲麻吕乘坐的船因触礁,不能继续航行,与其他三船失去了联系。后来,其他三艘船都顺利地回到了日本。这艘船却如大风中的树叶一样失去了方向,只能随着海浪漂泊。过了很多天,他们的船漂到越南的浓州海岸。无奈之下,船上的人只得弃船登岸。但这只是悲惨旅途的开始。登岸后,他们受到了当地土著居民的追杀,全船 170 多人,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土著人手里。只有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等十余人幸存了下来。公元 755 年 6 月,幸存的十几人历尽艰险,终于再次回到了长安。阿倍仲麻吕的返乡之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阿倍仲麻吕已经葬身大海了。忽然见到他又平安地回来了,都十分欢喜。从此,阿倍仲麻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安心在长安居住。

公元 755 年冬,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唐玄宗只得四处辗转,阿倍仲麻吕也随他一起奔波。直到安禄山被杀后,他们才回到长安。后来阿倍仲麻吕又担任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等职。

公元766年,阿倍仲麻吕被唐代宗李豫任命为安南节度使,上任不久,便患重病。公元770年1月,阿倍仲麻吕在长安病逝,并埋葬在长安,唐代宗追封他“璐州大都督”。

阿倍仲麻吕从19岁来到中国,到72岁去世,一直没有回到日本,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日友好往来的先驱。

为了纪念阿倍仲麻吕,现在的日本和中国分别在奈良和西安建造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西安的纪念碑坐落在当年阿倍仲麻吕经常出入的兴庆宫遗址上。汉白玉制作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李白的《哭晁卿衡》和阿倍仲麻吕的《望乡》诗,具有深邃的中日文化内涵。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看来,一千多年的时光并没有将这位与中国人民友好的使者遗忘。他的贡献和功绩,将在纪念碑上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第四节 日本围棋的始祖 ——大和留学生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693—775),出生于日本的吉备地区,原姓下道朝臣。因为日本人的姓氏大部分是按地域来划分的,所以吉备真备应该姓吉备,叫真备。吉备真备是随日本奈良时期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留学生之一,是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的典型代表。吉备真备在唐朝进行了长达19年的刻苦学习,成为日本精通中国文化的大师,也是中日交流的使者。他把围棋、《孙子兵法》、《太衍历立成》等带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科技、文化、历法、军事等方面的进步。

梦 回

1. 两度来华的日本名士

奈良时期的日本统治者十分推崇唐文化,受唐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全面昌盛的时期。为了更好地学习唐文化,日本统治者向唐朝派遣了大量使节和留学生,负责增进中日关系和学习唐朝先进文化。

吉备真备的父亲下道朝臣国胜在日本朝廷中担任卫士少尉的官职。因此,吉备真备年少时有许多接触优秀人才和文化的机会。他从小就被父亲送到了大学寮去学习,大学寮是当时日本负责学生教育、考试的最高级别部门,寮内分六种学科。在大学寮学习期间,他显示出了超出一般人的才华,很受老师器重。

公元717年,博学多才的吉备真备荣幸地成为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



流传的吉备真备画像之一

的一名留学生，与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等当时日本有名的人士一起到唐朝学习先进文化。到达唐朝后，吉备真备被派往长安鸿胪寺学习儒家经典，当时他的主要老师是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赵玄默是唐朝的一位大学问家，而且还是唐玄宗亲自指派的专门教授外国留学生的老师。

就这样，吉备真备在长安开始了他漫长的求学生涯。这一待就是19年。在19年中，他刻苦努力，虚心学习，从来也没有松懈过，终于小有成就，对唐朝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有了比较深的造诣。学成之后，吉备真备决定回国。



当年日本遣唐使入唐路径图

此时的吉备真备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再加上博学多才,唐玄宗怎么舍得让他离开呢?虽然吉备真备请求了好几次,唐玄宗总是有意不放他走。后来玄宗被缠得没法,就想出了一个挽留的办法。那天唐玄宗找吉备真备上殿,故意出了几道十分深奥的题目,规定倘若吉备真备全部答上来,就放他回国。吉备真备对自己的学问很有信心,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唐玄宗认为这几道题他肯定答不上来,也是相当的自信。可是没想到吉备真备对每一道题都对答如流,没有丝毫迟疑。无奈之下,唐玄宗只得同意吉备真备回国。

回国之后,吉备真备立刻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重用。公元752年,吉备真备作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副使再次来到了中国。唐玄宗见到这位故人十分高兴,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卫尉卿等官职。但第二年完成了出使任务后,吉备真备仍旧坚持回国。在回程的大海上,他们的船队遇到了大风暴,吉备真备乘坐的船只失去了航向,随风漂到了益久岛(今日本九州南之屋久岛)。经过艰苦跋涉,他终于在公元754年回到了日本的京城,并被任命为正四品以下的官职。公元766年,吉备真备由于功绩卓著被日本天皇升任为右大臣,相当于从二品官职,后来又晋升至正二品。公元771年,吉备真备以年老为由向日本天皇辞职,4年后去世,享年82岁。

2. 盛唐文化远赴东洋

与众多的遣唐使和留学生一样,吉备真备为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吉备真备回国后,为日本带去了唐朝先进的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书法、天文、历学、兵事、礼仪、祭祀、建筑等学科知识。唐朝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

吉备真备将唐朝的一些重要典籍带回了日本,为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吉备真备带回

日本的主要典籍有《唐礼》、《乐书要录》、《太衍历经》、《太衍历立成》、《东观汉纪》等。这些典籍大多数都与礼乐制度相关。《太衍历经》传到日本后,为日本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天皇发现这本历法比日本当时的历法《仪凤历》先进得多,马上废除了《仪凤历》,采用《太衍历》。吉备真备带去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

除了著作典籍,吉备真备还把许多先进的器物带回了日本。这些器物大多是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器物,如测影铁尺、乐器铜律管、方响等。另外还有许多军事器械,如骑兵使用的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丝缠漆角弓,能够射穿铠甲、锋利无比的射甲箭和习射用的平射箭等。这些实用器物大大促进了日本科技、军事、经济力量的发展。

吉备真备回到日本之后还亲身参加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活动,为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中介作用。他曾经在大学寮授课,将在唐朝学习到的各种知识传授给日本的学生。现在,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大学寮把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统史籍作为教科书,就是由吉备真备开始的。

对于吉备真备来说,最光彩的事情就是当日本天皇的老师。孝谦天皇继位前,曾经向他学习过科学文化知识。吉备真备针对天皇未来的政治需求,把《礼记》和《汉书》作为授课的重要教科书。吉备真备还参考着中国的礼制典籍,重新制定和完备了日本祭奠孔子的仪式。他参照《唐律》等中国法律制定了《养老律令》,并以《颜氏家训》为蓝本,写成《私教类聚》一书,以训诫子孙励精图治。

为了纪念吉备真备对中日交流作出的贡献,1986年,中日双方在西

安市共同修建了吉备真备纪念碑,记录了他的伟大功绩。



西安吉备真备纪念碑

传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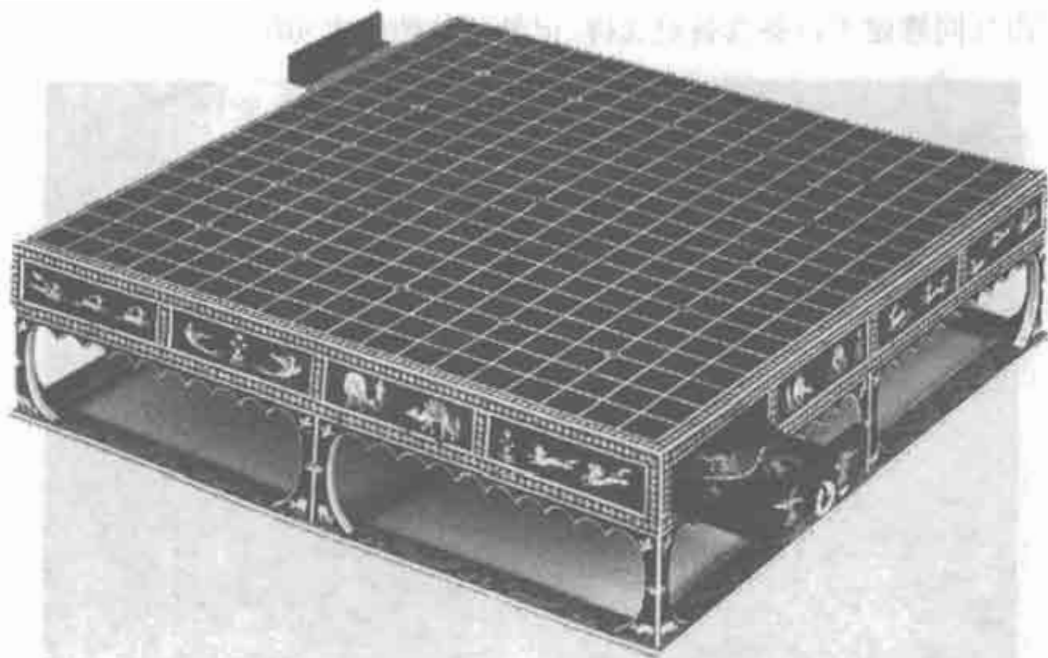
1. 博弈:技惊长安

吉备真备在中国学习的时候可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在日本的两部古书《江谈抄——吉备人唐轶事》和《阿倍仲麻吕入唐记》里,记载着吉备真备在唐朝下棋,弈惊长安的故事。虽然故事的真伪有待考证,但他对日本的围棋事业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

那是吉备真备刚刚表现出他过人才华的时候。

唐玄宗是个当皇帝的好材料,因为他能恰如其分地赏识和重用人才,而不论及出身。对于皇帝对吉备真备的宠爱,有些官员开始嫉妒起来。他们想捉弄一下吉备真备,同时也考验一下他的才能。

这些人经常给吉备真备出一些难题。最开始,他们以才学来为难吉备真备,从南北朝时期编纂的《昭明文选》中出一些难题。吉备真备应对



木画紫檀棋局。唐朝送给圣武天皇的礼物,现藏于日本正仓院。

得当,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有人不死心,决定与他来一场围棋实战。吉备应用围棋的攻战、退守、虚实、劫杀之着,沉着应对,与唐朝棋手杀得难解难分。棋过中盘,吉备真备逐渐转向了劣势。他知道自己这样下去最终会输掉全局,就主动放下棋子请和。唐朝棋手对吉备真备的棋艺也很佩服。于是,两人握手言和。

虽然吉备真备没有战胜唐朝第一棋手,但是他高超的棋艺逐渐传播开来,轰动了整个长安城。据说,吉备真备认为围棋是一种集娱乐性与思维性于一体的活动,在回国时还把围棋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围棋的繁盛局面与当年吉备真备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2.《孙子兵法》的外国之旅

除了成为日本围棋的始祖,吉备真备还为日本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那就是教会人们一门真正实用的学问《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子总结一生军事经验的著述。从古至今,它是中国每一位大将都要研究的重要兵书。如

今它已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兵家艺术的瑰宝。

日本是《孙子兵法》传入最早的国家。吉备真备在唐朝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部神奇的兵书,决定把它带回国用于日本的国防建设。回国后,他把这本兵书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日本古书《续日本纪》记载,吉备回国后的第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祢关成等6人到太宰府向吉备真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真备当年带回的众多书籍中确实有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从那时算起,《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孙子兵法》,如获至宝,把它藏在皇家的密室之中,只有皇室成员才可以阅读。吉备真备因为他对军事的特殊研究与贡献成为日本天皇的座上宾,得到了重用。他在担任太宰府教师的时候,主要为皇室成员讲授《孙子兵法》及中国其他兵书。

对于《孙子兵法》的传入,学界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应该是公元663年以前的事情。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来到了日本,带去了他们从中国引入的《孙子兵法》。他们在日本修建了几座城池,这些城池很有《孙子兵法》上城池的特点。他们认为《孙子兵法》不是由吉备真备通过海路传到日本的,而是通过百济兵法家间接传入日本的。

不管《孙子兵法》具体是在哪一年,由谁传入日本,吉备真备通过自己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为日本的军事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公元10世纪,曾经亲耳聆听过吉备真备教授《孙子兵法》的土师宿祢关成的后世子孙大江匡房对日本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此后,日本历代兵将都对这本经书情有独钟。公元762年,宰大賚依照吉备真备描述的唐

朝军事制度以及《孙子兵法》中的记述,对日本的军事装备进行了革新。由此可见,吉备真备在日本军事发展上功不可没。

总结吉备真备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些时候,一个关键人物能够改变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命运。作为中日交流的使者,吉备真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圆满。在岁月的另一个尽头,吉备真备可以以潇洒的姿态回忆前尘往事,没有任何遗憾了。

第五节 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

——新罗文学泰斗崔致远

在韩国提起崔致远(857—?),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如果有人说他不知道崔致远是谁,一定会惹来一番嘲笑。在那里,崔致远的地位就相当于大诗人李白在中国的地位。崔致远到底是哪里人氏?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为什么朝鲜人民对他如此熟悉、如此爱戴呢?

公元857年,崔致远出生于王京(今韩国庆州)沙梁部,字孤云、海云。他是唐朝末年来中国的韩国著名文人,是古代新罗的文学泰斗。他在中国有很多传奇的经历,一直被中韩两国人民津津乐道。崔致远在中国居住了16年,学习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崔致远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中了进士,在中国为官多年,历经宦海沉浮。他与中国当时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交往。回国时,他把中国的先进文化带回了新罗,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梦 回

踏入仕途的新罗进士

很多史书对韩国名人崔致远的叙述都比较简略,他没有什么离奇的前生后世,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人物。如云般的淡漠却千年万年地萦绕。

公元869年,年仅12岁的崔致远因仰慕中国文化,不畏艰辛,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在唐朝末年。崔致远来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选择将要为自己开创一段极为光辉灿烂的人生旅程。

经过5年学习,崔致远参加了科举考试,没想到一举考中进士。

这一下子,崔致远的名字在中国统治阶层中流传开了。一个刚来中国不久的外国人竟然能够技压群芳,实属异事,看来崔致远确实有超人的智慧。之后,崔致远没有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沾沾自喜,他离开了繁华的长安,来到了文化典籍异常丰富的洛阳攻读汉文。没过多少时日,唐朝统治者就依照考试成绩授予了他官职。从此崔致远开始了他在唐朝的仕途生涯,并不断得到晋升。

公元877年,崔致远被任命为宣州溧水县尉。4年之后,他因为政绩卓著而升迁为淮南节度使从事。当时,唐朝正处在黄巢起义的混乱之中,淮南节度使高骈特别聘请崔致远任从事巡官,执掌军事文书。后来唐僖宗授予他都统巡官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的职务。公元884年,唐朝统治者任命他以唐朝使臣的身份出使新罗,被新罗国王授予侍读兼翰林



位于扬州的崔致远雕像

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

公元894年，他向新罗真圣王进献了他根据当时新罗的社会状况制定的10多条建议，新罗国王因此授予他阿餐的官职。但好景不长，崔致远因过人的才华及皇帝的宠幸，不久就遭到了众多朝臣的嫉妒。这群眼红的大臣联合起来编织了很多罪名诬陷崔致远，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在左一扇子、右一扇子的煽动下，新罗国王终于相信了那些朝臣的话，逐渐冷落了崔致远，最后把他外放到偏远的大山郡、富城郡做郡守。此时的崔致远空怀一腔爱国热忱，却报国无门。他心灰意冷，辞掉官职，隐居在深山之中。再后来，人们就失去了他的消息，不知道他究竟到了哪里。

虽然崔致远的仕途不尽如人意，但他在其他领域却硕果累累。崔致远因为强烈的爱国情操和杰出的文学成就被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百世之师”的称号，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被朝鲜历代王朝公认为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早些年在公务之余，他就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曾写诗词文赋5卷，结集成书，名为《中山覆篔集》，“中山”是溧水县的别号。该书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对后世影响深远。扬州4年，他写成《桂苑笔耕集》20卷。史学家范文澜评价此书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史事”。在中国期间，他写了大量诗文，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四库全书》中收录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其中《秋夜雨中》、《江南女》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因对新罗社会现实不满，崔致远晚期的诗作大多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的黑暗，如《寓兴》、《古意》、《蜀葵花》等。

南京市溧水县有一座唐朝时期建造的规模宏大的7层塔，是唐朝人为纪念崔致远为中韩两国交流作出的贡献修建的。这座塔第二层陈列了崔致远的诗文及他的画像，因此也被称为崔致远室。2007年10月，扬州崔致远纪念馆正式落成，纪念馆内陈列了崔致远的塑像和诗作。



崔致远纪念馆是扬州市首次为外国人建立的纪念馆

传 奇

1. 异国友谊传佳话

崔致远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与当时唐朝的许多著名文人都是好朋友,成为与唐代文人交游最广的新罗文人。在他来华的16年中,裴瓚、顾云等文人经常与他一起讨论诗文。

在崔致远认识的所有唐朝文人中,裴瓚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当时裴瓚是礼部侍郎,是崔致远的主考官。《登科记考》上面记载,公元874年,裴瓚在担任礼部侍郎主贡时,崔致远进士及第。因此他们在长安就结下了“座主”与“门生”的师生之谊。但后来因为公职关系而没有见面。公元876年,崔致远曾经南下湖南潭州专程探望过裴瓚,他的《邮亭夜雨》一诗就是在前往潭州的路上作的。

当时湖南正处在乱世之中,裴瓚的仕途生涯受到了影响,就产生了

归隐山林,做山中宰相的想法。但是,当他看到百姓的生存困境后,就打消了这种念头。湖南观察使任满后,裴瓚被授予礼部侍郎,朝廷命令他到洛阳主管科举考试一事。在他前往洛阳赴任的路上,因为道路不通而被困在了山东襄州。后来,他在淮南节度使身边供职的崔致远的帮助下顺利到达了洛阳。唐军平定关中之乱后,裴瓚升迁为礼部尚书。听到这个消息,远在江南的崔致远十分高兴,竟然“远聆美命,俯切欢心”。他本来想亲自登门道贺的,但是因为职责在身,不能擅自出行。于是,就写了《吏部裴瓚尚书二首》、《贺除礼部尚书别纸》、《上座主尚书别纸》及《与礼部裴尚书瓚状》等文,向裴瓚表示恭贺。

裴瓚赴任途经淮南时,看望过崔致远。为此,崔致远十分感激,作了一篇《谢降顾状》来感谢他,文中写道:“伏蒙尚书念以远方,察其独立,俯怜素志,每煦温颜,听及阶及席之言,伫铭骨铭肌之恳。早来又蒙降三清之仙驾,顾一亩之穷居。”从这些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崔致远与裴瓚之间深厚的友谊。裴瓚在扬州时还曾经做过3首七绝诗赠送给崔致远。崔致远也作了3首诗作为对裴瓚的回报,其中就有著名的“岂料今朝覩宣父,豁开凡眼睹文章”一句。裴瓚到达楚州时,派专使向崔致远问候。崔致远不仅回复了一封信,还亲自前往楚州在路边等候裴瓚的到来。

顾云是崔致远另一位重要的汉人朋友。他是唐朝后期的一位大诗人,至今留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在唐末江淮文人中,顾云与崔致远的关系最为深厚。他们在公元874年同榜中了进士,经常以“同年”相称。当时崔致远只有18岁,顾云24岁,可谓是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

他们两人的友谊以崔致远在淮南节度使处任职时最为密切。当时,顾云也在淮南节度使处任职,比崔致远来得早些。崔致远正是在顾云的举荐下才得到了淮南节度使高骈的认可。两人本来交情就很深,同在一处供职,使他们的联系更加频繁起来。崔致远对顾云的文笔诗才十分钦

敬,他读了顾云献与高骈的“长启一首,短歌十篇”后,将这些诗文誉为“学派则鲸喷海涛,词锋则剑倚云汉,备为赞颂,永可流传”。

后来顾云升任观察支使,崔致远在他的《请转官从事状》中称赞顾云为:“东筠孕美,南桂抽芳,曳谢朓之长裾,从卫青之军幕,五羖皮之为重,岂谓虚谭;百鸢鸟之不如,方知实事。”公元883年,高骈修建的延和阁竣工,命令顾云“谨撰碑词”。碑词写好之后,高骈专门为崔致远送去了一份。崔致远盛赞顾云说:“支使侍御,丘门颜回,融帐卢植,能挥直笔,妙写尊襟。……今者支使侍御以好善心得稽占力,骋真才子



扬州崔致远纪念馆留存的崔致远诗文部分篇章

之藻思,辱大丞相之笔迹,推为宾席殊荣,别是儒家盛事。”他甚至还把顾云的碑词带回新罗,可见崔致远对顾云才华的欣赏。

2. 浪漫曲折的诗歌人生

崔致远一生的诗作很多,光在中国时就作有大量诗文。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文中体会到他对唐朝文化的敬仰、对友人的情谊以及他的诗文才华。

公元884年,裴瓚被朝廷重新起用,后又被提升为礼部尚书。裴瓚在经由淮河、长江赴成都的途中来到淮南,曾亲自来扬州探访崔致远。当时,崔致远刚刚经历了一场宦海风波,心情十分复杂。与老友相见,既喜又悲,他写下了《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五月一日别纸》和《谢降顾状》等一系列诗文。崔致远在此时写下的《奉和座主尚书避难过维扬宠示绝句三首》,生动地描绘了晚唐社会混乱的形势,反映了崔致远和裴瓚

之间的师生情谊,表达了崔致远在遭受淮南幕府同僚们的排挤打击后决定渡海归国的复杂心情。下面就是组诗中的一首:

年年荆棘侵儒苑,处处烟尘犹战场。

寂寥今朝覩宣父,豁开凡眼睹文章。

崔致远回国的时候,在临离开扬州前和东返新罗途中,写下了许多抒发师长朋友之间依依惜别之情的诗篇,如《行次山阳续蒙太尉寄赐衣段令充归续寿信物谨以诗射》、《留别女道士》、《酬进士杨瞻送别》、《楚州张尚书水郭相迎因以诗谢》等。

同时也写了大量描写景物的诗篇。《酬杨瞻秀才送别》是他为送别好友杨瞻而作,借美好的景物祝愿好友一路顺风:

海槎虽定隔年回,衣锦还乡愧不才。

暂别芜城当叶落,远寻蓬岛趁花开。

谷莺遥想高飞去,辽豕宁惭再献来。

好把壮心谋后会,广陵风月待衔杯。

离开扬州后,楚州是崔致远回归新罗的必经之路。在那里崔致远不仅受到了当地地方长官张尚书的热情接待,还得到了淮南节度使高骈派人送来的礼物。崔致远大受感动,并作一首诗以表纪念和明确自己知恩图报的志向。

公元884年,崔致远踏上了日思夜想的新罗国土。完成唐僖宗和淮南节度使高骈赋予的使命后,他在新罗国王的挽留下,留下来担任了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等官职。为了向宪康王展现自己的从政才华,崔致远大力传播唐朝的先进从政理念和先进文化,将自己在淮南节度使供职4年中的大量公私文书进行了整理,编成了《中山覆匱集》和《桂苑笔耕记》,包括今体诗100首、今体赋5首、杂诗赋30首以及表奏集28卷。他将多年的文学创作全部献给了新罗国王,希望得到他

的青睐。但是,当时的新罗王朝十分腐败黑暗,权贵们争宠夺位,交相淫逸,奢靡之风猛涨。当政的新罗真圣女王却不修朝政。于是,满怀报国之志的崔致远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并被排挤出了都城。为此,他作了《古意》、《寓兴》等诗来抒发自己的苦闷:

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
 谁知异物类,幻惑同人形。
 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
 欲辨真与伪,愿磨心镜看。

——《古意》

愿言扃利门,不使损遗体。
 争奈探珠者,轻生入海底。
 心荣尘易染,心垢正难洗。
 澹白与谁论,世路嗜甘醴。

——《寓兴》

崔致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唐朝得到了重用,但在自己的祖国却屡遭排挤,他的一生就像诗歌一样,丰富而多变。他的文学才华被后世的韩国人推崇,人们尊称他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韩国古典名著《仙女红袋》是崔致远在溧水做县尉时写成的,《仙女红袋》在韩国的影响和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

《仙女红袋》记述了一段人鬼相恋的浪漫传奇故事。故事发生在现在的南京高淳县。高淳县地界,在唐代属于溧水县,其固城湖畔有座海拔不高的山,名曰花山,此山因盛产牡丹花而得名。花山以西、固城湖东面,有一个村庄名叫李家村,村中农田中央有一堆椭圆形山丘。据当地人说,这座古墓内长眠着唐代两位才貌双全的绝色少女,人称“双女坟”。

崔致远在溧水县做官时,“禄厚官闲,饱食终日”,日子过得比较逍

遥。有时候实在无聊了,便到处游山玩水。一年春天,晴空万里,空气清新,他来到郊外踏青,见到了双女坟,内心忽然飘过一个念头。当时崔致远年方十八九岁,尚未加冠。正是多情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节。他内心隐隐有种感觉,仿佛不吊唁一下传说中的美女便不自在似的,于是便在墓门上题诗悼念:“谁家二女此遗坟,寂寂泉扃几怨春。形影空留溪畔月,姓名难问冢头尘。芳情倘许通幽梦,永夜何妨慰旅人。孤馆若逢云雨会,与君继赋洛川神。”崔致远竟希望这两位传奇少女的鬼魂能在梦中同他相会,以了断自己这一片相思之情。

回来后,崔致远处理完日常事务后,怀着郁郁的心情入睡了。令他倍感惊诧的是,在似睡非睡之际,却看见两位绝色佳人翩翩而至。不过,这两位美少女一开始非常怕羞。她们先是遣丫鬟送来红袋二只,内装回和诗二首。随后,二女现身相见,频频施礼,感谢崔致远题诗寄情。两姐妹说起自己的身世,忍不住泪珠盈盈,一番细述之后,崔致远终于明白双女坟的来历。

原来这二位小姐是名门之后,父亲为一县长官,在当地权大势大。那年姐姐18岁、妹妹16岁,到了婚配的年纪。两姐妹自小研习文墨,颇有才华,虽不敢称自己是班昭重生,文君再世,却也锦心绣口,不同于一般人家的女儿。谁知道,父母因为贪图小利,竟将她俩许配给了盐商茶贾。姐妹两人不愿屈就市井之辈,自叹命苦,整日里以泪洗面。终于抑郁而死,双双含怨撒手人间。进入阴间已有百年,虽墓旁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但都是凡夫俗子、平庸之辈,姐妹的夙愿一直不得实现。今日崔致远赋诗于此,这才触动姐妹俩的心事,愿以身报答知音。

三人顿觉相见恨晚,饮酒佐兴,谈诗论词。气度夺人、才华横溢的崔致远自然成了两位美少女心仪的“白马王子”,半醉半醒之中,同枕共衾,喜结连理。一觉醒来,崔致远恍然:这竟是人鬼相恋!感慨之余,多情的

崔致远赋长诗《双女坟》，后又继作《仙女红袋》，记述梦中情景。

《仙女红袋》情节曲折离奇，辞藻华丽，文笔优美，至情至真，是韩国篇幅最长、艺术水准最高的一篇爱情传奇，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影响巨大，被后人认为是“开聊斋之先河”，又被誉为韩国的《红楼梦》，可见韩国人对他的推崇。韩国学者曾多次来华寻访双女坟，都没有结果。1996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中韩文化关系研究会会长韦旭升，受韩国学者委托专程到高淳县查找双女坟。高淳县文物保管所所长濮阳康京等协助其查阅了清光绪《高淳县志》，该志卷十五“古迹”篇写道：“双女墓，县东三十里，花山李氏宅旁。鸡林（即新罗）人崔致远，唐乾符中补溧水尉，曾为诗吊之。夜梦二女称谢曰：儿本宣城郡开化县马阳乡张氏二女，少亲笔砚，长负才情，父母于盐商小竖，以此愤恚而死，天宝六年同葬于此。宴语至晓而别。一云招贤驿驿丞女，遇难不屈，尽节而死。”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三、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也有同样记载。由此找到双女坟，现场采集砖瓦、瓷片送请南京博物院专家鉴定，确为唐代实物。双女坟“浮出水面”后，每年来此凭吊、朝圣的韩国客人多不胜数，当地群众也对双女坟充满敬意，悉心保护。

崔致远返回新罗后，把大唐文化传播到韩国，千百年来被韩国人尊为“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父”“新罗文化的圣人”。“东国”、“新罗”即现在的韩国。韩国人提起崔致远，就如中国人提到孔子和李白。

总之，一生颇为坎坷的崔致远为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韩两国人民交流的使者。时至今日，韩国的许多崔姓后人依然向扬州、溧水、高淳等处寻访祖先的遗迹。因为有了崔致远，两国的友谊更加深切和淳厚了。

第四章 宋朝时期的外国人

第一节 茶禅之始

——日本来客荣西

荣西禅师(1141—1215),出生于日本备中地区的一户神官之家,很小就皈依佛门。他曾经两次来华修习佛法,增进了中日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在传教过程中,荣西禅师创办了日本的一个重要佛教门派——叶上派,成为临济宗的初祖,为日本禅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禅门发展成为一支占据主导地位的佛教力量。他从中国带去了茶禅思想、茶种、茶具、茶器等,为后来日本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荣西在京都洛东逝世。

梦 回

1. 传奇少年原来是佛赐予的神童

荣西的父亲是吉备津神社的一名姓贺阳的神官。荣西的身世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天,荣西的母亲在梦中梦见了一颗极为明亮的星星。第二天,她就怀孕了。到了怀孕8个月的时候,田氏感觉肚子中的小宝宝好像已经等不及了。她本来没有什么烦恼,后来无意中听说的传言使她不禁害怕起来。她听邻居们说,如果孩子没有满十个月生下来,对父母不利。可是不管母亲如何恐惧,荣西还是出生了。田氏因为听信了邻居的传言而

拒绝为荣西哺乳。但是,神奇的是,这个连续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婴儿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小生命在襁褓中倔犟地哭着,洪亮的哭声传到了远远的街外。三天之后,当地著名的高僧阳严登上了田氏的家门。他神态庄重地告诉田氏,这个小生命将来会有很高的造化,劝她一定要精心抚养。田氏这才开始为荣西洗浴、哺乳。

由于父亲是佛教的神职人员,荣西从小就受到了佛教的熏陶。8岁的时候,荣西就已经在父亲的指点下读《俱舍》、《婆沙》等深奥的经论。11岁那年,他拜吉备郡安养寺静心上人为师,专心学习佛法。父亲认为荣西是一个智慧超常的孩子,似乎对佛学有特殊的理解力,就决定在这方面培养他。他13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宗佛法。第二年,荣西正式受戒,成为一名专职僧人。当时,比睿山延历寺是日本天台宗佛学的最高学府,是最澄大师从唐代天台山国清寺学习佛法回国之后开创的寺院。在延历寺修行时,荣西主要学习的是天台宗和密教。

17岁时,荣西的第一个老师静心上人圆寂了。他遵循静心上人的遗嘱,追随自己的师兄千命法师学习虚空藏法。传说荣西在修习佛法的时候曾遇到过佛祖显灵等一些灵异的事情。

荣西虽然对佛法有着惊人的领悟力,在与同学们讨论佛经的时候也发挥出超常的口才,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相貌比较丑陋,身材也十分矮小。有人嘲笑荣西说:“虽然你在学识上超过我们,但是你的身材和相貌实在太丑陋了!”

面对别人的嘲笑,荣西坚定地反驳说:“虞舜王于赤县,晏婴相于齐国,未闻身长也。”听了荣西的回答,那些嘲笑他的人都感到十分惭愧。但是,那些尖酸的话对荣西的内心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于是,他向佛祖许下了一个百日修法的承诺。他希望佛祖能够见证自己的诚心,让自己长高一些。在踏入法坛前,他在堂

前的柱子上刻上了自己身高的痕迹。没想到佛祖真的显灵了。百日之后,他走出法坛再次经过那根柱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比百日之前长高了4寸多。从此,再也没有人嘲笑荣西个子矮小了。

19岁时,他拜比睿山有辩法师为师,向他学习天台宗教义。1162年,日本发生了罕见的流行疫病。荣西决定回家探视年迈的双亲。在归途中,他偶然间遇到了比睿山重受显意法师并向他学习密乘法义。荣西十分聪敏,很有悟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领悟了重受显意法师讲授的要旨。后来他又学会了佛学的密法灌顶,从此掩关专心修炼了8年,阅读了很多经书。就这样,荣西在佛学上的造诣越来越高,28岁时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师级人物。

2. 首次来华即遭遇多事之秋

荣西生活的公元12世纪,正值南北宋之交的多事之秋。那时候因为国家内部政权的极不稳定,连年的战争使得1127年的北宋朝廷土崩瓦解,康王赵构仓促之下来到杭州,建立南宋政权。自此,南宋也开始了向北方缴纳岁币的屈辱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要想像大唐时期那样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已属不可能。当时两国所有的交流活动都是通过民间形式完成的。那时民间贸易活动十分频繁,商人和僧侣是最活跃的外交人物。由于中国佛学发展得比较迅速,大量日本僧人来到中国学习禅法。

荣西大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到中国的。日本虽然早在奈良时代就已经产生了禅学,但并不兴盛,没有形成一种有强大影响力的显学。在闭关潜心修习佛法的8年里,荣西虽然阅读了很多经书,但仍然感觉到有很多不足之处。他认为日本的禅学发展得比较缓慢,经书、理论也比较缺乏。他听说中国的禅学发展得比较成熟,就决定远赴中国学习禅学。

1168年4月,年仅27岁的荣西踏上了漂洋过海的旅程。日本政府早已不组织专门到中国学习的使团了,荣西只好搭乘商人的货船。他由日本的博多出发,几个月之后到达了中国的明州(今宁波)。

荣西为了求得良师,遍访了江南的名刹古寺。在前往内地求法的途中,他遇到了另一位日本僧人重源大师,于是二人结伴到天台山寻访灵山圣迹。宋朝时,天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他们在灵山中看到了种种吉祥的象征,如当他们走到一座石桥上时,看见了一条青龙;当他们远远地朝拜饼峰上的罗汉时,供奉的茶汤茗碗忽然现出了夺目的光芒;当他们到阿育王山参拜时,看到了熠熠生辉的佛舍利。于是,人们都认为荣西法师有神奇的法力。他的名声很快就在中国传播开来。后来,他到天台山万年寺拜见了虚庵怀敞禅师,并在他的指点下承袭了临济宗黄龙派的法脉。

有一年秋季大旱,有人请荣西法师祈雨。荣西见当地百姓因为干旱已经陷入濒于死亡的境地,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在荣西为祈雨而念经诵法时,人们看到他身上竟然放出万道光芒。这些光芒一直射向遥远的天际,不一会儿大雨就倾盆而下。就这样,荣西为那里的人们解除了干旱。为此,他被宋孝宗赐予“千光”的名号,人们尊称他为“千光祖师”。

后来,虚庵怀敞禅师移居天童寺、景德寺,荣西也相伴左右,一同来到这些寺院。他们刚到达景德寺时,生活环境十分艰苦。景德寺因年久失修,已经基本上荒废了,需要改建。荣西为了报答虚庵怀敞禅师的教授之恩,主动承担起了景德寺的改建任务。为了筹集修建寺庙的良好木材,他决定回日本。就这样,荣西禅师结束了短短一年的中国学禅之行。这年9月,荣西与重源大师一同回国,并带回了天台山的新章疏30多部。当时日本天台宗的高僧明云僧正曾经夸他道:“子于支那掇扬台教,实中国之光华也。”

3. 故地重游始领悟禅学真谛

荣西大师没想到他再次来到中国已经是19年之后的事了。回国之后,他本想筹集好所需木材就迅速返回,却因很多事情耽搁了。他暂时居住在西九州,致力于禅学与密教的研究和实践,并埋首撰写密教典籍,写下了《出缠大纲》、《胎口诀》、《誓愿寺缘起》、《教时义勘文》、《孟兰盆一品经缘起》等经典作品。

直到1187年,荣西大师才再次得到了入宋的机会,那时他已经46岁了。到达中国后,他帮虚庵怀敞禅师改建完成了景德寺,并继续跟随他学习佛法。荣西学法的至诚精神备受虚庵怀敞禅师的赞扬。虚庵怀敞禅师曾经专门写了一首诗赞扬这位外国弟子,其中有“锋芒不露意已彰,扬眉早堕知情乡”一句,以赞扬荣西非凡的悟性。后来,荣西决心到印度去求取佛法。为了能够顺利出海,他专门赶到临安,参见知府安抚侍郎,表达了自己希望远赴印度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知府却以关塞不通回绝了他的请求。无奈之下,荣西只好放弃了去印度求取佛法的打算,继续跟随虚庵怀敞禅师学习。他在佛学上的精进使当时与他一起学习的很多僧人都对他十分钦佩。几年之后,他终于领悟了禅学的要旨,得到了虚庵怀敞禅师的印可,继承了正宗临济禅法。

荣西大师希望在中国学得的佛学禅法能够尽快传入日本。1190年,他在天台山折取了一枝道邃法师栽下的菩提树枝,交给了在中国的日本商船,请他们帮忙带回日本去,栽种到佛寺内。他对商人说:“中国未有此树,先移植一株于本土,以验我传法中兴之效,若树枯槁,则吾道不行。”商人回国后把这棵菩提树种在了东大寺,后来又取下了一枝树枝分种于建仁寺。直到现在,这两处寺院内当年栽种的菩提树仍然枝叶繁茂,生机盎然。看到树木如自己所愿存活了下来,荣西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天意所归。

公元1191年，佛学有成的荣西禅师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虚庵怀敞禅师将自己的菩萨戒及法衣、印书、钵、坐具、宝瓶、柱杖、白拂等法物全部赠送给荣西。此外，他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释迦牟尼佛以下二十八祖图传给了荣西，并嘱咐他回国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存，弘扬佛法，普度众生。荣西接受了师父赠予的法物和教诲，数月之后平安抵达了日本的平户岛苇浦。

荣西大师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持续了5年。回国之后的第二年，他就在筑前地区建立了报恩寺，后来他又在博多地区建立了圣福寺，在这两处寺院中宣扬佛法。日本佛学界一般把报恩寺的创建作为日本禅宗之始的标志。在荣西的努力下，日本的禅学发展很快。当时，信仰禅学的人很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荣西禅师都十分敬重。荣西在禅学方面的突出成就甚至引起了另一处佛学圣地比睿山僧人们的嫉妒。荣西禅师怎样化解这个矛盾呢？

4. 突遇非难，远走镰仓

在归国后的短短3年之内，荣西禅师就在肥前、筑前、筑后、萨摩、长门及九州等地开展了布教活动，收效很大。最初，他开设经坛讲授禅法时并没有吸引很多人注意，只有几十个人听。很快，僧侣们就被荣西禅师讲授的禅学深深地吸引了，向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此外，他还在讲经之余制定禅规、撰述经论等，渐渐受到了日本政府以及当时其他佛教派别的注意。

1194年，荣西在京都僧侣的邀请下到那里宣扬禅法，没想到由此引发了全日本范围内南都北岭旧宗派僧徒的嫉妒。其中，有一位非常善于辩论的僧侣蛊惑比睿山的僧侣上奏朝廷，向朝廷控诉荣西传播的禅学正在诱惑比睿山的僧侣，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并要求朝廷出面阻止禅学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皇帝在宫中早已听说荣西禅师在京都传播禅学的

事情,于是亲自下诏询问。《延宝传灯录》记载荣西禅师是这样回答皇帝的询问的:“中国禅宗非今始有,昔传教大师尝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一卷,是为最初举扬达摩直指的禅法。良辩昏愚无知,兴发天台山僧众诬蔑我,禅宗若非,则传教大师亦非;传教大师若非,则天台宗的教法亦不能成立;天台教法不能成立,则台徒岂能拒我乎?甚矣!可见其僧徒不明祖师意也。”但他的回答并没有让皇帝满意,皇帝禁止荣西在日本传播禅学。

但朝廷的禁止并没有阻止禅法的传播,荣西与皇帝的对话使更多人认识到荣西宣扬的禅法是十分正确的,从而对他的传法活动鼎力相助。荣西在博多建立圣福寺,参禅者四方云集,声名远播。1198年,荣西根据自己对禅学的理解和多年传播禅学的经验撰写了《兴禅护国论》一书,共分3卷,是日本最早的禅书。在这部书中,他详尽地阐述了禅学对国家的重要性及佛法与王法的相依相关,主张佛法的至极即是禅。《兴禅护国论》问世后,受到了百姓和僧侣们的热烈欢迎。不久之后,他又写成了《出家大纲》一卷,阐述了僧侣的职责。

1199年,比睿山僧侣对荣西的攻击、诋毁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荣西在京都的处境十分艰难。无奈之下,他只得离开京都,远走镰仓进谒幕府传播禅学。在那里,他得到了统治者源实朝的充分信任和极大支持。第二年,恰好源赖朝(源实朝之父)要举办一次周年忌法会,源实朝就聘请荣西为导师,宣扬禅学佛法。源赖朝自己以及家人也皈依了佛教,并专门划拨给荣西一片土地用来修建寺庙。此处寺庙就是后来的寿福寺,是镰仓地区著名的五处佛学圣地之一。得到镰仓政府的支持,禅学在那里很快传播开来,成为当地佛学界的一门显学。

传 奇

1. 茶禅,天地清净始于此物

荣西大师来到中国学佛的时候,几经战乱的宋朝终于盼来了南宋宋高宗年间的短暂平静。那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农业生产也缓慢发展。江南地区兴起了很多规模较大的茶园。当时,南宋境内的大街小巷几乎都可以看见茶馆。人们只要花一两文钱,就可以在这些地方随意饮茶聊天,消遣时光。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茶文化在中国以一种朝气蓬勃的姿势发展起来。

就在种茶、饮茶风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寺院内僧侣们也由此养成了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因为他们发现,饮茶不仅可以防止僧侣们在坐禅时打瞌睡,还可以陶冶情操,培养性情。更有神奇效果的是,不少僧侣还可以从茶的滋味里品出一种难得的人生哲理,从而提高他们的修行。就这样,茶开始与僧侣结缘,并且关系日渐深厚了起来。

荣西大师就居住在茶禅已经相当成熟的国清寺。国清寺附近是南宋文明的著名茶乡。当地人从春季到夏季基本上全部从事采茶、制茶等活动。在浓厚的茶文化和茶禅的影响下,荣西渐渐爱上了饮茶。他在研究佛教经典著作之余,开始研究茶文化和茶禅,并有了很深的体会。荣西还学会了茶的品制技艺,不仅懂得一般茶道技术,还懂到禅宗茶道之理。

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僧人已经把茶叶传播到了日本。但是,茶文化和茶禅并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对茶知之甚少,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茶叶。

为了把中国的茶文化带到日本,荣西禅师在回国收拾众多经书等行李时没有忘记带上一包茶叶种子。回国后,他就把这些茶叶种子种在了



日本的荣西禅师茶碑

自己居住的筑前、肥前两地交界处的背振山一带。为了使茶树尽快在日本扎根,他还将茶叶种子分送给了拇尾山(今宇治地区)高山寺的明惠上人。明惠上人在拇尾山也开始种植茶叶,后来那里发展成为日本有名的产茶地。因为宇治地区的茶是荣西禅师直接从中国带回来的,因此这里生产的茶叶也被称为“真正的茶”。荣西也因此被尊称为“日本的茶祖”。

茶禅是有别于民间茶文化的一种佛教文化。宋朝时,中国僧人已经有了专门的茶具,吃茶的礼仪、行法也渐渐发展成熟起来,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茶禅。中国流传着“茶禅一味”的说法,表明茶在禅学中的重要作用。

荣西大师除了把茶叶种子带到了日本,还把宋朝茶禅文化原原本本地引进到日本。他在自己曾经居住过的镰仓寿福寺、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等寺院都设立了每日修行中吃茶的寺规。1211年,荣西禅师在他70岁高龄时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本书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他从养生方面入手,阐述了自己饮茶的独特认识和切身体验并对中国的茶禅文化大加赞扬。他在书中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伏惟无造万像,以造人为贵也。人保期,以守命为贤。其保一期之根源,在养生。其示养生之术计可安五脏(肝心肺脾肾)。五脏中心王乎?心脏建立之方,吃茶是妙术也……”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荣西引用了佛教经典关于五脏的协调乃是生命之本的思想。他认为与五脏对应的五味是酸、辣、甜、苦、咸,苦味是所有味道中的最高级别,茶又是所有苦味的核心。此外,荣西禅师还在书中记述了如何饮茶才能起到养生效果。



建仁寺的《荣西禅师茶思》碑文

点茶法是荣西大师从中国带回的宋代的饮茶方法。点茶法与僧人空海传入的唐朝末茶煮饮法有很大的不同。点茶法也被称为末茶冲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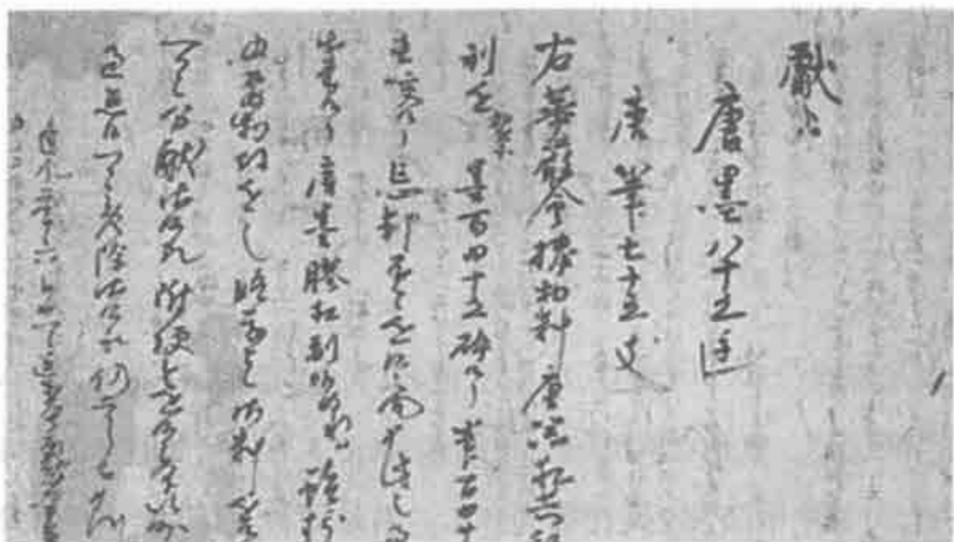
法,冲泡饮用过程为首先用专用的小勺子将已经被碾成粉末状的茶叶放入茶碗中,然后一边冲入开水,一边用勺子轻轻地搅动茶汤。这样冲好的茶水表面会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色茶末。这种绿色末茶冲点法传入日本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直被日本茶道沿用。茶具是荣西对日本茶道的又一重大贡献。之前,日本人在饮茶时没有专门的茶具,也没有专门用来贮藏茶叶的器物。荣西把宋朝的叶茶瓶罐贮藏法带到日本。这种贮藏器的体形较大,用来长年贮放叶茶,也一直被日本茶道沿用。

据说,荣西禅师向镰仓政府进献的茶叶还救过源实朝将军的性命。1215年,源实朝将军感染了热病,遍请国内名医用尽所有良药也没有任何效果。在他命悬一线之际,荣西禅师进献了自己种植的二月新茶,说饮下茶水就可以治好将军的病。源实朝将军的家人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想到源实朝将军饮下茶水后,身体竟然一天天地好转了起来。从此,日本的茶禅之风更加盛行了。

2. 禅学大兴

荣西禅师是日本禅学的始祖,对日本禅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有千光派之祖、台密叶上流之祖、遍照金刚、智金刚、渡宋巡礼沙门之称。他从中国学成归国后,一直致力于禅学在日本的传播。他的传播活动得到了镰仓幕府的支持,禅学在镰仓地区大力发展起来。

1202年,镰仓幕府统治者源赖朝长子源赖家在京都的洛东鸭河畔建立了建仁寺,并授命荣西为开山祖师。第二年6月,荣西在建仁寺开设了佛学界台宗、密宗、禅宗的三宗道场,把这三个佛教宗派结合起来向弟子讲授。他根据自己的佛学思想建立了真言院和止观院,把台宗、密宗、禅宗三宗佛学思想结合起来,开创了日本的临济宗禅学学派。在他的影响下,建业寺很快发展成日本一座著名的禅学寺院,各地僧人纷纷前往建业寺向荣西学习禅学。



荣西自笔书状

1206年，朝廷任命荣西为日本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东大寺劝进。他在那里负责监督修缮东大寺的整个工程。整个工程历时4年，完工后，他又被派往洛东法胜寺，负责修复因火灾而烧毁的第九层佛塔。因为修缮有功，他被日本皇帝授予了紫衣袈裟。1213年，荣西被升为僧正。后来，他又参与建设了龟谷寿福寺。两年之后，已经74岁高龄的荣西突然感到身体有些异样。他意识到是自己升天的时候到了，就带着慈祥的微笑安然离开了人世。从13岁出家到74岁去世，荣西禅师修习佛法、传播佛教的时间长达61年。因为他曾经在比睿山的叶上房和建仁寺讲经诵法，因此他开创的禅宗派别也被称为叶上流或建仁寺流。

荣西大师一生在禅学方面的著述很多，如《一代经论总释》、《日本佛法中兴愿文》、《三部经开题》、《不二门论》等。他门下汉族名的弟子有观海、明全、行勇、严琳、荣朝、心海、道圣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传播禅学思想的中流砥柱。他对日本后世的禅学思想影响极为深远，促成了入宋学禅的风潮。在他之后，明全和尚偕弟子道元禅师也到宋朝学习禅法，回国后创建了越前永平寺。

第二节 日本第一位国师 ——禅学中兴者圆尔辩圆

圆尔辩圆(1202—1280),出生于现在的日本静冈县,是日本著名僧人荣西的法孙。他是日本的第一位国师,法号“圣一”,是日本禅学的重要传播者,是把中国宋文化传播到日本的奠基之祖。他早年来到中国向中国著名的禅学大师无准师范学习禅法。学成回国之后,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对禅法的传播中。在传播禅法的同时,圆尔辩圆还把中国宋朝的理学、书法、茶道带入了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梦 回

1. 一生成就中兴禅宗

很小的时候,圆尔辩圆就出家为僧了。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超常的智慧,很快就在众多僧人中脱颖而出。皈依佛门后,圆尔辩圆认为日本的佛学系统很不完善,为了寻求佛法就渡海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在南宋时期。圆尔辩圆来华时,中国佛教杨岐派的分支破庵派正处在全盛发展时期。1235年,他来到南宋,在破庵派正宗传人无准师范禅师的门下苦修6年,终于得到师父的认可,正式成为杨岐派的传人。

1241年,继承了无准师范禅师衣钵的圆尔辩圆带着6年所学回到了日本,开展传教活动。他在日本著名的崇福寺与承天寺正式传播杨岐派的无准禅系。这是佛教杨岐派第一次传入日本。圆尔辩圆大师的师兄

道樗曾说：“兴尽心空转海东，定应赤手展家风。报言日本真天子，且喜杨岐正脉通。”可见圆尔辩圆确实是把杨岐派带到日本的第一人。圆尔辩圆因此成为日本杨岐派的始祖。

圆尔辩圆还曾三次前往当时日本首都镰仓幕府的所在地镰仓弘扬佛法。他的传教活动很有成效，当时日本的实际执权者北条氏和公卿贵族藤原氏等都对他带来的教义深信不疑。

藤原氏为了支持圆尔辩圆的佛法，在现在的日本京都东山区建立了东福寺。圆尔辩圆成为东福寺的第一任主持，并在那里以东福寺为中心进一步弘扬禅法。在圆尔辩圆的努力下，不久之后，日本就迎来了佛学禅宗兴隆的第一时期。《别峰殊禅师行道记》中记载：“日本禅宗之学，自圣一国师唱无准之道于东福，可谓中兴矣。”圆尔辩圆的佛教传播活动使中国的无准师范大师和径山寺名扬日本。当时，有其他宗派的日本僧人对圆尔辩圆的传教成果十分嫉妒，就上奏朝廷，说了圆尔辩圆的很多坏话，企图毁掉承天寺。朝廷不但没有相信他们的话，还把承天寺、崇福寺升为官寺。从此，无准师范和径山寺的名声更大了，形成了径山中日交往史上的一个高峰。

圆尔辩圆的师承比较正宗，又对汉语掌握得非常熟练，对佛经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些优势使他宣讲的佛法能够深入人心。当时，日本的后嵯峨、龟山、后深草三位天皇都曾经向圆尔辩圆学习过佛法。他对日本的政治也有影响，《日本国丞相藤原公舍经之记》记载，当时权倾朝廷的关白藤原道家之子藤原实经原来信奉道教，但自从听了圆尔辩圆的佛法之后，就开始改信佛学禅宗了。藤原实经还亲自动手抄写了32卷《法华经》，赠给无准师范入寂后宋理宗赐建的径山正续先师圆照塔院。

圆尔辩圆为日本佛学禅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日本的书



圆尔辩圆曾大力弘扬禅法的东福寺现在香火依然旺盛

法、茶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中日两国交往的使者。

2. 径山拜师

早在圆尔辩圆来华之前,就有很多日本学者、僧人来到宋朝学习。公元1171年至1174年,日本僧人觉阿远渡到达宋朝,拜佛海禅师为师学习禅宗的杨岐派禅法。但他回国后没有设立门庭加以传授,因此杨岐派禅法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来华之前,圆尔辩圆已经是日本一个很有声望的僧人。到达宋朝后,他四处遍访名师求教,走遍了江南,曾经先后参谒过许多名师,“跨天竺寺月柏庭门,质性具之旨。柏庭证前学,即授台宗相承之图,并付自撰《楞严》、《楞伽》、《圆觉》、《金刚》四经疏钞”。最后,他终于认定声名卓著的无准师范作为自己的老师。

无准师范,是中国一代禅学大师。他9岁就出家为僧,曾经拜过很多著名的高僧为师,学习佛法。径山是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禅院,被誉为

“天下东南第一释寺”。1232年,无准师范开始主持径山,《大丞相游公祭文》中记载,无准师范主张:“道无南北,弘此在人,果能弘道,则一切处总是受用处。不动本际而历遍南方,不涉寻求而普参知识,如是则非特此国彼国不隔丝毫,至于无边香水海那边更那边,犹指诸掌耳。此吾之心常分,非假于它术,如此信得及见得彻,则逾海越漠、涉岭登山,初不恶矣。”在他的主持下,径山的名声更大了,全国乃至许多外国僧人云集径山寻求佛法。



径山为南宋时期的著名佛教圣地

无准师范一见到圆尔辩圆,就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圆尔辩圆在径山有着特殊的地位,《元亨释书》上面记载:“其在径山,虽居侍位,佛鉴不称侍者,只呼尔老。”无准师范对圆尔辩圆大为赏识,不仅把自己的佛学知识倾囊相授,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法语:“圆尔上人效善财,游历百城参寻知识,决明已躬大事,

其志不浅。”

经过几年的学习，很有慧根的圆尔辩圆已经掌握了杨岐派禅法无准禅师的教义，成为第一个真正师承无准的日僧。无准师范认为他是一个传播佛法的合适人选，就早早催促他回国传法。他对圆尔辩圆说：“汝早归本土，提倡祖道。”还叮嘱他在传法的时候要“一一依从上佛祖法式，更宜以此道力行，使吾祖之教，在在处处，炽然而兴”，意思是严格按照杨岐派禅法的宗旨弘布禅法、开示众生。

在师父的教诲下圆尔辩圆决心回国传法。临走之前，无准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密庵咸杰祖师的法衣、宗派图和自赞顶相作为传法的信物，赠送给了他。

无准师范大师对门下弟子的要求一向很严格，只有他觉得向他学法的僧人已经真正领悟了佛法的要旨，才公开承认这个徒弟。因此，他门下的徒弟几乎全部是佛学精深的大师。圆尔辩圆在学佛时自然也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因此佛学功底非常深。这些为他回国后传法，并最终成为日本禅宗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奠定了基础。

3. 撒播禅宗种子的大师

圆尔辩圆为日本禅宗的生根发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圆尔辩圆，就没有禅宗在日本的全面传播，宋朝时中日文化交流也不会如此繁盛。

回国后，他把无准师范教授的具有径山特色的杨岐派禅法的规矩、僧堂原原本本地移植到了日本。公元1241年，圆尔辩圆将《禅院清规》带回日本，并使之在日本传播开来。他在日本传播了一整套杨岐派禅法的样式、规范。圆尔辩圆还参与制定了日本的一些佛教戒规。在中国学习期间，圆尔辩圆深切地体会到日本寺院禅规制度的落后。因此，他一回国，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整顿全国各寺院的禅规中去。他做事往

往事必躬亲,严格推行宋朝的禅院制度。

公元1280年,圆尔辩圆以《禅院清规》为参考蓝本,仿照上面的章条制定了《东福寺清规》。《东福寺条条事》记载着当年圆尔辩圆制定《东福寺清规》的事情:“圆尔以佛鉴禅师丛林规式,一期遵行之,永不退转矣。”后来大鉴禅师为日本禅林制定的《大鉴清规》,就是在圆尔辩圆制定的《禅院清规》基础上,进行不断完善写成的,成为后世日本禅林的规范,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禅林。因此可以说,日本禅林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圆尔辩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日本的《径山寺味噌》记载,日本佛教的僧堂生活是从径山传过去的,书中还记载了举行“茶礼”的僧堂中要张挂名家绘画和无准师范等祖师的墨迹,摆设中国花瓶,泡茶用天目茶碗。这些僧堂规范几乎全部来自于圆尔辩圆。他创立的《东福寺清规》中就有程序严格的“茶礼”。“茶礼”在布置讲究的僧堂举行,僧侣必须遵守。圆尔辩圆把宋朝的僧堂生活原原本本地移植到了东福寺的僧堂生活中。

圆尔辩圆门下的弟子很多,其门派在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中被称为“圣一派”。“圣一派”以东福寺为中心,在全国拥有众多寺院,是后世日本五山派的主要流派。圆尔辩圆因为在禅学上的巨大贡献被日本统治者封为“圣一国师”。他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国师,在日本宗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4. 宋学东渐:程朱理学开始影响世界

为日本带去了杨岐派禅法的同时,圆尔辩圆还把宋朝的朱熹理学带到了日本。他来华时,正是南宋的朱熹理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大流行的时期。在某些方面,宋朝理学的理念和方法论与禅宗十分接近,在社会上有“儒禅一致、教禅融合”的说法。因此,僧人们在学习禅法的时候,就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宋朝理学。圆尔辩圆十分注重对宋朝理学的学习。

回国之后,他在弘扬禅法的时候把宋朝理学也传播开去。宋代理学传到日本,被简称为“宋学”。

无准师范在禅学思想上具有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特点。他认为“三教圣人,同一舌头,各开门户,鞠其旨归,则了无二致”。他以禅宗为立足点,一直都致力于将宋朝理学与禅学结合起来。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称他为南宋禅门中第一宋学者。圆尔辩圆深受无准师范的影响,兼儒释于一身,在禅学上也继承了将禅学与宋朝理学结合起来的的思想。他是无准师范的众多弟子中倡行三教合一的最典型代表。

据历史记载,圆尔辩圆是现在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将宋学著作引入日本的日僧。他引入的著作有《晦庵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晦庵集注孟子》、《五先生语录》等。这些书籍被珍藏在普门院中。后来,他亲自将这些书籍总结归纳成了《三教典籍目录》。虽然这本目录已经失传,但从其法孙大道一法师根据他对普门院藏书的调查编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可以看出当年圆尔辩圆编写目录的影子。

圆尔辩圆继承了无准师范三教兼学的禅学思想,经常向弟子们讲授宋学。这些课程往往是在他传禅时讲授的,既丰富了弟子们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给讲授禅学增加了更多的乐趣。公元1257年,圆尔辩圆曾经为当时的幕府掌权者北条时赖讲授《大明录》。《大明录》是南宋奎堂居士编写的一部援儒入佛的著作。这是日本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在日本禅林中讲授宋学的记载,因此圆尔辩圆也被称为“日本宋学传入的第一人”。

公元1268年,崛河国大相国源基贞还曾向圆尔辩圆请教过儒、道、佛三教的大意。圆尔辩圆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精心的解答,并把答案集结成册,即《三教要略》一书。公元1275年,圆尔辩圆拜见了龟山法

皇,向他讲述了三教道理。

圆尔辩圆虽然是一位致力于传播禅学的僧人,但他一直把儒、佛、道三教学说作为传播的重点。因此,他既是一位僧人,又是一位宋学研究

传 奇

书法与茶禅,意境的出神入化

随着禅宗的传入,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渐渐传到了日本,尤其以书法最为显著。圆尔辩圆是宋朝书法传入日本的前驱者之一。他的老师无准师范是一个很有诗文修养的僧人,一生共作拈古 85 则、颂古 42 首、偈颂 62 首、佛祖赞 43 篇、自赞 23 篇、小佛事 14 篇、序跋 26 篇以及法语 31 篇。圆尔辩圆在向他学习的时候也十分注重对这些法语、偈颂、赋诗题字的学习。无准师范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无准大师的书法手法浑厚、气势磅礴。《大宋径山佛鉴无准禅师》中称赞无准大师的书法“自有寻常墨客、凡夫作家所不能达到的地方”。

宋朝的书法有鲜明的特点,那时的人们崇尚个性、峻烈、多禅味的书风。这种书风传到日本后被称为“禅宗体”。这种书法在日本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唐朝时的书法,但却是日本镰仓时代极为重要的一种书法形式。圆尔辩圆特别注重对汉字书法的学习。他在中国的 6 年间,曾经拜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张即之为师,并得到了无准师范禅师的秘传。因此,他可以写出一手漂亮的带有宋朝风格的汉字。回国时,他带回了许多著名宋朝书法家的拓本、书帖以及无准师范的书法作品。有学者将圆尔辩

圆与无准师范二人的书法作品进行比较,发现他们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圆尔辩圆认识到书法不仅可以陶冶僧人们的情操,同时还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工具。于是,他在日本传播禅学的时候,往往将宋朝的书法一同传播出去。当时宋朝政府在中日交流上有一定的限制,圆尔辩圆除了担当传播佛教的任务外,还肩负着书法交流的责任。

此外,圆尔辩圆还从中国带回了茶叶种子。现在日本静冈县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的主要产茶地,就是当年圆尔辩圆大师带去的茶种植后发展而来的。他制定的《禅院清规》还直接模仿径山的茶禅文化,把“茶礼”融入到僧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他对后来日本茶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饮茶的风俗开始流传到全国各地,昔日的“王谢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第五章 元朝时期的外国人



第一节 杰出的阿拉伯政治家

——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出生于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全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相传他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三十一世孙。“赛典赤”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意思,阿拉伯文的原意是“荣耀的圣裔”,“赡思丁”是宗教的太阳的意思,“乌马儿”代表长寿。他是中国元朝时期著名的阿拉伯政治家,曾经得到过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几代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重用,走过了长达40年的仕途生涯。这位阿拉伯政治家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他又做出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去怀念或歌颂的呢?

梦 回

1. 仕途漫漫四十年

赛典赤·赡思丁的父亲苦鲁马丁是当地一支军队的首领。在父亲的影响下,赛典赤·赡思丁很快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13世纪初,成吉思汗带领大军攻占了不花刺后,他们率领本部1000余人投靠了成吉思汗。由于作战勇猛又有谋略,赛典赤·赡思丁很快就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赏识和重用,真有点平步青云的味道。



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南北,任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跟随他征服了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窝阔台即位后,年轻有为的赛典赤·赡思丁再次得到重用,担任丰、靖、云内(今大同、呼和浩特一带)的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元朝时期的官职名,也就是那些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政绩卓著,他被调任为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赛典赤·赡思丁丝毫没受影响,他的好运还在继续。蒙哥继位后,赛典赤·赡思丁被任命为燕京断事官。断事官在当时的蒙古汗国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史书上记载:“断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属。国初,尝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原以为赛典赤·赡思丁只是适合带兵打仗,或是做一方武将,没想到当这个掌管刑狱的官依旧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可见,某些人天生就是做官的料,还是全才。

时过不久,赛典赤·赡思丁因为政绩卓著,被晋升为燕京路总管、采访使。忽必烈时期,他再次得到升迁,升任燕京路宣抚使。忽必烈对赛典赤·赡思丁也十分信任,“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公元1261年,朝廷任命他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负责管理元朝的财政。在担任平章政事期间,他以“轻财爱民,多惠政”著称。在他的财政政策指导下,蒙古汗国的国库很充盈,为蒙古大军攻打宋朝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赛典赤·赡思丁曾经发行过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正规纸币,至今,仍是经济史上最有意義的典范。

公元1264年,赛典赤·赡思丁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有节制陕西五路以及四川行枢密院所有大小官属的权力,成为蒙古汗国的一位重臣。在陕西任职的3年内,赛典赤·赡思丁兴屯垦,办学校、修治山路、桥梁、栈道,政绩卓著。他离任时,陕西的民户增加3 565户,军户增加12 255户,税收增加6 225钞锭,屯田粮增加9 721担。从此以后,朝廷更加器重赛典赤·赡思丁了。长安地区的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很多地方树立了记载着他政绩的石碑。

赛典赤·赡思丁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功绩是在云南省任职期间,人们称他为“昆明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政治家”。在40多年的仕途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元朝统治者扫清了中原和南方地区的统治障碍。这样的全才官员,皇帝又怎能不对他宠爱有加呢。

公元1279年,积劳成疾的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去世。当时,昆明城内“百姓巷哭”,“邦之父老人请诸朝刻石颂功,立庙祀之”。

赛典赤·赡思丁政绩卓著,在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族交往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交趾国国王派遣了12名使者到昆明为他送行,使者无不号啕痛哭。使者的祭辞上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元世祖忽必烈对这位重臣的去世也十分伤心,命令云南的继任者“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人们把他埋葬在了昆明北郊马再山的马家庵,墓的旁边就是他生前带领修建的松花坝水库。元成宗追封他为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谥忠懿。后来,朝廷晋封他为咸阳王,改谥忠惠。

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人大多在云南为官,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同样起了很大作用。据说,明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就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

现在,在昆明市民航东路五里多小学内有一座方形石砌高冢,这就是赛典赤·赡思丁的陵墓。陵墓上有石刻屋檐盖板,正面刻“元咸阳王

瞻思丁墓”，左面刻《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其右侧有1917年石刻《重修咸阳王陵记》。每逢节日，回族人民都要为他游坟，以示怀念。



赛典赤·瞻思丁墓

传 奇

1. 堪当大任的理财家

赛典赤·瞻思丁被中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公认为出色的理财能手。这种出色的理财能力在他从政之初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窝阔台即蒙古大汗时，蒙古国与金国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金国的统治者为了朝廷的稳定，把统治中心南迁到了河南汴京（今开封）。这样，丰州、净州、云内三州就成了蒙古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原来都是金国的军事重地，同时也是金国与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地方，互市上商业繁盛，人口稠密，经济较为发达。得到了这样一块风水宝地窝阔台

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他却因此而陷入了困境。原来在蒙古国与金国的交战中,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城镇内到处都是断壁颓垣,田野里也是一片荒凉。这也是金国将统治中心南移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些地区不但不能为蒙古国提供必要的军粮补给,反而成了蒙古国的包袱,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这些地区的生产、生活进行恢复。

窝阔台认为年轻有为的赛典赤·赡思丁是管理这一片区域的最佳人选。赛典赤·赡思丁对于如此沉重的任务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为难。上任后,他对那里的特殊经济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拟定出了对策。他认为流窜在那里的匪盗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要有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他带领官兵对活跃在这三个地区的匪盗进行了集中打击。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以后,赛典赤·赡思丁把重点放在了发展生产上。当时,生活在那里的很多百姓都到别处避难去了,没有劳动力就没法生产。于是,赛典赤·赡思丁下了一道命令,把躲到外地的流亡人民召了回来,分给他们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工具,让他们开垦荒地。此外,他还把暂时不用的军队投入到社会生产中。

在赛典赤·赡思丁的经济政策下,丰州、净州、云内三州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那时,蒙古国对中原地区实行课税制度。三州地区是大批课税物资运往蒙古国都哈勒和林的必经之路。为此,三州地区的人民要为运输这些物资负担很多徭役。赛典赤·赡思丁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三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体恤民间疾苦,合理使用役力,既保证了课税物资的运送,也使三州地区的人民免于过分沉重的劳役负担。这项措施对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窝阔台对三州地区经济的恢复状况很满意,对赛典赤·赡思丁的才干更加赞赏。他先后被授予燕京路断事官、燕京路总管、燕京路直抚使等位高权重的官职。燕京本来是金国的都城,战争之前是一个经济发

达、贸易频繁的北方名城。但经过战火的洗礼,也变得满目疮痍。当时的形势是:蒙古国要想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就必须把燕京这个大后方建设好,而建设燕京,又必须从恢复发展惨遭破坏的燕京说起。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有了三州地区的治理经验,赛典赤·赡思丁理所当然被委以重任。当时,一些蒙古贵族在燕京城内横行霸道,不仅公然在大街上抢占民女、掠民为奴,还任意霸占田地和水源,肆意搜刮钱财。赛典赤·赡思丁敢作敢为,刚一到任便对这些蒙古贵族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尽管他知道这些贵族背后有很强势力,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丢掉官职,还可能把性命搭进去,但他没有害怕和退缩,而是狠狠地打击那些为非作歹的权贵势力,清查田产,没收权贵霸占的民田,释放被权贵籍没为奴者,使其复业。

除了蒙古贵族,一些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社会上的违法活动也很猖狂,有的竟“造伪钞,结党杀人”,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极坏的影响。他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全部绳之于法,以儆效尤。此后,燕京的社会经济秩序日渐安定下来。办完这些亟待解决的事情后,赛典赤·赡思丁又在燕京地区组织了很多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紧跟着,他招抚流民开垦荒地。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京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再次成为中国北方一个经济发达、贸易繁荣的大城市。可以说,在元朝的功劳簿上,赛典赤·赡思丁绝对有资格占据非常靠前的位置,尽管他当文职比当武官的时间要多得多。

2. 远涉云南建立不世功绩

公元1274年,已经63岁高龄的赛典赤·赡思丁接受了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任务,即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是元朝开设云南行省之后的第一任平章政事。

当时元朝已经灭掉了金国,占领了原属南宋统治的大片地区,后来云南也成为元朝的正式统治区域。可是元世祖忽必烈却为寻找一个合适的云南管理者伤透了脑筋。由于云南地处偏远,民族众多。忽必烈最先派去的几名官员都政绩不佳,造成了那里社会秩序的动荡。他本来早就想让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平章政事,但是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就没有开口,直到云南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让他出马的地步,忽必烈一看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让老卿家远走他乡。赛典赤·赡思丁接受任命之后,并没有用什么年事已高告老还乡之类的话搪塞,而是遍访熟悉云南情况的人,获得了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精心绘制了一张图表呈送忽必烈,并向忽必烈奏明了自己安抚治理的计划。忽必烈十分感动,决定亲自为赛典赤·赡思丁盛宴壮行。临行前,忽必烈把他召进宫,送给他“谨厚”二字,鼓励他以谨厚的政治风度抚治云南。

从赛典赤·赡思丁一踏出京城,远在云南的宗王脱忽鲁就起了疑心。他担心赛典赤·赡思丁的到来会影响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风声传到了赛典赤·赡思丁的耳朵里,他当即派自己的长子纳速拉丁向宗王说明来意,并向他请教兴利除弊之道。宗王看赛典赤·赡思丁一片赤诚,就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到云南后,赛典赤·赡思丁非常注意与宗王的关系。宗王对他的各项整治措施也给予了全力支持。这样云南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下来。当时云南的管理体制是军政一体、军人代政、政出多门、号令不行。赛典赤·赡思丁认为这种管理体制有很多弊端,就上奏忽必烈,请朝廷把云南的宣慰司和元帅府纳入行中书省管辖。由此云南政令得以统一。

不过麻烦并没有完全消除。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行省,当时元朝虽然已经统一了云南,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有自己的统治区域。元江禾泥族(今哈尼族)首领萝槃甸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拒绝实行

元朝的行省制,带领自己部下的兵马发动了叛乱。赛典赤·赡思丁面带愁容地带兵出征平叛。身边的将士都对他的忧虑很不理解,因为凭元朝强大的军队征服一支小小的少数民族部队轻而易举。赛典赤·赡思丁解释说:“我不是怕打仗,也不是担心此次出征不能胜利,而是怕你们不幸阵亡。此外,即使我们征服了叛军,也必然会给当地的百姓带来灾难,使他们不得安宁。”

有此仁义之心,一路上赛典赤·赡思丁都在思考着最好的解决办法。他认为最好不通过武力就能把问题解决。大军兵临罗槃城下,他认为“力攻不如德胜”,决定对叛军实行劝降政策。罗槃王虽然口头答应投降,三天之后也没有投降。部将等不及了,极力劝赛典赤·赡思丁攻城,他却不同意,再派使者晓以利害。又过了三天,罗槃王仍然不肯投降,将士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来到赛典赤·赡思丁的营中请战,他仍然不同意。这时,有一位部将不顾他的命令私自出兵进攻,赛典赤·赡思丁十分生气,当即就把那名将士处斩了。罗槃王在城中观察着赛典赤·赡思丁军中的一举一动,当他看到赛典赤·赡思丁竟然为了自己处决军中的将士时,深受感动。他说:“赛平章如此宽宏大度,我若再不投降就是违抗天命啊!”于是,他开城归顺,一场战争就这样化解。在罗槃王的带领下,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如白衣(彻里傣族)、和泥(哈尼)、金齿诸部纷纷归顺元朝,全省呈现出了一派安定的政治局面。

根据云南具体的政治情况,赛典赤·赡思丁沿袭了大理的三十七部,新设了三十七路官职。路以下官员尽量选任各族首领和土官。有土官来见,他都备酒食宴劳,赠送衣冠鞋袜,因此深受土酋拥戴。在他管理云南的任期内,云南的一切都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有了赛典赤·赡思丁的存在,元朝政府再也不用担心西南的威胁,可以专心致志地发展中原了。

3. 主动减免赋税的父母官

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云南也不例外。赛典赤·赡思丁为了治理好云南,主动向当地的老百姓请教发展经济的办法。只要百姓们提出的办法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就会采纳。因此,赛典赤·赡思丁上任后,云南的百姓都很拥护他。他经常穿着百姓的衣服,带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深入民间探访。

一次,赛典赤·赡思丁对身边的百姓说:“如果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朝廷把种子、农具、耕牛借给你们,你们认为可以向朝廷缴纳多少粮食作为赋税?”百姓们回答说可以交一半的收成。他想了想说:“朝廷的赋税太重了。你们的牛死了要再买,农具损坏了要维修,还要留足下一季的种子。这样一季收成仅只剩下了一半,怎么能够维持你们的生活呢?”百姓们说可以向朝廷缴纳三成粮食。赛典赤·赡思丁仔细想了一下,认为还是欠妥当。他认为百姓们缴纳三成粮食虽然可以维持住基本的生活,可是没有什么富裕,一旦遇到灾荒很可能就会挨饿。若是碰上婚丧嫁娶、养育子孙的事情,粮食就更不够用了。最后,他决定只征收两成收成作为赋税,并且还可以用银钱、牛马折算缴纳。

这道命令一公布,云南百姓欢呼万岁。赋税减轻了,农民们都铆足了力气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在火热的农耕气氛中,云南经济大为好转,在很短的时间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赛典赤·赡思丁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又把因战争出现的大片无主荒田清理出来或由军队屯耕,或分给百姓耕种。他设立屯田区多处,垦田 20 多万亩。这样既使政府扩大了财政收入,又增加了百姓的耕地面积。最初,云南地区的农作物十分单一,都是一些较为低级的粮食作物。赛典赤·赡思丁把中原地区的稻、桑、麻大量在云南种植,同时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在大力发展农耕的同时,赛典赤·赡思丁还知道水利建设对农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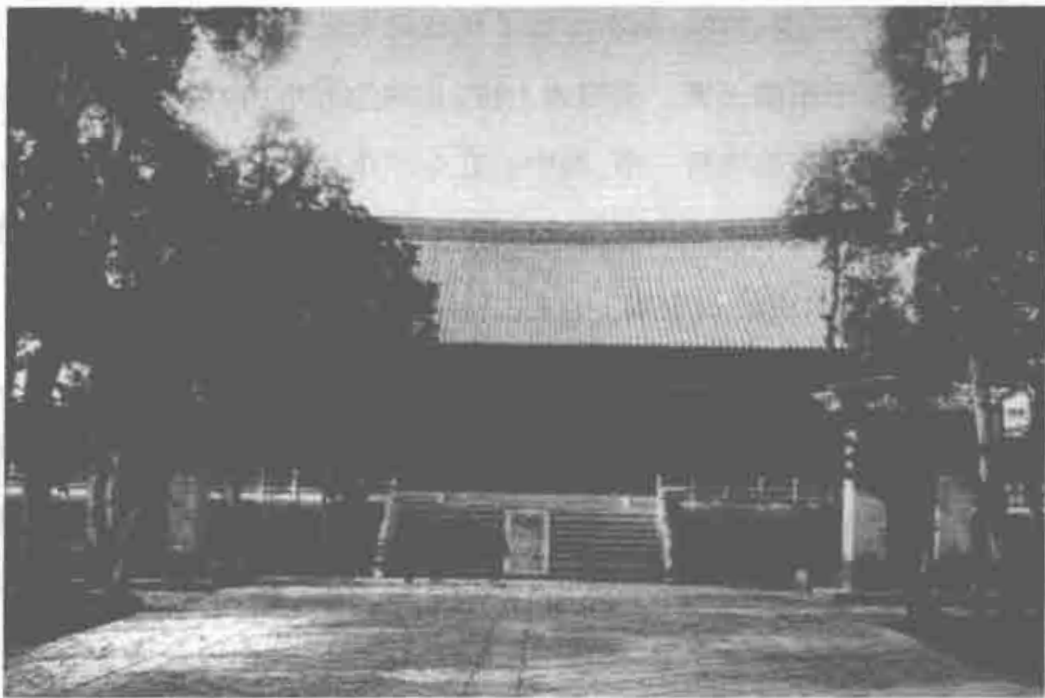
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兴修水利工程不仅可以抗旱,还可以防涝。赛典赤·赡思丁来到云南后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松华坝。此外,他还疏通海口河,修浚金汁河、银汁河、马料河、宝象河、海源河、盘龙江,使昆明附近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发达的灌溉系统。当时,昆明附近的田地主要依靠引滇池水进行灌溉。滇池的水源十分丰富,却只有海口一个出口。由海口到安宁鸡心滩一段的河床经常被泥沙淤塞,因此一到雨季,滇池水就会出现倒流的现象,往往酿成严重的水灾。

赛典赤·赡思丁首先清理疏浚了昆明东北部的盘龙江,然后带领治水大军,把来自东北部群山的“邵甸九十九泉”引入盘龙江,这样就消除了滇池上游的水患。随后,他派人在金马山下建造了松华坝大型分水闸,用以截流分洪。此外,他还负责开凿了金汁河,把河堤增高,沿堤建造水闸10座、涵洞水渠360个,自上而下轮流放水。这样,昆明东部地区的农田就得到了有效的灌溉。赛典赤·赡思丁带领修建的松华坝一直沿用了很多年,被称作“春城头上的一盆水”。

赛典赤·赡思丁很有发展眼光,他在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当地的文化建设。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促进一个地区的进步,没有文化的支撑,是绝对不行的。为此,他进行了大量改革。

首先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倡兴办儒学。公元1274年,他带头捐献了一部分资金在昆明五华山右侧购买了一块土地,于公元1276年建成了云南省第一座孔庙——昆明文庙。这座孔庙规模十分宏大,共有殿堂53间,孔子圣像面南位于正中的大成殿。东西两庑分别是孟子等“四贤”与子路等“十哲”。他负责建造的孔庙首开云南庙学之风。孔庙建成后,开始并没有多少学生去那里学习。赛典赤·赡思丁发动其他官员与他一起“劝士人子弟以学”。后来,在孔庙上学的人越来越多,发展到每期招收150名学生。即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子弟,他也大力提倡他们到孔

庙学习。



云南的第一座孔庙

赛典赤·赡思丁认为云南的一些婚丧习俗十分落后,不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对它们进行了大力改革,革除一些迷信陋俗。他专门设置了用于观测天象的测景所,用以观测日月蚀和推算四时节令。此外,他还设立惠民药局,为那些没钱治病的百姓治疗疾病,供给药物。

交通是制约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赛典赤·赡思丁十分注重云南的交通建设。他在云南境内设置驿站 78 处,增进了与西南各省间的交流。

赛典赤·赡思丁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在云南大规模传播就是从他开始的。当年与他一同来到云南的除了随从、家属外,还有大批穆斯林。他在昆明、大理等地建立了清真寺,现在昆明的南城清真寺和永宁清真寺都是他建造的。

现在的昆明城也是赛典赤·赡思丁在鄯阐城的基础上修建的,那时

叫中庆城。他扩大了鄯阐城的规模,使之向西北发展到现城区的中部,称押赤城,亦称鸭池、雅岐,基本形成了现在昆明城的规模。中庆城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南端为土桥,北端为五华山,东在盘龙江西,西在今沿福照街至鸡鸣桥一带,城中心在今三市街一带。后来赛典赤·赡思丁认为中庆城的地理位置更适合作为云南行省的所在地,就奏请朝廷,把云南行省治所迁到中庆。这样,昆明开始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



云南的南城清真寺建于元朝年间

文化中心。

赛典赤·赡思丁的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政策和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中国的西南边疆——云南。他对待云南,就像是对待自己的故乡一样饱含深情。作为阿拉伯人,他的胸怀和智慧正如真主安拉一样的博大、深邃。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恐怕还要落后中原若干年。仅为此,也应该缅怀这位伟大的外国人了。

第二节 元朝的天文之星

——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刺丁、札马刺丁。生卒年代不可考。札马鲁丁原是波斯大不里士附近马拉加天文学家,信奉伊斯兰教,

13世纪来到中国。到达中国后,把祖国优秀的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传播开来,贡献巨大。札马鲁丁创制的天文仪器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编制的《万年历》是一种更为先进的历法;负责编纂的《大元大一统志》是中国第一部政府主持下的地理志书。他把阿拉伯地区一些先进的科技、文化带到了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梦 回

博学多才的元朝重臣

札马鲁丁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据传说,札马鲁丁的出生地大不里士城当时属伊利汗国管辖。公元1259年,伊利汗国国王旭烈兀曾经在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速刺丁·图西的请求下在各地邀请了一批天文学家,并在大不里士城建造了一座天文台——马拉盖天文台。札马鲁丁就是这些天文学家中的一员。

伊利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并且与元朝统治者血脉相连,同祖同宗,关系很密切。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前,曾经向蒙古国的属国召集天文学家,于是,伊利汗国国王旭烈兀就把包括札马鲁丁在内的一批人送到了蒙古国。那时,忽必烈还是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人的,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徒,便称他们为“回回星学者”。忽必烈希望他们来到蒙古国能够安心从事天文学研究,为蒙古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历法和天文观测工具。

札马鲁丁来中国时除了那些天文学著作,还带来了一批天文仪器。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很快就开始了天文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创制工作。从此,他开始了在异国他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

不过,有些学者对札马鲁丁来华的时间提出了质疑。中国历史记

载,札马鲁丁是在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前来到中国的,也就是在公元1260年以前。《元史·百官志六》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刺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但是,忽必烈从公元1258年发动了向南宋的大举进攻,并一直忙于军务。因此,他是不可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抽出时间与精力来顾及天文学的,由此推理,可以看出札马鲁丁的来华时间不可能在公元1258年至1260年之间。如果他是在这一时期来华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马拉盖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因为那时的马拉盖天文台还在筹建之中。《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甲辰”是指公元1244年,“文学之士”就是天文学家。这表明早在公元1244年,忽必烈就已经开始招募天文学家了。这可能是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下限很可能就是公元1258年。

不过,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来华是一定的,不存在类似马可·波罗的问题。

札马鲁丁来华之初,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元史·食货志》记载:“世祖中统二年……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刺丁采粮,仍敕军、民官毋沮。”“世祖中统二年”也就是公元1261年,札马鲁丁在从事一些筹备军粮的事宜。因此,在札马鲁丁来华之初,可能做了一些与天文学完全无关的工作,看上去有些大材小用。

不过,忽必烈把筹备军粮这样的任务交给札马鲁丁这个伊斯兰教徒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无论是蒙古汗国还是后来的元朝,札马鲁丁所属的色目人在社会上拥有仅次于蒙古人的地位,经常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当时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回回”,是色目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忽必烈很有可能把筹备军粮的任务委任给值得信任的札马鲁丁。

不久,札马鲁丁开始了正式从事天文研究的工作。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向朝廷进献从波斯国引进的七种天文仪器,《元史·天文志》有一简单说明:咱秃哈刺吉,汉言浑天仪。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分晷影堂。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兀速都儿刺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

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上都建造了一座司天台,并任命札马鲁丁为“提点”,也就是天文台台长。1273年,札马鲁丁兼任忽必烈新设立的秘书监两长官之一。当时,秘书监的主要职能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因为元朝司天台的一些事情关系到元朝统治阶级的一些机密,因此就归秘书监管辖。秘书监的主管者和司天台的台长也往往由一人兼任。札马鲁丁是开创元朝兼任制度的第一人,自他以后,秘书监主管和司天台主管是同一人的事情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秘书监的工作关系到元朝的最高机密,只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有幸担任这个职务。由此可见,札马鲁丁在元世祖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一次,札马鲁丁竟然直接被带到了忽必烈的浴室中去禀报事情。浴室中的忽必烈可以说是没有丝毫戒备的,他敢把一个外国人直接宣到那里,足可以看出他对札马鲁丁是多么信任。

在札马鲁丁的建议与领导下,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化学、力学、医药、地理、哲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如《四劈算法段数》、《忒毕医经》等著作以及大量阿拉伯的地图。《四劈算法段数》很可能是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最早汉文译本。这些数学书籍使中国的数学在元代得以突飞猛进,填补了中国算学之一大空白。因此,秘书监成为元朝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

札马鲁丁天生聪慧,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在地理学方面成绩尤为突出。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札马鲁丁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元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成绩卓越。札马鲁丁对中国元代的科学工作,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

札马鲁丁的仕途非常平坦,不断得到晋升。当初,他在司天台任提点时只不过是一个从五品的小官,任职秘书监后就晋升到了从三品。不久之后,他又升任嘉议大夫,正三品官职。札马鲁丁可以说是元朝的一位朝廷重臣了。公元1287年,他再次得到晋升,担任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官职提到了从二品。集贤大学士的主要职责是主管集贤院,职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集贤院是当时元朝的最高文化事务机构。一个回回人能够得到如此重用,实属不易。

此外,札马鲁丁还做了一些与天文学以及他的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事,那就是在纺织方面的贡献。

《元史·百官志》记载,公元1287年“札马刺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刺欺,与丝绸同局造作”。撒答刺欺是一种纺织品,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主要产自波斯或中亚地区。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弄清楚这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札马鲁丁制造撒答刺欺成功后,元朝朝廷马上做出反应,直接把练人匠提举司改名为撒答刺欺提举司。札马鲁丁把这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的纺织技术自此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而札马鲁丁也一心一意做着他的元朝官,直到终老。

关于札马鲁丁卒于何年,历史上也没有准确的记载。因为他是在公元1290年离开秘书监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卒于这一年。他们的理由是,



现藏于比利时于伊教堂的藏粟特撒答刺欺织锦

札马鲁丁在朝廷中的地位很高,贡献很大,似乎没有被罢官或主动辞官的可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一年仅可能是札马鲁丁不在秘书监任职的时间,并不代表他就在这年去世。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也没得出定论。

传 奇

1. 刻在七大天文仪器上的功劳

札马鲁丁制作的七件天文仪器是他一生中为天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他在天文学研究方面最大的亮点。忽必烈在上都建造司天台后,札马鲁丁担任了司天台的台长。可是,他发现,天文台内能够用于天文研究的仪器非常匮乏,于是决定自己研究一些仪器。他创制的这些天文仪器虽然名字都是用蒙古语或阿拉伯语来命名的,听起来有些古怪,却很实用,为元朝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天文仪器与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在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上大体相同,但却需要使用者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如欧几

里德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除了司天台上那些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外,中国的天文学家几乎没有人会使用那些仪器。札马鲁丁发明的这七件天文仪器在中国的天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对传统的天文仪器进行改进时,就从札马鲁丁的仪器上吸取了很多经验。比如,郭守敬在他制作简仪、立运仪等仪器时就没有使用中国传统的窥管,而使用了与札马鲁丁星盘中相仿的窥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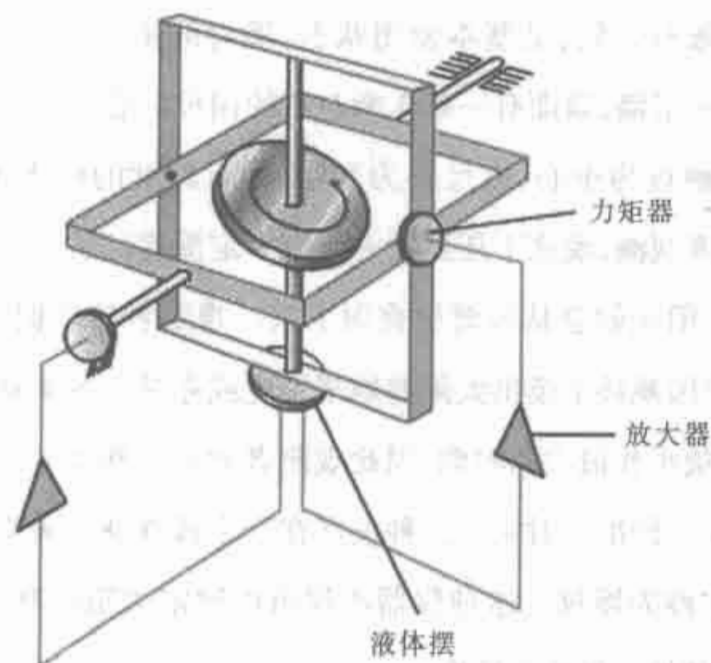
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些札马鲁丁创制的这七件仪器。

“咱秃哈刺吉”在《元史》被汉译为浑天仪。这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地平环与子午双环互相固结不动。子午双环的内部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黄经环和黄道环。浑天仪上有窍的铜方钉是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被开凿了一些整齐的缝隙,人们可以从缝隙中观测天体。铜方钉相当于现在观测用的照准器,观测者可以从铜片所在位置的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黄经环的中心位置有一条极轴,与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 24° 的地方相连。这两个连接点就是南、北黄极。这样,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观测者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也就是天体所在的黄纬。

黄道环被垂直地固定在赤经双环上,并且同时与黄极轴垂直。黄道环与赤经双环有两组交叉点。这两组交叉点的位置就是冬至点和夏至点。观测者只要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

“咱秃朔八台”是一种被《元史》解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的天

文仪器,即方位仪。这种仪器有一根高2米多的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表顶有一个机轴,上面有两根将近2米长的铜尺。其中的一根铜尺上有与之等长的窥管,是观测者用来瞄准天体的。这两根铜尺的底部又同时连接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不仅可自由地绕铜表转动,还可以调节高低。观测者可以利用这种仪器测定任意一颗天体到天顶的距离。窥管与另一根铜尺以及底下的横尺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顶角就是天体的天顶距。观测者可以根据窥管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通过一些数学计算方法计算出结果,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



札马鲁丁方位仪

现代天文学家认为札马鲁丁发明的这种天文仪器与托勒密在他撰写的名著《天文学大成》中介绍的仪器十分相似。只是,托勒密介绍的天文仪器的铜表是三角形的,札马鲁丁发明的天文仪器上面的铜表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

“鲁哈麻亦渺凹只”的汉语名字为“春秋分晷影堂”,即斜纬仪。这台仪器被观测者放置在一个特殊的基本密闭的屋子中。这间屋子只在

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日光就会从屋顶的缝隙处射进屋子里。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半圆形,半圆的半径长达6尺,另有一根6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春秋分时,太阳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这种仪器的环面上。观测者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在《元史》中被译为“冬夏至晷影堂”,即平纬仪。与“春秋分晷影堂”一样,这种仪器也是被安置在一座特殊的房子里面的。房屋一般有5间,呈基本密闭状态,屋脊顺南北方向有一道缝。缝的正下方有一道墙,墙面有一条3米左右的铜尺。墙上还有一个以铜尺与墙面的接触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标有刻度的仰天半圆规环。为了便于观测者观测,墙底下还要挖一个有一定深度的坑。每当太阳运行到子午线时,阳光就会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观测者转动铜尺,对准太阳,就可以从半圆规环上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冬至和夏至是一年中太阳高度最小和最大的时刻,因此观测者就可以利用冬夏至晷影堂来测定冬至、夏至的准确时刻。这种仪器在后来被欧洲的天文学家广泛应用,他们将它称为墙仪。这种仪器不仅可以测定太阳的高度和节气,同样可以测定其他天体的赤纬度。

“苦来亦撒麻”就是“浑天图”,外形与现在的地球仪基本相似,是一种天球仪。这种仪器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象基本相似,只是上面绘制的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

“苦来亦阿儿子”也叫做“地理志”,学术界认为这种仪器是地球仪。“地理志”是一个木制的圆球,上面画着白色的陆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球上陆地与海洋的分配比例与现代地球仪上的分配比例相近。此外,札马鲁丁还在球体上画了很多距离相等的小方格,是计算两地距离

远近用的。这些区分小方格的线条就是经线和纬线。札马鲁丁是在中国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地球纬度东西里差问题的人。

“兀速都儿刺不定”就是一种“昼夜时刻之器”。这种仪器很可能就是后来风靡欧洲的天文仪器——星盘。札马鲁丁制造的星盘上面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根可以绕中心旋转的铜条。铜条的两端都被折成一个 90° 的直角,与星盘盘面垂直。折下去的两处铜条上各有一个孔,两孔的连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观测者可以根据两个孔观测天体,以确定时间。这是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外形不同但功用相同的照准器。

以上就是札马鲁丁花费不少心血制造出来的天文仪器。历史是公正的,忘不了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奇闻轶事,更忘不了的是他们所带来的伟大科学,能够造福世人的科学。

2. 旷世杰作:《万年历》与《回回历》

《万年历》的创制是札马鲁丁为中国历法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元史·历志》中记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万年历》被忽必烈颁行后,一直在元朝沿用了至少46年。

历法是人们规划一年从事各种活动的时间,对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朝推行《万年历》之前,使用的历书是《大明历》。札马鲁丁来华后,忽必烈就把制定全新历法的任务交给了他。《万年历》原本是一本阿拉伯系统的历法,遗憾的是,这本历书失传了,并没有流传下来,这就给学者研究元朝的历法带来了困难。

札马鲁丁奉命制定这样一部历书,最后取得了成功,定名曰《万年历》。

不过,在记载元朝历史的书籍中,还记载着一种《回回历》。《回回历》与《万年历》有什么关系吗?目前,学界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两种历书本身就是一种,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为札马鲁丁是“回

回”，因此，人们便把他创制的历法称为《回回历》。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强大政权是不可能同时流行两种历法的，如果那样就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向把“颁正朔”，也就是确定新的纪年方法当做是一个王朝创立的开始。因此，他们认为札马鲁丁创制的《万年历》和《回回历》应该是一种历法。

还有学者认为这两种历书不是一个体系，不过它们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法，而是同一种历法的两种不同形式。《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书，与现在的万年历性质基本相同。“万年”并不是一个确指，而是虚指，表明历法包含的年份之多。《回回历》可能只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书，除了各月历日安排之外，还有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在《元史·食货志》中记载，《回回历》与《授时历》的售价基本相同，都是一两银子。《授时历》就是一年一本的历书，因此有人推测《回回历》应该与它基本相同。

中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编制更为先进的《授时历》时，就曾经以《回回历》为参考。此外札马鲁丁传入的《积尺诸家历》、《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海牙剔穷历法段数》等书籍也是郭守敬参考的重要资料。

从这一点上看，《回回历》的具体职能倒是清晰了不少，大致与《授时历》功用相同。

3. 杰出的兼职地理学家

《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元朝政府主持编纂与修订的全国地理志书。这本书经过多年的编纂，经过几次修订才完成，共分为755卷。这本书饱含了札马鲁丁的心血和汗水。

据历史记载，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发起者。根据《元秘书监志》记载，当时《授时历》已经编纂完成了，《大元本草》也在修

订之中,札马鲁丁便请求元世祖忽必烈准许秘书监也做一件较大的编纂工作,就是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收集起来作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当时的兵部为了掌握全国的地理情况,也向元世祖提出了各行省把所辖范围的图志以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历史汇集起来的要求。元世祖一听十分称意,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秘书监开始这项工作,同时让翰林院和兵部派出一些人力、物力与秘书监亲密合作。

工作就这样紧张地开始了。

札马鲁丁非常重视编纂《大元大一统志》所需的地图,想以地图为蓝本来写志书,并且特别强调地图的地理景观的作用,如野地、山林等自然地貌、交通道路,交通要道上设立的里程碑以及当地的物产资源和重要建筑物。同时,札马鲁丁还把自己带来的大量回回地图应用在书籍的编纂中。这些地图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汉人大都看不懂。因此,他要求在回回地图的基础上再制作一种汉文地图。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西域各国的地图。这些地图不但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同时也把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方法带到了中国。因此,札马鲁丁在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这本志书的工程量非常大,札马鲁丁在编书的过程中提拔了许多人才。后来在《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中起重要作用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从一名普通的秀才破格提拔上来的。为了加快书籍的编纂进程,札马鲁丁尽力排解编书人员的一切困难。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他都会尽力解决。他甚至还亲自过问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支领情况。

札马鲁丁去世后,编纂人员按照他开创的编纂体制和方法前后经过几次修订,共历时18年,终于在公元1303年完成了《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中国古代由官府主持编辑的第一部全国地理志,卷帙

浩繁,前所未有。此外,这本书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书中附有彩色地理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

历史上,札马鲁丁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与元朝之前来华人士主要活跃在文化交流领域不同,札马鲁丁的贡献还在于传播了阿拉伯医学和天文学,推动元朝改进推广《回回历》,带来了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三节 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 ——意大利神奇人物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1254—1324),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远近闻名的商人,以四处旅行与不同地区的人们进行贸易为人生最得意快乐之事。在家庭的熏陶下,马可·波罗从小就对旅行着迷。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随亲人踏上了前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的旅程。这一去就杳无音讯。21年,光阴荏苒,当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以为他已葬身异域的时候,马可·波罗带着一大堆财富和东方的故事突然出现在威尼斯。他告诉家乡的人,他大半岁月在蒙古帝国生活、旅游甚至当官。他讲述了来到中国后,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与重用,在元朝朝廷内供职多年的故事。根据自身经历,他由别人代笔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成为中世纪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普及读物。直到四五世纪后列强企图撬开东方富裕帝国大门的时候,人们心中所怀的梦想,仍旧是去席卷《马可·波罗游记》里传说的天堂。

梦 回

1. 把梦想拴在桅杆上的青春少年

公元1260年,年仅6岁的马可·波罗与母亲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送别了自己的父亲尼科洛·波罗和叔父马泰奥·波罗。年纪幼小的他虽然对父亲和叔父依依不舍,但他知道他们要去做一件大事。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的这次出海确实不同以往。他们要去遥远的东方经商,要用自己手里的新奇货物去换取东方美丽的丝绸和瓷器。

公元13、14世纪的欧洲,到处是一片热闹的景象。经济逐渐复苏并加快发展,大量的手工业、商业中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现身于世。于是,一个崭新的阶级——小市民阶级应运而生。

不过人们的生活并不像意大利著名画家奇马布埃画笔下的圣母与宝座那样的平静祥和。那时,基督教的徒众们正在筹划与伊斯兰教决一死战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由于交通被奥斯曼土耳其和强大的阿拉伯世界所阻断,珍贵的东方货物到达此处时一律都身价百倍。而新兴的小市民阶层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脱离其封建领主的统治,尽快发家致富。因此,很大一批住在威尼斯港口的年轻人,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到达富裕的东方世界,就算是冒着天大的危险也心甘情愿。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就是这些热血青年中典型的两位。

不过要想到达中国,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小马可·波罗知道这次分别之后,可能要连续多年看不见自己的父亲,甚至还有可能是永远。

父亲走后,马可·波罗整天坐在家门外等待着他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年两年过去了,他没有接到父亲和叔父的一点消息。他不知道,在日思夜想的岁月里,他的父亲与叔父正在艰苦的旅程中奔波跋涉。



马可·波罗故居

他们的足迹踏过中亚、西亚,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终于到了一个叫钦察汗国的地方。那时元朝还没有建立,钦察汗国是蒙古汗国的一个附属小国。但仅是如此,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足够让他们羡慕上一阵子的了。

波罗兄弟二人决定多歇些日子再走,就用随身携带的珠宝在钦察汗国做起了生意,赚了不少钱。后来,钦察汗国与它周边的一些小国发生了战争,兄弟俩为了自身安全只好离开,来到了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布哈拉城,在那里安心地住了下来,并且还是以自己的老本行——经商为生。

一天,忽必烈派往中亚一个国家的使者在回程时经过布哈拉。他在集市上看到了两名长相奇特的人。他们高鼻梁、蓝眼睛、头发金黄,使者一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马上派人请了过来。经过一番简单的交谈,这位使者得知他们就是住在很远的欧洲人时,就对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发出了邀请,说:“我们的大汗忽必烈是一个大英雄,可是他还

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欧洲人。如果你们能随我一起去见大汗,向他简述一些欧洲的人文情况,他一定会重重地赏赐你们。而且我们的国家十分安定,你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还可以在那里好好地做生意。”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兄弟俩听这位使者说得十分有理,就欣然答应与他一起去蒙古汗国。

过了些日子后,他们在使者的带领下来到了蒙古汗国的首都上都。忙于征战的忽必烈听使者说来了两名金发碧眼的欧洲人,竟然激动地从繁忙的军务中抽出身来,亲自接待了他们。一番酒宴过后,忽必烈赏赐给他们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而这两位还在云端飘悠悠的旅行者唯一的任务,就是给大汗讲述自己国家的故事,这简直是件再理想不过的工作了!

于是二人就十分开心地在王宫里住了下来,而忽必烈也从这两位欧洲人的口中得知了很多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事情,真是各有裨益。

尼科洛·波罗告诉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教皇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君主,但是教皇一声令下,所有皇帝都要乖乖听命,否则后果就很严重。他们还仔细地描述了自己生长的那个水城,讲解了维也纳醉人的音乐和大教堂里珍贵的雕像和仁慈的圣母画,等等,听得忽必烈也是满心向往。

在上都居住了一段时间,波罗兄弟决定起身告辞回国。忽必烈没有挽留,只是请他们给意大利的教皇捎个信,欢迎他派人来中国传教。就这样,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带着众多的宝物和钱财离开了蒙古汗国。又经过了3年多时间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回到了家乡威尼斯。

在父亲离家的9年里,马可·波罗已经由一名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成长为一名强壮、勇敢的少年了。他一边照顾多病的母亲,一边留意着港口上的任何消息。忽然有一天,港口上异常热闹起来。他想一定是父

亲、叔父回来了，赶忙奔出家门向不远处的港口跑去。不出所料，在码头上被众人包围起来的两个人正是他的父亲和叔父。阔别9年，他们想不到当年的马可·波罗已经成长为一名英俊高大的少年，几乎认不出来了。

如愿发了财后回来的父亲向儿子讲述了很多在东方的见闻，告诉他那里有个强大的国家，有数不尽的财宝，遍地的绫罗。听了父亲的历险故事，马可·波罗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十分向往，请求父亲再去那里时一定要把他带上。父亲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和家人团聚之后，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没有忘记那个英武的东方皇帝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把忽必烈的话转告了教皇，转达了忽必烈对他们国家的热情。教皇听了很高兴，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拿了许多礼物让他们再次前往中国时给忽必烈带去。波罗兄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2. 属于自己的探险之旅

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271年，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决定再次前往东方做生意。那时，马可·波罗的母亲去世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已经开始。威尼斯受到战争的冲击，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尼科洛·波罗实在放心不下把年仅17岁的儿子一人留在威尼斯，再加上儿子的一再请求，就把他也带上了。这次他们带的货物很少，所带物品主要是教皇送给忽必烈的礼物和书信。为了使旅途更加安全，他们壮大了旅行的队伍，召集了十几个人做伴。就这样，这支带有特殊使命的商队从威尼斯出发了。

他们驾驶的商船通过威尼斯的河流驶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换走陆路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了中东古城巴格达。不过他们并没有留恋巴格达的繁华，在那里只是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就踏上了前往波斯湾的出

海口霍尔木兹的路。到达霍尔木兹,他们的旅程也就过半了,只要从那里乘船一直向东走就可以到达蒙古汗国了。虽然一路又是坐船,又是步行,非常辛苦,可还未成年、未出过远门的马可·波罗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一声累。他们本来以为到达霍尔木兹后,后面的旅程就一帆风顺了。可事情却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到达霍尔木兹后,他们发现原本十分繁忙的海港不知什么原因十分冷清,竟然没有一艘开往中国的航船。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月,也没有航船能把他们带到中国。后来好不容易盼到一艘船,却出现了意外。

原来他们在集市上买东西时被当地的小偷盯上了。小偷看到他们身上带有很多钱财,就联合了一群强盗趁他们睡觉时将他们抓了起来,分别关押在了不同的地方。半夜,被关在一起的马可·波罗与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官兵时,那些强盗带着掠夺来的财物早已不知去向,



尼科洛·波罗一行三人穿过了帕米尔高原等相当艰苦的路程,终于到达中国境内

其他旅伴不知是自己逃走了还是被强盗带走了,只剩下马可·波罗的叔叔在那里苦等。于是,这支原本十几人的旅行队伍一眨眼就只剩下了三个人,真可谓是出师不利啊。但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坚定了去中国的信念。

尼科洛·波罗认为这里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开往中国的船只了,就决定从陆路向中国进发。这条陆路充满艰难险阻,让他们吃尽了苦头。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旅行队伍从霍尔木兹出发向东,必须要越过荒无人烟的伊朗沙漠,跨过寒冷险峻的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中国的新疆地区。在途中,他们曾经几次遇到了强盗、猛兽以及无数次的狂风、暴雨,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马可·波罗一行到敦煌见了众多佛像的雕塑及壁画后,更加坚定了深入学习中国文化的决心

终于到新疆了,马可·波罗抬眼一望,马上被那里的美丽景色吸引住了。他们认为中国的边境都如此美丽富饶,首都一定会更加繁荣。在新疆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后,他们牵着骆驼、马匹向中国内地进发。剩下的这段路并不好走,他们要穿过令很多探险家也望而生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好运此时终于开始眷顾他们了,这一路还算是平平安安,有惊无险。一天,他们三人到了现在的甘肃敦煌,有幸游览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内的众多佛教雕像和壁画,深

深地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折服。后来,他们度过玉门关,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元朝的北部都城,也就是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多年前来过的上都。此时,他们已经离家4年了。

在这些与上都相别的岁月里,蒙古已经不再是当初他们所认识的那个游牧民族的汗国了。此时的忽必烈基本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地区和很多南方地区,建立了元朝,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皇帝,而马可·波罗在一路的艰难坎坷中也成长为了一名英俊潇洒、勇敢果断的青年。

3. 终于到达了魂牵梦萦的国度——中国

忽必烈听说几年前来到中国的那两位欧洲人又回到了中国,非常高兴。马上命令使者前去迎接。当他们到达后,忽必烈即刻召见了他们。尼科洛·波罗首先把教皇托他转给忽必烈的信件呈了上去。忽必烈看完教皇的信,非常满意。

后来忽必烈注意到尼科洛·波罗身边多了一位年纪轻轻的英俊青年,就主动询问了起来。尼科洛·波罗正想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忽必烈,就把他儿子在旅途中的英勇表现讲了出来。忽必烈十分喜爱这个勇敢的青年,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此时,元朝的都城在大都。波罗家族三人来到了大都的宫中,担任了元朝的一些官职。马可·波罗一来到大都,就被这座繁华的城市吸引了。他认为这是他一生见过的最繁华的城市。为此,他下决心一定要对这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深入的了解。但是,他与元朝人的语言不通,为他的游历带来很多困难。他在弄清楚症结所在后,马上开始了学习蒙古语、汉语的课程。就这样,聪敏的马可·波罗没花多长时间就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蒙古语了。

从此,忽必烈手下又多了一个得力干将。

忽必烈经常派马可·波罗巡视江南各地,还任命他当过三年扬州总

管。马可·波罗运气非常好,有这么好的机会对中国的山水大饱眼福。每到一地,他都要对那里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十几年时间中,他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旅游之外,马可·波罗每次都能把元世祖交给他的任务顺利、圆满地完成。因此,忽必烈更加喜欢、信任他了。到了后来,一些关于外交出使的任务,忽必烈也放心地交给马可·波罗去做。这个来自威尼斯的青年,先后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菲律宾、印尼、爪哇等众多国家。完成出使任务之余,马可·波罗当然也不会放过每一个旅行的机会。他对这些国家的风俗、地理、人情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回到大都后,他还会把在那些国家的见闻讲给忽必烈听,以博得他的欢心。

在忽必烈眼中,马可·波罗比那些汉人要亲切得多。忽必烈曾经交给他一个至关重要的神秘使命,显示出对他的无比信任。与以前的外出寻访不同,马可·波罗这次肩负的并不是一般的钦差巡察任务。他在张掖居住了长达1年之久。马可·波罗为什么要在张掖居住这么长时间呢?这一切还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说起。

那时,忽必烈正率领元军围攻南宋王朝军队据守的军事重地襄阳。襄阳军民拼死抵抗元朝军队的进攻。这场战争打了3年之久,元军仍然没有攻破这座城池。忽必烈感到很头疼。

如果这座城池不破,那么元朝对江南其他地区的占领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统一南北的大业将化为泡影。忽必烈和身旁的将士们绞尽脑汁,仍然无计可施。这时,马可·波罗向忽必烈献出了一条计策。他认为要攻破这样坚固的城池只有使用回回炮。回回炮就是火炮,是一种攻城的专用武器。当时,元军生产回回炮的军事基地远在西域。于是,忽必烈就派马可·波罗一行到西域去寻找火炮和造炮工匠,马可·波罗走西域

这条道可谓轻车熟路，他们就来到了张掖，带回了制造火炮的技师。在火炮的帮助下，元军很快攻破了襄阳城。

17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已步入老年的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乡，年近中年的马可·波罗也开始想家了。他们多次向忽必烈表达过回国的愿望，都被拒绝。公元1292年，他们终于遇到了一个向忽必烈辞行的机会。

这年春天，元朝的同祖同宗附属国伊尔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死了。伊尔汗国王为了加强与元朝的联系就派使者到元朝求亲。忽必烈此时正有拉拢伊尔汗国的意思，就选了一名容貌美丽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赐给伊尔汗国国王做王妃。但是，伊尔汗国与元大都相隔万里，道路十分艰难，伊尔汗国国王便提出让熟悉道路环境的尼科洛·波罗三人护送王妃。元世祖虽然极不情愿，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只好答应了下来。马可·波罗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就趁机向忽必烈辞行。忽必烈知道再也留不住他们了，便允许他们将王妃护送到伊尔汗国后回家。临行之前，忽必烈赐予了马可·波罗三人许多奇珍异宝，他们回国之后一下子就成为威尼斯巨富。



元朝的回回炮结构图

传 奇

1. 在踏上威尼斯故土的时刻,《马可·波罗游记》就注定诞生

公元1292年,马可·波罗一行从中国乘船经过印度洋将阔阔真王妃安全护送到伊尔汗国后,就带着忽必烈赏赐给他们的珍宝踏上了回家的路。又经过了3年的艰苦跋涉,已经离家21年的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兄弟与马可·波罗终于回到了家乡威尼斯。

当他们到达港口时,已经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了。当地居民很久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认为他们早已经葬身大海或沙漠了。那一天,人们看见有三个穿着奇特服装的人走上了港口,以为有外国人来了,都好奇地围了上去。可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一番端详后,发现这三个人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穿的衣服不同而已。这也难怪,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元朝住了17年,当年他们带去的衣服早已经破旧不堪,同时为了入乡随俗,他们就一直穿元朝的服装,这次回乡照旧还是元朝装束。

马可·波罗看到人们惊诧的表情,马上向他们解释自己20多年前住在这里,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后来,还是一位马可·波罗多年前的邻居认出了他,人们才相信这三个人就是失踪多年的尼科洛·波罗、马泰奥·波罗和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向当地人详尽地讲述了他们在东方的见闻,他们带回的珍宝轰动了整个威尼斯。人们将马可·波罗形象地称为“百万家产的马可”。

回到威尼斯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这两个城市因为争夺贸易上的利益而发生了战争。为了支持威尼斯,马可·波罗用自己的钱购买了一艘战舰,自己担任战舰的船长,参加战斗。可是由于实力不如对方,这场战争以威尼斯战败而告终。更不幸的是,马可·波罗失踪了!

原来,马可·波罗的战舰被击沉,他自己被对方抓进了监狱。他不

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就想把自己在东方 17 年的经历记述下来。但是,监狱里没有纸和笔,马可·波罗只好向狱友不断讲述他的经历。狱友们见马可·波罗整日疯疯癫癫地向他们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只是把马可·波罗的话当成笑话,没有人认真对待。后来,监狱中来了一位叫做鲁思梯谦的作家。他的见识比较广博,听说过马可·波罗在东方的一些传奇经历,就把他说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鲁思梯谦出狱后,用法文把马可·波罗讲述的在东方的见闻全部记述了下来,起名为《马可·波罗游记》,也被称为《东方见闻录》。



位于杭州的马可·波罗雕像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的时候,可怜的马可·波罗仍在狱中。他做梦都没想到,正是这本书救了他一命。原来书一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热那亚市政府不得不在公元 1300 年将他释放。出狱后,马可·波罗继承家族产业继续经商,并娶妻生子。公元 1324 年,这位著名的旅行家告别了西方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 70 年人生,葬于威尼斯圣洛伦索教堂墓地。

而那本记录了他命运的《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他生命的延续，一直经久不衰。

在这部书中，马可·波罗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繁荣昌盛，包括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中国元朝时期的著名城市，如大都、扬州、苏州、杭州等在书中都有介绍。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一些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此外，马可·波罗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走完绿洲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全程的人。



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马可·波罗纪念金银币”。纪念币正面图案为马可·波罗来中国时经过的长城嘉峪关，背面为马可·波罗像和中国元代的远洋帆船

2. 马可·波罗留下的六大疑云

马可·波罗的事迹已经过去了700多年,但是他的东方之旅和在中国的见闻以及《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却存在很多谜团,甚至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

第一个谜团是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路线问题。按照《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他应该是从威尼斯来大都的,然后继续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旅行。但现代人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按照书中描述的线路几乎是不可能到达大都的。这本书不是一本可以供后人直接参考的指南。他在书中记述的两个地方的距离,有的十分精确,有的却误差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本书是在他归国后的几年内写成的,由于时间太长记忆模糊了吧!

第二个谜团是马可·波罗关于对东方见闻的描述。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描述的中国疆域,认为当时的元朝疆域不可能那么广大。但是,书中一些其他的描述又与中国当时很多现实情况相似,如他走到新疆敦煌时遇到了一场杀羊的仪式,杀羊是为了保佑儿女平安。直到现在,中国的敦煌地区仍然有这样的风俗。

第三个谜团是马可·波罗遗漏的一些问题。《马可·波罗游记》中遗漏了元朝的一些重要信息,使人们怀疑他到底来没来过中国。马可·波罗对中国的长城没有一丝描述。长城是古代最重要的防御措施之一,据他自己说,这么多年在元朝为官,走遍大江南北,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伟大的奇迹。可是注意到为什么还会有遗漏呢?或者,在他的心目中,长城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建筑?此外,中国的茶文化在书中也没有提到。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马可·波罗是外国人,不习惯喝茶,所以就没有提到,但这似乎证据不足。另外,他也没有记述汉族女子奇特的裹脚习俗。裹脚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他为什么

会没有提到呢？但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描述的元朝女子走路的形态非常秀气、身段婀娜多姿，反映的就是元朝女子裹脚的问题。

第四个谜团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汉语和蒙古语史料中没有对马可·波罗的任何记载。元朝是一个制度完备的封建国家，社会上发生的所有大事都几乎会被记载在史书中。马可·波罗来华并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件大事，那为什么史官没有留下一点文字记载呢？这个问题的确很值得怀疑。

第五个谜团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原始手稿到哪儿去了？对《马可·波罗游记》最大的质疑就是一直没有发现过这本书的手稿。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些手抄本。早期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共有 150 多份，但是几乎每一份都不尽相同。如果找不到手稿，就很难确定这些手抄本中不同的地方哪一个是真的。

第六个谜团是还有人认为即使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也可以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因为在马可·波罗来华 100 多年之后，有一位叫做佩加洛提的商人虽然只到过巴勒斯坦，却写出了一本很有见地的关于介绍如何在中国经商的书籍。因此，有人认为马可·波罗的那些见闻很可能是道听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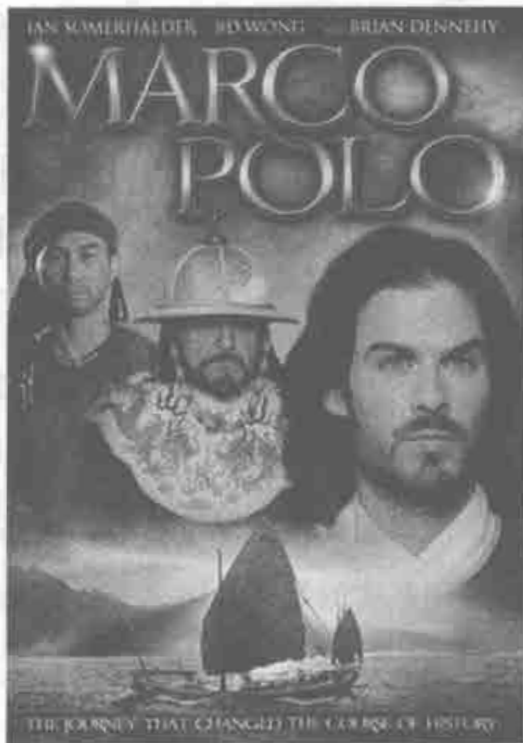
第七个谜团是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 14 世纪的德化白瓷，与马可·波罗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因此，马可·波罗当初到达的很可能只是中亚地区，而不是更加遥远而神秘的中国。

其实，不管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有没有写出一本翔实的见闻录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马可·波罗游记》最大的价值是它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当时流行在西方教廷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 15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寻访中国,寻求自由和真理。这其中有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可以说,自从马可·波罗把他眼中的东方世界带到欧洲后,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不但对于西欧来说,是一个转折,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是。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彼此都感到相当神秘。并且,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的文明世界。13世纪以后,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促进他们更加神往欧洲以外的世界。经过漫长的发展后,他们终于占了上风。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人民的视野,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拥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和印度,只是他们登错了大陆,只得为它取名为西印度群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经历是真是假已无从考证,图为后根据其事迹改编的电影画报

岛,就这样,美洲诞生了。

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是700多年的前尘往事,但他的精神已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依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励着人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无论后来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是愉快的和平共处还是硝烟弥漫的战火纷飞,大陆与大陆之间的纽带,还是要人们去寻找、去联结,最终,能有机会一起辉煌。

第四节 杰出的非洲旅行家 ——摩洛哥朝觐者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1304—1377),全名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欣·赖瓦蒂·团哲。在中国,伊本·白图泰又被译为伊本·拔图塔。伊本出身良好,是摩洛哥一个信奉伊斯兰教法官世家的子孙,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与马可·波罗、鄂多力克及尼哥罗康梯在那个年代名扬天下,一起并称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四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一生中曾经做过三次伟大的旅行,四次前往麦加朝拜,深入非洲大陆腹地探险,还曾经来中国出访,是一个故事多于岁数的人。当我们惊诧于探险者用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的神话并有所怀疑时,他们会用坚实的足迹和历史的真实来回答这一切。

梦 回

1. 伊本·白图泰:幸运的穆斯林

公元1304年,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吹响了唤醒人民奔向自由的风笛,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之父比特拉克用第一声啼哭藐视这个世

界,在遥远非洲的摩洛哥,伊本·白图泰的降生则预示着另一个传奇的开始。

像电影剪辑的镜头,众多中世纪的风云人物济济一堂。不管我们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都曾经在历史上掀起波澜。这回,我们把视角从欧洲的繁华中收回,放眼中世纪的非洲。

伊本·白图泰是个贵族子弟。除了像所有小孩子那样贪玩外,伊本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自古早慧儿童都有旁人羡慕的天赋。10岁左右的伊本,可以把一本厚厚的《古兰经》流利地背诵下来。

这可能与家庭环境有关。伊本·白图泰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法官,在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影响下,他受到了良好的法学教育和文学教育,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教法学都十分熟悉。

当时的摩洛哥,伊斯兰教是国教,地位崇高无比。伊斯兰教很有特点,教徒们此生最宏大的理想不是制造财富,而是到圣地麦加朝圣。当然他们不用担心食宿问题,在朝圣的路上,穆斯林会为那些远来朝圣的客人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因为穆斯林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再加上充足的食物,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越来越多。在穆斯林心中,朝圣不仅代表履行一个穆斯林应该完成的义务和功德,还是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

摩洛哥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因此要说他们不远万里去麦加朝圣,并不是一个神话。就算是神话,相信伊本也会想办法。

伊本·白图泰是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和所有穆斯林一样,从小就有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拜的强烈愿望。长大后,这个愿望愈加炽烈了。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年轻的他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注意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增加各方面的知识,为将来的朝圣做准备。就这样,伊本·白图泰在不断地学习中长到了21岁。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



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现在每年仍有大量的信徒前去朝圣

思想的青年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海上的风浪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向自己的父母提出了外出到麦加朝圣的请求。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听到儿子的计划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们为儿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勇气和坚定信念而自豪。

公元1325年,伊本·白图泰打点好行囊之后,开始了前往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拜的旅程。他的内心此时充满了神往,压根没有想到今后的人生会有多少风浪在等待着他。

2. 小有坎坷的三次朝圣

伊本·白图泰的海船从自己的家乡出发,沿着地中海南岸向东行驶,没过多久就到达了开罗。年轻人总是急性子,为了节省时间,他选择了一条较为近便的路线。即顺着尼罗河逆流而上,到达现在的苏丹北部城市阿特巴拉。这是一座处于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伊本·白图泰计划得很好,他想,只要在这里坐上商船就可以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然后再

走向麦加,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了。正当他为自己的愿望即将实现而兴奋不已的时候,上天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原来,当他到达阿特巴拉时,海上发生了战争,一切船只都不许出海,更别说是去遥远的阿拉伯半岛了。无奈之下,伊本·白图泰只好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到埃及。

挫折能够改变一个人,这几乎是真理。上一次的失败并没有动摇伊本·白图泰去麦加朝圣的信念,反而让他重新作出了选择。这一次,他直接从埃及出海到达了现在的巴勒斯坦,随后又到达了叙利亚。行走在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仅仅是为了朝觐而朝觐,而是饱览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风光,在有了一番对历史的领悟后,才开始前往麦地那,在那里稍事休整,直接前往麦加。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麦加朝圣,虽然中途有些波折,最终圆满成功。

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认为,无论此生际遇多么不幸,生活多么贫困,都要想方设法去麦加朝圣一次,否则在辞世的一天,心中就会充满痛苦。所以,他们都是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来到麦加。相比于他们来说,年轻的伊本是多么的幸运。

伊本·白图泰在麦加感受了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觉得阿拉伯地区的风土人情与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有很大不同,值得好好研究一番。况且游历还能增长自己的见识和胆量,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公元1326年,伊本越过阿拉伯沙漠,前往现在伊拉克最大的港口城市巴士拉,从那里北上到达了库尔迪斯坦,参观欣赏了沿途的众多城市,如伊斯法罕、库法、巴格达、摩苏尔等。随后,他又回到了麦加,进行他人生的第二次朝圣。

这一次,他在麦加做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在这3年中,他不仅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还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

听说过的新鲜事。于是,他对外面的广阔世界更加好奇了,决心到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3年之后,他从麦加附近的吉达港坐上一艘小船,沿着红海南岸来到了东南亚。他的第一个登陆地点是现在的港口城市亚丁。亚丁是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一座古城,是扼守红海通向印度洋的门户,因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素有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之称,各地来的满载货物的大船都在这里集散。当时的亚丁古城商贾云集,可以看到来自各大洲、各种肤色的商人,景象非常繁荣,这些见闻大大开阔了伊本的视野,也激起了他更加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随后,伊本·白图泰又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航行,到达了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观光了色拉、摩加迪沙、蒙巴萨等沿海城市,接着返航至阿拉伯半岛东面的阿曼,并继续前往麦加。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麦加朝圣。伊本·白图泰是从麦加来的使者,因此无论他到达哪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国王的热情欢迎和资助。随后,伊本·白图泰从吉达港乘船渡海到埃及,从阿斯旺顺尼罗河而下到达开罗,穿过叙利亚,漫游小亚细亚诸突厥小邦,然后渡黑海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卡发。那里大多数居民信仰的是基督教。他对那儿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听到教堂里传出的钟声大为惊讶。整洁的街市、优雅的风景令他入迷。他对鞑靼人尊敬妇女的风俗既感到惊奇,又感到不可理解。他受到了金帐汗国月祖伯的礼遇,畅游了南俄罗斯,直至黑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目睹了白夜的奇景。在此期间,他受乌兹别克族首领月祖伯的派遣参加护送其爱妃——东罗马帝国公主回国省亲。在君士坦丁堡,他受到了东罗马皇帝安得罗尼卡三世的热情接待。接着,他又继续旅行,穿过茫茫的大草原,先后来到花刺子模、布哈拉、罗珊、喀布尔等地。

这些旅程,我们普通人连想也许都不敢想。但是伊本却坚持做到了。他在游历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地优秀的文化,又不断把自己所知

所学带到另一个国度去,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伟大作用。如果这不能算是一位旅行者最伟大的意义,那什么能算呢?

3. 差一点成了马尔代夫驸马

在此前的旅行中,伊本·白图泰到达的几乎全是伊斯兰教国家。公元1333年,伊本·白图泰决定到一些非伊斯兰教国家去看看。于是,他再次从麦加出发,经过海路、陆路旅程来到了印度半岛上的苏丹首都德里。苏丹是阿富汗古尔王朝入侵北印度后建立的王朝,虽然统治阶级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国民却信奉印度教。当时统治苏丹国的国王是格鲁克王朝苏丹穆罕默德·本·图格鲁克国王。

这位国王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国王,他对这位从非洲来的伊斯兰教徒特别感兴趣。通过交谈,国王发现这位“异”教徒非常有才能。尤其是在法学方面表现出来的才华,更是令国王倍感惊奇。于是,国王任命伊本·白图泰为朝廷的“哈的大师”,这是一个相当于大法官性质的官职。伊本·白图泰并不推却,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凭着对法学知识的充分了解 and 灵活运用,伊本不仅侦破了许多疑难案件,还对苏丹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国王对伊本·白图泰更加信任了,为了使他能够长期留在苏丹,还专门赐予了他一块封地。

就这样,伊本·白图泰在苏丹度过了9年。正当伊本准备踏实地在苏丹过自己的小日子时,公元1342年,苏丹国王派给了伊本·白图泰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当时,中国正处于元朝时期,开放的贸易环境使各国商旅齐聚在沿海各个城市以及首都大都。苏丹只是一个小小国,对面积广大、经济繁荣的中国十分仰慕,早就想派使者前去通好,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年,元顺帝派使者到苏丹进行友善访问。苏丹国王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就决定派遣使者随元使出访中国。他把朝廷中所有的大臣都认真筛选了一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他

想到了早年在各国有着丰富游历经历的伊本·白图泰。国王想,这个外国人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识广博,正是出使中国的合适人选。就这样,伊本的命运又将发生惊天动地的转变。

当苏丹国王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伊本·白图泰的时候,本来以为会遭到婉言谢绝。因为出使中国可不是一次简单的行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有可能在中途送命。但伊本·白图泰却爽快地答应了。他早就想到中国去旅行,只是鉴于苏丹国王对他的厚恩,没有说出口而已。见国王给了他一个出使中国的任务,他就赶忙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伊本·白图泰带着苏丹国王进献给元朝皇帝的礼物和亲笔书信随元朝使者一起踏上了去往中国的坎坷道路。虽然这段路程比起他以前的路程并不算远,但却是一次出生入死、充满危机的艰难历程。潜在的危机正在一步步向他靠近,而他却丝毫没有察觉。

由于伊本·白图泰在苏丹受到了国王的重用,很多苏丹大臣嫉妒他,伊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集聚了这么多的怨恨。不仅如此,苏丹的人民大部分都信奉印度教,他们对这位异教徒很不满,也经常散布他的谣言。伊本·白图泰经常与国王待在一起,国王知道他是个品行端正又多才多艺的人,想祸害他的人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如今不是天赐良机吗,如果他出使中国,国王就无法庇护他了,对伊本·白图泰的报复就有可能实现,于是一场阴谋逐渐拉开序幕。

伊本·白图泰乘坐的航船刚刚驶出德里港,印度教徒就对航船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伊本·白图泰在这次危急中险些丧命,但最终平安脱险。随后,他的航船到达了喀里克脱(现加尔各答)港,等待信风,准备从那里乘船直接驶向中国。当时的喀里克脱是一个商业繁盛的良港,来自中国、南洋群岛、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群岛、也门以及波斯湾等地的商民往来不绝,场面十分繁荣。

说到这里,笔者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14世纪印度和中国的海上交通,以增进一些了解。那个时候两国往来大多依靠中国的商船。中国船舶在那时被分为三等,大的叫“镇克”,中等的叫“曹”,第三等的叫“喀克姆”。“镇克”分为四层,可以载客1000人左右,船上设备齐全。有的大船还附带小艇三只,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现在能理解的最好的船只。本来伊本想坐无论安全还是舒适性都比较棒的“镇克”去,可由于“镇克”的房舱客满,伊本只好赁一条“喀克姆”小船,先将苏丹国王的礼物、书信送到船上,准备在岸上的清真寺中做完星期五的祈祷就起航。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们准备出航的瞬间,海上忽然刮起了罕见的大风,他订下的小船被巨浪拔起,卷入海中。伊本·白图泰因为还没登船而幸免于难,可是船上的东西却再也找不回来了。他想若空着手回去肯定会受到苏丹国王的责罚,就暂时依附在苏门答腊岛伊斯兰教徒那里,等待离开的机会。后来苏丹的印度教徒推翻了苏丹国王的统治,伊本·白图泰才从苏门答腊岛逃出,并辗转到达了马尔代夫群岛。

在马尔代夫,伊本·白图泰又遇上了一件很传奇的事情。马尔代夫的国王对伊本·白图泰也十分器重,任命他为大法官,协助国王管理国家。甚至强迫他迎娶自己的女儿为妻。但是,伊本·白图泰并不想留在马尔代夫,去中国游历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为了让国王放他走,他就对国家中的案件随意判罚,造成冤假错案连连。后来他的行为终于惹怒了国王,不久之后就被赶出了马尔代夫。不知道后来国王有没有发觉自己上了伊本的当,但是对于伊本本人来说,这可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从马尔代夫逃出来的伊本·白图泰,几经辗转流落到了朋加刺(现在的孟加拉)。他兴奋地在那里看到了开往中国的商船,就搭乘商船经苏木都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八昔河下游)到了元朝的重要港口城市刺桐(今泉州),这一年已经是公元1347年了。



伊本·白图泰旅行记

4. 神秘的元朝之旅

伊本·白图泰到了刺桐后,都不知道怎么感谢真主赐予自己的幸运。原来,他一到刺桐就遇上了曾经派往苏丹的使者。当时的伊本·白图泰十分困顿,使者一见到从前的老上司,就把他安置在了泉州的地方官那里,然后向元朝皇帝奏报了他的到来。

在等候圣旨期间,伊本·白图泰在地方官的陪同下游历了刺桐、兴阿兴(今广州)等沿海城市。他在刺桐看到了市场繁荣、环境优美、商贸发达,港口内有数不清的船只,仅停泊在港内的大船就有百余艘,甚是壮观。在此情此景下,伊本·白图泰脑海里曾冒出刺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的念头,可见场面的繁荣状况。在这里,他还遇到了不少久居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阿拉伯商贾,甚至见到了摩洛哥同乡。他认为兴阿兴城市的繁荣、市场的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那里回教设施齐全,管理井井有条。元朝发达的贸易经济使这个外国人叹为观止。

不久,伊本接到了元顺帝命令他北上大都觐见的圣旨。在元朝官员的带领下,他来到了京杭运河的起点杭州。伊本·白图泰从来都是一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游历机会的人,怎么能错过游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小天堂的机会呢?到达杭州之后,他一刻都没有闲着,马不停蹄地利用有限时间把杭州从里到外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杭州对他来说简直太大了,要三天才能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同时他认为杭州的人们生活都很富有,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花园、天井。不止如此,这

里还是一个融汇了多元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可以看见来自世界各地、各个信仰的人,如犹太人、基督教徒、土耳其人等,真是繁华得让人心里痒痒的。转了一圈下来,伊本对杭州布置相当完善的城市设施大为赞赏。

伊本·白图泰是受元顺帝的旨意进京的,在普通百姓和官员们看来他就是元顺帝的贵宾。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对他十分热情。他在《游唐》中写道:“早餐于此,晚宴于彼,享受一切官费的待遇。”真有点春风得意的感觉。

但是,当他溯运河北上,历经 60 多天的航程到达大都时,却没赶上好时候。当时,元朝正处在分崩离析的亡国危机之中,大都被战争的阴云覆盖着。看到这种情况,伊本·白图泰并没有朝见元顺帝。他怕战争一旦爆发,道路隔绝,自己就无法回国了。考虑到危险性太大,伊本·白图泰顺着京杭大运河回到了杭州,并再次回到了刺桐。

有学者对伊本·白图泰的行程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伊本·白图泰根本没有来过大都,他的航程到杭州就结束了。他的大都之旅很有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否则,他也不会那么有胆量违抗王命,擅自做主离开。要知道,古代中国等级制度是相当森严的,元朝统治者尤其血腥。如果有人擅自违反王命,只要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免不了被追杀,哪里还有好日子呢,即使你是外国的使者,也不能给你面子,要不然,王者尊严何在?

回到刺桐后,伊本·白图泰决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那时,他已经离家 20 多年了。他从刺桐乘船西还,首先到达了苏门答腊岛,然后途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叙利亚等地,终于在 1349 年回到了摩洛哥首都非斯。在此期间,他到麦加进行了第四次朝拜。这次长达 24 年的旅行是伊本·白图泰一生中时间最长、行程最远的一次旅行,在世界旅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 奇

1. 《伊本·白图泰游记》

伊本·白图泰回国后,在家乡住了很短的1年时间,就又踏上了外出旅行的道路。他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常年的海外生活又让他极不习惯安逸享受。于是,公元1350年,他又想办法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游历了安达卢西亚(今西班牙)的龙达、马拉加和格拉纳达等地。公元1352年,他前往中非和西非各地考察。这两次旅行是他深入非洲大陆腹地的旅行。公元1354年,这位伟大的旅行家终于结束了他的旅程,在摩洛哥的首都非斯城定居。

从公元1325年伊本·白图泰迈出家乡的那一刻算起,到公元1354年他在非斯定居,其间将近30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是在旅途上度过的。他一生三次出游,四次到麦加朝觐,游历了亚、非、欧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行程达12万千米,足迹遍及西亚、马格里布、中亚、印度半岛、中国、苏门答腊、爪哇、格拉纳达、埃及、中非、西非等地。

进入晚年的伊本·白图泰对自己的一生颇多感慨,他决定把多年游历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保存下来,留给后人借鉴。写书的计划得到了摩洛哥苏丹的支持,苏丹把自己的一名书记官派给他,协助伊本·白图泰完成这本伟大的游记。公元1355年,由伊本·白图泰口述,书记官执笔,用阿拉伯文记录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终于完成了。同时,伊本·白图泰正式告别了他的旅行生涯,在摩洛哥继承家业,安心做起了法官。公元1377年,73岁的伟大旅行家与世长辞。

《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的又一部著名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书中介绍了伊本·白图泰游历过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各地的特色产品、城市建筑、社会设施、典章制度、奇闻轶事以及他在

这些国家停留时结交的官吏、学者、社会名流、宗教领袖人物等。

书中还记述了很多中国元朝时期的情况。伊本·白图泰在书中记述中国地大物博,农产品、水果、金银制品极为丰富。此外,书中对元朝的瓷器、煤炭、绘画、手工艺品、交通、船舶管理、旅行管理、治安措施等也都有记述。由于伊本·白图泰是穆斯林,因此他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发展情况格外关注。他在书中以一位穆斯林的身份记述道:“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中国每一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事务”等。他还详细地描述了当时中国重要的城市泉州、杭州、广州等地的市场贸易、清真寺、穆斯林生活、民族关系等。此外,他对当时中国与印度、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地的贸易与当时航船的记载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位于上海、建于元至正年间的松江清真寺

伊本·白图泰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非洲人,他本是摩洛哥贵族,又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因此,他的到来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非洲是一个绝对神秘的世界。它们的文化、它们的

艺术、它们的政治制度等,除了远道而来的阿拉伯人代为流传外,基本上没有机会传播到中国。伊本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为中国人民打开了远望非洲的双眼。与此同时,伊本将有关中国的见闻真实可靠地记录下来,不仅成为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更刺激了许多非洲人远去中国的梦想,使得两块大陆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成为可能。

因此,伊本·白图泰绝对是世界交流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

第五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太监

——高丽人朴不花

朴不花(?—1364),也叫王不花或花不花,高丽人。7岁时被带到元朝并被送入宫廷之中做了太监。在中国的太监史中,朴不花这个名字尤其引人注目。他是元顺帝最宠幸的太监,权倾一时。后来的元朝灭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拜他所赐。这是一个怎样的传奇人物,是怎样由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太监成长成一名在朝廷内翻云覆雨的掌权者的?为何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梦 回

1. 深宫中的小太监

朴不花的发迹纯属意外。

朴不花7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了身。中国历来有向番邦属国要宦官的传统,朴不花正好赶上了这批,就随着其他人辗转来到了中国。这群奴仆队伍里,有个小宫女是朴不花的同乡,名叫奇洛。在道路上奔波辛苦的朴不花也不知道,今后他的前途竟与奇洛有很大的关系。

刚进宫时，朴不花只是一名不起眼的小太监，经常被其他太监欺负，还被派做一些别人都不愿意做的活。朴不花就这样在他人的白眼与欺辱中渐渐长大了。

不过幸运的是，朴不花与奇洛被一同分到了皇子妥欢帖木尔的宫中。这名小女孩十分善解人意，经常在朴不花受了欺负之后安慰他。朴不花也经常会在奇洛受到主人的打骂之后宽慰她。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起来，常在一块儿说说话，诉诉思乡之苦。二人相互关怀、相互照应着，在宫里苦熬着日子，甚至产生了朦朦胧胧的感情。但是，他们只是宫廷中最卑贱的奴仆，丝毫不敢把自己的感情表露出来，更何况朴不花还是一个太监。

朴不花受屈辱的历史，因为奇洛的一朝得宠而画上了句号。一天，已经登基为元顺帝的妥欢帖木尔在宫中游玩时，看见了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奇洛。他被奇洛的美貌深深打动了，当即就把她纳入了自己的后宫。后来元顺帝又给了奇洛一个至高的身份，封她为第二皇后，命她居住兴圣宫中。不久之后，奇洛就为元顺帝生下了一个聪明、漂亮的男婴——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对奇洛更加宠幸了，以至于冷落了宫中其他妃嫔。元顺帝还把这名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皇子册封为太子。从此以后，奇洛在宫中的地位更高了，就连第一皇后也要怕她三分。

从奇洛得势的那一天起，她的心中就一直惦记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与她同甘共苦 10 余年的同乡朴不花。于是，她便利用生子之后兴圣宫人手不够为由向元顺帝提出把自己的同乡朴不花调到兴圣宫的要求。当时，元顺帝对奇洛言听计从，马上就答应了下来。从此之后，朴不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真正接触到了这个国家的最高人物——皇帝。并且罩着他的还有太子的母亲——同乡奇洛。朴不花的好运就此开始。

朴不花刚调到兴圣宫时,他负责照料皇太子的生活起居,渐渐地得到了元顺帝的赏识,成了顺帝的左右手,后来发展到形影不离的地步,可见宠幸之深。

2. 一朝发迹,直冲云霄,不仅仅是个梦而已

早在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太监的时候,朴不花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飞黄腾达,尤其是在他受了其他太监的欺辱之后。因此,他在日常活动中十分注意观察宫廷内的规矩、为人处世等,渐渐地成了一名心机非常深的人。在奇洛被元顺帝宠幸之后,他就认为离自己飞黄腾达的那一天不远了。他积累的那些为人处世的方法、经验在他被调入兴圣宫之后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他利用一切可以接近元顺帝的机会向元顺帝阿谀奉承,得到了元顺帝的赏识。此后,他在宫廷内的仕途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先后被提升为荣禄大夫,加资正院使,担任掌管财政的要职。朴不花在朝野中的地位日益升高。

资政院是元朝政府机构中专门管理全国财政的部门,是个能捞银子的肥缺。朴不花上任之后,就开始积蓄起了万贯家财。为了保持地位的稳定,他极力拉拢奇洛皇后作为自己的靠山,把自己搜刮来的银子分给了她很多。由于朴不花做事极为缜密,一开始并没有人发现他的贪污受贿行为。为了拉拢更多的人,朴不花不惜花费大量财力来笼络朝廷中的权贵及皇亲国戚。这些人收了他的好处,就在朝廷上下四处散播他的好名声。

后来,元顺帝终日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一些国家大事就交由朴不花掌管。太子成年后,元顺帝把军国大臣交给了太子,自己做了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安逸皇帝。太子执政后,对这位从小把自己看大的宦官朴不花更加信任了,甚至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任命朴不花推荐的搠思监为宰相。其实,谁都知道,那个搠思监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实权操纵在朴

不花的手中。在朴不花的脑袋里,是一直装着宰相这个有百官之首名号的位置的。他本来想自己担任宰相一职,怎奈自己太监和外国人的身份一定会在朝野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聪明地放弃了这个打算,以退为进,安了个傀儡上去,实际上大权在握又不授人把柄,真是两全之策。

除了心眼多,朴不花还是一个贪念很重的人,随着自己力量的壮大,他渐渐开始独揽朝政,甚至敢公然干预朝廷官职的任命。这个昔日的小太监,内有皇后、太子撑腰,外有朝臣相助,一时成为元朝能够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当时,朝廷内的90%的官吏都是朴不花的手下。对于那些不归顺自己的官吏,他要么排挤、要么打击,有很多看不惯朴不花独揽朝政举动的官员甚至因此而丧命。

在朴不花执掌朝政期间,他卖官鬻爵,对百姓进行大肆搜刮,元朝的统治更加黑暗了,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相继爆发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反元战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公元1358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元战乱。在战争中无家可归的大批难民避居京城,使京城发生严重饥荒,饿死的人有几十万。为了改善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朴不花也曾经做过一些好事。比如他利用自己搜刮来的钱财,花费了20万余锭银子在南北两城到卢沟桥之间买地,把这些饿死的人收敛埋葬。但是,由他作恶而枉死的百姓,又有多少呢?

3. 贪心不足报应循环

太子监国后,对自己现有的地位仍然不满足,唯恐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准备逼迫元顺帝禅位,提前登基。太子的想法得到了奇洛皇后、朴不花、搠思监的大力支持。但是,朴不花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会因此而丧命。

计划之初,朴不花为了争取朝廷官员的支持,就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了另一位丞相太平。太平听完朴不花的游说后,对他的想法没有发表

任何见解。朴不花一伙儿看到太平态度不甚明确,倒也不敢贸然轻举妄动。又过了两年,太平年老辞官回家,搠思监成为唯一一位丞相。朴不花终于有机会施展拳脚了。他利用各种伎俩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将朝廷四方的警报、臣子的功状都隐匿不奏。元顺帝真的成为一个“傀儡”皇帝。朴不花一伙儿利用手中的权力无恶不作,成为元朝的大蛀虫。

当时,朝廷上还有一支反抗朴不花势力集团的政治势力,就是元顺帝的母舅老的沙等人组成的集团。老的沙是当时的御史大夫,凭借与元顺帝的亲属关系处处与朴不花作对。公元1286年,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老的沙等人在元顺帝面前弹劾朴不花,元顺帝见证据确凿就罢免了朴不花的职务。但是在奇洛皇后与皇太子的影响下,元顺帝也将老的沙封为雍王并遣归国。

老的沙走后,奇洛皇后与皇太子就多方设计恢复了朴不花的官职,继续让他担任集贤大学士、崇正院使等官职。朴不花早就对老的沙等人恨之入骨了,本以为这些人被赶出京城后会一蹶不振,再也不会兴风作浪。可是,他没想到这些政敌却得到了元朝手握重兵的大将孛罗帖木儿的收留。朴不花对孛罗帖木儿的举动十分不满,怕他们将来有一天卷土重来,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就向元顺帝诬告孛罗帖木儿谋反。元顺帝当时根本不理朝政,仅听了朴不花的一面之词就下诏解除孛罗帖木儿的兵权,并削夺其官爵,把他发配到四川。同时,朴不花还怂恿元顺帝派扩廓帖木儿出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对朴不花和元顺帝的举动十分愤怒,根本没有接受圣旨,就更不用说前往四川了。更令元顺帝难堪的是,此时蒙古族的一些其他手握重兵的宗王对元顺帝的做法也十分不满,非常同情孛罗帖木儿的境遇。他们对朴不花独揽朝政本来就有很多怨言,后来发展到了极度仇恨的地步。他们纷纷出兵与孛罗帖木儿的军队会合,并以武力要挟元顺帝,要求他下诏向天下宣布孛罗帖木儿无罪。

元顺帝看到众多的蒙古军队都站在了孛罗帖木儿一边，准备起兵谋反，才着了慌。为了平息众怒，他不得不下令逮捕朴不花、搠思监，并把他们分别流放到甘肃和岭北。可是，这些都是元顺帝做给那些宗王们看的表面文章，实际上这两个人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惩罚，仍旧留在京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孛罗帖木儿和各地宗王明白事情的真相后更加愤怒了，孛罗帖木儿派自己手下的大将秃坚铁木儿出兵，以“清君侧”的名义进攻京城。没过多久，他的大军就已经进驻到了京城周围的清河。元顺帝意识到了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如果此时不能满足孛罗帖木儿的要求，后果将不堪设想。元顺帝害怕了。他先后四次派达达国师前去与孛罗帖木儿协商，想方设法让孛罗帖木儿退兵。

谈来谈去，孛罗帖木儿表示退兵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交出朴不花与搠思监。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元顺帝再也无法庇护这两个人了，只得将他们交到了孛罗帖木儿手里。交接仪式一完，朴不花就被孛罗帖木儿杀死。至此，这位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位外国太监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有人认为朴不花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孛罗帖木儿带兵出征京城的时候，备受元朝欺压的汉族人民开始趁机响应，共同起来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这其中最著名的有郭子兴和朱元璋领导的军队。他们在南方的势力急剧发展，掀起了滔天巨浪，直接威胁到了元朝的统治。在本族同胞孛罗帖木儿撤兵之后不久，元顺帝就陷入了对抗汉族起义军民的更大困境之中。当朱元璋带领着军队打到北京城下时，元顺帝面对着国家将亡的局面，终于有所觉悟。他纵观自己的一生，发现如果没有朴不花的惑乱朝政，自己也绝不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可惜，元顺帝醒悟得为时已晚，在各路起义军的打击下，元朝没过多久就灭亡了。

蒙古人在统治了中国将近 100 年后,终于退出中原,回到老家漠北。元朝的继任者仍在那里建立朝廷,史称北元。



元朝最后在外籍太监过多干预朝政下灭亡了,图为元大都遗址上的雕像。

第六章 明朝时期的外国人

第一节 长眠在中国的国王

——苏禄国王巴都葛叭答喇

明朝时,在遥远的东南亚浩瀚大海上,曾经有一个叫做古苏禄国(今菲律宾)的伊斯兰小国。苏禄自古扼中国与阿拉伯、棉兰老、维萨亚和婆罗洲之间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古籍《大得南海志》(1304)最早记录了它的名称,元代中国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1349)中对其地及物产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尤其突出该岛特色是产珠。该岛分东、西、峒三酋长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喇曾经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来华访问,但在回国的时候不幸去世,从此长眠德州,成为中菲友谊的见证。至今仍坐落在德州市北营村的苏禄国东王墓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菲友谊。它是中菲两国友谊的桥梁,并在近现代不断得到升华。1999年,其在菲律宾的第十六代后人与苏丹国王一起来中国祭祀祖先,从此中菲两国开始了更广泛的合作。为何这位600年前的国王现在仍能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身上,又埋藏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梦 回

1. 德州突现的不协调村落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北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北营村。这个村庄与其他村庄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这里的村民都信奉伊斯兰教。

已不知过了多少岁月,村中的清真寺仍旧每天定期传出诵经的声音,那是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行的礼拜。这里的回民,与普通的穆斯林一样谨守着伊斯兰教教规,看不出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什么区别。但谁能猜得到,这里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这个村中回民的祖先既不是那些把伊斯兰教带到中国的“西域回族”,也不是东南沿海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来自于东南亚地区一个古老的岛国——古苏禄国,即这个村的村民几乎全部是古苏禄国王巴都葛叭答喇的后代。

北营村内最显眼的建筑是苏禄国王的陵墓。位于村子中心的两尊高大的牌坊是陵墓的标志。牌坊下是一条由南向北延伸的长长的神道。神道两侧有两排整齐的翁仲马羊,既威武又庄严,很有皇家风范。神道的尽头是一座同样雄伟的仪门,踏进仪门,一棵棵挺拔的苍松翠柏排列在道路的两侧。放眼望去,恩门、正殿、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地排列在陵墓的中心位置。正殿后面的正中是一座高大的圆顶土冢,这就是苏禄王的陵墓。墓冢前面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故苏禄国恭定王墓”几个大字。“恭定王”是明成祖朱棣追封给苏禄国王的谥号,充分展现了苏禄国王在明朝的地位。古代的谥号可不是乱起的,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作一个概括的评价,带有评判的性质,相当于盖棺定论。先秦史籍《逸周书》(也称《周书》)是中国文化源流之一,上有云:“敬事供上曰恭,尊贤贵义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尊贤让善曰恭,渊流通曰恭。……大虑静民曰定,安民大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纯行不二曰定。”可见这位苏禄东王地位之崇高。

从墓碑上记载的时间上来看,这位身居异国的国王已经在北营村将近600年了。墓冢的前面有一张干净整洁的石桌,是供后人祭拜用的祭

奠设施,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可以说朴素到了极点。

追溯历史,突然发现,这位被人们忽略了6个世纪的国王,竟然是联系中菲两国的重要人物。

1980年,菲律宾驻华大使雷耶斯博士专程来德州瞻仰、祭奠他们古老的国王,并且会见了国王的后裔,也就是北营村的村民。1986年,为了纪念这位国王为两国交往作出的贡献,中菲两国还联合拍摄了大型历史传奇故事片《苏禄国王与中国》。1997年,苏禄国王墓被山东省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苏禄国王墓被中国正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目前现存的唯一一处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外国国王寝陵。

古时的苏禄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国?苏禄国与明朝之间发生了怎样的联系?这位苏禄国王又是怎样长眠在遥远的异乡?所有的谜团困扰着我们。

2. 苏禄王的梦魇

提起苏禄国,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若提起菲律宾,几乎每个人都至少能说出它是一个位于菲律宾群岛上的东南亚国家。地理学习得好的,甚至能把它的气候特征、地形物产统统说出来。苏禄国就是现在菲律宾的前身,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时,苏禄国的国土面积还比较小,领土只包括巴兰西岛、和乐岛、达达岛3个大岛及400多个小岛。那时的人们有着统一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每个国民几乎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苏禄国是一个四面靠海的国家,它的领海是亚洲最大的珍珠产地之一。因此,在很久以前,苏禄国就有“东方之珠”的美誉。此外,尽管苏禄国的国土并不广大,物产却极为丰富,如玳瑁、降香、竹布、水产、香料、药材、苏木等,尤其香料是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因为是岛国,所以当地海上

交通业比较发达,苏禄国人从事的工作,主要就是海上对外贸易。他们把自己盛产的香料等商品运送到周围的各个国家,取得利益,求得发展。因为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对香料的需求很大,所以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有苏禄国与中国人民相互贸易的记录。到了明朝,两国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苏禄国产的珍珠、香料受到明朝人的热烈欢迎。随着贸易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苏禄国人开始在中国进行较长时间的停留或居住。他们在中国看到了繁华的街市,领略到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深深地被中国的悠久历史所折服。于是,每当他们回国,都会在国内把中国大大地赞美一番。

明朝为了向世界展示大国的威仪,曾经鼓励周围的国家纳入明朝的礼制。为了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明成祖还派郑和七次出使西洋。郑和先后访问过占城(越南)、苏禄(菲律宾)、爪哇(印度尼西亚)、满刺家(马来西亚马六甲)、锡兰(斯里兰卡)、古里(印度)等国家或城市。郑和的航海活动加强了苏禄国与中国的进一步联系。

中国成为当时许多没有来过中国的苏禄国人最向往的地方。时间一久,这些赞美之词就渐渐传到了苏禄国王室的耳朵里。当时,统治苏禄国的国王共有三位,也可以说是三个酋长。他们分别是东王巴都葛叭答喇、西王麻哈喇叱葛麻丁以及峒王巴都葛叭喇卜。这三位国王按照不同的统治区域共同掌管国家的政治、经济。遇到大事,他们每每要进行统一的协商,最后达成一致后才能够颁发命令。在这三位国王中,以东王巴都葛叭答喇权势最大、影响力最广。

但是,他们虽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也有烦恼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国王,就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样行动自由,只能待在皇宫里处理着永远都望不到边际的国家大事。当他们听商人们说起中国的富有之后,非常羡慕,特别想与那些商人一样能够亲自到中国

拜访一下。由于身份所限,他们一直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一天,三位国王聚在一起,聊起了心中的遗憾。越聊越是对中国充满期待与好奇,他们认为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如果再不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东王向其他两位国王提出了出使中国的打算。同他想的一样,这个打算刚一说出来,就得到了西王与峒王的支持。就这样,远渡重洋、拜访中国的计划被提上日程。

三位国王回到自己的领地后,安排好了外出时国家可能遇到的一切事情,就整理好行囊出发了。这支皇家出使队伍的规模十分庞大,可能是苏禄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使团包括东王巴都葛叭答喇、西王麻哈喇叱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以及王妃、王子等在内的家眷和众多国家官员,共340余人,怎么看怎么像声势浩大的旅行团。而苏禄国的臣民们也竟然没有反对,只是一脸羡慕地送走了自己的国王,丝毫没有想到他们这丢下全体国民的一走,究竟需要多少岁月才能够回来。

3. 何处是归程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东王巴都葛叭答喇率领着这支庞大的出使队伍,带着丰厚的礼物,驾驶着许多条海船,从菲律宾群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十五年,是明成祖朱棣当政时期。使团经过几个月的航行,在这一年的7月到达了中国的福建泉州。获得明朝政府的批准后,东王率领船队顺着水路来到了杭州,然后沿京杭大运河在两个半月之后到达了北京。据历史记载,苏禄国王的这支使团是当时世界上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的友好使团。同时,这也是中国15世纪时期最著名的一次外交活动。

抵达京城后,苏禄王向明成祖进献了带来的礼物。而他们也受到了明成祖朱棣最隆重的接待。当时,明成祖是以国礼来接待苏禄国王的。明成祖在故宫设置了丰盛的宴席为苏禄王一行接风,以大国之仪赠送给

三位苏禄国王印诰、袭衣冠带、鞍马、仪仗等礼物。他们还登上了明朝的著名对外防御工事——长城，领略了中国的大好江山。参观一圈下来后，苏禄国的三位国王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自然风光都大加赞赏，他们与明成祖一起商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策略，虚心地向明成祖学习做人做事的经验。

这次友好访问进行得很愉快。在随后的日子里，明成祖派官员为来访使团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明朝官员的陪同下，他们欣赏了中国的音乐、绘画、舞蹈，参观了北京的著名景点以及热闹的街市。美好的时光总是显得十分短暂，转眼间，苏禄国王已经来北京 20 多天了。他们虽然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繁荣的国都依依不舍，但还是理智地向明成祖提出了告辞的打算。

明成祖认为他们身为一国的国王，长时间地停留在外也不是长远打算，就批准了苏禄国王的请求。临别之际，明成祖加封三位国王为中国的藩王，又赠送给了他们很多珍贵的珠宝。

这年 9 月，明成祖派遣专使护送苏禄国王一行回国。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准备经大运河再通过南方水道到达东南沿海，继而出海。可是，当他们离开京城后没多久，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离开北京时，已经进入了秋天。使团到达德州时，天气突然变冷，年龄偏长的苏禄国东王很快就对天气的变化产生了反应，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再加上水土不服，他的病情很快就加重了。明成祖得知苏禄国王在德州患病的消息，马上派遣宫中医术最为高明的御医前往治疗。可是，当御医到达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答喇已经病人膏肓。御医作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无能为力。

东王去世的噩耗很快就传到了京城，明成祖对这位国王的死很感悲痛，当即就派遣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德州吊丧。陈士启按照明成祖的圣

旨一边慰问东王的家属,一边筹备盛大的葬礼。本来西王与峒王准备把东王的遗体带回国安葬,可是离他们回国还需几个月的时间,到那时东王的遗体可能已经腐败发臭了。他俩看到明成祖为东王准备了隆重的葬礼,与他在苏禄国可以享受到的葬礼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默许了明成祖的计划。

按照明朝厚土而葬的习俗,明成祖命令军士沿运河取土,哪里出土重就把东王葬在哪里。选来选去,陈士启发现附近就数现在德州北营村的土最重,于是就把东王安葬在了那里。

为了表达对苏禄东王的感怀之情,明成祖亲自撰写了墓碑的碑文,他写道:“人孰无死?若王,光荣被其家国,庆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可谓得其所归矣。使其区区海峽之间,一旦殒歿,身与名俱灭,岂不惜哉!王虽薨逝,盖有不随死而亡者,诚大丈夫矣。”

传 奇

1. “温”“安”后裔入中国

东王被安葬好之后,东王长子都马含眼泪汪汪地随西王、峒王及使团回国继承王位。东王的王妃葛木宁和他的次子温哈刺、三子安都鲁以及侍从十余人留守在德州守陵。

明成祖对东王确实是非常重视的。他不仅周密而隆重地为他举行了葬礼,而且还安排好了留守东王家属、后裔的生活。他特别命令陈士启按照明朝的赏赐制度拨发给留守人员金银、土地,让他们能够在中国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了东王陵墓占去的土地外,他还特别赏赐给他们良田 238 亩,并规定他们永远不用向朝廷交纳赋税,并且所有的包括侍从在内的留守成员都会得到一份朝廷拨发的俸禄,与明朝的官员享受的待遇基本一致。

明成祖甚至还考虑到留守人员的宗教信仰问题。早在使团来华之初,他就了解到苏禄国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为了充分地尊重他们伊斯兰教的风俗,明成祖专门从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调来了夏、马、陈三姓回民,与他们一同居住,以图能够在生活上照料他们并使他们不感到孤寂。明成祖还十分体谅留守人员,知道东王的两位王子以及其他几名侍从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就特许他们可以与调拨过去的夏、马、陈三姓回民通婚。于是,这支留守队伍就这样慢慢发展壮大起来。

公元1423年,已经阔别故土6年之久的苏禄王妃与两位王子在守陵期满后准备回国,就向明成祖请旨。明成祖很快就对他们的奏请进行了批复。于是这三个人带领着几名侍从在明成祖派遣的侍卫护送下回到了苏禄国。可是回国之后,他们并没有感到怎么快乐。在中国的几年时光已经使他们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回国之后反倒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们又开始对远方的中国日思夜想起来。公元1424年,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打算,准备再次前往中国居住。于是,他们又与护送的侍卫一起再次来到了中国。就这样,东王王妃与两位王子在德州度过了他们的后半生。死后,他们都被葬在东王墓葬的东南方向。

因为王妃和王子的再度归来,使得留守的苏禄国东王的后裔人数越来越多,渐渐地发展成为当地的一个村庄。300多年过去了,明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清朝。公元1731年,苏禄国王苏老丹访问中国。他此行除了政治目的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祭拜300多年前的祖先苏禄国东王。他在来北京的路上专门到德州瞻仰祭拜了东王。当时,虽然苏禄国王的后裔已经与当地没有什么区别了,不仅能够说流利的汉语,风俗习惯也与中国的回民一致。但是,在身份上他们仍然是外国人。于是,东王的第八代后裔温崇凯、安汝奇向清廷提出了“本国远隔重洋,东王德州后裔愿加入中国籍”的请求,并请苏老丹国王把奏请转交给礼

部。礼部接到奏折后很快就进行了批复：“苏禄王留德州后裔以‘温’、‘安’二姓入籍中国德州。”当时，东王的后裔加入中国国籍时共有193人，全部是温、安二姓。从此，东王的后裔正式成为中国的国民，并发展形成了北营村。

2. 东王后裔的繁衍动向

东王的后裔最初是围绕着北营村发展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后来发生的两次自然灾害使东王的后裔开始分散并向外迁移。

民国时期，黄河在1933年和1935年曾经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决口。沃野千里的德州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北营村同样没有逃过洪水的劫难。生活在北营村的东王后裔面对洪水的侵袭只得向外四处逃难。这些外出的难民有的在洪水退去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的则在外地扎根。现在的苏禄国东王后裔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台湾等地均有其后裔居住。

在东王的后裔加入中国国籍之前，中国就已经有“温”、“安”二姓了。因此，并不能说现在所有这两个姓氏的人都是苏禄国东王的后裔。但是如果他们同时具备信仰伊斯兰教而且祖籍德州的特点，那么他们就必定是东王的后裔无疑了。

据初步统计，目前东王的后裔已经发展到了安姓21代，温姓20代。围绕苏禄王陵墓形成的德州北营村共有55户222人，而在全国范围内，苏禄王后裔已经达到3700人。在东王的后裔中，不乏颇有建树的杰出人物。安树德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1912年，冯玉祥到山东地区招兵，27岁的安树德应征入伍，因为作战英勇先后升任为国民军第二师少将旅长、平凉镇守使、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四路军中将师长、青海省主席、西北军军长等职。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安树德归隐，开始在北京、山东等地经商。他有很强的商业头

脑,所经营的商号有美孚——德润昌和德士古——德润厚两家石油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同德油坊、义德里货栈、济南卷烟厂、风船面粉公司、山城王银号等,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商人。他非常支持共产党,经常掩护地下党开展革命工作。抗战爆发后,安树德给八路军多次运送煤油和面粉,并通过中西药厂董事长刘济蓝为解放区提供药品。1946年,他还从国民党手中营救出了一些被国民党囚禁的干部。

当年,明成祖给东王的题词“王虽薨逝,盖有不随死而亡者,此诚大丈夫矣”在安树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继承了东王的雄浑气魄,他们在山东商人的长期影响下也发展成了一支具有经商传统的回民商人力量。

现在德州的街头,有许多商铺门前挂有一长方木牌,牌的正反两面,都画着细嘴端把彩壶,横书伊斯兰文,竖写汉字“清真教门”。那些卖熟牛肉、羊肉,肩背一椭圆形木桶,桶盖上挂着一个小木牌,两面写有“回族”标志的人,据说都是北营村人的后裔。他们以小本生意为主,经营着德州的特产,如烙锅饼、烙麻酱烧饼、酱牛肉、烤羊肉等。这些小食品在他们的经营下渐渐发展成为往来商旅喜爱的小食品。

现在,北营村的辈分最高的东王后裔是第十七代,现在已经70来岁的安金志老人。他正在与其他村民一起,通过各种途径建立与海内外同胞的联系,准备续写苏禄王德州后裔及分布海内外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的苏禄王“温”、“安”两姓后裔族谱。

为了继续增进中菲两国的友谊,德州市已出台“苏禄王御园”规划设计方案。方案规划以苏禄国东王墓为核心,立足文物古迹保护,以菲律宾地理和建筑形式为主题,以菲律宾风情、伊斯兰文化为背景,选择有代表性的与苏禄国东王有关的苏禄群岛地理形态进行微缩复原,在“岛”上修筑菲式古典建筑,辅以菲式游船和热带植物,一岛一景,一景一情,充

分展示古苏禄国东王时期的历史生活场景和文化特色。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苏禄乃至菲律宾与中国的历史渊源是不会动摇的。从591年前苏禄国王与明成祖的“政治会见”,到此后连续不断的民间往来,苏禄王国后裔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了保持和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也是日久弥新。

第二节 杰出的传教士与科学家

——泰西儒士利玛窦

说起泰西,倒是很有意思。明清以来,中国之人把欧洲统称为泰西。泰即太。太西了,到头了。意即十分遥远。不过在明清时期,还真有不少泰西人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出生在欧洲意大利中部的玛柴拉达城,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从小便在耶稣教会学习,后来奉命传教,来到中国,并居住了长达30多年,为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博学多识,他很受中国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知识传到中国,还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一起翻译并著述了很多书籍。这些作品不仅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日本和朝鲜学习西方文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梦 回

1. 年轻的学者,在天主的召唤下接近圣殿

意大利马尔凯州有个玛柴拉达城。它建立在一个小山上,是远近闻名的繁华的城市,城内不仅筑有教皇派来的行政长官,还有高等法院和专门铸造钱币的工厂。

利玛窦的父亲曾经是玛柴拉达城内的一名医生,经营着祖传的药店,在当地非常有名。后来他还在政府里担任过官职,曾经做过教皇国派遣的市长和省长。这一切,都为利玛窦创造了一个优越的生长环境。在家中,利玛窦是12个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孩子,因为性情活泼、体格强壮,十分讨父母和亲友的喜欢。

利玛窦天资聪颖,在只有几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记忆力。父亲一看自己的孩子这么聪明,今后绝对有出息,就把他送到城里的一位神父那里学习。利玛窦不负众望,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神父教过的课文,用不了多久利玛窦就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神父对他十分疼爱,竭尽全力,尽量教给利玛窦更多的知识。没过多久,利玛窦的学问就已超出常人了,甚至,比一些大人懂得都要多。

但不久,这位神父就加入了耶稣教会,有了自己的神职工作,无暇顾及利玛窦了。利玛窦见状,只好回家自学。9岁时,利玛窦到玛柴拉达城新开办的一所耶稣学校去学习。在学校里,他刻苦用功,学业上进步飞快。16岁时,利玛窦以优异的成绩从耶稣学校提前毕业。

那时,利玛窦的父亲已经升任为当地的省长。他对这名聪明英俊的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样到政府中做官。为了儿子的前途,他把利玛窦送到了能够结识很多宫廷贵族的罗马,到一所大学攻读法律课程。此时的利玛窦已经朦胧地知道自己并不喜欢父亲给他

安排的这条道路。可惜父命难违,他只好离开家乡,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罗马上学。离家前,玛柴拉达城曾经教过利玛窦的老师给罗马的耶稣会写了一封介绍信,叮嘱他若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找耶稣会解决。初到罗马,举目无亲,利玛窦经常在课余时间到耶稣会访问那些教士,并加入了耶稣会教士创办的圣母会。

随着利玛窦与教士接触时间的增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发现自己对做官并没有多大兴趣,人生如果只为追求世俗的名利就太没有意义了。他把罗马法的法律条文与耶稣会的神操相比较,觉得它们的差异实在太大了。他认为前者使人走向地狱,后者却使人走向天堂。于是,他对耶稣会越来越神往了,经常向教士请教自己不明白的一些教义、经文,渐渐地,他产生了加入耶稣会的想法。

公元1571年8月15日,这一天是利玛窦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这天,正好是圣母升天节,利玛窦前去拜望耶稣会的总会长,总会长不在。于是,利玛窦就与代理神父纳达尔交谈了起来。利玛窦向他表达了自己申请加入耶稣会的想法。纳达尔神父见利玛窦一片赤诚,就收录了他。他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由一名大有前途的后备官员转为一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

不久,利玛窦加入耶稣会的消息就传到了玛柴拉达城,他父亲十分生气,立刻前往罗马,准备让他退出耶稣会,继续读完大学的课程。可是,事有不巧,他刚赶了一半路,就在过度愤怒的刺激下中暑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回玛柴拉达城养病。

这时候,利玛窦的母亲出场了。她对儿子的做法并没有像丈夫那样的激动,而是表现得十分开明,她趁机劝丈夫说这是天主的意愿,并让他不要违背天主的意愿,准许儿子加入耶稣会。在妻子的劝说下,利玛窦的父亲也渐渐想通了,不再阻挠他加入耶稣会。



罗马的耶稣会教堂。耶稣会对利玛窦的影响颇深,促使他为了宣扬教会远赴中国传教

公元 1572 年,利玛窦开始在耶稣会所设的罗马学院学习神哲学。其间,他还拜数学家克拉乌为师,学习天算。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利玛窦一面专心读书,一面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他想自己是作为一名神学教师留在意大利教书呢,还是到遥远的地方传播福音呢?但是,他并不能对自己的将来做主,还要听从耶稣会的统一安排。

2. 来到中国,完全是主的安排

利玛窦在罗马学习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被派往中国传教。因为,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朝时期,统治者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几乎禁止了一切外来文化的传入。即使是传教士,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权。耶稣会著名的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方就是因为无法去中国传教而忧郁过度去世的。然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发生在了利玛窦的身上。

从神学院毕业后,利玛窦并没有被直接派往中国。当时,一位在印度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请求罗马耶稣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印度去传教。于是在公元1577年,耶稣会总会长派遣了四位传教士从罗马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准备从那里乘船前往印度传教。这四名传教士中就有利玛窦,还有一位把利玛窦带到中国的罗明坚神父。利玛窦当时只有25岁,还没有升任为神父。

利玛窦没来得及回家辞行就踏上了传教之路。他们的船只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6个月后到达了印度果阿,那里是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来印度之前,他听到过很多传教士对这个国家的赞美。但当他到达印度后,才发现在这里传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地人根本不信耶稣教会。但传教失败的打击并没有消磨他传教的积极性。在传教的4年中,他不仅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本职做好,还在那里的神学院学习了一些人文学科。

几年后,罗明坚神父把利玛窦推荐给了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范礼安见利玛窦品学纯良,非常喜欢,于是派利玛窦前往中国传教。当时,由于中国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外国传教士只能停留在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的澳门。公元1582年,利玛窦由印度来到了澳门。在澳门的传教士想把天主教义用汉文表述以吸引中国人。因此,几乎所有在澳门的传教士都要首先学习汉语。利玛窦也不例外,他对与自己掌握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字有浓厚的兴趣,深深地被这种神奇的文字吸引了。但是利玛窦却一直以不能前往中国内地传教感到深深的遗憾,他一

直没有放弃,一直寻找进入内地的机会。

公元1584年,利玛窦终于获得明王朝的批准,与罗明坚神父一起来到了广东肇庆。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来到广东,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这个办法不甚光彩。

利玛窦发现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允许那些天竺佛教徒进入。他们在天竺(印度)待了那么久,对印度的一切都非常了解。他们对明朝官员说他们来自天竺,致使那些官员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便放他们过了关。利玛窦带来了许多宗教用品,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还有欧几里德的著名典籍《几何原本》。他带来的这些东西吸引了很多达官贵人的眼球,尤其是那本翔实的地图。

同样,来到肇庆后,利玛窦对中国的文明也惊奇不已。他认为除了没有传播天主教这一点外,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位居世界前列。他称赞道:“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通过与一些中国人的接触,利玛窦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精通包括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等在内的很多学科。

到达肇庆的第一年,利玛窦组织建立了“仙花寺”,在那里进行传教活动。最初,他们的传教活动十分谨慎、低调,怕被明朝政府驱逐。利玛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汉语和礼节习俗上,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的信任。为了取得人们的好感,他甚至把佛教的服装穿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在仙花寺挂上了圣母玛丽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佛教僧人都来跪拜。

公元1584年,利玛窦亲自动手制作了《山海輿地全图》,这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份近代地理学地图。他利用解说那些令中国人好奇的西方世界的机会,向他们传播天主教。在小心翼翼地传播教义的同时,为了使天主教能够更快被人们接受,利玛窦还翻译了《十诫》、《主的祈

祷》、《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等书籍。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就有人对天主教产生了兴趣,这让利玛窦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在初步传教成果的鼓励下,利玛窦又向当地人分发了罗明坚用中文撰写的《天主实录》。当时,很多人都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遗憾的是,当地人始终把天主教当做一支佛教流派来对待,并没有把它当做一种全新的宗教。

公元1589年,利玛窦遭到了一些广东官员的排挤。广东新任总督甚至还将利玛窦的住所据为己有。无奈之下,他只好移居韶州。没想到,在韶州竟然困难重重。

一天,利玛窦在外出传教的时候遇到了一伙儿强盗。在争斗中,利玛窦受了伤,不过幸好那些强盗最终被吓走了。利玛窦受的伤并不重,几天之后就恢复了。

更让利玛窦感到痛苦的事情就是传教伙伴的相继离开,公元1591年麦安东神父去世了,公元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去世,罗明坚神父奉命返回了欧洲。广东只剩下了利玛窦一名传教士。强烈的孤独感包围着他,苦闷冲击着他的心灵,动摇着他传教的决心。但是,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专心从事传教事业。最终,好运来到了他的门口。他在那里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弟子——瞿太素。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第一卷。随着瞿太素的宣传,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广东传开。后来瞿太素在与明朝政府官员和上流社会接触中发现,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有一些欠妥。利玛窦的僧侣服装打扮并不会赢来当地人的尊重,反而会受到上层社会的排斥。于是,为了更方便地与中国官员交往,利玛窦征得了范礼安的同意开始蓄发留须,穿起了当时备受上层社会人士推崇的儒士服装。就这样,利玛窦终于有了一个融入上层士子社会的机会。他的传教生涯开始步入辉煌。



利玛窦身着儒士服装画像

除了传教,利玛窦在韶州期间还攻读了中国的经典名著《四书》,并首次将它翻译成拉丁文。

3. 与南昌渊源不浅

利玛窦改装之后,效果明显。以前那些敬而远之的大人物频频向他示好,传教活动终于有了转机。

在以后的传教活动中,利玛窦与南昌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年的初夏,利玛窦乘船沿着赣江向南昌进发。当船行驶到赣江万安县险峻的十八滩时,因为突然撞上了水中的礁石而翻船了。利玛窦落入水中,幸亏他在紧急中抓住了一块木板,才得以游到岸边。与他同船的人全都葬身赣江。当这个金发蓝眼的外国人爬上岸后,很快引起了南昌百姓的围观。人们发现这个人虽然相貌与自己的外貌有很大的不

同,但全身上下的打扮与自己一样。更令他们吃惊的是这个人竟然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利玛窦本来想经由南昌到更为繁华的南京去传教,当时的明王朝正在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抵御倭寇上面,对这个外国人在内陆的活动充满了戒心,不允许他到南京传教。无奈之下,利玛窦只好在南昌开展传教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来南昌,在这里他进行了3年的传教活动。没想到正是这个城市使他改变了脑海中固有的“欧洲中心论”。他亲眼见到了南昌的繁华,亲眼见到了南昌的风土人情。这些都使他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写给罗马耶稣教会的信中写道:“南昌为江西省的首府……赣江右岸,四周皆为碧绿色的平原。”

利玛窦徜徉在南昌繁华的街道与集市中,看到南昌的繁华程度比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吸引了他的注意。这座“宫殿”就是南昌著名的铁柱万寿宫。他见到万寿宫门前人潮汹涌,很多人都带了礼物向里面走去,于是他也随着人流一起走进了万寿宫。万寿宫宏伟的规模、威猛的塑像以及无数虔诚跪拜的男女老少使利玛窦深深叹服。

利玛窦的到来在宫内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当他正在醉心于对万寿宫欣赏时,万寿宫内的人们也注意起了这位外国人。众人先是对这位外国人表现出了惊讶,而后就转入到气愤与指责之中。众人把利玛窦围起来,并七嘴八舌地向他说着什么。利玛窦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招来这么多人的注意,而且大家的态度似乎不很友善,一时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在一位年轻人的帮助下才弄清了引起众怒的原因。原来利玛窦居然没有向万寿宫内供奉的主神许真君下跪。那位年轻人赶忙向南昌百姓解释外国人与他们的信仰不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激愤的人群才平息下来。利玛窦在给罗马耶稣教会的信中写道:“非常懊悔,因

为不明白外教人的心理,引起他们的误会,又不易给他们讲个明白,因此决定在尚未使中国明白我们立场前,绝不去参观中国庙宇。”在他的信中提到的庙宇就是万寿宫。这是中国万寿宫的名字在400多年前第一次传到欧洲。



利玛窦的到访,使中国的万寿宫在多年前已传入欧洲

在此后的日子里,利玛窦尽量避免参与一些容易引起南昌人误会的活动。由于在南昌没有一个熟人,因此他传教活动之外的唯一乐趣就是在闲暇的时候仔细观察城里的一切。他认为,南昌的规模以及繁华程度是当时意大利著名商业城市翡冷翠(今佛罗伦萨)的两倍。虽然这里的商业比不上广州,但是城市环境却非常优越。他在城内还发现了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牌坊,他形容“这类牌坊雕得十分精致,比比皆是,几乎无空闲地方可以再竖立了”。

经过努力,利玛窦终于让南昌城的百姓和官员们接纳了自己。无论是江西巡抚陆万垓还是南昌城的普通百姓以及文人雅士都十分喜欢这位远来的外国人。他还与南昌城著名的中医王继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尽如人意,经常有人到利玛窦的住所拜访、做客,有时还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参加家宴。一般情况下,每天他要接待最少三名客人。他对南昌人的热情非常感动,说:“假使我能在此居留,相信一年的收获,会比过去十年在广东所获得的还多。”

章潢是利玛窦结识的南昌好友之一。他是南昌著名的文人,是庐山白鹿洞书院主人、顺天府儒学训导。章潢不仅品行高洁、学问也非常高深。一天,章潢去探望久病未愈的利玛窦。当时,利玛窦的住所聚集了很多前来探病的人。章潢认为一个病人不能充分地休息反而要强支身体迎接来客,很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就劝告利玛窦让佣人找个理由说主人不在家。利玛窦并没有同意章潢的建议,他认为作为一个传教士应严格遵守教义教律,不能说假话。章潢对利玛窦的为人更加佩服了。后来,这件事情不知怎么传了出去,赢得了更多人对他的尊敬。利玛窦身体康复后,有更多的南昌人前去利玛窦的住所拜望。他们有时探讨学问,有时交流学习经验。由此,他对南昌以及中华文明的感触更深了。

公元1597年,利玛窦亲身经历了明朝的一次科举。他认为科举在中国并不是一般的考试,而是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大事。他在给罗马耶稣教会的信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写道:“在每座省府城中,皆设有贡院,内分由北向南10排以上成行的房子,房子只有桌子一张、椅子一把而已。”“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4000多个小单间。”那些被隔成小间的单间建造得非常密闭,目的是“使得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

在谈到明朝的考试制度时,他写道:“在这个帝国,由朝廷籍科举取士;先‘乡试’,中者为‘举人’。举人的录取数字虽然无一定,但实际上却不少。举人资格是由各省首府所颁发;皇帝每三年一次给予每省一定的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每省每次参加会考者录取九十名。再高一级为

‘会试’，由礼部主持；只举人才有资格参与会试，全帝国只录取三百名，礼节隆重，法规森严。会试及格，再由天子在宫殿亲自试策，称作‘殿试’，然后分一、二、三甲放榜：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及探花，皆赐进士及第；二、三甲无定额，各赐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此外，利玛窦还谈到了考试纪律以及防止作弊的措施。

在称赞科举考试可以选拔人才时，利玛窦激动地告诉西方人的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一个外国人，能够把科举制的优点尽皆看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更加值得人们敬佩的是，他看到了科举制的内涵，即它主导之下的知识政治、道德社会、公平竞争、阶层流动等。这样，就为西方世界送去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传 奇

1. 来到东方的“吉卜赛人”

利玛窦的到来引起的轰动不仅在于他奇特的相貌、古怪的语言以及外来的宗教，还在于他带来的众多稀奇古怪的工具。三棱镜引起了与他交往的所有南昌人的好奇，利玛窦便趁机向这些人讲授一些光学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向他们介绍了欧洲的地圆说。同时，他亲自修订了一幅《坤輿万国全图》。为了使更多中国人接受这幅地图，他按照中国人的思想习惯，把中国放在了地图的正中，形成了现代中国世界地图的模型。当时，人们对地图十分好奇，争相购买，以致地图多次重印。他感慨道：“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利玛窦在南昌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明朝的《坤輿万国全图》

能够把《四书》、《五经》背得一字不差。因此,南昌的百姓对他越来越佩服,并请他把自己记忆的诀窍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于是,利玛窦就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写成了《记忆术》一书,引起了南昌城的轰动。为了传播天主教,他还专门写了后来在天主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天主实义》。不但如此,他还在南昌皇室的要求下,修订出版了《交友论》。后来清康熙皇帝看了这部著作以后,就很开明地解除了天主教不准在中国传播的禁令。自此,天主教才得以迅速传播开来。

关于利玛窦在南昌的居住地,历史上始终没有明确的记载,到现在还是个谜。一些资料上显示,他初到南昌时,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只能暂时在旅馆中栖身。1年后,他在给一封朋友的信件中提道:“两个月前,在受过多次艰辛之后,终于在这里建立了另一座住所。”这封信的书写时间是公元1596年10月,表明他已经有了的一处较为稳定的住所。此外,他还很可能在另一处地点居住过,但具体位置难以确定。利玛窦在提到自己的住所时,往往一笔带过,只说明了他住在城里,距离巡抚衙门大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目前,学术界认为有三个地点利玛窦曾经居住过,分别是当时的棉花寺、戊子牌坊和杏花村。

公元1595年,利玛窦借口自己为一位官员的孩子治病离开了南昌,获得了一次去南京的机会。他在一些官员的带领下到达了南京。然而,与他一起来的官员没过多长时间就各顾各的了。一人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的利玛窦只得再次返回南昌,并获得了在南昌的永久居住权。

2. 勇敢的灵魂留在盛世之都北京

公元1596年,因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功绩显著,范礼安任命他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让他负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时,范礼安还建议利玛窦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以使天主教能够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1598年,利玛窦离开了南昌,前往明朝的都城。与他同行的还有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在王忠铭的带领下,利玛窦与郭居静神父在这年的9月抵达北京。但是,他的此次北京之行并不顺利。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正值日本侵犯朝鲜期间,利玛窦没有获得留居北京的许可,并且遇上了财政上的困难。在北京居住了1个多月,他只好向南折返,最后来到了南京。在瞿太素的帮助下,利玛窦很快结交了南京的社会名流,如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此外,利玛窦还与大报恩寺的三淮和尚进行了一场辩论,并凭借其科学的思辨明显占据了上风。为了更好地传播天主教,他在南京的正阳门附近修建了中国大陆第四座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在他的努力下,南京很快成为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但是,利玛窦一直把没有在北京传教作为一种遗憾。公元1601年,他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抵达北京。他向明神宗进献了西洋的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物品,并由此得到了明神宗的信任。明神宗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北京成为这位伟大传教士的永久居住地,也是最后居住地。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以他丰富的学识很快迎来了士大夫的尊敬。他



南京石鼓路的天主教堂现在依然有许多信徒。

常与前来拜访的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此外，他还用中文编撰了《二十五言》书籍。短短几年之后，在利玛窦的努力下，北京已经有200多名天主教徒了，最著名的就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利玛窦来到北京后，为了使中国人能够尽快接受天主教，开始留心寻找一些北京固有的基督教痕迹。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传播的天主教是一种完全外来的宗教。他认为如果能够证明在很久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信奉基督教了，这样就可以说明基督教是中国人固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就会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尊敬与信赖。

早年在罗马学习的时候，他就曾经听说过东方有一个遥远的契丹国的人们信奉基督教。他认为契丹国就是当时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因此，

他到北京定居之后,就开始多方面查找有关基督教会的资料与史实。他发现了一个刻有希腊文字的献弥撒时用的祭铃,这是基督教会特有的东西。公元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遇到了一位专程来拜访他的来自开封自称信奉犹太教的客人。这位客人说他们信仰犹太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犹太教是与天主教同源的宗教,信仰的都是耶稣基督。利玛窦认为既然几百年前犹太教就已经传到中国,天主教在那时也有传入中国的可能。于是,他便派了一名传教士前往开封调查。可是,这次调查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但是,利玛窦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基督教踪迹的寻找。公元1625年,终于有人发现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踪迹。可惜的是,利玛窦当时已经去世了。但是,此处基督教存在踪迹的发现与利玛窦有着很大的关系。利玛窦交友的范围很广,曾经有一位西安籍的举人在北京居住时与他成了好友。这位好友一直帮他留心一切关于基督教的事情。这一年有人在长安的西郊附近挖出了一块高约3米、宽约1.5米的石碑。石碑立在莲台上面,碑顶上刻有十字架,左右刻着飘浮的白云,十字架下面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熟悉古文的人从碑文上看出,这块石碑是唐朝时所立。这块石碑出土后立刻引来了众多文人雅士前来参观,其中就有利玛窦的这位朋友。他看了碑文的内容,想起了利玛窦讲解的教理,认为这可能就是利玛窦生前苦苦寻找的东西。于是,他就用纸把碑文拓了下来,带到了远在杭州的朋友李之藻。李之藻经过研究认为碑文上面记述的景教就是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

利玛窦于公元161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58岁。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本来不具备安葬在北京的资格。但是因为他对中国科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明朝皇帝在利玛窦众多朋友的建议下,特别允许把他安葬在北京西郊。公元1611年,在明朝天才科学家徐光启的主持下,利玛窦被安葬

在了皇帝赐予的二里沟滕公栅栏。之后,这块墓地渐渐发展成为中外天主教神父、教徒的公共墓地。后来,墓地几经战争损毁,并被迫迁往他处,唯有利玛窦等三人的墓葬留了下来。利玛窦墓现在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成为外国友好人士来京访问期间必定前往拜谒的地方之一。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刻成的碑文,写着:“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建在中国北京的利玛窦墓

利玛窦对中国的介绍使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他被公认为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位让世界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他在中国不仅传播了天主教,还为中国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作出了突出贡献。

3. 天主教的叩门者

唐朝时期曾经在中国兴起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后来逐渐没落。明朝时,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基督教传播了。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是基

督教的另一分支。他再次把基督的福音带到了中国,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后来传教士的来华打下了基础,开启了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

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态度。他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进行传统的祭天、祭祖等习俗。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他认为这些传统仪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危害,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就基本上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把基督教中的神“God”翻译成“天主”,由此中国开始把这种宗教称为“天主教”。在传教时,他往往身着中国士人的服饰。利玛窦的传教效果很明显,甚至一些皇室成员也准备皈依天主教。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皇帝的皇后在清军入关之前就曾经写信罗马教皇,申请加入天主教。其传教方式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后来的传教士大都依照利玛窦的方式来传教。

利玛窦还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他撰写的《天主实义》以及与徐光启等联合翻译而成的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还把许多词汇,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据说,“欧”字就是利玛窦等人为了翻译的方便而创造的汉字。《天主实义》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同时也把西方的星期制度引入中国。后来,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把这本书的内容收录了进去,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坤輿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世界地图。传入中国后不久就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西字奇迹》揭开了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的序幕。《二十五言》阐

述的是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畸人十篇》记述的是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交友论》中,利玛窦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是利玛窦用汉字写的第一部著作。《西国记法》中,利玛窦向人们解释自己是如何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辩学遗牍》中记述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佛教观点交流的情况。《同文算指》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翻译而成的,主要介绍欧洲算术。《测量法义》是一本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的数学专著。此外,利玛窦著述的书籍还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利玛窦在音乐方面还有一定的造诣,参与编纂了《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利玛窦为中国天主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利玛窦的到来,对中国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的世界观、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欧洲先进的文明成果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封闭的中国,引发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

第三节 欧洲的中国通

——佛朗机传教士曾德昭

曾德昭(1585—1658),出生于佛朗机国(今葡萄牙)阿连特茹省尼撒地区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很小就投身耶稣会。因为他学识丰富,对教旨领悟得十分深刻,因此被耶稣会派往中国传教,使天主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开来。他在中国的传教历程十分曲折,经历了当时比较恐怖的南京教案,身受囹圄之苦。曾德昭撰写的《大中国志》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梦 回

1. 磨难,岂能改变勇士的壮志

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资本主义者为了寻求金钱开始“放眼看世界”时,港口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终于迎来了它们的全盛时代。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这两个曾经受制于人的城市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它们在非、亚、美拥有大量殖民地,成为海上强国。这其中,后来被人们赠以“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葡萄牙因为占据着天时地利而更胜一筹。它三面被西班牙环绕,一面紧靠大西洋,既能躲开陆地上的战争冲击,又能安心地发展海上贸易。在15、16世纪,葡萄牙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辉煌。

公元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的新航路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大批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其中以耶稣会的势力最大,发展最快。天主教渐渐在中国有了发展根基。

中国的一些历史资料中记载了早在明朝早中期,就有很多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来华的情况,如在嘉靖时期的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后来写下《中国见闻录》的加列奥特和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写下《中国情况记》的克鲁兹。他们著述的书籍记载了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使更多的葡萄牙人向往来到中国。明朝后期,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更多了,曾德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曾德昭17岁加入耶稣会,进入埃武拉大学专门攻读神学,学成后从事传教工作。当时的明朝把葡萄牙称为佛朗机国,此译音来源于到中国朝贡做买卖的东南亚回教徒。阿拉伯、土耳其等地泛指欧洲为“佛朗

机”，即“法兰克”（Frank）一词的转读。转来拐去，发生音变，到中国就变成“佛朗机”了。

公元1613年，曾德昭在耶稣会的派遣下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的南京。

初到中国时，曾德昭起了一个汉名叫做谢务禄，从事传教活动。可是，他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却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公元1616年爆发的南京教案不仅使曾德昭被官府逮捕，还使他在监狱中饱受酷刑。当时，他被关在木笼中，手上有沉重的木枷，脚上有沉重的铁链，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就这样足足忍受了1个月。之后，他被官府押送到了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公元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权力；公元1553年，葡萄牙以曝晒船上水渍货物为由，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吏，进入澳门居住；自公元1557年起，他们每年须向当地中国官吏交纳一定银两的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住的资格。后来在葡萄牙的胁迫下，公元1623年，葡萄牙政府委任马士加路也为首任澳门总督，自此，澳门有了殖民地的味道。

公元1619年之后，南京教案渐渐平息下来，曾德昭继续回到他的传教活动中来。公元1620年，谢务禄改名为曾德昭，躲过了朝廷的追查，得以重新回到中国内地。他起初在南方的杭州传教，继而前往江西等地，后来来到了西部的西安府。

公元1637年，罗马教会召回曾德昭，命令他召集新教士再次前往中国传教，以便迅速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曾德昭回到欧洲后，向罗马教会详细叙述了他在中国传教20多年中所经历的灾难，激起了众多传教士对明王朝的愤怒，并使更多传教士愿意来中国传教。当时，仅罗马高因伯和厄瓦拉两会院就有90多名教士自愿来华。为了表示自己的热

诚，他们在来华之前咬破手指用鲜血署名。

曾德昭再次返华的时候，正是明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明清军队在南方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负责管理中国传教事务的司铎身处北方，他发布的消息无法及时传播到南方，因此罗马教会委任曾德昭司铎为副省会长，管理南方地区的传教活动。后来曾德昭来到广东的肇庆传教。当时，永历皇帝正在肇庆避难，便接见了曾德昭。曾德昭曾在皇帝、皇后和朝廷大臣前举行弥撒圣祭。他还向永历皇帝许下了派司铎回欧洲，请公教国王的援兵帮助明朝复国的诺言。但在清军的包围之下，司铎一直没有被派出去。

公元1651年，清兵向广州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广州城危在旦夕。曾德昭率领部分信众在圣堂内祈祷。当时的情势已经十分危急，可他没有丝毫的恐惧。很多信徒在逃走之前都劝他赶快撤离，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在兵荒马乱之中，他忽然想起了还有一个曾经听他宣教的人尚未领洗，便不顾外面的炮火出去寻找那个人。洗礼完成之后，他才回到教堂，对坚守的信徒进行彻夜的告解。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他就举行了圣祭，给众人送圣体，并恭领了剩余的圣体。为了不使清军把圣器抢走，他在举行完这些礼拜活动之后把圣器藏了起来，然后穿上白衣，点燃蜡烛，安然地等待清军到来。

不久之后，一支清军果真冲进了教堂，正想在教堂内展开大肆厮杀，忽然看见了曾德昭专注祈祷的景象，不敢贸然上前。后来一位清军太监帮曾德昭解了围。原来，这个太监认出曾德昭就是在清朝内供职的汤若望的好友，也就没有为难他，准许他在广州自由传教。公元1658年，78岁的曾德昭在广州去世。

曾德昭的来华，不仅为中国的宗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还把属于中国的国粹——围棋，进一步介绍给了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促进了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他在《大中国志》中表述道：“他们当中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棋，有如下述：棋盘有三百格，用二百个棋子玩，一百是白的，一百是黑的，双方都尽力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中央，以便控制其他地方，结果是谁占的地盘多，谁就赢棋。官员玩这种棋以消磨时间，娱乐消遣，常常要花大半天时间玩它，因为在高手之间，一盘棋就需几个小时。善于下这种棋的人很受尊敬，下棋是他唯一的本领，因此他们被称为棋师，常常接受盛情的接待和邀请。”他对围棋的描述比利玛窦描述得更加准确、详细，这样就勾起了欧洲学者对围棋的强烈兴趣，刺激了他们想亲身来到中国的强烈愿望。这对中国来说，本应该是件好事，然而清统治者上台之后的闭关锁国，却让好事变成了坏事。

2. 古今奇闻：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作为基督教入华后第一次大规模中西文化冲突的标志而载入史册。曾德昭就是南京教案的亲历者。

曾德昭来华的万历年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大规模传入时期。

历尽辛苦的利玛窦使传教士获得了在华居留传教的许可后，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好景不长，利玛窦去世后仅6年，来华的传教士就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这就是1616年爆发的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的爆发有多种原因。首先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其次，一些传教士不恰当的传教方法也激化了矛盾。另外，风云变幻的明朝后期政局也是教案爆发的重要原因。

万历皇帝晚年不理朝政，政治日益腐败，国家统治陷入困境，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期。国家内部政治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政治派别凸现出来。其中，势力最大的两个政治派别就是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和以浙党为首的反东林派。这两股

势力的碰撞,使得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为名副其实的牺牲品。

曾德昭等传教士与东林党士大夫清流派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些士大夫在曾德昭那里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想回去在民间传播,以期有助于挽救国家的多重危机。就因为这个原因,曾德昭等传教士遭到了反东林派的打击。若是东林党能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取胜,曾德昭的前途就会跟着一起光明。可惜的是,反东林派逐渐占据了上风。为了打击东林派,反东林派把外国传教士也列入了铲除的对象。1616年,反东林派官员南京礼部侍郎沈惟利用政治形势的变化,将矛头指向了西方传教士和西学,说他们从外国引进淫技扰乱国家根基。一听这个,皇帝再也坐不住了,南京教案就此发生。作为南方副省会长的曾德昭难逃牵连,饱受囹圄之苦。

沈惟这个人值得说一下。

他本来在北京任职,被派往南京之后心中很是落寞。在南京上任不久就发现了曾德昭等人的“不轨”行为。于是,他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对南京的传教士进行治理,以讨好反东林派势力。此外,沈惟本身也是一个佛教徒,对基督教很排斥。南京当地的佛教徒对迅速发展的天主教也十分仇视,曾经花重金贿赂沈惟,以铲除天主教。这些都是沈惟向传教士发难的原因。起初,他的上奏并没有被批准。但是他不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地搜罗证据上奏。公元1616年,他在《参远夷疏》中写道:“远夷阑入部门,暗伤王化,恳乞圣明申严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事……职闻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纪纲,持纪纲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此所谓一道同风,正人心而维国脉之本计也。”在奏章中,他以保守的“夷夏之防”说诬陷传教士以“天主”与大明相抗衡。此外,沈惟指斥天主教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沈惟认为传教士用天主教不祭祀祖先的教义说明传教士的不

孝,并把这种不孝延伸到传教士蛊惑百姓消除君臣观念上。于是,沈催把所有的问题都与明王朝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了一起。

在沈催的蛊惑下,万历皇帝下令查抄教堂、拘捕传教士。当时,留在南京的传教士只有曾德昭和王丰肃。沈催带兵包围了教堂,搜索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曾德昭正处在重病之中,卧床不起,但沈催并没有放过他。官兵先带走了王丰肃,把曾德昭关在教堂内的一间屋子里。没过多久,曾德昭也被沈催派来的官兵抓走投进了监狱。曾德昭由于身负重病,受到的刑罚还算比较轻的,但也经受了连续长达6小时的审讯。公元1617年,曾德昭被关在木笼中从南京押赴至澳门。押赴的队伍走了30天才到达广州。这30天中,曾德昭全是在木笼中度过的。

曾德昭在经受了这样巨大的打击后并没有失去信心,在澳门一直等待着再次进入内陆的机会。公元1621年,明熹宗继位,连遭打压的东林派东山再起,西方传教士才得以卷土重来。曾德昭也在这时再次来到内陆传教,继续他的传教生涯。

传 奇

煌煌中华,唯我大明天朝气象

公元1636年,曾德昭在第一次来华返回欧洲的路途中写下了著名的《大中国志》。在第一次来中国的22年中,他跨越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朝代,他写的《大中国志》生动地把中国明朝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史实和社会发展状况记录了下来。

提起明朝的后期,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可是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呈现给后人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他的笔下,当时的社会处在富裕与繁荣时期,在很多方面依然领先于世界各国。曾德昭描绘的明朝甚至比100多年之后马戛尔尼

笔下的“乾隆盛世”要富裕得多。那么,在曾德昭的印象中,当时的明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从他的《大中国志》可以窥见一斑。

曾德昭在华活动的地域大多是南方地区。他曾经在浙江的杭州住过较长时间。他记述道:“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八天……一个沙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他描绘的是南京河上频繁过往的船只,反映出了当时商业贸易的繁荣。

在明朝人的生活方面,曾德昭描写道:“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人生活状况还是不错的,他们不仅有充足的粮食,还有丰富的蔬菜与肉类作为食物。他们居住的条件也很好,房屋不仅设计合理而且整洁舒适。

曾德昭对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感到相当震惊,写道:“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 805万至5 180万人。”这里曾德昭记述的5 000多万人口不包括女性、儿童以及大部分流民、商人、文官阶层。因此,照这样来推算,当时的明朝人口数量与中国历史记载的2亿多人基本相符。

明朝广州发达的对外贸易吸引了很多外国商人,曾德昭描绘了广州

的贸易情况,写道:“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 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 200块金锭,此外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曾德昭在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对南京的印象也最深,写道:“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曾德昭来到中国大陆之前,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传教士向他介绍的中国人形象大都无理、愚昧、傲慢。但当他深入中国内地之后,发现中国人的形象完全不是那样。他写道:“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地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做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東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

要利息。”

此外,他对当时明朝人开放心态的一段描述使现代人感到震惊。在现代人眼中,明朝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人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不仅愚昧僵化,盲目自大,而且十分排斥外来的新鲜事物。曾德昭的描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他写道:“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羨,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由此可见,当时的明朝确实是打破了人们心中、从所谓的“正史”看到的那个形象,而是以一个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模样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不论那个时代的景况如何,在一个外国人眼里和他笔下的纪实,多多少少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尊重真实。

当然,曾德昭著述的《大中国志》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所居住的地区大部分在南方,因此描述的情况也大都是江南一些发达地区的情况,不能完全代表当时中国的总体情况。但《大中国志》为欧洲人打开了探访中国的又一扇窗,吸引着更多的商人与传教士来华。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除了记述明朝人的生活、贸易等情况外,还描绘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他是继利玛窦之后把道教传入欧洲的另外一名传教士。他认为道教的信仰者大都擅长音乐,精通几种乐器。他们经常被请去为一些大户人家作祭祀和丧事,甚至还在皇帝的祭典上担任重要角色。但曾德昭对道教似乎有一定的偏见,他认为那些道士没有什么本事,却假装为术士,进行祈雨或驱赶作祟鬼神等活动。

曾德昭对道教的描述要比利玛窦的描述更加具体详尽,内容涉及到了与道教相关的音乐、服饰、仪式等。他记述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当时道教的发展情况相符,但也存在一些片面性,如他记述的道教的独身制度。事实上,中国道教中只有全真教才实行独身制度。

尽管曾德昭对道教的记述有明显的偏颇,但这是在他本身的宗教感情影响下形成的。欧洲人在他的记述中对道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来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道教的传教士。

曾德昭的来华,留给人们最大的疑问就是,他所见到的明朝末年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个致力于文化传播的耶稣教士,一段亦喜亦忧的中国情缘,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波,一篇难分难辨的旅行日志。曾德昭的出现,带来了天主教的蓄势和即将繁荣,也带来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最时髦的文明。也许对于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首富的中国统治者来说,确实不算什么。但是,他们怎么都忘了,当人家都在努力地开创科学的时候,自己怎么能偏安一隅,做起了妄自尊大的美梦呢?

世界,早已不是从前,只有天朝大国的皇帝,还以一副骄傲的神态,在黄粱一梦中紧紧地攥着手中那越来越少的资产。

第七章 清朝时期的外国人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洋监正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1591,一说1592—1666),字道未,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封建贵族家庭。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传教士,并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作为、有成就、有眼光的外国人。他来到中国后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见证了明朝的灭亡、清军的入关、多尔袞的专权、顺治帝的统治、康熙的继位,并在较长时期内得到了统治者的信任。他编制了新的历法、创制了很多天文仪器、著述翻译了很多书籍,为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梦 回

年轻的神父,古老的国家又是一场梦与寻梦的旅程

公元1591年(一说1592年)5月1日,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下,汤若望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少年时,他被家人送到当地耶稣会创办的中学读书。公元1608年,汤若望进入著名的罗马日耳曼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非常刻苦,以优良的成绩结束了他的3年异地求学生涯,修完了哲学课程。

因为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汤若望从儿时起就树立了长大后担任神父的理想。公元1611年,已经对天主教很有研究的汤若望被正式批

准加入耶稣会,并担任了为期2年的见习修士。两年之后,汤若望以其丰富的学识顺利地通过了修士考试,正式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并进入罗马学院,进行4年的神学研究学习。在学习神学理论之余,汤若望还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公元1616年,汤若望学成毕业。他请求耶稣会批准他到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或印度去传教。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的愿望并没有立即实现。公元1617年,在教堂担任神职人员的汤若望因为表现比较出色被正式晋升为神父。

公元1618年,汤若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荣幸地被选为罗马教皇派往中国的22名传教士之一,跟随金尼阁(第一位来华的法籍耶稣会士)一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汤若望与同行的邓玉函、罗雅谷进行了不同的科学考察和研究。他们分别观察天象、风向、海流及磁针指向,确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见的海岸和岛屿的位置,并将研究结果报告给欧洲学术界。

也许有人会对这些神职人员研究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产生一些疑惑,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背叛了宗教神学?

在西欧,虽然一直是神学统治着社会,但同时他们也相当注重科学。其实不仅如此,中国的神学人员除了研究佛法道法外,因为修行的需要,也是要远行的,为此他们会多多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只是,他们的学习纯属自觉,和外国的教会半公开地支持科学发展是不一样的。

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在科学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们与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同为知名的罗马灵采研究院院士。能够与伽利略平起平坐,足可以看出他们在科学方面的素养之高。

经过1年多的航行,汤若望终于到达了澳门,并在那里进行了两年多的传教活动。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朝末年的动乱之中。公元1622

年,他辗转来到大陆北上到达北京。为了使传教活动更为有效地进行,他到北京之后首先花费了一段的时间与精力学习汉语。在学习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曾三次准确地预测了日食。这件事情一传出去,汤若望在北京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很快赢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敬与支持。公元1627年,他被派遣到陕西西安等地传教。在进行传教的同时,他十分注重研究与总结从欧洲经由陆路来到中国的通道,同时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放在喜欢的天文学上。

汤若望认为,要想让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尽快发展,说服统治阶级信奉天主教是最简单易行的一个方法。如果皇帝都信奉天主教了,那么下面的臣子和人民也必然会热衷于天主教。此外,他还认为如果一旦皇帝接受了天主教,就必然会采取一些保护天主教的措施,这对天主教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他的努力下,宫廷中已经有妃嫔50人、太监40人、皇族140余人受洗加入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在当时的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公元1638年,汤若望上书奏请崇祯皇帝赐予天主教“钦褒天学”四字。此后,崇祯皇帝又赐予过天主教“旌忠”、“崇义”金字匾额各一块。崇祯皇帝赐予的牌匾被汤若望分别送到了下面的各天主教堂悬挂。

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占领北京后,汤若望并没有撤走,而是继续在钦天监中就职。在他心中,无论谁做皇帝都阻挡不了他研究科学与传教的决心。

汤若望的安稳日子没过几天,战争又追着过来了。李自成兵败如山倒,清军的铁骑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北京。

清军入关后,多尔袞控制了整个北京城甚至大半个中国。多尔袞十分爱慕汤若望的才学,不拘一格留他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受宠若惊,曾经多次上表拒绝多尔袞的安排。但是,多尔袞执意要让汤若望

担任这个职位。汤若望认为担任清朝的官职会更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就同意担任监正。但他声明只负责钦天监的历书编纂事宜，一些违背天主教教义涉及迷信的东西一概不负责。他在中国传教时享受到的待遇要比在德国或意大利好很多。汤若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名外国监正。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画像

汤若望在钦天监监正的职位上做得非常好，受到了顺治皇帝的赞赏。顺治皇帝下旨命令一些清朝的学生向汤若望学习一些科学技术，并且册封汤若望为太常寺少卿。顺治帝亲政后，对汤若望更加宠信了，经常与他在一起谈话，听他讲述一些西方的事情，还敬称他为“玛法”。“玛法”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神父的意思。公元1651年，顺治帝册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并赐号“通玄教师”。公元1657年，汤若望再次被册封为通政使司通政使，成为满清朝廷内的一位股肱之臣。汤若望担任这些官

职的时候,仍旧兢兢业业,没有丝毫的懈怠,受到了顺治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一致好评。公元1658年,顺治帝册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恩赐祖先三代、一品封典。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实属罕见。

在朝廷内担任官职的同时,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宗教信仰,没有忘记此行来华的目的。官职不但没有羁绊住他的身心,反而更有利于传播天主教。在他的努力下,清廷批准外国传教士可以分批来到中国公开传教。于是,清朝初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天主教。

公元1664年,年近70岁的汤若望由于受到了朝廷重臣杨光先的陷害而被打入死牢,拟被凌迟处死,刑期定在第二年。公元1665年,京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朝廷大赦天下,汤若望也被免除了死刑,但仍被羁押在大牢之中,后来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下得以出狱。公元1666年,年迈体弱、饱受囹圄之苦的汤若望突然患病,口舌结塞,不久之后就在京城去世了。在另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的努力下,清廷终于在公元1669年为汤若望洗清了罪名。

在中国长达50年的生活,使汤若望有很深的儒学基础。他不仅精通民间常用语言,就连那些晦涩难懂的古文也能轻松阅读。为了不使自己的学识落后,他经常请欧洲的朋友邮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通宵达旦秉烛夜读。除了精通天主教义,他在教会法律学与国家法律学、圣经学、教会史等方面也有很深的研究。晚年时他变得固执己见,经常讪笑讥讽他人,在朝廷内树立了一些敌人。因此才引发了入狱事件。出狱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集结成书,以警示后人。

汤若望的墓碑上用汉满两种文字刻载着他的墓志铭:“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这首墓志铭不仅表达了汤若望对中国君主的感怀,也表现出了他对天主教的敬仰。

传 奇

1. 来中国的西方人个个都是科技全才

汤若望不仅对中国的宗教事业有突出的贡献,在中国的历制改革方面的贡献也很大。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很多,政府对这些传教士礼遇有加的原因并不是器重他们宣扬的宗教,最主要的是看中了他们带来的科学技术。这些传教士一般都有很高的科学素养,大部分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是名副其实的欧洲精英。

其实,欧洲的教皇也正是因为这些人有科学素养,到中国后可能会受到统治者的重用才选取他们远赴中国的。教皇认为传教士被统治者重用就必然有利于宗教的传播,他的想法一点都没错。事实证明,凡是欧洲来的传教士个个聪明绝顶,学识丰富,品性纯良,在社会上很快就能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使传教活动成为可能。

令人惊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否一直都在盛产着全才人物,达尔文如是,达·芬奇如是,派到中国来的汤若望如是。

汤若望在天文、历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来到中国后,就准备制定一套更为先进的历法。

明朝末年,朝廷使用的是《大统历》、《回回历》。这两种历法的历史都较为久远,按照历法推算出来的日期差错越来越大,按照这些历法推测的天象已经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了。面对这种情况,明廷命令徐光启负责对旧有的历法进行修订。汤若望来华后不久,就与徐光启结成了好朋友。这位外国人在科学方面的精深知识令徐光启十分佩服。因此,当他接到皇帝的圣旨后第一个想到能够帮助他完成此项任务的人就是汤若望。于是,他马上上书请求朝廷准许汤若望加入到修改历法的活动中

来。公元1630年,远在外地传教的汤若望奉诏赴北京,供奉钦天监。

汤若望与徐光启一边译书撰表、制造仪器、测算交尺度,一边向中国钦天监官生授课,以增加编纂《崇祯历书》的人手。汤若望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认同。明廷采用汤若望带来的西方推测日月食的方法推算历书,并屡次得到验证。崇祯皇帝本来很怀疑汤若望的推算是否准确。当他推算的三次日食都准时地出现后,崇祯皇帝就认为西方的方法更为精确,并准备让他们根据西方的方法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历书。可是,历书的制定工作还没正式开始,明朝就在李自成的起义军与清朝军队的夹攻下灭亡了。在战乱中,汤若望的历书编制工作耽搁了下来。

这一拖就拖到了清朝。

清军人关定都北京后,汤若望因为历法方面的学识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上奏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及已刻《崇祯历书》书版。他在奏章中写道:“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多尔衮认为汤若望修订的历书确实比较先进,只是名字和一些具体细节尚待修正,就命令汤若望继续修正立法,并改名为《时宪历》,在全国颁行。因为这套历法是在顺治二年颁行的,因此也被称为《顺治二年时宪书》,历法的正面有“依西洋新法”五字。

后来,汤若望又根据中国人民使用历法的特点对历法进行了修订。他向多尔衮上奏道:“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今节气、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增加历首,以协民时,利民用。”多尔衮十分赞赏汤若望这种力求精确的精神。这年8月,按照新法的推算,应该出现日食。多尔衮为了检验新法的准

确程度,就派遣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那天,在新法预测的时辰果然出现了日食,而《大统历》、《回回历》都没有准确地预测出。

汤若望把西方天文学、光学、火器及矿冶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并亲自发明了一些工具仪器,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因此他也被评为明末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

首先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在修订历法期间,他曾经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如浑天仪、天球仪、日晷、罗盘、望远镜等。这些天文观象仪器为当时的天象观测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一直延续了很多年。汤若望在科学方面的著述很多,具体可分为几种,如法原,也就是天文学理论;法数,也就是天文表;法算,也就是天文学计算中必需的数学知识;法器,也就是天文仪器知识;会通,也就是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等基本五目,以及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会、五纬星、五星交会等。为了增强书籍的实用性,他在著述中穿插了很多解、术、图、考、表、论等。他在书中还引用了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的新发现,使欧洲的最新天文学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

在修订历法之前,汤若望译著了一部科学著作——《远镜说》。这本书成书于公元1626年,是在中国著名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根据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完成的。他在书中阐述了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的结构、原理、功能、制法、用法等,条理清晰、浅显易懂、图文并茂。这本书是中国出版的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最早论述望远镜的专著,也是中国出版的最早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也曾留下过汤若望光辉的一笔。明朝末年,明王朝在起义军与清朝军队的夹攻下屡屡败退。为了扭转战局,明廷决定

制造一些火炮。崇祯皇帝把监制火炮的任务交给了汤若望。为了把火炮造得更好,他详细地阅读了西方的火器著作《火攻挈要》。公元1636年,他带领铸造成功了可发射40磅重炮弹的大炮20门。后来,他与焦勳辑将《火攻挈要》翻译成了汉语,并在公元1643年出版发行。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流行的各种火器的制作方法,还附有40幅“火攻挈要诸器图”。

为了加速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他还与一些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于公元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中译本定名为《坤輿格致》。崇祯皇帝见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当即就御批:“发下《坤輿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除了以上成就外,汤若望还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曾经奉旨把明朝收藏多年的西方进贡得来的钢琴进行修理和调音,并写了一篇关于钢琴的文章,向明朝人解释钢琴的用途。之后,他还曾设计制造了起重机械,可将重达数万斤的大钟毫不费力地吊起悬挂。他设计制造的一条双桅帆船,可以供皇帝在北海游航和捕鱼。此外,他还是一位建筑师,按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建筑式样设计了教堂,甚至设计边防要塞的图样。

这个时期的汤若望,全才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2. 清宫沉浮谁主

汤若望不仅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人际关系学家。

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的交往成为史学界的一段佳话。顺治皇帝不仅从这位外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西洋科学知识,还接受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建议。在顺治皇帝的支持下,汤若望把天主教的教义迅速传播开来,同时也在科学方面有了更多的发明、创造。顺治皇帝与汤若望的亲密关系最初缘于皇室成员的一场重病。

1651年5月,孝庄皇太后最疼爱的一位侄女不知什么原因得了一场怪病,经过多方医治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孝庄皇太后因此而闷闷不乐。顺治皇帝见母后整日烦恼,想到朝廷内有一个学识渊博的西洋传教士,便把他找来。汤若望并没有对这种怪病下任何药物,只拿出了一面十字架,嘱咐挂在病人的胸前,祈祷上帝保佑,疾病自会退去。没过多久,孝庄皇太后的侄女果然好了起来。皇太后十分高兴,不仅对汤若望赐以重赏,还向他要了一面十字架挂在自己的胸前,以支持他的传教活动。

顺治皇帝亲眼见到汤若望传播的天主教的神奇作用,就与他的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之前,汤若望虽然已经在朝廷的钦天监任职,可是顺治与他并没有过多的交往。汤若望只是负责天文历法方面的一些事宜,官职并不算高。此后,顺治任命汤若望为自己的私人顾问,尊称他“玛法”,从他身上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汤若望在朝廷中的地位一天天显赫起来。

此外,汤若望甚至还阻止了一场清王朝即将面临的灾难。公元1659年,郑成功因为反对清朝的统治而率水师10余万北上,经舟山溯长江,连克瓜洲、镇江等城,兵临南京城下。郑成功的进攻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年轻气盛的顺治皇帝得到战报后当即就准备南下亲征,并严令不许文武大臣谏阻。顺治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不成熟的,倘若他在战争中有所闪失,清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会马上凸显出来,很可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在危急时刻,满朝文武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汤若望的身上。当时,整个朝廷的气氛十分紧张。汤若望知道自己进谏,阻止顺治亲征很可能有丧命的危险。但他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把当时的形势详细地分析给顺治听。他分析得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最终使顺治放弃了南下的打算,改为派大将出征。

公元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失去爱妃的痛苦中患天花而去世。姑且不说顺治皇帝扑朔迷离的死因,只说康熙皇帝的继位。康熙皇帝的继位与汤若望有很重要的关系。顺治去世之前,曾在二皇子与三皇子之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汤若望向他建议三皇子聪明稳重,是新君的最佳人选。顺治才下定决心把皇位传给三皇子。三皇子继位后就是康熙。

康熙继位时,只有8岁,当时把持朝政的是鳌拜及其党羽。顺治驾崩之前,他们已经对汤若望在朝廷中的地位十分嫉妒。他们曾经针对汤若望的一些工作遗漏,在顺治帝面前参奏过他。公元1557年,钦天监的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首先上疏,诬陷汤若望推算错误。之后,又有人举报汤若望编制的历法颠倒觜参(觜宿、参宿,两星名)、颠倒罗计(罗喉和计都的并称,印度占星术名词)。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历法十分重视,认为星象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顺治皇帝命令内大臣及各部院大臣到观象台监测,以验证汤若望的历法是否有错误。验证结果对汤若望很不利,但顺治皇帝并不想因此而置他于死地,再加上其他大臣的求情,汤若望最终被赦免。

顺治皇帝去世后,朝廷中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很快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汤若望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何况在他身边的并不是一只虎。他们随时注意着汤若望的一举一动,企图抓到什么小辫子。汤若望只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传教士,并没有什么名利观念。当时除了鳌拜势力集团极端仇视汤若望外,苏克萨哈也因为极端仇视天主教而被称为“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但是,那时他们的羽翼还都未丰满,因此并没有直接出面弹劾汤若望。此时汉官杨光先成为反汤若望势力的代表。这个人在明朝时十分落魄,后来不知怎么和鳌拜搭上了关系,在鳌拜的指使下向汤若望发难。公元1664年,杨光先参奏

汤若望在新的历法书上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认为是对清朝的侮辱;参奏汤若望的历法只推算了200年,有诅咒亡国的嫌疑;上疏参劾汤若望所著的《摘谬论》、《选择议》的书籍有很多荒谬之处;参奏汤若望在主持荣亲王葬礼时不选用正五行而采用洪范五行,以至于使荣亲王的母亲董鄂妃因为受了冲撞而在不久之后去世。

他们以邪说惑众、潜谋造反、历法荒谬等罪名将汤若望罢黜并被囚禁入狱。由于年迈,汤若望已经不能对自己进行辩护,只能请与他一同入狱的南怀仁代为辩护。负责审查汤若望的大臣与鳌拜是一丘之貉,有心置汤若望于死地,对他的辩解根本不予理睬。公元1665年,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处死。似乎是上帝庇护,汤若望因为一场地震而幸免于难。这年4月,京城发生了地震,宫廷失火。满朝文武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请康熙皇帝大赦天下。汤若望被判处的是凌迟处死,本来不在赦免的行列。但他受到了孝庄太皇太后的关注,她趁机谕令开释了汤若望。鳌拜等人虽然对此非常不满,但也不敢公然与太皇太后对抗,只得把汤若望放了出来。但是,汤若望编制的已经在清朝推行了20多年的《时宪历》却被废弃不用。从此,清朝又回到了使用《大统历》、《回回历》的时期。公元1666年,汤若望在伤心失望中离开了人世。

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开始亲政。他不仅为汤若望平反,还赐银500多两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康熙亲自书写了祭文:“汤若望鞠躬尽瘁,恤死报勤,朕悲其长逝,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后来,康熙还与孝庄太皇太后带领满朝文武亲临墓地悼念汤若望。一个外国人死后能够得到中国皇帝的亲自祭奠,中国历史上恐怕为数不多。

汤若望的一生可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比较开明的顺治朝。清初的统治者,起初并不排斥外来文化,但是,他们对于欧洲的

先进科学技术,都是把它作为个人兴趣爱好来学习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念之差造成的后世悲哀。

横向比较来看,清军人关并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迅速发展,并向外部扩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开始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时候。清军人关后,面对一大堆混乱的场面,不知道是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照多尔衮和清初几任皇帝的开明程度来看,他们未必没有认识到。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当前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广大的中国大地。

清初,汤若望的到来,其实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可惜,那个时候接手天朝上国的满族,觉得自己补习中原文化尚且困难,再加上传统的中国中心论,没有严厉打击西方文明已经算是开明,怎么还能畅销呢?

朝廷中很多人看不惯汤若望,一方面是嫉妒他的才华和地位,但更是因为他的到来妄图改变“祖宗历法”,因此才搞出了董鄂妃是被五行克死的怪异事件,这充分体现了双方世界观最大的冲突。汤若望事件只是排斥西学的一个苗头,历史给了中国很多机会,但可惜的是,中国人都错过了。

第二节 献身中国的科学奇才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南怀仁(1623—1688),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普通家庭,是清朝初年来华的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之一。从公元1658年到达澳门至公元1688年去世,他共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南怀仁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还

中国,制造了天文仪器、火炮、地理仪器等,著述了很多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他在清朝的立法改革、平定叛乱以及外交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梦 回

“勤敏”的外来传教士

南怀仁从小聪明好学,虽然家境并不是很好,可是由于父母的开明,坚持让他读书。南怀仁先在比利时的文化名城布鲁日读了1年书,后来到了库尔特攻读4年,毕业后又到卢汶攻读了1年的哲学课程。从卢汶毕业后,南怀仁已经是一位对科学、哲学等都有一定见解的青年了。就在他准备计划自己的人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对基督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这种喜爱一发不可收拾,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公元1641年,南怀仁如愿以偿地进入耶稣会,并兼任马林学院拉丁文和修辞学教授。在5年时间内,南怀仁一面授课,一面利用空闲时间学习神学课程。

公元1654年,南怀仁被比利时的耶稣会派到罗马专攻神学,后来又到了西班牙学习。不过,到美洲传教一直是南怀仁的梦想。为了达成愿望,他两次在西班牙乘船赴美洲,但都因为遭遇海上风浪而没能如愿。公元1656年,南怀仁被耶稣会派遣与卫匡国神父一起去中国传教。

漫长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首先从意大利的港口热那亚出发,但是船刚刚行驶到地中海就碰上了烧杀抢掠的海盗。所幸南怀仁等人并没有因此而丧命,而是被同伴用重金赎了出来。脱险后,南怀仁从地中海出发,继续向中国前进。公元1658年7月,历尽艰辛的南怀仁终于到达了澳门。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公元1659年,南怀仁被派往中国内地的陕西传教。

尽管南怀仁来华不久,但他在科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在中国的科学界享有盛名。在陕西活动了1年左右的时间,南怀仁就被清廷召到北京,协助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从事天文历算工作。

公元1666年,南怀仁同样没有逃过那场由杨光先发起的诬告事件,与汤若望等人一起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他表现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勇敢与无私:他在自己身陷囹圄跪地受审的情况下还帮助年老体弱的汤若望辩护。在这6个月中,因为他比其他几位传教士年轻,所受的刑罚也最重。杨光先等人几乎天天提审他,动不动就对他施以酷刑,但他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在狱中,南怀仁除了每天做定期的祈祷外,还经常为同监的狱友讲授教义,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

公元1669年,正式亲政的康熙皇帝将已被囚禁了3年多的南怀仁无罪开释,命他在钦天监任职。康熙是一位非常热衷于西学的皇帝,南怀仁在科学技术方面又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康熙与南怀仁就慢慢熟悉了起来。当时,有很多传教士因为教难被驱逐、流放到了广州。南怀仁得到康熙皇帝的再次信任后,就开始致力于使那些被流放的传教士回归内地。

鳌拜虽然已经被除掉,但是他的党羽还在。康熙皇帝为了除掉鳌拜的余党,就下旨准许那些遭受磨难的传教士向朝廷陈诉。南怀仁抓住了这个时机,与其他两位神父一起参奏杨光先等人僭越大权、假公济私,对来华传教士进行诬陷一案。康熙皇帝接到奏章后当即就命令相关各部及王公大臣对这件案件展开深入的调查。经查明真相朝廷认为天主教并没有违反国家利益、违背庶民职守。同时,康熙准许原来被驱逐或流放的传教士回归内地进行传教。

南怀仁在宗教、科学、军事、外交等方面为中国作出了贡献。他甚至帮助康熙皇帝平定过三藩之乱。在南怀仁修复的大炮的协助下,清军渐

渐扭转战局,并最终平定了叛乱。

南怀仁还负责过清廷一些较大的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等。在清廷担任官职的同时,南怀仁从来没有停止过传教活动。他在宗教方面的著述很多,如以浅显明白的文字概述天主教的《教要序论》;以问答体裁解释人世善恶赏罚问题的《善亚报略论》;解释有关告解、天主教性质与重要性的《告解原义》;解答关于圣餐问题的《圣体答疑》;关于天主教的史实以及来华传教士的名录、传略的《道学家传》以及《天主教丧礼问答》等。其中《教要序论》是南怀仁宗教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经过多次刊印,直到1930年仍有刊印。在这些著作中,他宣扬了天主教教义、教规和宗教仪式等,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和了解了天主教。

1676年,鉴于南怀仁在传教上的突出贡献,耶稣会任命他为中国的耶稣会副省会长。1688年,久病的南怀仁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享年65岁。从年轻时代来华到去世,他共在中国居住了长达29年的时光,把自己对基督教的虔诚、对科学的热情全部奉献给了中国。

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十分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派遣官员前去祭奠,并致祭文,称颂南怀仁“尔南怀仁,秉心质朴,肆业淹通。……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可谓莅事惟精,奉职弗懈者矣。遽闻溘逝,深切悼伤。追念成劳,易名勤敏”。“勤敏”是康熙皇帝册封给他的谥号,从中可见康熙对他的评价。

此外,南怀仁担任的官职也是众多来华传教士中最高的,为“钦天监治理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级”。一个外国人能够得到中国杰出帝王如此重用,十分罕见。

1. 入主钦天监

南怀仁在天文历算方面对中国的贡献非常突出。1669年,康熙皇帝任命刚刚出狱不久的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几个月之后又命令他管理所有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事宜。

出狱后不久,南怀仁就撰述了一本《历法不得已辨》。在这本书中,他逐条驳斥了杨光先等人在历法方面的错误。同时,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他在这一年还著述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等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

主管钦天监后,南怀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造观象台,把那些先进的西方天文仪器应用到观象台之中。经过4年多的努力,他在公元1673年成功制造了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并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这六件天文仪器分别是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这些仪器是在西方机械加工技术和中国铸造技术基础上完成的,不仅造型精美,而且非常实用。它们提高了中国天文方面的观测水平,有利于近代天文学的发展。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历史见证,这些天文仪器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此外,南怀仁还制作了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多种天文仪器,并著有《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和《简平规总星图》等天文学书籍。南怀仁把制造和安装天文仪器的步骤、经验详细地记述了下来,绘图立说,在公元1674年出版了《新制灵台仪象志》。

《新制灵台仪象志》第一部分介绍新制成的六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其中包含了西方近代早期的许多科学技术知识。第二部

分是天文测量数据,也就是全天星表,包括1366颗星、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等。第三部分是117幅图,被称为《新制仪象图》或《仪象图》。

刚刚完成对观象台的改造,康熙皇帝又交给了他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编制一本详尽、准确的涉及未来2000年的历法。公元1678年,《康熙永年历法》编撰完成。这本历法实际上是一部天文表,包括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及交食等八个部分。与每一部分相对应的是某一天体在未来2000年的星历表。天文学家根据星历表上面的数据,就可以轻松地推算出中国的农历。

《欧洲天文学》是南怀仁一生众多天文学著作中最著名的一本。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详尽地阐述了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应用发展以及他本人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他早年编制的《测验纪略》、《仪象志》、《仪象图》等经过修订之后被收录到了《欧洲天文学》之中。此外,这本天文学著作还包括数学、物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书籍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历史性记述,反映了欧洲天文学在康熙时期重新得到承认和发展的过程。第二部分记述南怀仁本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数学和力学等方面的活动。他从日晷仪原理和制作、弹道学应用、造炮、输水技术、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学、静力学、流体静力学、水力学、气体力学、音乐、钟表制造技术、气象学等众多方面,阐述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有力地帮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是南怀仁一生的结晶所在。

2. 平定三藩的重要功臣

古代中国人在评定一个人的贡献的时候,比较习惯于看这个人的军功。比方说,双方交战的时候,功劳的大小会以那个人马背上挂着的敌军脑袋为准。汉初大谋臣张良这个像神灵一样的人,论功排名却排在了莽撞的樊哙后面,就是例证。

公元1674年,发动三藩叛乱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军队中拥

有大量的先进火器,而清朝军队的装备却相对落后。康熙皇帝虽然派遣了众多军队前去增援,但仍然无法扭转战局。因为吴三桂盘踞在山区,清军依靠刀枪根本无法损伤其皮毛。面对这种情况,康熙皇帝迅速召集朝臣研究对敌策略。满朝文武认为只有利用大炮轰炸才可能挫败叛军。

然而,清军中当年汤若望负责制造的一些火炮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不能使用。为了增强清军的军事力量,南怀仁奉命铸造新炮。公元1674年,经过将近一年的试制,南怀仁按照西洋火炮样式制造的新炮试制成功。这种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炮弹仅为3斤,炮身总重1000斤,便于在行军中运输。这种火炮的命中率非常高,试射的100发炮弹有99发都击中目标。此外,火炮的威力也很大,炮弹能够穿透10多厘米厚的木板。火炮一制造出来就被送到了平定三藩叛乱的前线。此后,他又在两年的时间内先后铸造了大炮120门。南怀仁负责修复和制造的火炮在清军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就是平定台湾。康熙为平定台湾做了充分准备。公元1680年,他命令南怀仁在原有火炮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制造一些更先进的大炮,以适应海战。南怀仁监制了神威火炮320门。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发动了平定台湾的战争,神威大炮在战争中屡建奇功。公元1682年,因为在制造火炮方面的贡献,康熙皇帝晋升南怀仁为工部右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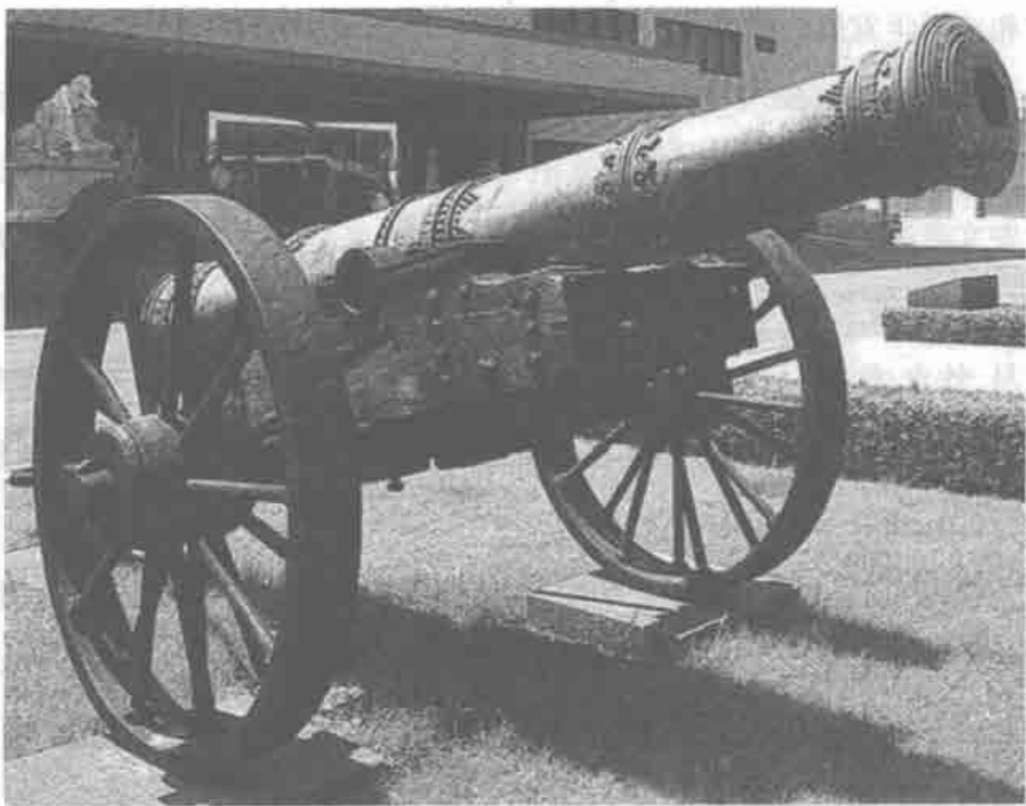
后来,康熙皇帝命令南怀仁制造了一种炮弹重8斤的火炮。康熙亲临试射现场点火试炮。发射的100发炮弹有96发顺利击中目标,其中还有一发落在了前一发炮弹上。南怀仁对这种火炮不断进行改进,使之更加坚固耐用。试炮时连续发射了三四百发炮弹,炮身没有丝毫损毁。康熙非常高兴,当即就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赏赐给了南怀仁。

为了把制造火炮的原理、过程详细地记述下来,以便后人继承传播,

南怀仁还著述了《神武图说》，包括理论、图解等部分。

康熙时期，清朝共铸造火炮 905 门，南怀仁功不可没。他设计的“神威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被选入了《钦定大清会典》。南怀仁使康熙时期无论在造炮的规模、数量和种类方面，还是在制炮的技术和火炮的性能方面，都达到了清代火炮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些火炮在征讨三藩、平定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平定噶尔丹叛乱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南怀仁在制造火炮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高了火炮的准确性。《神威图说》中记载了“神威将军”炮的“准绳之法”。他使用“正对星斗之法”来改正炮偏向的问题，提高火炮的射击精度。此外，他还根据炮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决定炮的仰角，以便炮弹击中目标。



南怀仁奉命制造的火炮为平定三藩作出了巨大贡献(图为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在铸造火炮的同时,南怀仁并没有忘记基督教的教义。本来当康熙皇帝将修铸火炮的任务交给他时,他并不愿意接受,因为他认为火炮是一种杀人的武器,但又不能违抗康熙的命令。于是,每铸完一批炮,他都会在火炮前面供奉天主像进行祈祷,并把天主教中圣人名字刻在上面。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还收藏着南怀仁当年监制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3. 杰出的地理学家

除了传教士、天文学家、武器学家等头衔外,南怀仁还被人们称为“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

《御览西方要纪》、《坤輿图说》、《坤輿外纪》、《坤輿格致略说》等地理学著作、地图是南怀仁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这些著作成为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的标志。

早在公元1668年,康熙皇帝就曾经向外国人询问欧洲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公元1669年,刚刚释放不久的南怀仁向康熙皇帝进献了自己与安文思等人合著的《御览西方要纪》。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涉及了欧洲的国土、路程、海舶、制造、西学、服饰、风俗、法度、交易、饮食、医学、城池、兵备、婚配、教法等众多内容。为了征得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他还在这本书的末尾强调天主教的作用,并对康熙皇帝的礼遇表示了感谢。

《坤輿图说》是为解说《坤輿全图》而撰写的,于公元1674年成书。南怀仁在书中记述了地体之圆、地球南北两极、地震、潮汐、风雨、亚欧大陆和大洋洲的各国各岛等情况。此外,书中还有23种动物图画以及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图等。

《坤輿全图》是南怀仁在木质的两个半球组成的圆球上绘制的地图,于公元1674年绘制完成。地图的东半球为亚洲、欧洲和非洲;西半球为

北美洲和南美洲。整个地图分为八部分,其中东西两半球各占三部分,文字注记占两部分。南怀仁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图方法——球极平面投影法,按照1:1700万的比例将地图制成。地图与现在的地图极为相似,上面有本初子午线、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等主要经纬线。注记文字主要是对自然现象,尤其是气象现象以及海洋中几十种珍奇动物的阐述。此外,他还用文字注记解释了因地球是球体,按照一定规律转动而形成的各种自然现象,如潮汐的周期性消长,雨和云系大气中水汽凝结而成,风和公海上影响航行的季风、空气的运动等。他借此批评了当时中国人对月食、地震等自然现象的错误理解。《坤輿全图》与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成为来华传教士绘制的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地图。

南怀仁还发明了一种专门测量两地距离的工具——里程计和另一种专门测量经纬度的工具。他在书中具体描述了这种测量经纬度的仪器的使用方法。在随乾隆皇帝巡行天下的时候,他曾经在沿途测量了各地的北极高度。这些初步的测量工作为后来绘制地图进行的大规模测量奠定了基础。此外,南怀仁还负责测量过京城内外牌楼街道的高低工作。

4. 南怀仁造就的机械神话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和《穷理学》两部著作中,阐述了西方的物理力学,如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以及一些简单的机械知识。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些光学方面的知识,如光的折射和色散等。从他的这些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怀仁还是一位在机械方面很有研究的机械学家。

《穷理学》成书于公元1683年,共60卷。南怀仁依据“格物穷理”的理念,将以往关于机械方面的中西方书籍进行了总结概述。因此,这本书是当时机械方面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南怀仁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天

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藤线等六种简单机械的性质、原理、计算和应用。

只有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南怀仁非常重视将这些机械学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参与了多项清朝机械工程方面的活动。他奉诏到北京后不久,就接受了一项艰难的任务,即设法把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在钟楼之上。这在当时没有任何起重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南怀仁与汤若望却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他们首先对大钟和大钟悬挂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确定了悬挂大钟的具体方案。滑轮是他们选择的最主要工具。这项巨大的工程在公元1661年4月的一天正式拉开了序幕。满朝文武和众多百姓都聚集在一起,看这两个外国人怎样完成这项任务。南怀仁调集了200多名工匠,安放了数量众多的定滑轮、动滑轮等,终于把大钟悬挂到了指定地点。围观的官员和百姓不禁喝起彩来。

公元1669年,南怀仁被康熙皇帝重新起用后不久,就接到了为顺治皇帝的孝陵运送制作大石牌坊石料的任务。这件石料的重量恰好也有12万斤。正是由于南怀仁曾经安放过与之等重的大钟,所以康熙才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这件石料被安放在一架由16个车轮组成的巨大平板车上,由300匹马负责运送。但是,这块石料必须经过卢沟桥才能到孝陵。可是,卢沟桥又怎能同时容纳300匹马同时通过呢!即使马匹能够通过卢沟桥,它们形成的共振也有可能把这座百年老桥震塌。

接到任务后,南怀仁立即前往卢沟桥考察。他认为要想让大石顺利通过,就只有采用绞盘牵引法。在他的指导下,负责运送大石的部门很快就制成了特殊的滑轮和绞盘。他在卢沟桥的东西两侧分别安放了6个和12个绞盘,东西两端的绞盘用粗大的绳索相连,每8名身强体壮的军

士负责推动一个绞盘。在滑轮、绞盘、军士的共同作用下,大石顺利地通过了卢沟桥。

此外,南怀仁还进行了中国最早关于汽轮机的试验。他利用具有一定温度和压力的蒸汽推动叶轮旋转,进而带动轴转动产生动力。

5. 中俄外交史上的第一翻译

17世纪中叶,沙俄乘中国明清内乱之机侵占了中国北方的大片领土,严重影响了边疆各族居民的生活,威胁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和台湾之后,开始着手于抗击沙俄侵略。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清军要想赢得对沙俄作战的胜利,就要对敌军的情况有一些深入的了解。于是,通晓多种语言的南怀仁就在中俄的交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公元1676年,沙皇派遣特使尼果赖一行到达北京与清朝进行谈判。沙皇之所以派尼果赖作为谈判特使,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还因为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然而,尼果赖却对汉语一窍不通,这给双方的谈判带来了很大障碍。康熙皇帝想到了他的外国大臣南怀仁,可能与尼果赖有相通的语言,便把他找来担任两国谈判的翻译。

南怀仁果然不负众望,在几个月间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不仅在谈判过程中担任现场翻译,还把双方的官方文书详细地翻译了出来。他将沙皇致康熙的信及提出的12条谈判纲领译成中文,又将中文文件译成尼果赖能看懂的拉丁文。

在担任翻译时,南怀仁还不遗余力地进行传教活动。他希望沙皇能够为传教士开辟一条从欧洲经过俄国到达中国的交通线,并为传教士寻找进入莫斯科的机会。

尽管南怀仁为两国达成一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两国的谈判最终破裂了。此后,中俄两国发动了激烈的边境战

争,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公元1686年,清军取得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重创沙皇军队。沙皇只得派遣了一批使臣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谈判。那时,南怀仁已经身患重病。但他对中俄谈判仍然念念不忘,并对两国的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深知俄国常年在欧洲征战,国力严重受损,已经失去了与中国长期作战的实力。因此,在谈判中,俄国争取的应该是商业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他也知道中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既不要贸易,也不要战争,需要的是领土的完整与边境的和平。南怀仁认为如果耶稣会能够帮助两国实现这次谈判的成功,就必然有利于开辟罗马——俄国——中国的陆路交通。于是,他强撑病体积极参与到两国的谈判中。由于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去世了。幸运的是,他的遗愿被另外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继承下来。公元1689年6月,在徐日升与张诚的努力下,中俄两国终于签署了《尼布楚条约》。中俄边境从此远离战火,安定了下来。

此外,南怀仁还为公元1686年到访中国的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翻译。他为维护中国的和平稳定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南怀仁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经历了南京教案,经历了康熙大帝时期最重要的苏俄战争,并且,把当时西方最为重要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带到了中国,为中国科技发展添上了重要的一笔。但是,尽管他满怀赤诚地想在这片古老的世界里,把自己的“先进”传播开来,成为不世之功臣,最后这个理想还是随着康熙大帝的老去而湮灭在尘嚣中。中外双方的文化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在封建社会,越是古老的文明改变起来越需要时间,越需要教训,越需要天翻地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个基本事实。

从南怀仁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比较严重的冲突:

首先,中外宗教、礼教的冲突。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虽然看上去

对西方文化表示赞赏,并力图加以吸收,但他更是中国文化的“坚决崇拜者”。在满汉关系比较紧张的清初,康熙礼贤下士,想尽一切办法招徕满腹经纶的汉族学者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阶级队伍中来,共同振兴传统文化。对于那些对新政权持敌对态度的汉族学者,康熙也没有为难他们,而是想办法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明确表示支持他们从事《明史》的编修工作。在康熙时代,传统文化有了很多出彩的地方,如《古今图书集成》、《朱子全书》的刊行,《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大型图书的编撰和出版等。康熙的传统政策是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以科举考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以儒、释、道三家思想成为自己立身之根本。后来,这些又成为抵抗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的有力武器。

与皇帝大力提倡的文化不同,西方传教士由于基督教传统比较自由的情况,使他们在儒教控制下的中国无视文化传统和礼仪,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使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习礼仪制度处于对立的境地。经过几次冲突,康熙帝遂于公元171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免得多事”,从此,以前许多传教士的心血付之东流。这个禁令对中国上自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来说有什么影响呢?似乎是根本没有,因为基督教根本没在中国扎下过根来。

虽然禁教的命令几乎中断了后来中西之间的所有文化交往,然而对知识阶层来说,这个命令正与他们的心情相合。尤其是那些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在明末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企图引进西学以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在那个时代,并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心诚意的。然而,大清之后,这一大批知识分子不甘于异族的统治,大都以遗民自居。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而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一种典型的逆反心理。顺治及康熙早期对西方传教士优礼有加,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尊敬,这无疑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极强的刺

激,他们慢慢地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冷漠,甚至是仇视。在他们的带动下,百姓自然对那些破坏老祖宗礼法的洋人没有一丁点好感。到了后来,西方传教士似乎不满足于传教,而是逐步伸手到政治、经济方面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住了,这才有了后来一哄而上震惊中外的“不得已案”,即“南京教案”。

其次,东方科技与西方科技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中国自古就是物阜民丰的天朝上邦,四大发明与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的传播,又使自己盲目乐观了起来。其实,在清初,统治者是十分推崇外来科技的,这从以上许多外国学者在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当时人们把斗争的主要矛头都对准了文化思想,在科学这一方面,倒是矛盾不是很多。可以说,大家还是比较欢迎外来科技的传播的。后来,随着封闭文化和通商口岸,中国的科技已经是江河日下了,等到大门被英国人的大炮打开的那一天,已经是强弩之末,这是后话。但你我宁愿相信的是,南怀仁和其他在清初来的传教士,是抱着真诚的信念来到中国这片古老而陌生的土地的,他们为中国作出的贡献,将不会被忘记。

第三节 康熙大帝的音乐教师

——葡萄牙神父徐日升

徐日升(1645—1708),字寅公,出生于葡萄牙的布拉加省,是一位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神父曾经在康熙皇帝身边长伴36年之久,向康熙教授了很多西方乐理、乐器方面的知识。此外,徐日升神父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忠诚的外交家,为中国的天文历法、外交等作出了贡献。

梦 回

是神父,更是音乐奇才

公元1672年11月,27岁的徐日升来到中国澳门,开始从事传教活动。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刚到中国不久就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接见与重用。这不得不归功于著名的传教士南怀仁。

康熙初年,杨光先发动的教案给中国的耶稣会教会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康熙皇帝亲政后,曾经多次向朝臣们说当年钦天监的故事。在年轻的皇帝心目中,始终认为是历法争议引发的教案导致很多传教士受辱而死。此后,满朝文武慑于往日的恐怖案件,竟然没有一名精通历法的,或是愿意去学习历法的官员。康熙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他一面释放教案时被逮捕入狱的传教士,一面学习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南怀仁奉命接受了向康熙讲授西方科学知识的任务。

一天,南怀仁与往常一样向康熙讲授西方科学知识,无意间提到了音乐。康熙皇帝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王,不仅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在绘画、美术、书法、音乐等众多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音乐十分喜爱。南怀仁见康熙对西洋音乐十分好奇,就向他推荐了自己认识的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说他是精通音乐的好手。另外,还是一位精通天文的科学家。南怀仁话一说完,康熙皇帝非常高兴。眼下手里正好缺少这样的人才,如果自己国家果有其才,怎能不为所用呢?当即,康熙皇帝就命令徐日升进宫觐见。

不过,那个时候的徐日升还远在澳门传教。接到圣旨后,他急忙起程。公元1673年1月,他来到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隆重欢迎。徐日升向康熙皇帝介绍了许多西方乐器,并为他当场演奏了一些。康熙对这些

精美的乐器很喜欢,也很好奇,对徐日升的演奏更为赏识。之后,他任命徐日升随南怀仁一起在钦天监中任职,协助南怀仁治理历法。从此,徐日升开始了在康熙皇帝身边终日相伴的生活,长达36年之久。其间,他从来没有受到康熙皇帝的冷落。

公元1676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在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陪同下讨论中外乐器。兴致正浓的时候,康熙忽然想为难一下徐日升,就命令他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中国古筝演奏一些曲子。康熙为了显示自己的音乐才华,亲自抚筝弹奏了一曲。这也是为徐日升做的示范。在康熙弹奏的过程中,徐日升一边认真聆听,一边动手将康熙演奏的乐曲曲调记了下来。接下来,轮到徐日升上场了。只见他胸有成竹地走到古筝面前,安然坐定,从容不迫地依照记载的乐谱弹奏了起来。在美妙的乐曲声中,徐日升顺利地把刚才康熙弹奏的曲子完整无误地弹奏了出来。康熙对徐日升的表现非常吃惊,不相信他竟然有这样杰出的才能,就又试奏了几首较为生僻的曲子。徐日升与第一次的表现一样,把那些曲子都完整地演奏了出来,屡试不爽。康熙皇帝对徐日升的音乐造诣十分惊叹,称赞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音乐奇才。就这样,康熙把徐日升留用为自己的亲随,还赏赐了徐日升24匹锦缎。

此后,徐日升就正式成为康熙皇帝的音乐教师,教授他一些西方乐理和古钢琴知识。康熙皇帝进步很快。30年后,康熙皇帝已经能够在钢琴上演奏中国乐曲。这不仅需要极高的钢琴弹奏技巧,还需要有将中国乐曲在西方键盘乐器上再现出来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徐日升对康熙在西方乐理、古钢琴学习方面的影响之深。

公元1688年,南怀仁因病去世。此时,钦天监内徐日升的天文造诣最高,也最受皇帝器重。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钦天监监副。公元1689年,徐日升在清廷与沙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谈判中,担任两国的

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690年,徐日升升任为耶稣会视察。当时,浙江的耶稣会分支多明我会(即布道兄弟会)的传教士在兰溪新建教堂时因为多方面原因被浙江巡抚查禁。徐日升上奏康熙皇帝,陈述了传教士在制造军器、办理外交方面作出的功绩,请求康熙能够撤销禁令。在他的努力下,康熙皇帝在公元1691年下令:“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公元1706年,徐日升晋升为耶稣会中国教区副会长,两年之后因病在北京去世。

传 奇

1. 西洋音乐的引进者

徐日升除了精通音律乐理之外,还能够制作很多大型的西洋乐器。来到北京得到康熙的重用后,他曾经奉旨制造一些大型的西洋乐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架大型管风琴乐器。这架管风琴被安放在当时北京的南堂,被清朝人形象地称为“西琴编箫”。演奏时,演奏者不用触按弦,只要轻轻地触动机关,这件乐器就会自己发出美妙的音乐。“编箫”也就是指管风琴的竖管(共鸣管),与中国的传统乐器编箫在造型上极为相似,所用原理也基本一致。小的管风琴的竖管有几十根,稍大的有数百根,最大的有数千根。竖管的音色各不相同,呈高低排列,与琴的演奏方法极为相似,但可以进行分奏与合奏。凡是人们在大自然中能够听到的风雨鸟兽之声,管风琴都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如果在演奏过程中以歌声合之,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当时的清朝人为这件新型乐器发出的洪亮、和谐的音调而陶醉。

此外,精通天文学的徐日升神父还在教堂的钟楼里安装了一架大型

机械钟。这件机械钟不仅能够准确报时,在报时的时候还能够奏出美妙的乐曲。这种大钟吸引了上自王公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很多人专门前去一睹大钟的风采,聆听大钟发出的音乐。当时前来参观的人甚至超出了教堂的容纳人数,还有很多人几次前来参观。

徐日升在音乐方面的著述为清朝音乐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律吕正义》与《律吕纂要》都是他关于音乐方面的著作,绝大部分是他独自著述的。《律吕正义》是徐日升接受康熙的圣旨奉命编纂的。

2. 外交不忘知遇恩

在中俄两国最初的交锋雅克萨战役之后,南怀仁作为翻译,参加了中俄双方的谈判,和他一同接受这个任务的,还有徐日升与其他几位神父。

当时,徐日升担任的是中方代表团的拉丁文翻译。其间,俄国大使柯罗文希望徐日升能够“从基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也就是在谈判中向俄方作一些妥协。徐日升为了基督教能够在沙俄传播,把一些不影响谈判进程的消息透露给了柯罗文,如清廷对这次谈判的战略目标及代表团的策略和情绪。这样,柯罗文掌握了清廷谈判进程,有利于两国达成一致。但柯罗文对这些还不满足,竟然要求徐日升背着清廷代表团在草约的拉丁文本中加上一些有利于俄方的内容。对于柯罗文的这些举动,徐日升十分生气,断然拒绝了柯罗文的要求,没有辜负康熙皇帝对他的信任。

徐日升的举动令柯罗文十分恼火。中俄两国签署了《尼布楚条约》后,柯罗文回到俄国就把徐日升的表现添油加醋地禀报给了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抱怨耶稣会士没有尽力帮他们取得更多的利益,下令封闭莫斯科的耶稣会住院,并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境。

徐日升神父从尼布楚凯旋而归,得到了康熙皇帝重赏。当康熙皇帝听说徐日升顶住重重压力拒绝了柯罗文的要求后,对他更加信任了,特

赏徐日升穿缀有蟠龙补子的锦缎官服,又赐锦缎里子、装金纽扣的貂皮马褂各一领。

3. 复兴基督教靠的是皇上的金口玉言

康熙皇帝除掉鳌拜势力集团正式亲政后,对曾经遭受打击的西方传教士采取了按其专长为清廷服务的策略。这些传教士大多在天文历法、数学、几何、音乐、绘画、医药、翻译,以及机械、钟表修造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康熙皇帝把他们请到宫中教自己及众皇子数历、拉丁文和音乐,并命他们掌管钦天监事务。同时,他还允许传教士可以在京城修建天主教教堂。徐日升神父对先前的教堂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改建,把原来的教堂改为西式建筑。

在备受康熙重视和恩遇的情况下,徐日升不失时机地向皇上提出了传教自由的要求。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了影响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一道著名圣旨。康熙皇帝在圣旨中宣布清廷公开承认天主教的圣善并对100多年来西洋教士在传教工作中的模范表率作了肯定,特许中国人有信奉天主教的自由。此外,康熙皇帝还下令对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修建的教堂一律加以保护。

徐日升神父对康熙皇帝采取的措施十分感动,在谢恩词中说:“蒙圣上宏恩,准予臣等在圣朝辽阔之国土上宣扬真主福音之自由,是臣等所以远离祖国、不辞艰辛,前来圣朝供职者,亦唯此愿耳。”

康熙皇帝在徐日升神父去世后,还专门到过他生前修缮的教堂祭奠,亲自为该天主堂题诗: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
体一何终而何识,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此外,康熙还赐予这个天主教堂一块写有“万有真元”的御制匾额,并御书堂额,分别为“密合天行”、“尽善尽美”、“敬天”等,后厅堂额为“声清气和”,亲自御题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后来这座天主教堂几经损毁,经过修复后成为北京地区天主教徒的重要活动中心。现在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府均设在该堂。可以说,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徐日升神父是大有功劳的,他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康熙曾为此亲赐御制匾额

第四节 第一位来华通商的英国使臣 ——英国勋爵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是18世纪的一名重要外交家,他的访华活动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交活动。马戛尔尼在英王的派遣下希望趁恭贺乾隆皇帝寿辰之机打开中国国门,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虽然最后无功而返,但马戛尔尼的此次来华却具有重要意义。他把西方工业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同时,他回国后对于中国的描述也使英国进一步扩张了侵略中国的野心。那么,马戛尔尼与乾隆皇帝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外交风波?他的访华活动为什么会失败?他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功过又是如何呢?

梦 回

1. 正牌的英国使者

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与西方国家的交流非常少。尽管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于欧洲国家,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于是,刚刚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开始争相与遥远的中国开展贸易活动。

已经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的英国对这个蕴藏着无数财富的农业国家垂涎已久。但英国在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政府迫切希望打开中国的通商口岸。他们认为英国之所以出现贸易逆差是因为英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茶叶、丝绸,而处于小农经济阶段的中国人却对英国商人运来的货物不感兴趣。

此外,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众多对来华商人的管理条款限制了英国商人的自由。

乾隆时期,外国人只能在位于南部沿海的广州经商,并且只能和政府规定的广州十三行经商。他们不能私自外出,不能接触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不能坐轿,不能说中国话,不能带女性来经商,不能在广州过夏、过冬。总之,中国提供给英国商人的是无数个“不能”。这还不算完,在当地官府与十三行的盘剥下,英国商人的利润空间更小了。此外,英国商人向中国政府缴纳的关税没有统一的标准,完全靠当地的官员说了算。后来,英国人认为中英贸易之所以不畅通,是因为中国海关官吏的贪赃枉法。因此,他们意识到要改变这种情况,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就必须直接沟通,而不用十三行或海关官员转达。

于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决定派遣以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大使的使团访华。公元1793年是乾隆皇帝的83岁大寿,英王决定在公元1792年以庆贺乾隆皇帝寿辰为名派这支使团前往中国。

马戛尔尼出身于英国的贵族世家,有勋爵身份,是英国的贵族,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的公使和英国政府孟加拉总督。

在出使之前,马戛尔尼在船队中装进了很多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兵器以及工业机器,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他之所以决定带这么多贵重的礼物前去,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这些礼物一定会受到中国皇帝和官员的欢迎,有利于使团完成任务。此外,这

些礼物还可以作为恭贺乾隆 83 岁大寿的寿礼。

公元 1792 年 9 月 26 日,马戛尔尼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及卫队等 800 多人组成的使团,携带着 600 箱礼品,乘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 5 艘船从朴次茅斯港起程,正式出使中国。马戛尔尼还随身携带了英王庆贺乾隆帝 83 岁寿辰的信函和关于扩大通商事宜的国书。使团的副使是



马戛尔尼画像

乔治·斯当东男爵,他把自己年仅 12 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带进了访华使团。小斯当东长大后在中英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经历了长达 9 个月的艰难航行,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终于在公元 1793 年的 5 月来到了中国,船队在澳门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清廷的消息。马戛尔尼深知此行的最重要目的是敲开东方清王朝的大门。这次场面宏大的出使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

2. 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马戛尔尼到达澳门后,通过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百灵与两广总督福康安取得了联系。当时,清朝对“夷务”事宜并不很重视,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而是由两广总督负责管理洋务。他向福康安表达了使团不远万里来向乾隆皇帝恭贺寿辰的目的,并表达了希望能够得到乾隆召见的意愿。

英国派使团前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传到了

乾隆的耳朵里。他接到福康安的奏折后非常高兴,任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乾隆还下旨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遇使者,其携来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充分食物,“赏给一年米石”。

公元1793年的7月,马戛尔尼按照乾隆圣旨中规定的条款带领船队来到天津。到达天津后,使团乘清廷前来迎接的内陆船到达通州,最后到达了北京。

当时,乾隆皇帝并不在北京,而在热河避暑山庄的行宫中避暑。因此,马戛尔尼并没有立刻见到乾隆。负责接待的官员带领使团在京城中游玩了几天,便奉圣旨带领他们前往避暑山庄觐见,并参加乾隆的寿辰庆典。

前往热河的途中,他们路过了万里长城。马戛尔尼等人不禁为这样庞大的人造工程所震惊。但当他们听说这条蜿蜒崎岖的长龙是清朝的军事防御工事时,不禁露出了傲慢的微笑。长城在他们的眼里怎能抵挡住坚船利炮的袭击!

公元1793年8月,马戛尔尼等人到达热河,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隆重欢迎。他站在避暑山庄御花园的高台上,迎接排列整齐的使团队伍。在马戛尔尼使团到达热河之前,乾隆已经命令官员制订出了一整套接待方案,包括如何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于是,马戛尔尼到达避暑山庄后,一切活动都按预先制定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进行。

但双方在正式会见时,却因为两国礼仪的不同而出了差错。原来,按照中国觐见皇帝的礼仪,马戛尔尼等人必须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可是,马戛尔尼认为他们只有在向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才会下跪磕头,向中国皇帝行此大礼有损大英帝国的威严。马戛尔尼主张在向乾隆朝见时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



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觐见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提出的建议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是化外之人,不值得优待。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马戛尔尼越来越感觉到局势的紧张,使团甚至面临被驱逐的危险。无奈之下,马戛尔尼不得不向清廷做出一定让步。他向清廷建议在乾隆皇帝万树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们行英国式礼节;在9月17日在澹泊敬诚殿正式举行的乾隆万寿典礼上,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乾隆见英使做出了让步,态度也有所缓和,便同意了马戛尔尼的建议。他还命令和珅带领使臣一行参观游览,尽情观赏皇家园林的湖光山色。

9月17日,澹泊敬诚殿张灯结彩,文武百官、国外使节齐聚一堂为乾隆皇帝庆贺寿辰。马戛尔尼一行究竟有没有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这个问题在国内外的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史料上的记载更多地支持行此大礼。《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上记载,马戛尔尼等人虽然对叩头

极不习惯,但面对乾隆的威严还是跪了下去。温德是这支使团的秘书,同时也是马戛尔尼的亲戚,他的记述应该不会错。他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当天日记中写道:“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朝拜过之后,马戛尔尼向乾隆进献了带来的众多礼物。这些礼物虽然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可在清朝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乾隆皇帝认为那些礼物虽然制作得相当精致,但对于农耕社会并没有什么作用。他甚至把它们当做玩物,还让马戛尔尼提醒英王不要玩物丧志,农耕才是立国之本。乾隆以天朝大国的骄傲,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仍旧赏赐给英王以及使团很多精美的丝绸、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数量达到3 000多件。

进献礼物之后,英国使团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在清音阁观看了戏剧。第二天马戛尔尼等人看了万树园举行的歌舞表演,晚上又观看了焰火晚会。

3. 没能打开中国港口的马戛尔尼却不后悔

万寿庆典的当晚,马戛尔尼除了进献了众多礼物之外,还呈递了英王的信件和有关通商事宜的国书。但是由于庆典活动太繁杂了,信件和国书并没有当即被翻译出来。朝拜时,马戛尔尼并没有得到与乾隆帝长谈的机会。

万寿庆典结束之后,清廷马上命令马戛尔尼率使团回北京。马戛尔尼本来想在北京度过春节再走,可是清王朝有外国使者在京逗留时间不能超过40天的规定。他的计划被迫取消。

此时,西方传教士把马戛尔尼呈递的表文翻译了出来。乾隆皇帝一看到表文,心中就十分恼火。英王在信中以骄傲的口气要求清朝准许英

国派人常驻北京。乾隆严厉指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并当即以皇帝向臣民颁发谕旨的形式给英国国王回了一封信。

当乾隆看到英国请求扩大通商事宜的国书时，更加愤怒了。同时，他明显地感觉到马戛尔尼一行来华并不是单纯地为他祝寿，扩大通商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马戛尔尼进献给乾隆的国书中提出了七点请求：多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到宁波、珠山（今舟山）、天津、广东等地贸易；批准英商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清廷在珠山附近拨给英国商人一个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清廷拨给广州附近的一块地方，为英商贸易之用；减免英商在澳门、广州等内河运货的赋税；广州海关除正税外免除其他一切税收；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乾隆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驳回了英国的通商请求，严厉警告英国商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而进行的一次尝试，带有炫耀资本主义实力以及进行殖民扩张的色彩。特别是英国提出让清廷在珠山或广州割一个小岛供英商使用一条，带有明显的侵犯中国领土的迹象。乾隆对英国诸上请求的严词拒绝一方面维护了国家尊严，但同时也因为闭关锁国而不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乾隆皇帝对英王请求的拒绝标志着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清廷命令英国使团迅速离京回国，并传令沿途官员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公元1793年10月7日，马戛尔尼只得率领使团在钦差大臣松筠的护送下由运河南下到达杭州，再通过陆路到达广州，与等候在那里的船队会合，离开中国。马戛尔尼在公元1794年9月回到了英国普利茅斯港，完成了他的访华之旅。

虽然马戛尔尼的访华活动以失败告终，但东西方两个大国却因此而有了初步了解，对此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马戛尔尼把

在中国的见闻公布于世之后,在英伦三岛上,一种情绪在滋生和蔓延,那是傲视,是冷漠。它们,引发了中国后来一溃千里的战争。

传 奇

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

在中国的记载中,18世纪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众多方面都处于中国5000多年历史的最高水平。当时,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国”自居,称马戛尔尼等人为“四夷”之外的“英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接待他们。那么在马戛尔尼的眼中,“康乾盛世”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马戛尔尼当初离开北京时对乾隆皇帝的做法十分气愤,他写道:“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

马戛尔尼一行返回到达广州时,有一支让乾隆以及所有清朝官员引以为傲的“欢送”队伍迎接他们。在乾隆的命令下,这支军队向马戛尔尼等人展示了枪戟林立、刀利弓强的雄壮军威。然而,在马戛尔尼眼中,这支军队是那么落后,那么可笑,那么不堪一击。手持大刀长矛、身背强弓硬弩仍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怎能抵挡得住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枪支弹药的进攻!然而,此时的中国人面对马戛尔尼的队列表现,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反而露出了嘲笑的表情,认为他们走路步履僵硬,膝盖不易弯曲,“一旦仆地,极难起身”。

在清朝官员嘲笑的眼神中,马戛尔尼带着失望与不屑踏上了归程。回国后,他与副使斯当东一起,用很长的时间冷静地思考了在中国的见闻,并写成《纪实》一书。在这本书中,马戛尔尼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当时清朝人和现代人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的假象。这本书到1908年才正

式出版。在书中,马戛尔尼不仅看到了大清帝国盛世之下的落后,还看到了盛世之下埋藏的危机。

他在《纪实》中写道:“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他认为清朝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裹脚,残杀婴儿”。马戛尔尼预言中国“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他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在马戛尔尼眼中,“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表、外强中干的花架子。尽管这个帝国的经济仍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仍然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富有的国家,但它腐朽的迹象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土崩瓦解。不幸的是,马戛尔尼的所有预言都很快变成了现实。

要说他不带情绪地回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在自己见闻里所叙述的一切,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中国的落后与盲目自大,已经在有眼光的外国人眼中,酝酿成一场百年的灾难。

英使马戛尔尼的访华,是中英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也是双方力量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表面上看,英国的使者走得灰溜溜的,他们提出的要求全部被乾隆皇帝驳回。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的愚昧落后和当时社会已经和世界先进科技脱轨的状况已经完全展现出来,这才是马戛尔尼此次来华最大的“收获”。正因为这个,中国在以后的百年历史中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走进了最屈辱的一个时代。

此次访华,马戛尔尼和欧洲彻底地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尔后,他们对中国的热情转为蔑视。清朝帝国无可否认地开始衰落了,而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却变得日益强大。“天朝上国”的大门没有被“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叩开,中国人又一次与学习先进、迎头赶上的机会失之交臂。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认为“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又说:“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虽然,清王朝对于英国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开放”要求理应拒绝,但问题在于它拒绝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贡体制。这注定了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仅是礼仪和文化的冲突,更是清朝对外政策的失误。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与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其闭关自守的性质在此暴露无遗,当马戛尔尼回到英国的时候,已经隐约地知道,那时的世界将很快有所改变了。

第五节 精通汉学的外国奇才

——英国新教传播者马礼逊

马礼逊(1782—1834),出生于英国北部布勒古林的莫佩思小镇上的一个贫苦而传统的天主教长老会家庭,是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是中国基督新教的先驱。在华25年间,他在经书翻译、汉学研究、创办教育、医药事业、期刊创办等方面都有首创之功,汉译本新旧

约《圣经》、《华英字典》、英华书院等都是他光辉业绩中的代表。为了纪念马礼逊，传教士后来创办了“马礼逊教育协会”，并设立了神学院、教育机关、图书馆等机构。直到今日，香港仍然保存有马礼逊纪念馆，供后人瞻仰、祭奠。



历经数次翻修的澳门马礼逊教堂

梦 回

1. 献身新教的伟大人生

马礼逊是家庭中的第八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孩提时代，马礼逊表现出了一种超出常人的聪颖与极强的记忆力——他曾经在一夜之间准确地背下了《圣经》中最长的一篇诗篇，他的天才震惊了全家。后来，在家庭的培养熏陶下，年仅12岁的马礼逊已经可以背诵出很多诗篇了。

因为家境贫寒，马礼逊的父亲把家搬到纽开斯尔，专以制鞋坯为生。为了增加收入，马礼逊一家老小都要参加劳动。他们过着下层社会的穷

困生活,经常缺衣缺食。但马礼逊却并没有因为家庭的贫困而荒废学业。他勤奋读书,从小就学习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独立生活能力很强。

随着年龄的增长,马礼逊逐渐产生了一种叛逆的情绪,并因此而度过了一段人生中较为黑暗、荒唐的时期。其间,他经常酗酒、狂欢、放荡,对于污言秽语已经习以为常。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15岁的一天,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公元1798年,马礼逊正式加入了英国长老会。

之后,他进入霍克斯顿学院,学习神学、天文、医学等课程,并因为个人兴趣而初步学习到了一些中文。后来,他又进入戈斯波特传教士学院对所学课程进行进一步深造,并听取了传教士在非洲和印度等地传教经验的介绍。他进入神学院学习不光是为了求取知识,也不光是为了获得牧师、神父的职务,而是过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

公元1804年,马礼逊正式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准备成为一名传教士。伦敦传教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让他继续学习两年,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并把他作为派往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的重点人选。公元1807年,马礼逊被伦敦教堂封立为牧师,正式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是在这时,他接受了被派往中国传教的任务。伦敦传教会专为马礼逊举行了欢送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的《书面指示》和《告诫书》。

来中国后,马礼逊迅速开展了传教活动,开创了很多“第一”。他虽然是第一个把基督新教带到中国的传教士,但传教的效果并不明显,信教、受洗的人数寥寥无几。马礼逊还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传教士。当时,清王朝不允许洋人随意在广州停留。他们唯一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是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但是葡萄牙政府对这位基督新教传教士极不欢迎,甚至达到极力排斥的地步。于是,马礼逊只得在广州与澳门之间来

回奔走。为了把基督新教的福音尽快带到中国内地,他不得不就职于参与鸦片走私的东印度公司,做一名中文翻译人员。既然他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的员工,中国人能对他有好感吗?于是在开头的几年间,总是有人对他冷言冷语。但是,对于应聘一事,马礼逊是有他自身的原因的。对于所受的误解,马礼逊并没有过多的在意,他认为:“每人都要甘于上帝为他铺的路,要认真演出上帝所预定的剧本角色,不能简单评估自己的胜与败。一切都交给主来评判。”

2. 矢志不改的终生奋斗

在接到伦敦传教会的派遣之前,马礼逊就立下了到中国传教的志向。他在利玛窦的记述中发现当时的中国仍旧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没有赋予外国传教士传教的自由。为了能够深入地在中国传教,他学习了天文学与医学等很多课程,为来华做准备。他希望把西方的先进科技作为基督新教的传播媒介。

马礼逊的来华旅程十分曲折。当时,东印度公司认为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对公司在华的贸易有很多不利之处,就禁止他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中国。没有商船的支持,马礼逊就不可能来到中国。无奈之下,他只好首先选择去美国。

公元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开始了美国之旅。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他终于到达了纽约。在美国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他就准备换船并申请手续前往中国。在办手续的时候,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船坞的职员听说马礼逊要前往中国传教,便嘲笑他不可能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中国国民几年来形成的对于偶像的崇拜。面对嘲笑,马礼逊坚定地说道:“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在美国期间,他尽力争取到了当时美国国务卿、后任总统麦迪逊的一封介绍信。这封介绍信为他的中国之旅提供了很多便利,为他与美国驻中国领事和商人的

交往提供了条件。

5月12日,马礼逊登上了开往中国的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起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4个月的海上颠簸,于公元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从此,马礼逊开始了他在中国25年的漫漫传教之路。

到达广州之后,他发现当地传教士的处境并不乐观。首先,清王朝不允许洋人在内地久留。其次,清王朝规定中国人不能加入基督教,也不允许洋人学习中文,违者会遭到朝廷的重罚甚至会遭受极刑。此外,他在广州还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敌视。除了宗教之外的种种困难限制,马礼逊还感受到了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重重压力。因此,到达广州之后,他就把麦迪逊给美国驻华公使的信件递到了美国领事馆,得到了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并因此而获得留居广州的机会。为了掩护身份,马礼逊住到美国商馆。卡林顿还专门为他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让他安心学习汉语。

这一年,马礼逊与第一任妻子玛丽结婚。但是,玛丽没有获得在广州居住的许可,只得居住在澳门,于是马礼逊就在广州与澳门之间来回奔波,日子过得颇为辛苦。但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患病死亡,马礼逊伤心地发现竟然没有能力为儿子获取一块葬身之地。后经过多方交涉,他才在澳门北面的一座小山上安葬下了年幼的儿子。

公元1809年,马礼逊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邀请,担任公司的一名翻译人员。马礼逊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可以借此安全地长期留居广州,可以更好地学习中文,还可以利用得到的薪酬为传教活动提供资金来源。此外,他认为这样做也可以消除东印度公司对他的敌视。此后马礼逊一面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一面进行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他先后翻译、修订了许多经书和工具书,是把《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公元1815年,玛丽因水土不服,带领年幼的儿女返回英国,留下了马礼逊一人。公元1816年,马礼逊作为英国特使阿默士德的中文翻译随英国使团北上进京。鉴于他在中英交流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格拉斯哥大学在公元1817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公元1820年,马礼逊夫人在返回澳门的时候不幸染上霍乱,不久去世。在悲痛之中,马礼逊没有停止传教活动。1824年,马礼逊首次回英国休假,并与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结婚。

马礼逊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他的传教活动不是以引人入教为目的,不求速成,而是注重扎实的工作,一点一滴地积累。他的第一个基督新教的中国信徒名叫蔡高。此外,协助马礼逊印刷《圣经》、负责刻木版的工人梁发,也是早期的基督新教徒之一。梁发不顾清廷的禁令,冒着生命危险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

公元1834年,马礼逊被英国国王任命为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兼译员,官衔为副领事。此后不久,他因病去世。人们将他安葬在澳门基督教坟场,并为他建立了纪念堂以示哀悼。

马礼逊是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尽管他在中国活动的25年间,传教影响并不大,但却带动了更多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到他去世时,中国境内已有23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了。著名传教士米怜就是因为受马礼逊的影响而来华传教的。在中国境内提倡未婚基督徒女子担任传教事业的第一人就是马礼逊。他认为虔诚的未婚青年姐妹向华人妇女传播福音相对于男性传教士有更多的优势,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马礼逊是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创办人。他在英美政府和米怜神父的支持下,于公元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基督教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他创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马礼逊开创了中国的医药传教事业。爱丁堡大学的副校长贝尔德

请马礼逊代为调查中国的病人、孤儿等以及国家或政府中的一些救济问题的详细情况。为了不耽误自己的传教工作,马礼逊把这件工作的具体细节交给了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温士顿,请他将相关详细数据发表在《中印拾遗季刊》上。后来,马礼逊与李温士顿合作开设一个诊疗所,聘擅长中医中药的华人为助手,专为华人治病,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大功绩之一。

公元1834年,马礼逊在年初日记中写道:“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此时,史当东爵士还推荐马礼逊为新任命的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担任译员。同年7月16日,律劳卑爵士一行官员抵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1300英镑,副领事官职。从7月17日到7月29日,马礼逊带病随律劳卑爵士到广州与中国官员谈判。7月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到8月1日晚10点钟逝世,享年52岁。遗体由他大儿子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前东印度公司的墓地,其第一任妻玛丽身旁。

传 奇

举世无双的汉学专家

马礼逊为中英交流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他在汉学方面的贡献。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将《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传教士。

公元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了《圣经》的汉译工作。他在以前天主教传教士翻译手稿的基础上,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在翻译《圣经》之初,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向他提出译文应忠实于原义,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并博得对它的尊重。马礼逊认为他不仅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还要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

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



马礼逊的译经活动

公元1810年,他翻译完成了《使徒行传》。公元1811年和1812年两年中,马礼逊翻译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到公元1813年,他已经把新约《圣经》完全译出。旧约《圣经》是他与另一位在华传教士米怜共同翻译完成的,于公元1819年正式完工。公元1823年,马礼逊将译出的《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其中的旧约部分称为《旧遗诏书》、新约部分称为《新遗诏书》。其中,现在流行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马礼逊创造的。

汉译新旧约《圣经》的完成是中国基督教事业发展的一大重要标志。中国人从《圣经》中看到了基督教的全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清王朝严禁传教士布道的情况下,散发《圣经》译本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就成为马礼逊以及后来的传教士在华进行传教的重要方式,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此外,《圣经》翻译的完成对中国的近代文

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为后世传教士再次翻译《圣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借鉴。

《华英字典》也是马礼逊在汉学研究方面的一大贡献。《华英字典》又被称为《中国语文字典》,于公元1808年开始编纂。马礼逊之所以编纂这本字典,是为了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学习汉语提供方便。他的编纂活动得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公司不但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还承担了印刷工作。

公元1815年,经过7年的艰难工作,马礼逊终于完成了这本字典的第一卷。这卷字典是马礼逊按照清廷刻印的《艺文备览》为参考编纂的,是一本汉英对照字典。他将汉字按照笔画分成214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公元1819年,他编纂的《五车韵府》作为字典的第二卷正式出版。这卷字典是按照英文字母编排的。马礼逊在公元1820年对第二卷补充时,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公元1822年,马礼逊编纂的《英汉字典》作为字典的第三卷出版。这本《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公元1823年,整部字典的所有部分宣告完成,共分为6本,共计4595页。《华英字典》的编纂历时15年,全部由马礼逊一人完成,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

《华英字典》不仅包括中英文字词的对照,还包括很多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因此,它可以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例如,马礼逊在介绍“孔”字的时候,就详细介绍了孔子和孔明,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外国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中国文化、历

史的了解,并使字典充满趣味性;书中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从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华英字典》还涉及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尤其是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列举出了很多星座的名字;此外,马礼逊还在字典中介绍了中国的戏剧。



《华英字典》部分篇章

《华英字典》的出版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提供了方便,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是汉学界的热烈的欢迎,在极短的时间内风靡欧洲大陆。这本字典还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英字典》中包含了很多现代汉语词汇,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国近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都有很大影响。

《华英字典》的出版还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出版的序幕。这本字典催生了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的诞生。这就是在葡萄牙人管辖之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置的出版机构。这家出版机构创办后,很多在华的西方公使开始在中国创办印刷所,以实现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这种趋势

影响下,清廷和一些中国民间人士也开始投资于现代印刷、出版,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印刷、出版的诞生以及发展。此外,因为印刷《华英字典》的需要,印刷所还专门制作了中国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并使用机器印刷,开创了中文图书采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现代出版历史。印刷《华英字典》时使用的印刷机是中国进口的第一台现代化印刷机。总之,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的出版,无论是在资金运作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还是在编辑模式、印刷方式、发行方式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变革。

此外,马礼逊还著有许多专著,如《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广东省土话字汇》等,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因为他在汉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就连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都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此外,马礼逊在中国活动期间还创办了很多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马礼逊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于公元1815年正式创刊。这本报刊是一份月刊,对近代中国的印刷、出版、新闻、传教以至中外文化关系等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对促进基督新教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传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本报刊在宣传基督新教的同时,从侧面抨击了中国儒、释、道思想中一些较为腐朽落后的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在这本报刊中,马礼逊首次把西方的标点符号——顿号、句号,带到中国。

《中国丛报》也是在马礼逊的倡议下创办的。他不仅是报刊的创办者之一,还是报刊的撰稿人。在公元1832至公元1834年短短的两年中,马礼逊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多达97篇文章,涉及到中国的政治、法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书影

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物产、哲学、宗教、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作为传教士创办的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期刊，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全貌，为欧美各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开山祖，他创办的译圣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被称为无声而有效的传教方式，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发展起来。文化事业的大力发展，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具有普遍的先行意义，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把利玛窦看作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文化的开创者，那么，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乃至强烈碰撞的开创者当属马礼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马礼逊开启的这次文化交流，层次更深，影响更久远。若没有他所开创的全新文化传播方式和崭新理念，那么，中国的文化发展，恐怕还要落后西方世界好多年。当然，他不遗余力地引进西学，令清末的学者们感到一丝恐慌。太平天国运动

爆发后,这场在文化领域竖起的大旗被农民阶级和小手工业者、商人们高高举起,直捣黄龙,给清廷一个不小的震撼。这些,恐怕是马礼逊没能料到的结果吧。

第六节 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 ——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

罗孝全(1802—1871),是一名来自美国的牧师。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桑穆纳县一个具有浓厚基督浸礼会宗教色彩的农庄。来到中国的他,因为与太平天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而闻名于世。在与洪秀全的交往中,他曾经有过非常传奇的经历,曾担任过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但是,他最终因为与洪秀全在宗教、政治上的不和而分道扬镳。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天主教期刊《益闻录》于1882年出版

梦 回

为传播浸礼会奉献一生

浸礼会也叫浸信会,是基督新教在美国的一个主要流派。罗孝全的母亲是一位基督教浸礼会成员。他的哥哥是当地浸礼会的一名牧师。在母亲与哥哥的影响下,罗孝全在19岁时就加入了浸礼会,并成为一名业余的神职人员。

罗孝全早年为了生计曾做过教师、马具工。后来他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主。公元1827年,为了提高自己的神学知识,罗孝全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学校进修了一个学期的神学课程。此后不久,他就被正式任命为牧师。当时,美国的基督教各派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跃跃欲试,想来中国传教。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罗孝全决定横渡太平洋,来中国传教。罗孝全向美国浸礼会的传教机构多次申请,但都没有得到批准。美国浸礼会认为他“资质平庸”,并不是来华传教的合理人选。

罗孝全并没有因为遭到拒绝而失去信心,他积极投入到了赴华传教的准备中。公元1835年,他组织了一个名叫“罗孝全基金与中国传教会”的组织,专门筹备前往中国传教的事宜。后来,他又组织成立了“密西西比谷地中国传道会”,作为他到中国传教的组织和后援机构。公元1836年10月,罗孝全乘船离开波士顿,前往中国。公元1837年年初,他到达了南太平洋地区的巴达维亚。他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学习了一定的中文知识,继续向中国前进。公元1837年5月,罗孝全终于到达了清廷唯一允许外国传教士居住的地区——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门。他与另外一名著名传教士叔未士一同在澳门附近的乡村和渔船上进行传教,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长达5年之久。

在澳门,罗孝全提倡扩大对华传教的力度。他在写给美国宗教人士的信中说道:“我认为如果有一打勇敢的传教士来到这里,精诚合作;再有一打勇敢的本地皈依者,甘冒生命危险,在他们的努力和神的保佑下,福音将像电流一样传遍这个国家。”由于罗孝全来华传教并没有得到美国浸礼会的派遣,他的传教活动没有得到美国浸礼会海外传道会的资金支持,因此在传教活动中的一切费用都要由罗孝全自己承担。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他甚至重新做起了多年前的老本行,在传教之余制造一些马具赚钱,但日子仍显捉襟见肘。公元1841年,他不得不再次向美国浸礼会提出成为正式传教士的请求。幸运的是这次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从此他的经济状况有所改观。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领了香港。罗孝全与叔未士认为香港可能更适合传教,就在公元1842年从澳门到达香港,开始在香港进行传教活动,成为最先来香港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们向英国香港当局申请租赁了位于香港皇后大道的一块地皮,修建了一座基督教堂,作为传教的基地。罗孝全开始时在香港南端赤柱传教。但他在那里的传教活动并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于是他就离开地域狭小、人口稀少的赤柱地区。这一举动激化了他与叔未士在澳门时就已经形成的隔阂、矛盾。公元1844年5月,罗孝全不得不离开香港,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到广州传教。

罗孝全到广州后,很快就把自己的所有精力投入到传教活动之中。一年之后,罗孝全在广州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成立了“粤东施蘸圣会”。粤东施蘸圣会是罗孝全自己成立的浸礼会组织,由他本人担任牧师,成员不断增加。他还成立了一个“广州浸礼会传道会”的传教组织,自己担任总干事。此外,他在佛山还建立了另一个传教站。为了筹集传教的经费,他经常以广州浸礼会传道会的名义向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筹集捐款。

罗孝全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受到了美国浸礼会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

以后美国浸礼会内部因为美国南部与北部的自由州在维护还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意见不同而发生分裂。美国南方浸礼会的人士成立了“南部浸信会”。罗孝全出生于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应该属于美国南部浸信会,但他与这个组织的关系却十分微妙。美国南部浸信会在叔未士等人的影响下,与罗孝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公元1851年,罗孝全被南部浸信会除名。此后,他作为一名没有宗派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继续在广州传教。

公元1860年,罗孝全在洪秀全的邀请下历经周折来到南京,归途中在广州继续传教。公元1866年,罗孝全返回美国,5年之后去世。

传 奇

1. 罗孝全和洪秀全的师徒之谊

罗孝全与太平军领袖洪秀全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公元1847年3月。当时,洪秀全与族弟洪秀仁听说广州有一位宣扬基督的外国传教士,就来到广州向罗孝全学习。他们参加圣经班,与普通教徒一样,每天听课两小时,记忆和背诵圣经。

刚开始,罗孝全对这两个人的印象并不好,拒绝为他们入教洗礼。罗孝全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当洪秀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皆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而去矣。”

不过,洪秀全却全然不在意老师罗孝全的看法。他在罗孝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新旧约全本《圣经》,认真研习,使得这段时间的学习成为对洪秀全影响最为巨大的时期。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写道:“尔凡人何能识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

主而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腆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皇上帝”这个称呼就来源于当时《圣经》的汉译本。洪秀全在罗孝全那里得到了很多启示,他在《圣经》中为崇拜皇上帝,反对阎罗妖,反对偶像,特别是反对清朝皇帝,找到了新的根据。3个月后,洪秀全与洪秀仁就携带《圣经》去广西宣传教义,以组织起义力量。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洪秀全在罗孝全心目中的形象。公元1852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与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在香港会见,并把洪秀全的一些文件留给韩山文。不久,罗孝全在香港访问了韩山文,同时阅读了洪秀全的那批文件。看过文件之后,罗孝全说:“迄今我对这个事件极少或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今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此外,他还赞扬洪秀全信仰基督教,“打倒偶像”,并认为不久之后,洪秀全一定会需要大批传教士和《圣经》以及小册子。他写道:“我猜想,已经接受过传教士的教育领袖将是容易会见的和肯听教训的。虽然,在这个国家,他的地位是高贵的……他将充分地学习耶稣的真理,然后在向他的人民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和传教士进行合作。”

公元1853年,洪秀全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定国都为天京。他专门写了一封邀请罗孝全来南京传教的信,命令叶师帅把信带到罗孝全那里。叶师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记述道:“太平天国癸丑(查太平天国惯例,癸丑的“丑”字应写作“好”字,此处日期存疑)三年二月十六日南京起程,三千余里到广省。叶师帅尊东王天会所行,远传福音,自说十三行番国钦差大人知之。四月初六日到省东交信,十三行兄弟看见信不收;……五月初九日,尊到粤东礼拜堂,师帅闻见说罗孝全大人打发徐生查仿本师帅书信,即到看见,即到靖海门。兄弟看见信皮不同四月初六日,信到粤东礼拜堂收入。……信皮不同,信内真实福

音,叶师帅不是贪心挞道兄弟钱粮,相(想)得回一句福音,回答天朝。如或兄弟不信者,天王诗句为凭。”

接到洪秀全的邀请信,罗孝全很兴奋。他高兴地说:“这多么像对使徒的邀请——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他急忙给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写信,请求前去天京。在等候回信的过程中,许多传教士和商人极力怂恿他早日去天京。广州的一位商人答应免费搭载他到上海,英格兰的一个团体资助他100块银元。于是,罗孝全决定离开广州后先前往上海,再从上海去天京。可是到达上海后,他才知道马歇尔并不同意他去天京,并对他执意去天京的行为进行威胁。

尽管如此,马歇尔的话并没有使罗孝全退缩。不久之后,他得知一位准备到天京做生意的商人愿意带一两个人一道前去,于是就与那位商人起程了。

眼看大好前景在向他们招手,谁知道又出了问题。原来,他们乘坐的船只刚刚驶入长江,就受到清朝水师的拦阻,无可奈何之下,罗孝全被迫回到上海。后来,罗孝全又碰了几次钉子,都没有得到前往天京的许可。

公元1860年,太平军东进,占领了苏州,逼近上海。罗孝全在这种形势下趁机来到苏州,与太平军的重要将领李秀成会面,受到了太平军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李秀成的护送下,罗孝全终于来到了天京。

然而,罗孝全与洪秀全这次期待已久的会面并不愉快。罗孝全向洪秀全声明此次天京之行是为了传布包含在《新约》中的基督福音,并把散布《圣经》作为更有效地完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已经功成名就的洪秀全向罗孝全颁发了一道《诏书》,里面写道:“孝全西洋同家人,识得朕心否?朕今钦赐各项诏书,尔等细认。朕诚上天否?上帝圣旨,‘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醒否?信否?醒信福祉矣!”洪秀全甚至认为“约书不好些当去”。他甚至要罗孝全到外国去布道,让外国人改信太平天

国的宗教。

罗孝全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从此他们之间展开了几次斗争。他们在天京的关系成为后世史学家与宗教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2. 与天王的斗争



天王洪秀全

罗孝全与洪秀全的斗争表现在方方面面。罗孝全来到天京后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参拜洪秀全的礼仪问题。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后,洪秀全就命令手下的大臣专门制定出一套太平天国的礼制。这套礼制与历代封建王朝的礼制基本一样,其中规定大臣朝见天王的时候必须要下跪。但是,罗孝全却坚持对洪秀全不行下跪之礼。太平军的将领们经过

研究同意了罗孝全的不下跪行为,但又作出了一些片面的规定。他们告诉罗孝全,他必须要向天父下跪。这等于把这个外国人绕了进去。因为太平军信仰的天父就是由洪秀全代表的。转来转去,罗孝全还是要向洪秀全下跪。罗孝全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做法。当他与太平天国的文武百官对天父进行礼拜时,罗孝全把脸转到另一个方向。

下跪事件平息之后,罗孝全面对的是与洪秀全之间的一场长期的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论点。罗孝全在辩论中始终坚持基督教的上帝——基督——圣灵三位一体论点。洪秀全却认为天父的地位是高于西方的耶稣的。洪秀全在给罗孝全的信中写道:“天父是我自己的父亲,耶稣是我自己的哥哥,和我同由一母所生。天父和天兄使我成为统治者。”

罗孝全与洪秀全宗教上的分歧还表现在罗孝全是否承认洪秀全上过天堂的问题。洪秀全曾经向罗孝全讲述了自己如何“升天”的过程。为了诠释自己的“升天”故事,他还列举了基督教《圣经·约翰启示录》里的故事。洪秀全写信给他说:“你要更忠。你不要以为我受了欺骗。……你为什么对神和我交往一事感到不可靠呢?……就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许多诏书,所有的人都和我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干王到达天京,他也得到启示。承认我和神的这些交往,比洗礼一万次还要好。”此外,洪秀全劝罗孝全说:“我已经给你写了许多信,你是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我曾经去过天堂?你和所有西方洋兄弟是否理解我的意思?你是否承认上帝神圣的旨意?细细地想一想:日头正照耀着天堂,你还不觉醒吗?你还不相信吗?为了幸福,你相信吧!诚上加诚,忠上加忠。”罗孝全当然不能认同洪秀全的观点。

当时,太平天国另一位重要领袖东王杨秀清的称号为“赎病主”。罗孝全与太平天国的诸位领袖对这个称号产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他认为

赎病主这个称号是极为不恰当的,指出:“它把杨秀清和基督相比,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世主。”对此,洪秀全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在给罗孝全的信中批道:“东王是上帝的爱子,他虽然没有赎罪,但是,他赎病。”

在关于教会的含义和首领问题上,罗孝全一直坚持教会是由改宗者、圣灵使成为基督徒的人以及受过洗礼的人组成的,基督是教会中唯一的最高首领。洪秀全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是一个精神的教会,而太平天国是一个“世俗的、全世界的教会或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天父上帝、天兄耶稣、洪秀全以及洪秀全的儿子组成了一个“四人组”的共同首领。

众多宗教上的分歧使罗孝全与洪秀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大。后来,太平军中的文武将领也对这位外国传教士失去了新鲜感。除了在宗教上碰壁,罗孝全在后期太平天国的政治格局中也屡遭排挤。开始,洪秀全封他为绥天义,又兼任事官领袖,在洪仁玕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当翻译。公元1861年,洪秀全任命他为洋务丞相,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或国务卿。在罗孝全的斡旋下,太平天国同意了英军关于太平军在一年内不进攻上海和吴淞两地四周百里以内的地区的条件。后来罗孝全又获得了洪秀全颁发的关于传教自由的诏书。

公元1861年的一次事件使罗孝全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这年,英国向太平军提出继续保证不进攻上海以及太平军保证不进攻九江、汉口和镇江的要求。洪秀全严词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此后,中英关系急剧恶化,罗孝全对太平军的举动十分恼火。同时,太平军也对罗孝全的政治措施不满起来。

公元1862年,在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罗孝全从干王府出走,逃到了停泊在南京城外江面的英国兵舰“狐狸先生号”上。对于出走的原因,罗孝全在公元186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道:“我先前曾经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但是,在他们那里住了十

五个月,我密切地观察了他的活动——政治的、商业的和宗教的——我已经完全地革面洗心,坚决反对他们。……洪秀全对我非常友好,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结果变成了滑稽戏,在传布基督教方面完全无用。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他自己和耶稣放在同等地位。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构成对一切的统治者。”从罗孝全这段话中,能够很轻易地看出洪秀全的宗教症结所在,可见“一位宗教狂人”比单纯的异教徒还要可怕和疯狂。

罗孝全的传教活动,虽然不像先前来华的几位传教士那样饶有成果,但是,他通过与洪秀全的接触,把自己信奉的宗教信仰带入到中国广大的南方地区。可以说,也是相当有成就的。他所忠于和记录的事实,无论是对当时文化的发展状况还是对宗教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罗孝全与洪秀全之间几个月的接触和交往,造就了天王主体思想。这个课题,一直为历史学家津津乐道。

第七节 闽南使徒

——英国教士领袖杜嘉德

杜嘉德(1830—1877),英国人。他出生在一个长老会牧师家庭,长大后成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是把近代基督教传入台湾的先驱,他编制的诗集《养心神诗》以及西方音乐理论著作,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杜嘉德牧师不仅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还是一位充满才华的诗人。他来华后共在中国福建省的南部地区居住了22年,把基督福音带到了闽南的广大地区,因此也被称为闽南的使徒。

梦回

满腔豪情，怎禁得，一番风雨

杜嘉德是家庭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受长老会的影响很深。公元1851年，21岁的杜嘉德顺利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公元1855年，他又前往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学习神学。由于成绩优异，杜嘉德在这一年被正式批准成为英国长老会宣教士。

不久之后，长老会派遣他和另一位宣教士宾威廉牧师一同乘船前往香港，准备到中国传教，他欣然而去。在旅途中，杜嘉德得到了宾威廉牧师的指点，对教义掌握得更加深入了。更让他感到受益匪浅的是，他从威廉牧师那里学到了一些传教的方法，这些崭新的开始让他兴奋不已。6月，他们辗转到达了现在福建省的厦门，开始在那里传教。尔后，他俩把战线转移到了安海镇。

安海镇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是晋江的文化古镇。杜嘉德开始觉得在港口城市传教应该会比较轻松的，毕竟那里的居民接触的外国人多，容易接受教会思想。但是，杜嘉德在安海的传教活动遇到了重重困难。他没有想到，这竟是基督教第一次传入泉州地区。

杜嘉德刚到那里时，当地的百姓并不欢迎他，经常向他投掷一些砂石，后来还不准他租赁安海的房屋居住。杜嘉德在安海无法立足，只好乘船暂时返回厦门。

公元1858年，经过周密准备的杜嘉德再次乘船来到安海镇。他悄悄地租赁了一间当地的民房作为传教的讲堂。但是，当地百姓并没有改变对杜嘉德的看法，多次聚众将讲堂捣毁。后来，杜嘉德只好把讲堂迁往玄坛宫后蔡宅私塾。没想到他的这个举动竟然引发了当地绅士阶层和更多民众的愤怒，致使他在安海的传教活动一直停滞不前。

杜嘉德与当地百姓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并被打昏。晋江一些关于宗教方面的记载显示了教案发生的过程。

为了在安海站稳脚跟,杜嘉德用微薄的钱财与当地的一些小混混拉上了关系,让他们保护自己在安海的传教活动。这样,当地的人们对杜嘉德的印象更加不好了。一天,一群小孩子把在街上行走的杜嘉德围了起来,并对他指指点点嘲笑起来。杜嘉德本来只想把这些小孩子吓走,没想到其中的一名儿童因为摔倒而受了重伤。当地人以为杜嘉德杀了人,就聚拢起来准备将他暴打一顿。杜嘉德在危急的情况下只好躲到了讲堂之中。愤怒的人们纷纷冲进讲堂,向他投掷石块。他在众人的围攻下昏死过去。后来,讲堂房屋的主人见势不妙,怕惹上人命官司赶忙将他拖进屋子抢救。杜嘉德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醒转之后,他马上乔装改扮逃到厦门,向英国驻厦门领事报告了这件事。英国领事一面积极组织军队前往安海镇压,一面通知清廷,让他们对福建地方施加压力。

在政府和军队的干预下,安海地区渐渐平静了下来。公元1862年,杜嘉德在安海镇成立了漳泉大会。为了改变自己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消除当地人对他的戒备心理,他专门为设立的教会制定了一些信条,其中就有“戒除鸦片”一条。

对于安海教案爆发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也有人说教案爆发于公元1856年,即杜嘉德刚刚到达安海的那一年。

公元1863年,杜嘉德离开安海前往泉州城南门外桥尾街传教。但是,他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也经常受到当地百姓的突袭。到了公元1865年,整个泉州地区还只有安海镇一个堂会,教徒也只有30人。虽然杜嘉德在泉州地区的传教并不顺利,但是基督教长老会的势力已经逐步渗透到了泉州城内。

公元1866年,泉州地区的反洋教形势有所缓和,杜嘉德趁机扩大了他在泉州城内的活动范围。他的传教活动得到了泉州知府的支持。泉州知府为了讨好英国,发出告示禁止百姓“毁抢教堂”。此后,长老会在泉州的势力不断扩大。后来,杜嘉德创办了南安丰州教会学堂。

杜嘉德在传教时,意识到闽南话是传教活动的重要工具,便开始认真地学习闽南话。为了把闽南话集结成书,每到一地他都把新听到的闽南话记下来。长此以往,杜嘉德搜集的闽南话已经十分丰富了,包括以厦门腔为主,以漳州、漳浦、晋江、永春、惠安、安溪、同安、长泰、南安、灌口等腔为辅的语言。

公元1873年,在其他几位牧师的协助下,杜嘉德编译完成了《厦英大辞典》,也被称为《厦门音汉英大辞典》。这本辞典是第一部大型厦门腔白话华英辞典,是外国人对中国方言加以系统整理的一个成功例证。杜嘉德在辞典中用英语说明字词发音、意义用法。这本书一出版,很快就成为学习闽南语的宣教士、商人、旅行者、船员、通译、学生等人的必需工具。整部辞典中没有一个汉字,音节只用罗马拼音标注。没有汉字一方面是这本书的缺点,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优势,为学习闽南语的人减轻了负担。此外,杜嘉德对于植物、动物或医药方面的词汇较少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后来,他因为编纂这本辞典的成就而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虽然杜嘉德在传播宗教的活动中表现得过于急躁,有时甚至还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他在中国宗教发展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传教中,他经常从事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工作,以致身体每况愈下。从外表上看,他的外貌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公元1877年,杜嘉德的身体更加虚弱。7月的一天,他突然受到霍乱的侵袭,腹泻不止。为他治病的医生经过诊治认为他的病已经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就劝他尽早留下遗

嘱。杜嘉德劝慰周围的人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之后，年仅47岁的杜嘉德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传 奇

1. 众望所归的传教士领袖

杜嘉德在长期的传教活动中形成了严格的自律观念，并且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进行周密详尽的计划。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放到了传教活动中，多年来没有丝毫懈怠。

在厦门传教时，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都会按照原定计划外出传教。有时为了在准确的时间到达传教地点，他要在天亮之前趁着夜色赶路，连续走几十千米的路程对他极为普通的事情。此外，他是众多在华传教士的领袖，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很多传教士在遇到困难时都要请求他的帮助或听取他的建议。

公元1877年，所有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会议。前来参会的传教士大部分来自于英美两国，因此大会决定在英美两国的传教士中各选出一名主席。杜嘉德深孚众望，理所当然地当选为英国方面的主席，与美籍主席孙罗伯轮流主持大会。

在大会中，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他号召各宗派的传教士能够团结一心，不要因为各自的宗派利益纷争而影响传教活动。

杜嘉德对中国当时的基督教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发展情况可以按照行政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现在的福建，浙江，广东的中部、东部与江苏的南部等地区，这些地

区是基督教各教派较早的来华据点,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因此不宜新教派加入;第二个层次是现在的东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的西部、江苏的北部、山东与直隶等地区,这些地方的基督教传播情况刚刚开始,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新的教派可以考虑来这些地区传教;第三个层次是现在的蒙古、湖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广西与云南等地,这些地方还没有基督教传播,最适于新的教派发展。他对中国整体基督教传播情况的分析人情入理,切合实际,既不会疏漏任何地区,也可以避免传教士在资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

鉴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特点,杜嘉德还在大会成员的要求下给西方教会写信,请他们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他在信中写道:“在中国的许多福音战场上,我们都必须孤军奋战。除了孤军之外,我们也都已准备被过量的工作所吞没。事实上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承担了过量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中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健康大受损害,甚至英年早逝。”

这似乎是他对自己传教活动的总结。两个月之后,杜嘉德去世。在他的倡议下,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摒弃了以前存在的教派观念,由此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

2. 台湾宣教的前驱

现在,很多人认为最早来到台湾宣传近代基督教的是长老会的马雅各医生与马偕医生。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第一个来台湾宣传长老会基督教的人应该是杜嘉德。他首先听到了台湾民众对宗教的呼声,并把这呼声转达给西方教会。

公元1860年,杜嘉德乘船由厦门渡海来到了台湾地区。他在那本港(今淡水)登岸,在那里逗留了几天。那时他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了。到达台湾后,他惊喜地发现虽然厦门与台湾有海峡相隔,但语言上却

是相通的。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令他忧虑的现象,就是台湾地区还没有基督教传播。在几天的旅行中,他不仅被宝岛台湾美丽的景色吸引,也为如何拯救台湾人的灵魂而着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于九月十九日离厦门,二十四日安抵本港。……这市镇有疏疏落落的几条长街,居民或有四五百人,确数多少,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很难作正确的估计。我们还访问过附近唯一的大市镇艋舺。……整个地区为福建漳、厦一带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闽南话,而台湾全岛也以闽南话为普遍。”

因此,从台湾回来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西方教会写信,请求教会把台湾作为新的宣教场所。他在信中写道:“跨过海峡,仍通行着同样的语言,这是很不平常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往往隔了一百里,语言就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这封信揭开了台湾宣教的序幕,被形象地称为“马其顿的呼声”。

在杜嘉德的呼吁下,几年之后,英国长老会果真派出了马雅各医生到台湾传教。在杜嘉德的陪同下,马雅各医生立刻在台湾展开了传教活动。他以台南为中心,在为当地人医疗的基础上一步步展开宣教活动。直到马雅各医生的传教活动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走入正轨之后,杜嘉德才离开台湾返回厦门继续传教。

3. 与众不同的诗人和音乐家

19世纪影响台湾基督教传播的诗册,以杜嘉德编制的《养心神诗》最有名。《养心神诗》是1814年,由伦敦宣道会第一位驻华宣教士马礼逊在广州主编的30首诗歌,后来被出版成圣诗。

早在1862年,杜嘉德就曾编制过《漳泉神诗》,意在传教活动中吟唱。1868年,杜嘉德总结自己的传教经验在厦门写了一本汉文西洋乐理著作《养心诗调》,以便在厦门传教时使用。这本书以西方流行的简易乐

理和多首马礼逊编制的《养心神诗》中的诗歌为主要内容。杜嘉德利用这些作为传教的教材,一边向教徒们讲授教义,一边教他们吟唱诗歌,以增强教徒对教义的理解和兴趣。此外,他还编制了一些其他书集,如《乐法启蒙》、《乐理颇晰》、《西国乐法》等。这些书籍为杜嘉德编制《养心神诗》做了充分的准备。

《养心诗调》、《乐理颇晰》、《西国乐法》是3本汉文音乐理论书籍。杜嘉德在撰述这些书籍时,只给《养心诗调》加了标点,其余两本都没有标点。他在《养心诗调》中以诗册为范例阐述了明音、音阶、声部构成等;在《乐理颇晰》中进一步解释了调性、转调;在《西国乐法》中阐述了以五线谱、音符等西式记谱法以及升降记号和调性关系。

杜嘉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西洋圣诗融入东方人的生活之中。在著述《西国乐法》的时候,他最初以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十二地支,来对应西方黑白键的十二个音。但是,后来他发现那样做会把本来很简单的西方五线谱转化得十分复杂,就直接把五线谱载入书中,并开始以五线谱概念直接切入三声部、四声部的实例。

公元1871年,杜嘉德编制了由59首诗组成的《养心神诗》,并由马偕医生带到台湾。从此,这本59首版《养心神诗》得以在台湾传播开来。但是,流传到台湾的《养心神诗》的诗册本身并未附谱。于是,人们把杜嘉德《养心诗调》后半册所附的42首谱例作为《养心神诗》乐谱的主要引证来源。这本诗集是台湾后来圣诗创作的基础。

从杜嘉德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比较恍惚的形象。作为一名学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人物,但是若将文化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事情往往会变得复杂许多。

杜嘉德的传教活动,最大的功绩是将基督教带入了中国,带入了台湾,并且编写了许多诗歌和乐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但是,他在传

教过程中也有冒失的时候,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人们普遍对英国仇恨的心情,更何况他在自己受袭后请求了政治干涉,这也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他的活动并不得人心是可以理解的。

文化上的斗争,有时就是政治上斗争的延续,错误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

但不管怎样说,杜嘉德对中国东南地区的文化建设还是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历史都会铭记。

第八节 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

“假使我有千磅黄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戴德生

戴德生(1832—1905),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是一位从英国来华的传教士。他出生于英国约克郡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普通家庭,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事业,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戴德生创造的以极少的经费进行传教活动,自愿忍受艰苦的条件,自立自传,不接受津贴的传教模式被称为“戴德生模式”。

梦 回

1. 远方的召唤

在戴德生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决定把这个孩子献给主。他一出生,父亲就抱着他向神祷告。待他年龄稍微大一些,识字之

后,他的父母就开始每日教他读经。因此,当同龄的伙伴还在四处玩耍的时候,戴德生已经学会了在每天的早餐前和黄昏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中默默地与神交流。他发现与神交流的时候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当时,来华传教士麦都思写的《中国》一书成为基督教家庭中除经书之外最受欢迎的读物,戴德生家也不例外。在书中,他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中国的国家,那里的4亿人民还没有得到主的救助。于是,戴德生从小就立下了到中国传教的志向。当牧师问戴德生将来的志向时,他坚定地回答要到中国去传教。但当那位牧师问他怎样到达遥远的中国,又怎样进行传教时,戴德生迷茫了,年少的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尽管如此,到中国传教的信念在他心中仍然十分坚定,没有丝毫动摇。他想了一下,回答说自己可以像耶稣基督与12门徒在犹太传教时一样,腰袋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主供给一切所需。牧师慈爱地告诉这个年轻人,那种传教的方式在基督在世的时候可以,但在那时却行不通。

此后,戴德生开始认真地思考牧师向他提出的问题。是啊,凭借什么力量才能把基督教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发展起来呢?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又把麦都思神父的《中国》找出来进行反复研究,来学习传教的方法。他发现在中国医疗传道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于是,戴德生便准备学医,为将来在中国传教做准备。他来到了赫尔市接受了医学和手术方面的专业训练,并同时担当一名医生的助手。起初,他住在一位亲戚家里,用自己的工资过着较为闲适的生活。但是,当他决定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捐献给基督教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困难。当时戴德生薪水很低,如果捐献给基督教,剩下的薪金就不足以支付他在亲戚家中的生活费用。于是,他甘愿搬到了生活费用非常低的城郊,租了一间极为廉价的房屋居住。这样,他不仅在房租上可以节约一笔

钱,而且还可以自己安排饮食,从中节省一些钱。后来,他又发现一种粗麦饼的价格极为低廉,但味道却比面包好很多,于是就把这种粗麦饼当做早餐。因为青鱼比牛油便宜得多,他便把青鱼夹在粗麦饼中。他的午餐更为简单,通常只是烤马铃薯和牛脚,偶尔用青豆代替马铃薯,算是改善生活。他还用1便士买些红叶,放在醋里浸泡制成腌菜。

这样的节俭生活使戴德生奉献给基督教的钱财越来越多,甚至占到了总收入的3/5。他丝毫没有感到生活的穷困,反而十分快乐。他记述说:“整天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欢愉,每天都是我快乐的经验。神,甚至我的神,是光明活生生而真实的!我一切能做的,只是喜乐地侍奉他。”

戴德生在研读经文与每天的祷告中不断感觉到主向他传达让他到中国传教的旨意。但由于学医还没有结束,他只能尽力做好远行传教的准备。他把自己小书室和小衣橱中多余的书籍和衣服整理出来,分送给一些贫苦的邻居。

2. 神父,祈祷,海上的奇迹

公元1853年,21岁的戴德生再也等不及了,即使还没有从医学院毕业,也决定前往中国传教。当时,他是以中国布道会成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来的。

来华之前,中华传道会在他乘坐的“达姆福利斯号”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戴德生的母亲也专程从家乡赶到了利物浦。在母亲的祷告声中,戴德生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祖国,准备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教中去。他在来华的路途中遭遇了很多大风大浪,但都幸运地化险为夷。

“达姆福利斯号”刚刚起航不久,就遇上了海上的大风。当时滔天巨浪向航船打来,好像要将它吞没一样。挣扎良久,航船才勉强驶出麦士河口。但是,后来他们在爱尔兰海峡漂荡了12天,也没能出海。9月25

日,航船漂到了嘉拿温湾,与海岸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离岸边的岩石只有几米之遥,航船眼看就要触礁了。这时船长问戴德生,我们只能再活上半个小时了,你对主召唤你去中国传教,却遇上了这样的灾难有什么看法?戴德生不但没有对面前的灾难感到紧张与恐惧,反而表现得十分从容。他回答说,我对主的安排并没有什么抱怨,我坚信一定会化险为夷。假使遇险就是主对我的安排,我也会顺从他的旨意。

幸运的是,几分钟之后,海上的风向发生了变化。船摆脱了触礁的危险,顺利地驶出了嘉拿温湾。尽管船脱险了,但船的斜桅在长时间的风浪中出现了摆动的迹象,其他地方受损也比较严重。当航船驶入大海后,他们一边进行必要的修补,一边向目的地前进。随后的航程也不顺利,原来波涛汹涌的大海突然变得安静起来。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没有风,航船的行驶速度就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只能在日落后的微风中勉强前进,待天明风停后就顺着海洋漂流。

海上的风险还远远没有结束。后来,他们来到了位于南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北部,航船离陆地只有短短 30 海里的距离了。可是,这时船长却突然发现有一股时速达到 4 海里的洋流把船带向暗礁,船眼看就要与暗礁相撞了。

情况紧急,水手努力试图改变船的行进方向,使船驶离海岸,但无济于事,航船还是在洋流的带动下以极快的速度向暗礁冲去。船上的人都失望极了,静静地站在甲板上不知所措。经验丰富的船长也只得告诉船员们大家等待事情的结局吧,现在的情形,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戴德生听完后,突然站了出来,高声说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向基督祷告。他带领大家一起祷告,请求主给予指点。船上的所有基督徒一边祷告,一边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等候主的旨意。

戴德生在自己的房间中祷告了一会儿,似乎感觉到主已经接受了他

的请求,就赶紧来到甲板上观察。他看见船桅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风中颤动,就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来。几分钟之后,航船就在大风的推动下逆转了航向,向大海深处驶去。戴德生和船上的人员就这样脱离了险境。

3. 首次来华工作不顺

公元1854年在海上经历了大风大浪后的戴德生终于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当时,英国虽然已经凭借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西方人可以停留的地方仍旧只有上海和其他四个因条约被迫开放的口岸。

戴德生发现内陆的基督教传教士非常少,便决定到内陆地区去传教。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戴德生来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清王朝与太平军正在激烈的交战中,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他为自己的传教活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决定首先从上海起程前往南京,继而进一步深入内地传教。但是,他到达上海没多久,就发现在上海立足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去南京了。

戴德生抵达上海的时候,他怀着感恩的心写道:“对于终可踏足这国土,我的感受实在是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好像山洪暴发一般的澎湃,挂着感恩的泪水。”但他并不知道上海正处在战乱之中,一股被称为“红巾”的叛军与清军的对抗。戴德生很快陷入困境:上海的英国使团并没有收到戴德生来华的通告,戴德生准备投靠的一位朋友也已经去世。

正在戴德生为无处落脚而忧虑的时候,一位素不相识的传教士帮他解了围。他邀请戴德生暂时居住在伦敦会的房子里,直到他找到合适的居所为止。这只是戴德生在华坎坷的开始。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可能降临的战争灾难,而且还要负担沉重的生活费用。当时,上海由于战争的原因,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很昂贵,不是一个清贫的传教士所能承受的。

他没有钱买煤生火,因此在隆冬季节也要住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房间里。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处境非常不妙。乐克医生暂时收留我住在他那里,因为房子缺乏……没有人可以住在市区内……我写此信时战争正在进行,房子亦因落下的炮弹摇动起来。”

戴德生身上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为了摆脱困境,他曾经几次向伦敦的教会写信求助。但是那些信件发出后都石沉大海。冬天过去了,戴德生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更加困窘了。后来,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安身的房子,这样才算在上海正式安定下来。

安顿好了生活,戴德生认为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传教活动中去的时刻到来了。他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药房,开办了一家基督教学校,每天在自己的住处定时举行早会和晚间聚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在上海的传教活动初见成效。同时,在上海经历的一些事情使他不断反思与改进传教方式。一天,戴德生在外出布道时发现人群中一个人对他的讲解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一副聚精会神、深有感触的样子。他非常高兴,待布道结束后就主动找到那个人说:“我刚刚看到你对我的讲解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是不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说出来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解释。”那个人说出的话令戴德生大吃一惊。那个人说自己是一个裁缝,并没有听他在讲什么,只是看他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很不理解,有些地方怎么也想不通。当时,戴德生来华不久,穿的还是西装,他并没意识到这种服装会带来什么影响,不解地请裁缝讲明。裁缝说他在这么冷的天气下穿前面开口的服装难道不冷吗?而且西装袖子上多缝了三个扣子,有什么实际作用吗?何况西装看起来很硬,远不如中国人穿的棉布衣服舒服。

听完裁缝的话,戴德生才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

使中国人不乐于接受基督教,也会进一步扩大传教士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他认为若穿西装去布道,当地人就会把自己当外人。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服装,改穿汉服。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清朝人,他甚至把自己前面的头发剃光,后边梳一条很长的辫子,把自己的红头发也染成了黑色。为了保持辫子的光亮,他还仿照清朝人的样子把猪油抹在头发上。尽管他对这种生活方式很不习惯,但为了传教还是忍受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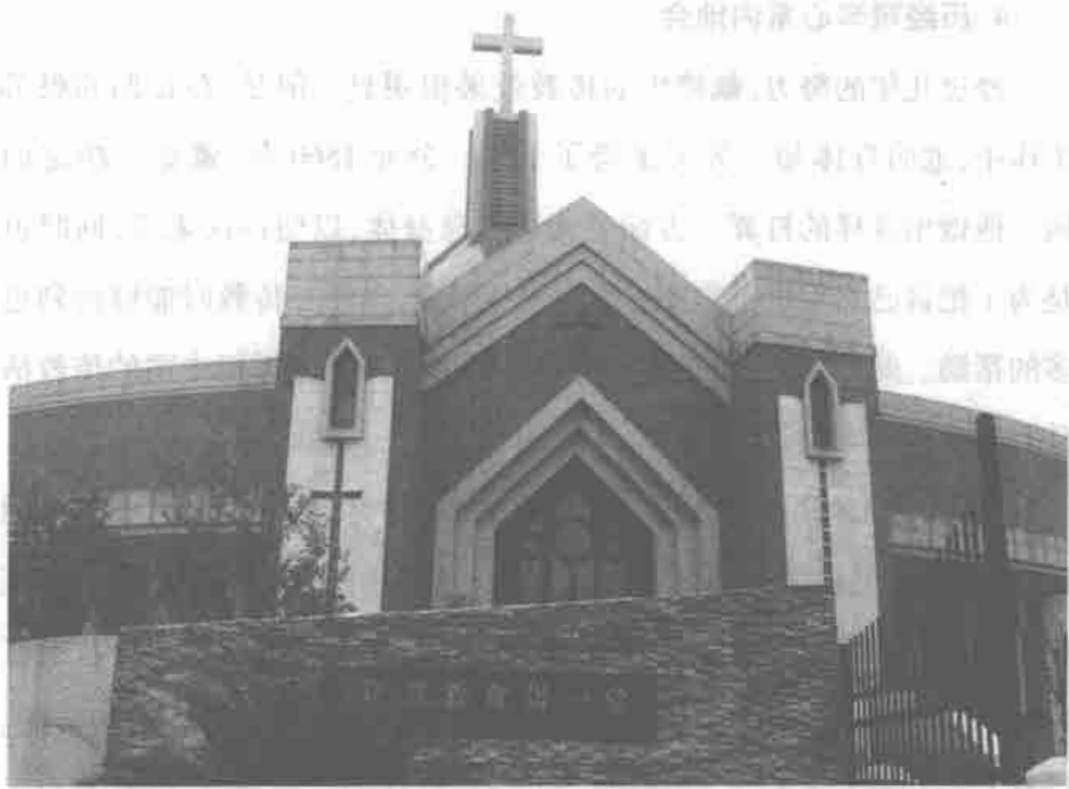
4. 历经艰辛心系内地会

经过几年的努力,戴德生的传教效果很明显。但是,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垮了下来。公元1860年,戴德生决定回国。他做出这样的打算一方面是为了养息身体,以便再次来华,同时也是为了把自己当年没有学完的医学课程学完,以便在传教时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此外,他也想趁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怎样把中国的传教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

当时,清王朝虽然已经签订了《北京条约》,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的内地自由传教,但很少有人真正深入内地。中国仍有11个省份还没有基督教传教士。戴德生希望这些省份至少有2名传教士定居。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在中国创立一个独立的传教组织更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于是,公元1865年6月,戴德生在英国伦敦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存入了只有10英镑的小额存款,成为中国内地会成立的标志。这个组织是戴德生专门为中国设立的,主要职责是召集那些愿意到中国的传教士,并在他们传教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中国内地会成立后,戴德生就开始正式招募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其间,他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的基督教小册子,向英国的传教士展示中国每天都有3.3万人死亡,但这些人却没有基督救恩。在他的号召下,很多传教士都决心前往中国传教。

公元1866年5月,戴德生选取了18名传教士,带领着自己的妻子与4个孩子,乘“兰茂尔”号离开英国,向中国进发。经过5个月的旅程,他们终于到达了中国。戴德生此次来华选取的第一个传教地点是浙江的杭州。他想以杭州为传教基地,把基督教迅速发展到附近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如温州等。他组织修建了中国内地会在杭州的第一座教堂——崇一堂。



由戴德生创建的崇一堂经过百年洗礼,虽外表已翻新,但其宗教的本质仍和初建时一样

公元1868年8月,戴德生到中国南方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江苏扬州传教。他计划以扬州为基地,把基督教迅速扩展到中国的中部地区。但是,他在扬州的传教活动很不顺利,发生了著名的“扬州教案”。当时位于扬州皮市街的内地会传教站受到扬州本地上万名暴徒的攻击、抢劫。传教站内的财物被抢劫一空,还被大火烧毁。戴德生冒险同另一宣教士到扬州衙门求援。但扬州官员对他的报案拖宕推诿,两个小时后

才率兵镇压。戴德生正在孕期的妻子马利亚只得跳楼逃生,因此而负伤。后来这场教案在英国政府与军队的干预下平息了下去。这对刚刚成立不久的内地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公元1870年,戴德生再次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他深爱的妻子马利亚因病去世。但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他仍旧致力于传教事业,没有丝毫动摇。在他的努力下,到公元1885年,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已经增加到了225位。他们在全中国建立了50多个教会。公元1887年,在戴德生的带动下,自愿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多达600多人。由于资金条件的限制和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内地会一时接收不了那么多传教士,只选了其中的10名来中国传教。

公元1888年,应美国政府之邀,戴德生前往美国访问,受到了慕迪先生的热诚款待。他趁机在美国成立了内地会分会。公元1889年,瑞典女王邀请他到瑞典一行。内地会的规模和影响更大了。

到19世纪末期,内地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传教会。1900年,内地会遭到了建立以来最大的损失。有多达58名传教士因抢匪之乱而惨遭杀害,此外还有21名传教士的子女同时遇难。戴德生闻讯后十分悲痛,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此后,戴德生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1905年6月1日,已经73岁的戴德生强支病体在湖南长沙布道。3日,他在劳累一天之后回房休息时突然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往江苏的镇江,与之前去世的两个子女和爱妻马利亚安葬在了一起。

戴德生去世时,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已经增加到828名。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这些传教士散布在中国的18个省份,边远的蒙古、新疆和云南也有他们的足迹。仅1905年一年,加入基督教的信徒就多达2500人。

戴德生几乎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基督教。他的碑文上写着



戴德生逝世当天与同工合照

“A MAN IN CHRIST”，即“他一生常在基督”的意思。

传 奇

1. 戴德生的几个故事

年少的时候，戴德生就养成了系统的读经习惯。他 68 岁的时候说自己读经已经有 40 年的历史了，读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圣经》40 遍，大约每天读旧约三章、新约一章、诗篇一篇。有时因思想贯串，读得多些；有时因为多默想，读得少些。他几乎每年总把《圣经》读一遍。他习惯早起，守晨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改变。他解释说：“哪有先开音乐会，然后才调和乐器呢？每天读经，祈祷，先与神调和，然后再与人见面、办事。”因此，他能比一般人更能明白《圣经》中的道理。

一次，戴德生在宁波布道时，感化了一位曾经在很多宗教领域寻找真理的人。当时，戴德生正在向听众讲述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突然，有一名中年人在他讲述的间隙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很多年以来，我和

我的祖先都在寻找真理,但却一无所获。我曾经到过很远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在儒、佛、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听了戴德生牧师的福音,终于找到了能让灵魂安息的真理。从今以后,我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了!”

这个人是在宁波宗教界一位很显赫的人物,是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领导地位的执事。他改信基督教后,就开始随戴德生一起进行传教。一次,他与戴德生参加了以前的佛教团体举行的聚会。他在那些人面前详细地讲述了信奉基督教后得到的平安。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个朋友也在不久之后接受洗礼,信奉基督。他曾经向戴德生询问基督福音在英国传播了多久,当戴德生告诉他已经传播了几百年时,他露出了既惊讶又惋惜的表情,感慨道:“怎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20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一无所得。啊!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在宁波布道的时期是戴德生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布道会付给戴德生的薪俸虽然可以使他的生活有所保障,但布道会却因为借贷薪金而陷入困境。为了避免良心的不安,他决定辞去布道会的职务,依靠自己的力量传教。他不期望得到朋友的支持,也不知道主会不会帮助他。但他认为只要能保证生活的最低限度,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就会把所有的精力奉献出去。因此,在他后来的宣教活动中经常遇到经济困难,即使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后,这种情况仍没有多少改观。

到达宁波1年后,他曾经照顾过一位患上严重天花的美国牧师。牧师去世后,他本应该把当时穿的衣服全部烧掉,以避免传染。但他手里根本没有添置新衣服的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主默默地祈祷。主似乎听到了他的祈祷,戴德生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在两年前失落的一箱衣服。

戴德生建立的内地会每天给当地的穷人派发早餐,数量大概在70份左右。有一天,当他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备了明天的食用之后,发现已经没有任何一文钱了。戴德生不知道以后的早餐该怎样准备,但他深信主会指示他们。正在戴德生祈祷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一张240英镑的支票。于是,第三天前来领取早餐的穷人像往常一样来领取早餐,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还有一次,与戴德生一同布道的派克医生因有事回英国,将宁波的医院和门诊转交给戴德生管理。戴德生很快就挑起重任,每天在众多的病人之间奔忙。但是,最令他苦恼的不是每天的劳累,而是资金的紧张。派克医生临走之前,只留下了1月的费用开支。戴德生把自己所有的钱财都捐了出去,但效果并不明显。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仍然相信主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他们的最后一袋米即将吃完的时候,收到了一张从伦敦寄来的50英镑的支票,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但是这张支票的主人远在伦敦,对这家医院的困境一点也不了解。对此,戴德生只能理解为是主的安排。

2. 人最难与之争斗的是心灵

每个人可能都对自己的信仰有过或多或少动摇的时候,戴德生牧师也不例外。他曾经一度怀疑过自己信仰的真实性。

戴德生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督教。但是,他的这个信仰却在15岁的时候发生了动摇。当时,他在一家银行里担任普通的文员。同事们看到他信仰基督教,就经常聚在一起捉弄他,嘲笑他守旧、古板,还故意提出许多对基督教质疑的疑难问题让他解答。15岁的戴德生根本回答不出那么深奥的问题,时间长了就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他改变了自己已经形成多年的基督徒习惯,不再祈祷,不再上教堂,也不担心末日审判的到来。

看到自己的变化,戴德生很苦恼,可又不知道怎么办。他经常对自己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一定会是他虔诚的信徒,跟随他,矢志不渝。但因为他内心已经开始怀疑耶稣基督的真实性,任凭他怎么努力,也无法像以前一样那样虔诚了。后来,他竟然自暴自弃了起来,认为自己肯定不会得到耶稣的救助了。戴德生就这样在信仰上完全堕落了。

一天下午,他待在家中感到非常无聊,就走入了父亲的书房,准备找一本书来消遣。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十分合意的,只得拿起一本《劝世文》看了起来。起初,他并没对这本书有多大兴趣,没想到看了几页之后竟然被一个基督教故事吸引住了。

故事叙述了一个患有严重肺病的煤矿工人在病危之前,有些基督徒来看望他,向他传讲神道。其中,他对一段经文印象颇深——耶稣被钉十字架,担负世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这位矿工认识到这些话的意义,接受了主。当戴德生读到“成了”时,不禁思索起了究竟成了什么。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成就了一个完全圆满的救赎,为我们的罪,已付了赎价;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这时,就像有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一样,戴德生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再次坚定了基督教信仰。后来,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成就了一生的辉煌。

戴德生死于中国,距今已有93年了,由他一手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也已有143年的历史。戴德生一生向善,他经历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人最痛苦的生离死别。但是,他的生命始终是在奉献中度过的,他把自己的满腔热血留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自己传教的诺言,是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位著名人物。从此,内地会在中国生根发芽,终于长成参天大树,戴德生的梦想实现了。

附录 古代来华主要外国人一览表

人物名称	国家	生卒年代	来华朝代	来华时间	来华活动	主要贡献	官职或称号
迦叶摩腾	天竺		东汉	68年	传播佛教、翻译佛经	翻译了《佛说四十二章经》	中国最早的外国和尚
竺法兰	天竺		东汉	68年	传播佛教、翻译佛经	翻译了《佛说四十二章经》	中国最早的外国和尚
安世高	古安息国	约2世纪	东汉末年	148年	传播小乘佛教、翻译小乘佛经	翻译了《阿毗达摩》等35部小乘佛经	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
昙无讫	天竺	385—433	南北朝	约5世纪20年代	传播佛教、翻译佛经	翻译了《大般涅槃经》等12部经书	涅槃学派的创始人
菩提达摩	南印度香至国	?—536, 一说528	南北朝	520年	传播佛教	开创了中国的禅学	中国禅宗始祖
真谛	西印度优禅尼国	499—569	南北朝	546年	传播佛教、翻译佛经	翻译了《摄大乘经》等100多卷经书	摄论师的开山祖师
阿罗本	叙利亚		唐朝	635年	传播景教	使景教在中国传播开来	中国最早的景教传教士
卑路斯	萨珊国		唐朝	7世纪50年代	复国	把波斯的宗教、文化带到中国	波斯都督府都督
泥涅师师	萨珊国		唐朝	7世纪50年代	复国	把波斯的宗教、文化带到中国	
阿倍仲麻吕	日本	698—770	唐朝	717年	学习中国文化、从事政治活动	增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交流的先驱、安南节度使
吉备真备	日本	693—775	唐朝	717年	学习中国文化	增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围棋始祖

续表

人物名称	国家	生卒年代	来华朝代	来华时间	来华活动	主要贡献	官职或称号
崔致远	新罗	857—?	唐朝	869年	学习中国文化	增进了中韩文化交流	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
荣西	日本	1141—1215	宋朝	1168年	学习禅学	把正宗临济禅法带到日本	日本茶禅之始
圆尔辨圆	日本	1202—1280	宋朝	1235年	学习禅学	把杨岐派禅法带到日本	日本第一位国师
赛典赤·赡思丁	波斯	1211—1279	元朝	13世纪初	军事、政治活动	治理了云南地区	元咸阳王、云南行省第一任平章政事
札马鲁丁	波斯		元朝	1244至1258年之间	政治、天文、历法活动	制作多种天文仪器,创制了《万年历》	嘉议大夫、集贤大学士
马可·波罗	意大利	1254—1324	元朝	1275年	游历、政治活动	《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介绍到欧洲	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
伊本·白图泰	摩洛哥	1304—1377	元朝	1347年	游历	《伊本·白图泰游记》把中国介绍到非洲	
朴不花	高丽	?—1364	元朝		政治活动		
巴都葛叭答喇	苏禄国		明朝	1417年	政治活动	增进两国政治、文化交流	
利玛窦	意大利	1552—1610	明朝	1582年	传教与科学研究活动	撰写了《天主实义》、《坤輿万国全图》等天主教、科学书籍	荣禄大夫、资政院使
曾德昭	葡萄牙	1585—1658	明朝	1613年	传播天主教	《大中国志》向西方进一步介绍了中国	欧洲的中国通
汤若望	德国	1592—1666	明朝	1619年	传播天主教、科学研究	创制了《崇禎历书》、《时宪历》	中国历史上第一名外国监正、通玄教师
南怀仁	比利时	1623—1688		1658年	传播天主教、科学研究	天文、军备、地理、机械、外交方面	钦天监监副、谥号“勤敏”
徐日升	葡萄牙	1645—1708	清朝	1672年	传播天主教	把西方音乐带到中国	葡萄牙音乐大师

续表

人物名称	国家	生卒年代	来华朝代	来华时间	来华活动	主要贡献	官职或称号
马戛尔尼	英国	1737— 1806	清朝	1793年	外交活动	使清朝人第一次正式接触西方	第一位来华通商的英国使臣
马礼逊	英国	1782— 1834	清朝	1807年	传播基督教新教	把基督新教带到中国、翻译新旧约《圣经》、编纂《华英字典》	
罗孝全	美国	1802— 1871	清朝	1837年	传播基督教新教	建立广州浸礼会传道会	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
杜嘉德	英国	1830— 1877	清朝	1855年	传播天主教	创制了《养心神诗》、把天主教传播到台湾	台湾宣教先驱、闽南使徒
戴德生	英国	1832— 1905	清朝	1854年	传播天主教	建立了中国内地会	中国内地会创始人

